

凤凰文库·政治学前沿系列

# BRITISH NEW LEFT THINKERS

## 英国新左派思想家

张亮 编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BRITISH NEW LEFT THINKERS

英国新左派思想家

1956 年以后，一些欧美国家陆续爆发新左派运动。这其中思想成就最丰硕的要属英国新左派。在该运动实际存在的四分之一世纪（1956 年至 20 世纪 80 年代初）里，英国涌现出一批新左派思想家。他们活跃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在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的“理论的贫困”面貌的同时，将英国打造为一个堪与德法比肩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输出国。即便在该运动已经终结 30 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它的影响。

作为英国战后最重要的思想运动，新左派运动为当代英国思想留下了一笔巨大遗产。即便是在已经被消耗了 30 年后的今天，这笔遗产依旧显得价值不菲。首先，活跃在当代英国思想舞台上的重要左派思想家都出身于新左派运动，他们的思想都以各种方式受到新左派运动的深刻影响。其次，新左派运动提出了许多重大观念，如今它们已经演变成文化研究、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重要理论主题。最后，新左派运动为英国左派政治想象引入了一些新的主题（如英国治理的非集权化、强大的市民社会的重要性等），今天它们再一次成为左派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关注焦点。

上架建议：政治学/马克思主义

ISBN 978-7-214-06372-4



9 787214 063724 >

定价：32.00元

凤凰文库·政治学前沿系列

# BRITISH NEW LEFT THINKERS

# 英国新左派思想家

张亮 编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新左派思想家/张亮编.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7

(凤凰文库. 政治学前沿系列)

ISBN 978-7-214-06372-4

I. ①英… II. ①张… III. ①政治思想—研究—英国  
IV. ①D09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46727号

---

书 名 英国新左派思想家  
编 者 张 亮  
责任编辑 刘 焱  
装帧设计 武 迪 姜 嵩 许文菲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mm×1304 mm 1/32  
印 张 11.125 插页 4  
字 数 292 千字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372-4  
定 价 32.00 元

---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 编者的话

1956年以后,一些欧美国家陆续爆发新左派运动。这其中思想成就最丰硕的要属英国新左派。在该运动实际存在的四分之一世纪(1956年至20世纪80年代初)里,英国涌现出一批新左派思想家。他们活跃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在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的“理论的贫困”面貌的同时,将英国打造为一个可与德法比肩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输出国。即便在该运动已经终结30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它的影响。

### 寻找共产党和工党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共产党和英国工党内都积聚了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党员。同时,还有一些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团结在它们周围。然而,不管是在共产党内还是在工党内,也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这些左派知识分子都不占据领导地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都只能默默地专注于各自的学术领域,努力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探索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可能道路,同时以个人身份积极参与和平运动、核裁军运动、反对朝鲜战争等现实的社会主义政治活动。

1956年2月24日深夜,在苏共二十大实际上已经闭幕后,赫鲁晓夫做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了严厉然而非辩证的批判。三个月后,这份秘密报告流传到西方,让欧美左派知识分子极为震惊。各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党员纷纷对各自党内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和建议,希望推动党向一个好的方向发展。在英共内部,以爱德华·汤普森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党员在党内刊物上发表公开信,批评党内缺乏自我批判的风气,认为英国存在马克思主义脱离英国现实和经验的弊病。迫于形势的压力,英共领导层同意汤普森等人创办了一个争鸣性的党内刊物,但很快又借机将他们调离该编辑部。同年10月、11月间,“匈牙利事件”爆发。英共对苏军武装行动的支持,引发了随后的大规模退党风潮,近万名党员(占英共当时党员总数的五分之一,其中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党员)退出英共。退党后,不少左派知识分子选择放弃社会主义信仰、脱离现实政治,而汤普森等人则变得更加活跃,希望能够在共产党的体制之外寻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新途径。

与此同时,亲工党的左派知识分子也遭遇重大思想危机。一方面,进入50年代以后,工党内部否定传统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的修正主义思潮不断壮大,倾向修正主义的工党领袖日益增多。1956年,工党理论家克罗斯兰出版了影响巨大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对修正主义进行了系统、全面的阐述。这让亲工党的左派知识分子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挫败感。另一方面,同年10月、11月间,英国保守党政府为了争夺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勾结法国和以色列悍然入侵埃及,导致苏伊士运河危机和第二次中东战争的爆发。这种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行径让亲工党的左派知识分子对整个英国统治阶级都不再抱有幻想。

在这种背景下,1956年下半年以后,英国各地涌现出了许多左派讨论圈子,吸引了众多知识分子以及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他们打破了以前共产党和工党之间的门户壁垒,紧密地聚集在一起,反思传统左派(共产党和工党)的思想缺陷和政治弊端,探索符合英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寻找实现社会主义的新的“第三条道路”。英国新左派运动就此兴起。作为一种非体制化的思想运动和政治运动,英国新左派主要通过爱德华·汤普森等主编的《新理性者》和斯图亚特·霍尔等主编的《大学与左派评论》向公众进行自我展示。1960年,这两个杂志合并重组为《新左派评论》,霍尔任主编。

## 第一代英国新左派及其历史贡献

英国新左派运动的发起者和最初的思想核心是汤普森等20世纪30年代以前出生的新左派思想家。这些思想家虽然政党属性与思想资源略有不同,但拥有非常类似的成长经历、教育背景和社会经验,所以对很多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立场和态度非常接近。正因为如此,后来人们把他们称为第一代英国新左派。

就学科背景而言,最为活跃的第一代新左派大多是历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这是由英国的社会主义传统决定的。经过战后十年的积淀,他们在1956年前后陆续进入了思想的成熟期。新左派运动的爆发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理论热情,激发了他们的思想创造力,一批高质量的理论成果迅速涌现,其中包括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和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两部里程碑式的经典著作。英国缺乏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理论的贫困”局面由此得到根本改变。

就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而言,第一代新左派的历史贡献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批判、清算了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诠释与建构,树立了一种比较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为英国知识分子重新接受马克思主义铺平了道路。第二,在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研究具体的英国问题的过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和民族化,创造出“文化马克思主义”这一具有鲜明英国特色的理论新形态,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英国的传播和发展。第三,深入发掘英国的社

会主义传统,提出了人道主义和道德对于英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性,使“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成为新左派运动早期的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

## 第二代英国新左派的崛起

新左派运动兴起之初,与第一代新左派并肩战斗的还有牛津、剑桥、伦敦经济学院等高校的一批激进的新左派研究生和本科生。受风起云涌的第三世界革命运动的激励,这批三四十年代出生的青年学生具有更加国际化的眼光和政治追求,渴望掌握理论化程度更高的马克思主义。这与立足英国的第一代新左派存在明显差别。他们也因此被命名为第二代新左派。

对于第一代新左派的理论立场和政治立场,第二代新左派一开始就持某种程度的怀疑和反对。具体地说,他们认为第一代新左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后者倡导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具有浓重的经验主义色彩,“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则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民粹主义的和前社会主义的。不过,在运动的第一阶段(1956—1962年),他们并没有表现出要与第一代新左派分道扬镳的意思。除了羽翼未丰这个原因外,最重要的原因在于:1959年以后,工党内左派暂时占据了上风,这使两代新左派都认为英国历史性地出现了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但是,1961年以后,工党右派重新占据上风。这促使两代新左派的分歧变得不可调和,分裂由此发端。

1962年5月,安德森出任《新左派评论》主编。在他的领导下,《新左派评论》将目光更多地转向了欧洲大陆,希望从那里寻找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以为英国的社会主义寻找到新的未来。借助萨特、卢卡奇、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学说,安德森及其合作者汤姆·奈恩很快对英国的民族性问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即“安德森—奈恩论题”。该论题通过概要式地追溯英国民族性的历史形成,彻底否定第一代新左



派关于英国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判断,认为英国能否实现社会主义的关键已不在于英国工人阶级,甚至不在于英国自身。该论题一经提出,即在第二代新左派中产生热烈反响与共鸣。虽然汤普森随即代表第一代新左派对它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全面驳斥,但并没有能够改变一个基本趋势:话语权已经历史地转移到了第二代新左派手中。

1966年以后,《新左派评论》对后来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而闻名的欧陆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系统译介。这一工作的最重大结果是导致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脱颖而出,成为第二代新左派批判、扬弃“文化马克思主义”,建构革命的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来源。整个70年代,第二代新左派都致力于在各自领域推进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转型,并在文化研究、历史学和历史社会学、文学批评、政治学等领域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历史地看,结构主义转型不仅使第二代新左派获得了大量新的理论资源,理论化程度大幅提高,更重要的是使他们实现了一次方法论创新,从而在“文化马克思主义”已经开辟的学术疆域中,将第一代新左派所开创的各项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扬弃“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非理论化倾向,使已经积累的理论成果获得了一种比较完备的理论形态,具备了世界性传播的现实性。

## 英国新左派运动的终结及其遗产

第二代新左派的结构主义转型对第一代新左派带来了巨大冲击。第一代新左派以不同的方式对此做出了回应,其中,汤普森于1978年出版《理论的贫困》一书,对“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动了极为猛烈的进攻。第二代新左派随即进行还击,一场大争论就此拉开帷幕。

就在两代新左派围绕“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鏖战正酣之际,玛格丽特·撒切尔领导保守党赢得大选,出任首相。随着“撒切尔主义”的强

势推进,资本主义似乎治好了“英国病”,重新焕发出了勃勃生机,社会主义在英国重新变得遥遥无期。这使得新左派运动的存在基础受到严重侵蚀。与此同时,随着英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以及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日益盛行,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70年代初就出现的各种亚政治的新社会运动(和平运动、生态运动、女权运动等)逐渐取代新左派运动成为左派抗争的主要形式。结果,80年代初,当围绕“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论战基本结束时,两代新左派突然发现:自己曾为之奋斗的新左派运动本身已经终结了。

作为英国战后最重要的思想运动,新左派运动为当代英国思想留下了一笔巨大遗产。即便是在已经被消耗了近30年后的今天,这笔遗产依旧显得价值不菲。首先,活跃在当代英国思想舞台上的重要左派思想家都出身于新左派运动,他们的思想都以各种方式受到新左派运动的深刻影响。其次,新左派运动提出了许多重大观念,如今它们已经演变成文化研究、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重要理论主题。最后,新左派运动为英国左派政治想象引入了一些新的主题(如英国治理的非集权化、强大的市民社会的重要性等),今天它们再一次成为左派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关注焦点。

# 目 录

## 编者的话 1

1. 英国新左派的马克思主义 玛德琳·戴维斯 1
2. 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及文化转向 斯图亚特·霍尔 37
3. 雷蒙·威廉斯的新左派政治学 罗宾·布莱克伯恩 53
4. 爱德华·汤普森:作为行动主义者的历史学家 迈克·贝斯 69
5. 爱德华·汤普森的伦理激进主义及其遗产 迈克·肯尼 96
6.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与工人阶级 诺拉·卡林 伊恩·博查尔 111
7. 作为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拉尔夫·密里本德 列奥·潘尼奇 146
8. 自由、欲望和革命: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的早期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保罗·布莱克里奇 173
9. 斯图亚特·霍尔的学术之路 詹姆斯·普罗科特 204
10. 汤姆·奈恩的民族主义理论:历史发展与当代批判 尼尔·戴维森 243
11. 佩里·安德森的早期新左派政治学 保罗·布莱克里奇 293
12. 伊格尔顿学术思想概览 大卫·爱德森 325

# 1. 英国新左派的马克思主义

玛德琳·戴维斯

斯图亚特·霍尔曾说,英国新左派“一向把马克思主义视为问题、苦恼、危险,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过,他从来都没有把他自己归类为“在与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的状态中工作的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开展研究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以马克思主义进行工作的人、努力工作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sup>①</sup> 霍尔尽管说的是他自己,不过,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这种批判而又值得尊敬、充满创造性的接近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应当说也适用于更普遍意义上的英国新左派。确实,在那种多样性的环境中,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在与承接了不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其他流派的相互比较中,不同的流派间都出现了意见分歧。在某些阵地上,特别是与 20 世纪 70 年代围绕在《新左派评论》周围的那一大批人有关的阵地上,就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家那里得出的那种革命图景而言,出现了某种理论上的退缩。相反,一些新左派人物则视马克思主义为一种需要从根基上进行再考察的传统:早在 50 年代,查尔斯·泰勒就质疑它是否具有解决道德和伦理问题的能力。有的人的思想发展轨迹

---

<sup>①</sup> S. Hall, 'Cultural Studies and its Theoretical Legacies', in L. Grossberg et al., ed.,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92, p. 279.

存在相当大的改变：最初倡导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爱德华·汤普森后来离开了任何明确类型的马克思主义。而威廉斯的发展轨迹则刚好相反，随着工作的深入，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不过，在所有不同的新左派知识分子流派都以不同的方式介入了阐明、提出——作为1956年事件及其后果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个意义上，的确存在一个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的新左派规划。当然，这并不是要暗示：所有新左派思想家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新左派可以从根本上被理解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团体。相反，这不过是说，英国新左派与众不同的重要之处就在于，它持续努力在特殊的、深刻影响了新左派运动的思想发展历程的英国意识形态语境和政治语境中，引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对原先的理论进行再解释或批判。正因为如此，它对英国政治理论图景做出了真正创造性的、实验性的理论干预，并且，它确实发生过持久影响，虽然后来出现了冲淡马克思主义的趋势。

本文追踪了新左派在与某些经过精心挑选的、有重要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结合中不断发展的历程，目的在于推进人们对更宽泛意义上的当代英国政治思想发展史的理解。新左派将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整合进了英国的知识文化之中。这不仅仅是一个将外来传统输入或者嫁接到本土文化上的问题，而更像是一个在与英国理论传统进行创造性对话的过程中引进、吸收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意识形态“本土化”过程。不过，与英国新左派的历史编纂学有关的那些主要的假定并不能很好地提供对这一过程的发展机制的更充分理解。因为既有的历史编纂学倾向于聚焦英国新左派的内在环境而不是外在环境、追问它的内在断裂而不是它的更广泛的重要性，因此，往往看到的就是不同新左派流派或“代际”之间的尖锐差异。所以，本文第一部分与新左派历史编纂学中的某些观点进行了辩论，并提供了一种重点关注共同的论题、发展的连续性以及思想的杂交生长的解释。有人认为，新左派最好是被视为一种危机

的产物，一个力图在特定的英国条件下对追随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进行批判性、创造性反思的思想实验室。这项计划在不同时间强调不同的重点，但对最终的重点，所有的流派都做出了贡献。这一解释为后面关于新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接合的总体看法提供了基础。在那一部分，我试图表明：不同的新左派流派或思想家是如何采纳、再解释那些有重要影响的新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以及他们是如何将其运用到英国的理论语境和政治语境中去的。

## 对英国新左派的解释

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新左派”这一术语是与 20 世纪 60 年代世界范围内青年激进主义的高涨——它最终在 1968 年的骚动中达到了高潮——联系在一起的。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它通常被用以描述 50 年代后期发端的那种旨在开辟新的理论—政治空间、寻找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替代选择的努力。在空间上，它延伸到了西欧和东欧、美国以及更广阔的地域，在时间上，经 1968 年运动的推波助澜至少持续到了 70 年代早期。<sup>①</sup> 英国新左派既与这种更广泛意义上的新左派激进主义运动相互交织，但它也有自己特殊的、更早可以追溯到 1956 年的起源。人们通常认为它是一种具有独特性的运动。它的独特性既存在于它的实质——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理论运动——之中，也在于它受到了（前）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更加强烈的影响。

英国新左派是在对已经察觉到的一种双重危机的反应中兴起的：这一危机既是赫鲁晓夫 1956 年“秘密报告”之后世界共产主义和英国共产主义的危机，也是英国和更大范围内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这项事业

---

<sup>①</sup> G. Katsiaficas, *The Imagination of the New Left: A Global Analysis of 1968*,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7, p. 27. 参见其中对共同因素的讨论。



主要是由一些与新闻出版、学术研究有关的知识分子贯彻的。<sup>①</sup> 回避传统的组织形式、深切关注文化、折衷主义的理论影响,这三点将新左派与其他宣称占据了这种“第三”空间的社会主义形式——如托洛茨基主义——区别开来。不过,除了这些一般性的评论,在如何界定英国新左派问题上存在的共识很少;事实上,几乎不可能把定义问题和解释问题割裂开来处理。这种方法论问题是由其本质导引出来的: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旨在消解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学术工作和政治实践之间的传统界限的组织构成,确切地讲,它为学术讨论和社会实验提供了一个同场竞技的舞台。正如迈克·肯尼的评论所言:“因此,理解它的历史和‘意义’是相当复杂的工作,不同层面的学术观点和政治行动都需要得到讨论。”<sup>②</sup>

这一组织构成的历史通常被叙述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区别的标志是《新左派评论》的控制权在1963年转移到了佩里·安德森手中。1956—1963年这个阶段习惯上被视为“早期”新左派或“第一代”左派兴旺活跃的一个阶段。正是在这个阶段上,两种不同的但具有互补性的倾向围绕“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价值观走到了一起,并以(创立于1960年的)《新左派评论》为支点,完成了创造一场“思想运动”这种初始性的尝试。这两种倾向一个是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人群体,它创立了争鸣性刊物《理性者》,该刊物后来以《新理性者》之名在英国共产党之外继续刊行;另一个则是团结在牛津编辑出版的《大学与左派评论》周围的一大批更年轻的、独立的社会主义者。不过,新左派的这种特征在1962—1963年前后就消耗殆尽了。从那以后,《新左派评论》开始追求一种不同的规

---

① Lin Chun, *The British New Left*,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3. 这是迄今唯一一本概要性的研究。M. Kenny, *The First New Left: British Intellectuals after Stalin*,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95. 这是对1962年之前的早期新左派分析得最好的一份资料。

② M. Kenny, 'Interpreting the New Left: Pitfalls and Opportunities', *New Left Review* 219, September-October 1996.

划,主要是一种以在英国开创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化为目的的理论说明和构建规划。“第一代”新左派的力量因此被冲散了。有些评论家因此不同意“新左派”这一术语还适用于第二阶段<sup>①</sup>,但主流倾向还是认为:虽然“第二代”新左派开创了一种具有新的差异的事业,不过,它依旧处于其前辈所开辟的“第三空间”中。而后者则继续存在并创立了其他一些事业。林春鉴别出了四种在1963年之后构成新左派的“建制性倾向”:《新左派评论》;约翰·萨维勒和拉尔夫·密里本德在1964年创办的《社会主义纪事》年刊;理查德·霍加特创建、斯图亚特·霍尔推进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由牛津大学罗斯金学院在1966年发起的历史工场运动和《历史工场杂志》。不过,她肯定,像雷蒙·威廉斯这样的一些人并不正式隶属于上述任何一个团体,他们也构成了新左派的部分语境。因此,林春实际上承认不能仅仅从组织层面上定义新左派。明确划定新左派事业的重点也很困难,因为不少相关机构都维持到了现在,甚至连人员都没有变。不过,到70年代后期,“新左派”术语就变得不那么切合实际了,这部分是因为英国左派知识文化的普遍扩展已经使得把“非新左派”思想从“新左派”思想中清理出去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试图依据代际或者建制性倾向来定义和解释新左派,存在一些相关问题。依据代际进行定义,其困难在于不好处理某些人的文献,尤其是霍尔和威廉斯,他们的著作——不管是就编年而言还是就主题而言——切断了任何明确的代际区分。“第一代”、“第二代”这种区分,过于认同1962—1963年间围绕《新左派评论》的管理权所发生的那场被宣传得沸沸扬扬的争论,也过于认同汤普森和安德森随后发生的那场争强好胜的交锋,在交锋过程中,汤普森称1962—1963年的控制权变化是接管甚至

---

<sup>①</sup> 奈杰尔·杨把第二阶段视为一种明显向老的左派传统的回归。Nigel Young, *An Infantile Disorder: the Crisis and Decline of the New Left*, London: Routledge, 1977, p. 145.

是政变。<sup>①</sup> 后来的学者都不太相信这种表述,认为早期新左派的可能性空间在1962年就耗尽了。<sup>②</sup> 此外,对“第一代”和“第二代”新左派集团进行比较也容易受到当年就《新左派评论》的再定型问题所展开的激烈交锋的某些回响的影响。一方面,或多或少受汤普森说法的影响,人们会认为“第二代”新左派表现出了全面放弃其前辈的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精神,青睐一种抽象的、过于理论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倾向,这种马克思主义几乎不涉及学术之外的任何事情,与工人阶级政治也毫无关系。<sup>③</sup> 另一方面,安德森批评早期新左派的“道德主义”、“民粹主义”以及缺乏理论的严格性,这导致早期新左派对50年代后期的政治可能性以及自身的作用做出了过高估计。从这种表述中,人们不难发现安德森实际上是以更加赞赏的态度,对后来自己主政时期《新左派评论》的理论规划进行了重新确认。<sup>④</sup> 这两种说法都包含真理性,而且并不是必然完全相互排斥的。他们当年争论的那种愤怒表明,要寻找的那些真实的政治差异就存在于最初的控制权转移和双方后来的解释之中。就如人们已经承认的那样,安德森—汤普森之争反映出了一种比第一代新左派与第

---

① 这场争论开始于汤普森对《新左派评论》上佩里·安德森和汤姆·奈恩关于英国的系列文章的批判。Edward Thompson, '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English', *Socialist Register*, 1965. 也可参见安德森的回应文章(Perry Anderson, 'Socialism and Pseudo-empiricism', *New Left Review* 35, January-February 1966), 以及他更为深思熟虑的重估(Perry Anderson,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London: Verso, 1980)。

② 德沃金说它“是一个耗尽的力量”(D. Dworkin, *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 history, the New Left and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Studie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77)。林春说,“最初的新左派是一个失败了的政治运动”(Lin Chun, *The British New Left*, p. 64)。肯尼对此的论述最为详尽(Kenny, *The First New Left*)。

③ P. Sedgwick, 'The Two New Lefts', in Widgery, ed., *The Left in Britai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6, pp. 147 - 150; Meiksins-Wood, 'A Chronology of the New Left and its Successors: or, Who's Old Fashioned Now?', *Socialist Register* 1995; M. Rustin, 'The New Left and the Present Crisis', *New Left Review* 121, May-June 1981, pp. 7 - 9. Even Lin, *The British New Left*, p. 62.

④ Anderson, 'The Left in the Fifties', *New Left Review* 29, January-February 1965; G. Elliott, *The Merciless Laboratory of History: Aspects of Perry Anders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apolis Press, 1998, pp. 7 - 12.

二代新左派之间的断裂更广泛的不一致,这实际上是70年代就“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优劣问题展开的同样激烈的那场争论的一个前奏。这些激烈的交锋抓住了与激进理论的本质和目标有关的那些基本问题。但是,如果只关注差异,势必会遮蔽早期新左派和后期新左派之间的连续性和互补性,并使注意力从所有流派都做出过贡献的、更广泛的理论重建计划的重要意义上转移开来。这种第一代、第二代的划分方式没有能够公正地对待新左派的多样性,缩小了不同新左派集团之间和之中的其他层面的意义,使早期新左派拥有了一种它从来都没有拥有过的连续性。它在新左派思想后来的发展过程上加强了一种虚假的二元逻辑,在这种逻辑中,不属于任何一个阵营的那些个体的贡献没有得到充分考虑,而非《新左派评论》集团成员在1963年之后的发展则被认为仅仅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静态地延续着早期新左派的议程。具体就新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接合而言,强调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向“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转变的决定性意义,模糊了所有新左派的团体(虽然不是所有新左派思想家个人)受到各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方案影响的程度,这种影响是以逐渐打破“第一代”倾向和“第二代”倾向之间区别的方式实现的。一些通常不被认为是早期新左派的人,如威廉斯和密里本德,从70年代后期开始(在有些问题而非所有问题上)分享了类似于《新左派评论》集团的马克思主义观。同时,另外一些人,尤其是汤普森、霍尔和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则在追求不同的议程。基于这些原因,坚持认为“第一代”新左派和“第二代”新左派之间存在严格的区别,必然被认为无助于评价作为一个整体的英国新左派的重要意义,并对分析英国新左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具有误导性。

那么,应当如何定义新左派并解释其历史呢?既然不存在容许进行明确分类的、连贯的、共同的理论视角或政治视角,那么,它的多样性就使进行提纲挈领式的尝试变得复杂了。虽然使用了“文化马克思主义”

(虽然它主要与早期新左派思想家以及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集团有关)一词<sup>①</sup>,但是,它可能将在其他方式下并不属于新左派范围的那些著作包含进来,并且排斥了某些关注重点在其他领域的思想家的贡献。在首先将新左派定位在意识形态教条之外后,我支持在一种广义的意义上把它定义为一种介入行动:既公开宣称为社会主义而奋斗,同时也明确承认社会主义本身也必须接受严格的审视。《理性者》就曾宣布它要提出下列基本问题,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本质是什么”、“什么是社会主义”<sup>②</sup>。而对于《大学与左派评论》集团来说,如果社会主义要被重建,它必须是“全力以赴的——即关涉人的全部活动的——社会主义”<sup>③</sup>。后来的潮流保持了这一批判的方法。以这种方式刻画新左派,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它作为回应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长期危机的一种尝试(或者许多尝试)的产物在更广泛语境中所发挥的作用。<sup>④</sup>

为了与这种宽广的视野相一致,1962—1963年的转变最好是被视为一种着重点的变化,而不是一种断裂。作为一种有活力却又是多样化、脆弱并且还含糊的实体,早期新左派是在其内部张力的作用下分解,尤其需要考虑到它试图开辟一种新的政治运动类型。它所提出的问题被吸收进了一种新的形式中,虽然这种形式在组织问题上缺乏实验性,但更稳定。这种精力分散的代价是:新左派再也不是政治主流中具有话语权的鼓动性力量了;政治组织问题从来都没有被解决;而它的唯理智论倾向却加强了。不过,它以其他形式存在的连续性却仍然为政治独立、普遍的非宗派主义、对社会主义理念的批判质疑及再造开辟了空间。在下面的讨论中,“早期新左派”术语将用来指代截至1962年《新左派评论》最初办刊模式的解体的整个环境。之所以使用“后期新左派”这个更

---

① Dworkin, *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

② Editorial, 'Why We Are Publishing', *The Reasoner*, 1, July 1956, p. 2.

③ Editorial, *University and Left Review* Vol. 1, No. 1, Spring 1957, p. ii.

④ Kenny, *The First New Left*, p. 5. 肯尼把早期新左派定位为对“代表性危机”的反应——我认为这对于后来的思潮来说也是对的。

含混一点的术语,则是出于便于编年的考虑,但它并不仅仅限定于《新左派评论》。

## 使马克思主义本土化

新左派处于一种已被察知的危机中的各种起源决定了它接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在1956年之前,马克思主义在英国或多或少是共产党学说的同义词。而新左派的马克思主义则声称要将英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从官方共产主义中解放出来。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独立”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以其与官方共产主义的决裂,为自己确立了通向马克思主义内部替代性传统的新方向,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个新起点。新左派以创造性的、非宗派的方式接近马克思主义,这是英国学术舞台上全新的东西。其次,这种双重危机也深刻影响到了它对关注重心的选择。《理性者》集团对斯大林主义和经济主义的拒斥指出了主体性活动和文化这一对关注焦点,它们与《大学与左派评论》集团刚刚表露出来的对新文化形式和发展中的消费资本主义的兴趣是相互交织的。这种重点,尤其是它的植根于人道主义的基础,在60年代受到了挑战,但对文化的深刻关注这一点却得到了保留。最后,1956年危机割断了新左派与政治实践的血肉联系,并激起了一种反应和内省的强烈需要,换言之,也就是对理论的强烈需要,它们使新左派的马克思主义开始向“唯理智论”、政治隔绝和组织格局(即使最初仅仅是政治抵抗和组织抵抗)偏转。

在新左派试图革新英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努力中,它从这些一般坐标系中获取了广泛的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被赋予了一种特许的——虽然不是排他的——角色。它首先反映了对共产主义遗产的坚持,随后则反映了一个信念:英国的知识文化必须被“国际化”,接受(主要是欧陆马克思主义)——哪怕是正在消失的——理论影响。因此,在販售马克思



主义理念并提炼它们以适用于分析英国的政治环境的过程中,新左派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直接导致受马克思主义激励的著作出现了大繁荣,另一个更精微、更持久的结果则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被整合到了英国的理论传统和知识文化之中。这在很多领域都结出了丰硕的理论果实,这种成就就是同属于两个“代际”的。在历史学领域,汤普森把历史唯物主义和本土激进思想谱系相结合(这是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原来集体计划的一种继续),创作出了包括《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在内的一些里程碑式的著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历史工场运动中,他的规划受到其他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扩展以及挑战:尽管有不少分歧,但是,吸收、同化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确实对历史学学科进行了极为重要的重塑。更加粗略地看,就文化解释而言,新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接合是决定性的和变革性的。威廉斯将新兴马克思主义影响与原有的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传统相结合,开创出了一种非还原论的、唯物主义的文化解释,重塑了英国的文化批评。与威廉斯的研究相互补充、相互交织,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大众文化研究吸收了葛兰西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以及稍后一些的后结构主义,还有其他一些思想传统的观点,扩展了文化的定义,并为其文化分析提供了新的工具。《新左派评论》长期坚持译介欧陆理论这一计划,从而使得这些以及其他一些计划变得可能。而在那些被译介的思想家中,葛兰西和阿尔都塞之于英国的敏感性得到了最为清晰的证明。新左派思想家,尤其是安德森、奈恩和密里本德,将得到强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卓有成效地运用到对英国国家和工党作用的分析中去。围绕英国的“危机”(安德森和奈恩)和“工党主义病症”(密里本德)提出的一系列深刻洞察被人们广泛接受(例如在后来关于英国的相对经济衰落和宪制改革运动的许多著作中)。在霍尔(和其他人一起)提出的一种截然不同的分析中,英国新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被定位为“权威主义的民粹主义”,它深刻影响了左派在80年代对撒切尔主义和新右派所做的政治反应。尽管存在分歧,但最重要的是,不同新左派团体所

共有的关注重点在富有活力的相互作用下彼此交织、相互纵横,使得它们能够被视为一个集体的事业。

新左派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采纳和再造,以及它把新的理论发展应用于英国问题的努力,扩大了英国政治思想的范围和资源,并且为受马克思主义激励的著作提供了一个比以前更广阔的市场。接下来的讨论将追踪新左派直到 70 年代后期的发展过程。由于篇幅的缘故,很多具体的贡献都不可能得到详细分析,重点只能是放在对一般发展线索的界定上。最后的结论性部分将就这一理论事业的某些重要意义进行总结。

##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对于那些创立了《理性者》的前共产党人来说,最要紧的事情是去(再)确认一种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传统,以反对斯大林主义。<sup>①</sup> 在早期,最重要的一次介入是汤普森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一文。这篇文章中的观点为他后来的著作奠定了基础,不过却受到了某些更年轻的新左派理论家的尖锐质疑。对于他来说,“斯大林主义的一个主要谬误”是“企图从经济原因中直接推导出对所有政治现象的分析,以及蔑视人的观念、道德态度在历史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sup>②</sup>。汤普森把经济主义视为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它专注于“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辩证的相互作用”——的一种扭曲。不过,他们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隐喻去解释这种相互作用,却促进了对其思想的滥用,因为斯大林接受这种隐喻并将其转变为“一种半自动地、独立于有意识的主体性活动之外运作的机械模式”<sup>③</sup>。对重建理性的、讲人性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共产

---

① 他们起初并没有脱离英国共产党的意思。最后一期《新理性者》还是说该刊编辑致力于“在共产主义传统中创建一个理性的、讲人道和自由主义的团体”。Editorial, *New Reasoner* 10, Autumn 1959.

② E. P. Thompson, 'Socialist Humanism', *New Reasoner* 1, Summer 1957, p. 108.

③ *Ibid.*, p. 113.

主义传统而言,最根本的是要重新坚持道德和主体性活动以及人道主义。汤普森在英国浪漫主义的激进主义中看到了一种关键资源,在那里,“威廉·莫里斯的洞察,他对人的潜在道德本质的揭示,并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的活力封冻起来,而是构成了对马克思发现的补充”<sup>①</sup>。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成了早期新左派的一个组织原则。不过,这在自20世纪30年代后期活跃于英国共产党内的历史学家小组成员的著作中是有重要先例的。这些小组成员包括克里斯托弗·希尔、维克多·基尔南、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罗德尼·希尔顿、约翰·萨维勒和汤普森。小组成员受到两名前辈共产主义学者——经济学家莫里斯·多布和历史学家唐娜·托尔——的深刻影响,发展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体裁,其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他们开创的“阶级斗争分析法”、对(工人阶级)文化的关注以及致力于“自下而上”地书写历史。<sup>②</sup> 历史学家小组的马克思主义被用以实施一项特殊的英国历史—政治计划:为了激活大众激进主义并将它与共产主义事业联合起来而揭示、重新解释英国本土的激进传统。<sup>③</sup>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发展,很难归结于其他地方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反映出替代性的(如非苏联支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英国共产主义者来说缺乏可行性,也反映出人民阵线时期党的意识形态纪律的松弛,以及后来对通往社会主义的特殊民族道路的可能性的接受。该小组所创造的马克思主义历史挖掘和记录了英国的大众激进传统:乌托邦社会主义、浪漫主义以及其他形式的文学文化激进主义、宗教反对派、讲求自助和团结的工人运动传统。虽然并没有明确地挑战正统马克思主义,不过,它们对意识、理念和文化的深切关注,的确

---

① E. P. Thompson, 'Socialist Humanism', *New Reasoner* 1, Summer 1957, p. 125.

② H. Kaye, *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 Cambridge: Polity, 1984. 该书对于该小组及其方法做了有益的概述。

③ B. Schwarz, 'The "People" in History: the Communist Party Historians Group 1946-56', in R. Johnson et al., ed., *Making Histories*, London: Hutchinson, 1982, pp. 44-95, p. 56.

指出了一种修正主义的方向。<sup>①</sup>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英国历史学所做出的贡献是极为重要的。不过,他们的政治计划却是建立在一些像人民阵线时期的乐观主义和团结那样看起来并不那么可靠的假设,以及曾使其工作陷于低谷、50年代就被保守主义和消费主义所取代的反法西斯主义政治动员模式基础上的。其实,能够适合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具有连续性(即使它有时被人遗忘了)的大众激进传统观念,以及对稍后出现的传统的——即使是具有必然性的——天生优越性的目的论式信仰,都是很成问题的。就像史华慈所争辩的那样,这些假设使历史学家倾向于一种理想化了的“人民”形象,以及对由“人民”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可能性范围的盲目信仰,例如,他们就没有提到出现反动的而不是进步的大众传统的可能性。<sup>②</sup> 这些历史学家不仅没有对自身独特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对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它提供了一种比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流行观点更精致的解释,当然,这本身还是有争议的——进行充分解释,而且,就像理查德·约翰逊在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历史学所做的一个重要批判中所强调的那样,在他们的著作中,它依旧是隐而未发的。<sup>③</sup>

史华慈<sup>④</sup>和约翰逊<sup>⑤</sup>以为,正是其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某些方面使这些历史学家转向了道德民粹主义。在早期新左派的著作中,这一点主要是通过汤普森——他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表述就是建立在相似假设的基础上的——著作得到了贯彻和强化。如果在某种意义上它代表了

① Dworkin, *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 pp. 26 - 29.

② Schwarz, 'The "People" in History: the Communist Party Historians Group 1946 - 56', in. R. Johnson et al., ed., *Making Histories*, p. 69.

③ R. Johnson, 'Edward Thompson, Eugene Genovese and Socialist Humanist History',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6, Autumn 1978, p. 79.

④ Schwartz, 'The "People" in History: the Communist Party Historians Group 1946 - 56', in. R. Johnson et al., ed., *Making Histories*, p. 69.

⑤ R. Johnson, 'Edward Thompson, Eugene Genovese and Socialist Humanist History',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6, Autumn 1978.

1956年后对斯大林主义的更广泛的人道主义批判的话,那么,对于那些可能给予它理论支持的国外人道主义思潮(如法国的存在主义或者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著作),英国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却一点也没有提及。<sup>①</sup>汤普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本土的浪漫主义和乌托邦传统联系起来,这一立场在他对威廉·莫里斯所做的介绍——既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sup>②</sup>——中得到了典型表现。1956年之后,汤普森开始把莫里斯的道德立场看做与马克思的经济分析同等重要的东西,进而发展出来一种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包括马克思本人的后期著作在内)的批判——因为它过分强调了经济而忽视了人的道德本质。<sup>③</sup>尽管他的批评者姗姗来迟地承认这里确实有很大的价值<sup>④</sup>,但就像历史学家小组一样,这其中也包含某种失败:他没有为自己的立场提供令人信服的理论基础,并且有忽视本土激进主义的局限性的倾向。在把经济主义作为批评靶子时,汤普森错误地倾向于拒绝对经济的作用进行必要的化约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化努力,而在用“经验”对抗理论的过程中,他日益把抽象等同于教条。他个人对安德森接管《新左派评论》的愤慨使他的立场变得更加尖锐,加之他认为更年轻的《新左派评论》集团具有“民族虚无主义”倾向<sup>⑤</sup>,因此,他们在60年代的交锋和70年代中期围绕“历史与理论”开展的辩论就平添了一种人身攻击的形式。

英国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从本质上说表达的是对斯大林主义的道

---

① K. Soper, 'Socialist Humanism', in H. Kaye and D. McClelland, ed., *E. P. Thompson: Critic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Polity, 1990, pp. 204 - 232; also D. Kellner,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the Missed Articulation', available at <http://www.uta.edu/huma/illuminations/kell16.htm>.

② E. P. Thompson, *William Morris: Romantic to Revolutionary*,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55, revised edition 1976. 对汤普森这一时期观点的讨论,参见 Lin Chun, *The British New Left*, pp. 29 - 32.

③ Lin Chun, *The British New Left*, p. 31.

④ P. Anderson,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London: Verso, 1980.

⑤ 安德森在前言中提到了此项指控。P. Anderson, *English Questions*, London: Verso, 1992, pp. 4 - 5.

德和政治拒绝。它的道德明晰性给了它一种把不满的共产党人、构成早期新左派的支持群体的不结盟青年和核裁军运动活动分子集结起来的吸引力。不过，它虽然得到了新左派的集中认同，但是，在一些基本问题上新左派并没有形成共识。过于强调道德、主体性活动和主体性，以及简单地把经济主义和决定论认定为斯大林主义的来源，后来这些都受到了安德森的批判。而且在更早些时候，它们就被认为是有问题的。当时还是《大学与左派评论》编辑的查尔斯·泰勒回应汤普森的文章，质疑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兼容性，强调前者“最多是一种不完整的人道主义”——它的价值不需要被再次强调，而需要从根本上重新审视。<sup>①</sup> 基于一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视角，哈里·汉森对汤普森的回应预示了安德森后来对汤普森的道德主义的批判的某些要素，他评论说：“你……以一种掺水的基督教酱汁来配你的马克思主义，而没有认识到你正在做一道非常奇怪的菜。”<sup>②</sup> 通过答复自己的批判者，汤普森再次重申了自己的立场，宣称“人类的需要是评估……经济和社会安排的唯一有效的标准”，但并没有完全回答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兼容问题。<sup>③</sup>

这场交锋的不完整性反映了这一事实：一般说来，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服从于《理性者》集团所做的具体批判——这是后来进行的一项任务。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它们后来变得越来越容易获得——被狂热地引用（例如，肯尼斯·缪尔声称，马克思的早期哲学思想对于后来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是批判性的）<sup>④</sup>，可是，把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血统重新还给共产主义这一优先任务，却把由泰勒提出的那一类理论问题推到了一边。同样，葛兰西（以路易·马克斯 1957 年的译本为中介）作为“教条

① C. Taylor, 'Marxism and Humanism', *New Reasoner* 2, Autumn 1957, p. 98.

② H. Hanson, 'An open letter to Thompson', *New Reasoner* 2, Autumn 1957, p. 92.

③ E. P. Thompson, 'Agency and Choice 1', *New Reasoner* 5, Summer 1958, p. 91.

④ K. Muir, 'Marx's Conversion to Communism', *New Reasoner* 3, Winter 1957.



主义的敌人”得到了充分的接受,但是,其思想的真实含义并没有得到具体的分析。<sup>①</sup>

## 文化和当代英国资本主义

《大学与左派评论》集团的关注点与《理性者》既有重叠,也存在着明显的分歧。重新强调共产主义原则并不是他们事业的组成部分,相反,“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需要面对斯大林主义和福利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价值所做的破坏”<sup>②</sup>。他们的兴趣深深地植根于当时的英国资本主义的状况之中。大众文化的发展使工人阶级被整合进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潜在可能性,以及这一发展对工人阶级的激进潜力的消解,很快都得到了认识,并且成为《大学与左派评论》集团的信念核心——复兴社会主义需要新的概念和新的战略,而不是简单的老调重弹。广义地讲,《大学与左派评论》赞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视角,但其重点与汤普森所有不同。呼唤人道主义并不是因为与反斯大林主义有多大的联系,相反,而是与一种(分散的、只是部分明确的)解放和实现人的潜能这一计划的语境有关。一篇社论称:“对我们的社会的生活质量的批判”“意味着一种关于人的生活的唯一性的观念;对我们的思维方式来说,对它的多个方面和它的统一体的意识是人道主义最根本来源之一”;“人作为总体性的这一意义”经常失落在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现有理论体系中,在马克思主义那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对我们社会的本质提供了局限性非常大的认识”。<sup>③</sup>

除了拒绝教条主义,《理性者》集团仍然倾向于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神话般的观念自足体,只不过它在后来的运用过程中被扭曲了。相对于《理性者》而言,《大学与左派评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后来变得更

---

① C. Hill, 'Antonio Gramsci', *New Reasoner* 4, Spring 1958, p. 108.

② Editorial, *University and Left Review* 1, Spring 1957, p. 2.

③ Editorial, *University and Left Review* 4, Summer 1958, p. 3.

加自相矛盾并且更具修正主义色彩。《大学与左派评论》集团中的人更加倾向于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本身就需要审视的传统：霍尔强调，“马克思的著作本身”“就是一种分析性概念的总体，而不是封闭的理论体系”。<sup>①</sup>《大学与左派评论》所用方法的新颖性在它对待英国的阶级关系中得到了体现。发展中的消费主义以及传播技术——特别是电视——的进步，很早就被确认为一种能潜在地重塑和加强资本主义控制的现象。围绕理查德·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1957年)——它看到了传统的工人阶级生活方式正受到“大众文化”蚕食的威胁——发生了广泛的辩论。威廉斯——他的《文化与社会》一书出版于1958年——对霍加特的论题进行了富有同情的但又具说服力的批判。威廉斯认为霍加特把工人阶级生活方式理想化了，并且高估了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文化对这种生活方式的威胁。“这些变化是在个人物品使用方面的变化，在任何真正意义上，它们都与成为‘资产阶级’没有任何关系。”<sup>②</sup>对于他来说，工人阶级的主要文化贡献不是被霍加特浪漫主义化了的日常实践，而是集体民主制。

在霍尔的《无阶级感》——这可能是《大学与左派评论》发表的最重要的单篇文章——中，这两种视角的影响都能看到。这将这个问题当做了某种阶级自觉意识或者对阶级认同的主体意识而置于一种新的形势中，在这种新形势下，“作为一种社会系统的资本主义现在建立在了消费的基础上”，而不是生产的基础上。<sup>③</sup>霍尔强调，即使客观的阶级关系保持不变，“在那里，决定‘阶级自觉意识’的主体因素也发生了剧烈变化，以致工人阶级能够形成一种虚假的‘无阶级’意识”。

新资本主义起码在形式上承认并试图去迎合工业社会中的人的问题，而这在本质上是由社会主义首先命名的。但这些只是虚假的参与，其结果是在工人阶级人群中形成了一种虚假意识，使得真

① S. Hall, 'A Sense of Classlessness', *University and Left Review* 5, Autumn 1958, p. 32, note 3.

② R. Williams, 'Working-class Culture', *University and Left Review* 2, Summer 1957, p. 30.

③ Hall, 'A Sense of Classlessness', *University and Left Review* 5, Autumn 1958, p. 29.

正的问题不仅更加难以解决,而且更加难以被发现。<sup>①</sup>

新的传播媒介被视为“并不是对经济基础不重要的东西:它们就是其中的一部分”<sup>②</sup>。在这些新的条件下,一种可行的社会主义必须从文化领域入手,以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全面的、权威性的政治——它能够保证“人类及共同体获得更完美的生活”<sup>③</sup>。霍尔的分析明显挑战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文化以及政治领域之间所做的区分,强调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关系的“简单化的经济主义解读”应该被抛弃,并且应该重新认识各个不同领域之间的关系,以允许相互渗透。<sup>④</sup>《大学与左派评论》的独特计划就是去构想、实践一种新的左派文化政治。它开创性地实现了对青年文化、亚文化、城市规划、广告的影响、工人阶级的尖锐分化、教育改革的影响、艺术和电影批判的分析。虽然这些关注点对于一些老一代激进主义者来说有点“无足轻重”,但使那些挑战并且扩展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作品成为可能,并测试了这种原创性作品在当代英国条件下的适用性。《大学与左派评论》的早期作品已经预见到了后来吸引左派目光的那些问题,尤其是逐渐问题重重的阶级地位问题,以及新兴的种族问题议程。<sup>⑤</sup>霍尔以及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其他人后来用新的理论资源进一步探讨了这些问题。

《大学与左派评论》思想家发现威廉斯的作品具有启发意义,虽然他的作品难以归于任何一个新左派主流派别。威廉斯与更早的集团共享的兴趣是英国激进文学和文化传统,他与新兴集团共享的兴趣则是对文化现象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的理论化。在这一时期,他没怎么运用马克思主义。这就与后来逐渐远离马克思主义的汤普森形成了对比。威廉斯的轨迹正好相反: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发现了越

---

① Hall, 'A Sense of Classlessness', *University and Left Review* 5, Autumn 1958, p. 30.

② Ibid., p. 31.

③ Editorial, *University and Left Review* 4, Summer 1958, p. 3.

④ Hall, 'A Sense of Classlessness', *University and Left Review* 5, Autumn 1958, p. 32, note 3.

⑤ Kenny, *The First New Left*, pp. 65-66.

来越多、越来越精密的概念工具可供利用,他与马克思主义理念的关系就变得越来越紧密了。威廉斯的著作挑战了现存的、不管是主流的还是左派的文化观念,强调了文化在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新的理论和战略中心地位。《文化与社会》<sup>①</sup>“对我们在思想上和情感上对英国社会的变迁的反应进行了记述和解释”,并把文化定位为“整个的生活方式”。<sup>②</sup> 这既体现了对英国文学批评中的“文化与文明”主流传统——具有精英主义偏见并且不信任流行文化或“大众”文化——的挑战,也体现了对威廉斯视做还原论而加以拒斥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挑战。威廉斯坚持认为,文化必须被视为对社会秩序的构建,而不仅仅是社会秩序的简单反映。

对于新左派在英国条件下寻找为社会主义奠定基础的新方式的探索而言,尤其是对《大学与左派评论》集团而言,威廉斯的洞见具有直接的吸引力。尽管有一些新左派发现他的分析不够激进并且对马克思主义所知甚少。汤普森批评他把文化定义为“整个的生活方式”,从而忽视了阶级冲突和意识形态的意义,并对在社会经济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共同文化”能够得到实现的可能性提出了质疑。<sup>③</sup> 反过来,受60年代英国已经引入的各种理论视角的影响,威廉斯逐渐开始直接接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卢卡奇、戈德曼、晚期葛兰西等思想家那里寻求支持。他在70年代发展出来的更加明确的“文化唯物主义”是其最终成果。对于新左派证明、扩展、改写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命题这一更大努力而言,这是一个重要贡献。“文化唯物主义”是威廉斯用来描绘他自己的理论立场的一个术语,也是“历史唯物主义中一种关于物质、文化和文学生产的特征的理论”<sup>④</sup>。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他倡导:对作为一系列作用于人类主体性活动的限制的“决定性”进行马克思

① R.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 - 1950*,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58.

②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 - 1950*, foreword.

③ E. P. Thompson, 'The Long Revolution', *New Left Review* 9, May-June 1961, and *New Left Review* 10, July-August 1961.

④ R.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UP, 1977, p. 5.

主义的解释<sup>①</sup>，这种解释允许对文化形式和文化事件进行更加细致入微的分析，而这种分析要比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隐喻（早在《文化与社会》中威廉斯就建议这“仅仅应当被理解为一种比喻”<sup>②</sup>）所能提供的要多得多。

早期新左派与马克思主义接合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它的研究范围是由当时英国的文学文化所决定的。<sup>③</sup>一般说来，这反映了文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左派知识文化中的突出地位，以及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相对薄弱状况，不过，它也是共产党历史学家的一份直接遗产。在这个意义上，早期新左派的“文化主义”已经被制定完成了，并且英国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未来将会采取的道路也隐含其中了，即便是50年代后期它与正统理论突然发生了明显的关系破裂。随着它在70年代的继续发展，这些先行存在的参照点持续影响了英国文化研究那些与众不同的研究重点的形成。与此同时，作为对不同环境的反应，新左派将在下一阶段发现“文化主义”的褊狭和局限。

## 欧陆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霸权

安德森团队的工作是从对英国思想缺陷的一个不妥协的判断着手的。在一份未发表的文件中，安德森把新左派的计划描述为“以一种很慢的方式、尤其是通过试图去填补在英国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或者社会学传统而留下的历史裂缝，去改变英国的文化”。它受到的主要理论影响是：

法国的现象学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主要关注对资本主义的一种规范—理论的批判以及哲学人类学的发展；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主要关注的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一种比较丰富的历史理解，以及发展一种超越它的发达社会主义战略。

---

① R. Williams,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in Marxist Cultural Theory', in *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 Selected Essays*, London: Verso, 1980.

②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p. 267.

③ Dworkin, *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 p. 43.

孤立于主流的争论之外是受欢迎的：“这一事业的整个价值和目标是去创造某些全新的并且是从未出现过的东西，这些东西在现有的文化中是不存在的，并且最初是不能够被消化吸收的。”<sup>①</sup>《新左派评论》开始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翻译和出版大陆思想家的作品，他们坚信在政治进步成为可能之前，英国褊狭的和经验主义的知识文化必须先被改变。从1963年开始一直到70年代中期，它出版并讨论了许多欧洲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包括萨特、葛兰西、卢卡奇、马尔库塞、阿尔都塞、本雅明、阿多诺、霍克海默、德拉-沃尔佩、科莱蒂以及其他更多的人。

这一新方向被描述为“与既有英国文化和政治相比较而言的急剧左转”<sup>②</sup>。为什么它注定是必要的？安德森后来强调了的团队和他的前辈——特别是《理性者》集团——之间在政治观念形成上的区别：前者并没有经历大萧条、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的动员以及世界战争；相反，他们形成于一个资本主义增长和“资产阶级民主”传播的时代，因此他们在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之外寻求社会主义的发展。<sup>③</sup> 政治形势和现有势力到60年代也改变了：与其他东欧事件相比，与并不鼓舞人的国内概貌——核裁军运动日益衰颓，并且工党修正主义已经复活——相比，古巴革命激发了安德森团队的想象。有论者已经把那些政治观念形成的差异视为“新纪元的开端”以及在优先性问题出现激烈变化的主要解释。<sup>④</sup> 这有点像写《大学与左派评论》集团对早期新左派的贡献史，可是，《大学与左派评论》集团的政治观念的形成和以《新左派评论》为标志的那批人并没有多大的不同，且与《理性者》集团共享了很多视角。这一论点因而例证了上文所确认的用“代际”来考虑新左派历史所存在的问题。政治观念的形成的差异确实重要，但它是与更直接的原因交织在一起的。隐藏

① ‘Conspicuous’, unpublished memorandum 1964, p. 1.

② Ibid., p. 3.

③ P. Anderson,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pp. 147-150.

④ Meiksins-Wood, ‘A Chronology of the New Left and its Successors: or, Who’s Old Fashioned Now?’, *Socialist Register* 1995, p. 41.

在《新左派评论》重组背后的一个主要动力是对早期新左派政治失败的尖锐批判,以及对知识分子激进主义的可能性的重新评价。安德森准确地把早期新左派的“运动”野心视为“瘫痪性的混乱”的原因之一。在“成为它能够真正唯一联合的一系列力量”的努力中,它“失去了知识力量的优点而没有得到政治效力的优点。为了总是逃避理论工作和知识工作的政治动员,后者都被牺牲掉了”<sup>①</sup>。他同样正确地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中识别出了一种用简单化的修辞来取代对斯大林主义的本质和根源的批判性分析的动向,虽然他(在1965年)对它的总体判断——“民粹主义的和前社会主义的”——确实有点仓促和简单化,并且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对它的重要影响。<sup>②</sup> 尽管安德森承认早期新左派的出现标志着“英国社会中最深层次的社会批判传统的复兴”,从而使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新的文化批判得以清晰陈述出来,但是,他认为,这种社会背景没有能够提供一种严肃的超越资本主义的战略建议。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以及某种程度上还有其他一些早期新左派的计划是使马克思主义英国化,从而适合英国的环境,与此相反,《新左派评论》集团的目的是要让本土的知识文化“马克思主义化”。最终,虽然这一事业的“民族虚无主义”是令人遗憾的,但不同方法的互补性却得到了承认。

与《新左派评论》有意把焦点放在知识分子自己的文化上相反,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则是把大众文化视为其对象。通过大众文化,霍尔以及其他一些人探索和改造了意识形态、行动、霸权以及“民族大众”这些概念。这一方向包含在由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和早期新左派所信奉的各种“文化主义”的某种连续感——或者换言之,重估——之中,它与复兴工人阶级文化中的一种可以被感知的激进民主的张力相联系。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理论家们都逃离文化主义潜在的排他性和倒退倾向,因为它赋予某

---

<sup>①</sup> Anderson, 'The Left in the Fifties', *New left review* 29, January-February 1965, pp. 16-17.

<sup>②</sup> *Ibid.*, p. 17.

一种预先确定的工人阶级文化以特权,也因为不能解决媒介化和消费主义对阶级认同观念的冲击。这些就是在围绕《识字的用途》和《无阶级感》发生的争论中较早获得公开讨论的那些问题,不过现在,它们将接受运用新的理论方法和在新的理论影响下所进行的持续分析。

### 1. 阿尔都塞时刻

后期新左派流派将英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带上了一个新的理论方向,不过,他们对影响来源的选择却是由他们从早期新左派解体中所吸取的教训决定的。在所有那些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被介绍到英国的欧陆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中,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的影响最为深刻,这部分是由于他们的理念被当做经验主义的、道德主义的和民粹主义的英国传统的积极替代物(阿尔都塞),或者是因为他们使得对文化早已充分发展起来的重点关切变得合法化了(葛兰西)。在葛兰西受到普遍肯定的同时,阿尔都塞的影响却在历史学界点燃了一场激辩——它重复了早先安德森—汤普森之争的诸多要素。不过,真正成问题的其实是 1956 年以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方向这类更广泛的问题。

阿尔都塞的思想是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和替代物。他宣称在马克思 1845 年左右的作品中发现了一个“认识论的断裂”,在这一阶段,马克思与黑格尔及唯心主义决裂并开创了一种新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但是,甚至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运用一种首先在语言学中发展起来的结构主义方法,阿尔都塞坚持认为,意义不仅存在于马克思的成文文本中,也存在于断裂和无意识影响中,因此,需要对马克思进行“症候”阅读。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一种结构因果性、反人道主义的、反历史主义的理论。根据阿尔都塞的看法,马克思把社会当做由截然不同而又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经济层面、政治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每个层面都有自身的内在发展规律——相互作用的一个总体、一种联合。“在归根结底



的意义上”经济层面被认为是具有决定性的,但这并不是以直接的方式实现的,因为经济的决定作用不能够和作为整体的社会结构相分离。

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早期的“阿尔都塞时刻”相当短暂,但它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却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阿尔都塞坚持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中心地位,这对1956年以后欧洲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倾向构成了蓄意挑战,那种倾向认为,马克思的早期哲学著作及其所包含的人的主体性活动和主体性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贫瘠的唯科学论的解毒剂,也是斯大林主义的替代物。阿尔都塞认为,到60年代早期,这种人道主义冲动已经被官方共产主义吸收和中立化了:他把经济分析重新放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核心因此可以被视为一种纠正措施。<sup>①</sup>在英国,阿尔都塞主义使得年轻一代的理论团体可以对他们前辈的方法保持批判性的距离。后期新左派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拒绝,使得社会环境向系统的反人道主义的结构主义思想敞开了大门,所以,一经被引入,阿尔都塞主义就迅速流行起来。在1967年,本·布鲁斯特在《新左派评论》中写道:“英国的很多社会主义者仍然在捍卫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以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这场战役已经大获全胜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观念,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条件结合起来。”<sup>②</sup>阿尔都塞的“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是对并没有陷入经济还原论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一种非斯大林主义的替代物。它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得后期新左派对理论工作的关注合法化了。基于一种比新左派更广泛的方法论影响,它在许多学科中被用来挑战英国知识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经验主义。在《新左派评论》中,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较早例证了结构主义之于历史学的有用性,以挑战自由主义的实证主义:“没有一个被称为‘历史’——它

① L. Althusser, *For Marx*, trans. B. Brewster, Harmondsworth: Allen Lane, 1965, p. 237.

也见以下文献中的讨论:Anderson,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pp. 105 - 109.

② ‘Introduction to Althusser’, *New Left Review* 41, January-February 1967, p. 12.

赋予时间中的事件以意义——抽象的东西，时间也不是一个把所有阶级、结构以及处于其中的时段都包括在内的统一的流程……至少在一个最低限度上，所有的历史都是一个结构性的历史。”<sup>①</sup>

更加一般地说，在历史学及政治学领域，结构主义使把经济分析恢复为很多更加具有英国马克思主义特征的著作的中心成为可能，而“经济主义”一度曾因为它与还原论、1956年之后的斯大林主义的联系而黯然失色。在西欧马克思主义那里，围绕向经验、主体和文化的总体转变之后果的更大辩论，在这里则通过一种特殊的英国棱镜而传播开来。汤普森对阿尔都塞主义进行了有名的抨击，称后者是“最后的斯大林主义，理论化的意识形态”<sup>②</sup>，他还对自己的新左派晚辈们的理论倾向进行了抨击，这些都是由《历史工场杂志》上的一场辩论引起的，这场辩论源于理查德·约翰逊（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员）呼吁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关注莫里斯·多布的“复杂的经济主义”。约翰逊主张，更年轻的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忽略了多布著作的关键方面；他们因为偏爱经验和文化而放弃了多布对经济关系和经济抽象的强调，这使得他们接受了一场并没有被充分证明的“冲入文化”运动。<sup>③</sup> 约翰逊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阿尔都塞主义的影响，但他并没有放弃人道主义的传统，他强调，“一个更好的、更加理论化的、有活力的历史写作实践将必须同时吸取这两种要素”<sup>④</sup>。然而，汤普森把他的批判完全解释为阿尔都塞主义对历史学科本身的进攻。汤普森的反批判称阿尔都塞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监控行动”<sup>⑤</sup>，这反映了他对一

① G. Stedman-Jones, 'The Pathology of English History', *New Left Review* 46, November-December 1967.

② E. P.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or An Orrery of Errors', i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Merlin, 1978, p. 182.

③ Johnson, 'Edward Thompson, Eugene Genovese and Socialist Humanist History',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6, Autumn 1978, p. 97.

④ *Ibid.*, p. 79.

⑤ E. P.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or An Orrery of Errors', i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p. 183.

般抽象的日益增强的不信任感,也反映出他自己把马克思主义认定为一种“开放的经验调查的传统”,而不是一种方法或理论。<sup>①</sup>可是,阿尔都塞的观念之所以能对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产生吸引力,恰恰是因为他强调科学和抽象,并以此反对经验主义,同时也因为他所强调的结构因果观看起来是对先前存在于英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人道主义的一种必要纠正。英国与结构主义(不可避免地)相遇,远非像汤普森声称那样,标志着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死灰复燃,而是使对斯大林主义的更深入批判、人道主义者对此的反应以及阿尔都塞主义对前一反应的反击——安德森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就是一个突出的样本<sup>②</sup>——都得到了清晰表达。

对新左派的国家分析而言,与结构主义的遭遇也是重要的。在这方面,普兰查斯的著作是关键。<sup>③</sup>不管是密里本德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中的分析,还是汤姆·奈恩和佩里·安德森(起初是受葛兰西主义启发)对英国国家特殊性的分析都是在与普兰查斯的对话中(虽然密里本德坚持对结构主义的批判)得到完善和发展的。<sup>④</sup>随后,安德森—奈恩论题被改写,以重新强调英国资本主义统治中的经济维度,此后,在《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1974年)中,安德森又再次详细探讨了其中的某些主

① 汤普森在《致列泽克·克拉科夫斯基的公开信》中阐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观的分类和他自己的立场。Thompson, 'An Open Letter to Leszek Kolakowski', i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pp. 320 - 335. 此处引自第361页。

② Anderson,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See especially pp. 100 - 130.

③ N. Poulantzas,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 London: NLB, 1973; 'The Problem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New Left Review* 58, November-December 1969.

④ 普兰查斯(N. Poulantzas, 'The Problem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New Left Review* 58, November-December 1969)对密里本德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R. Miliband, *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holson, 1969)进行了评论。密里本德随即回复(Miliband, 'Reply to Nicos Poulantzas', *New Left Review* 59, January-February 1970)。后来,密里本德对普兰查斯的批评立场越来越激烈(M. Newman, *Ralph Miliband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New Left*, London: Merlin, 2002, pp. 198 - 220)。安德森和奈恩以安德森—奈恩论题而闻名的那些论文分别发表在1964年的《新左派评论》上,其中的经典文本是安德森的《当前危机的起源》(Anderson, '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 *New Left Review* 23, January-February 1964)。对此,普兰查斯也给予了批判(Poulantzas, 'Marxist Political Theory in Great Britain', *New Left Review*, 43, May-June 1967)。

题。对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文化理论家来说,结构主义的方法(或者“语言学转向”)的某些方面也被证明也是十分有用的。文本和文本性概念的扩展,以及把文化认同为一个经验、生产意义的场所,使得用新的方法研究文化“文本”成为可能。这极大地修正了文化批判的方法,并使系统地研究文化形式和文化实践的意识形态内容成为可能。

因此,与结构主义的遭遇被证明是有理论价值的,尽管其方式当时没有得到汤普森的“文化主义”和“历史学”的支持者的认同。不过,当《历史工场杂志》的书面争论出现后,阿尔都塞主义的局限性就开始变得清晰起来了。1972年,诺曼·杰拉斯的批判揭露它不能说明作为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同样不能解释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困局。<sup>①</sup> 一如往常,外部环境也对理论的发展起到塑型的作用:1968年以及此后政治语境的改变——学生和工人好战分子数量剧增——呼唤一种比阿尔都塞主义似乎能创造的理论更具政治接合力的马克思主义。

## 2. 葛兰西主义

英国新左派思想家离开对结构主义的狂热追捧、继续前进的途径之一是经历了一次明显的葛兰西转向(另外一个途径是随后会提及的后结构主义的中转)。不过,对于英国左派而言,对葛兰西的这种“后阿尔都塞”式的同化并不是首次出现。当1957年葛兰西的一种选集被首次翻译成英语时,共产主义历史学家虽然还没有明确地借鉴葛兰西,但已经对他的作品表示了某种兴趣。<sup>②</sup> 20世纪60年代,这种兴趣明显增加了。安德森和奈恩发表在《新左派评论》上关于英国的宪政制度及“工党主义”在其中的地位问题的颇有影响的系列文章,就运用了葛兰西的霸权和统合概念。他们的核心观念,即贵族权力在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不同寻常的延

---

<sup>①</sup> N. Geras, 'Althusser's Marxism: An Account and Assessment', *New Left Review* 71, January-February 1972.

<sup>②</sup> L. Marks, ed., *The Modern Prince and Other Writing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57.

续,直接受到了《狱中札记》中的一个类似评论的启发。<sup>①</sup> 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观念则对《新左派评论》和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不同的文化转型方案起到了塑型作用。密里本德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一书中也用到了霸权概念。<sup>②</sup> 在一种更加散漫的意义上,由汤普森和威廉斯等新左派思想家所创造的“文化主义”论著,为更多读者接近葛兰西的著作提供了必要的语境。<sup>③</sup> 正如大卫·福尔加奇所强调的,与意大利之外的其他国家相比,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运用葛兰西思想方面做得更深入也更广泛,当然,这也是有选择的,他的著作中被强调的方面都与下列方面有关:

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政治稳定和政治调节,它们的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霸权”的资源,政治联盟的机制和弹性本质,把市民社会视为一个政治组织和斗争的场所,以及左派对从“经济合作”的看法中挣脱出来、建立自身的霸权政治的需要。<sup>④</sup>

也就是说,他的思想被用以补充、证明或者论证英国新左派先前所关注的东西,他也因此从根本上被解释为一位“上层建筑理论家”。<sup>⑤</sup>

随着英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开始撤离阿尔都塞主义,复兴了的注意力投向了既作为理论家又作为政治战略家的葛兰西。新的译著和解释表明了他思想的影响力,它现在对英国左派都产生了影响,而不只是新左派。<sup>⑥</sup> 其中最深刻也最有意义的运用是在文化研究领域做出的。

---

① 《新左派评论》上论英国的文章主要有:P. Anderson, '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 *New Left Review* 23, January-February 1964; T. Nairn, 'The British Political Elite', *New Left Review* 23, January-February 1964; 'The English Working-class', *New Left Review* 24, March-April 1964; 'The Nature of the Labour Party', *New Left Review* 27 & 28, September-October. and November-December 1964)。

② 虽然他并没有持久地运用葛兰西的分析。

③ D. Forgacs, 'Gramsci and Marxism in Britain', *New Left Review* 176, July-August 1989, p. 74.

④ *Ibid.*, p. 72.

⑤ *Ibid.*, p. 77.

⑥ A.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 and trans., Q. Hoare and G. Nowell-Smith,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1.

葛兰西的思想对于文化研究,以及协调经济、文化决定和主体性活动这三条路线之间的关系具有明确的战略意义。<sup>①</sup>他把霸权视为一种谈判过程和一个斗争场所,而不仅仅是由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所提供的某种东西,他帮助文化理论家克服了阿尔都塞理论的僵硬性,也使对大众文化的关注获得了合法性。不过,葛兰西并没有简单地取代阿尔都塞在英国文化研究中的位置:“语言学转向”已经以一种无法逆转或停止的方式极大地修正了该领域的方法。霍尔是这样描述他自己的发展轨迹的:“我与阿尔都塞的思想做斗争,最终得以在被葛兰西做了极大修正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式框架中从事研究。”<sup>②</sup>从语言学转向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来自福柯和后结构主义——中产生出来的新影响,与葛兰西、女性主义和黑人批评一起被吸收进来。与其他地方的研究相比,英国文化研究保持了一种激进的政治棱角,不仅仅关注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统治机制的分析,而且也关注对抵制这种统治的形式和场所的承认和表述,不管表述是以阶级的方式还是非阶级方式进行的。70年代晚期至80年代早期,由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理论家所进行的大众文化分析逐渐聚焦于青年亚文化所创造的对抗性身份及其政治潜能。<sup>③</sup>虽然焦点变为“新社会运动”的主体性活动,但是,它的持续存在无疑是以前强调工人阶级文化中的抵制形式这一传统的一份直接遗产。

这种“强化的葛兰西主义”<sup>④</sup>为英国左派关于政治战略的广泛讨论做出了贡献。其中的来源之一是斯图亚特·霍尔关于撒切尔主义的研究著作,它通过对葛兰西进行“后阿尔都塞”解读来分析被他称为“集权主

① G. Turner,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6, p. 194.

② 这些观点最先提出于1990年在伊利诺伊州召开的文化理论家会议上。Grossberg et al., ed.,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92, p. 289.

③ 尤其见 D. Hebdige,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London: Methuen, 1979.

④ Forgacs, 'Gramsci and Marxism in Britain', *New Left Review* 176, July-August 1989, p. 84.

义民粹主义”的新型霸权计划的具体机制。<sup>①</sup> 同一时期,英国共产党的一些学者也对葛兰西进行了吸收,这与欧洲共产主义的兴起相互交织,促成了该党明确的战略转变。从对文化、意识形态和承诺在资本主义统治再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日渐重视开始,一种对经济主义以及英国工人运动中的社团主义的批判,以及一种对“新社会运动”(它所有的见解都与新左派相关)基础上的非阶级的兴起的相应承认,都使左派产生了一种需要:如果要发起一场反霸权挑战,那么就应该建立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不是简单的经济)层面上的更广泛的可能联盟。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对陷入长期危机中的工人运动的分析,对“修正主义”立场——该立场日益质疑以阶级为基础的分析对于左翼思想和组织的中心性和相关性——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sup>②</sup> 改版后的共产党杂志《今日马克思主义》开始成为辩论——它的重要性远远超出英国共产党的内部辩论——的主要论坛,而霍尔则成了它的重要供稿者。在挑战马克思主义和左派的一些核心假设时,“修正主义”立场认真考虑了从“新社会运动”、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分析<sup>③</sup>、后结构主义思想中产生出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新旧批评。

在批判欧洲共产主义对葛兰西所作解读的众多批评中,最深刻的一个批评出自《新左派评论》。它是建立在安德森所提供的理论基础上的。在《安东尼奥·葛兰西的二律背反》这篇长文中,安德森首次标定了自己与这种对这位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更宽泛的英国式运用之间的距离。<sup>④</sup> 安德森对葛兰西的批判涉及葛兰西的早期著

---

① S. Hall, 'The Great Moving Right Show', *Marxism Today*, January 1979, p. 15.

② 霍布斯鲍姆的文章作为马克思纪念演讲首次发表于1978年。相关争论收录于 M. Jacques and F. Mulhern, ed., *The Forward March of Labour Halted?*, London: Verso, 1981.

③ E. Laclau and C.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Verso, 1985.

④ Anderson, '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 *New Left Review* 100, November-December 1976.

作以及《狱中札记》，并指出了存在于后期霸权分析中的（无意识的）游移不定和不一致，在安德森看来，这导致葛兰西赋予了市民社会太过重要的作用，而这是以葛兰西同意牺牲对国家和统治的足够重视为代价的：

葛兰西有时暗示：承诺主要适合市民社会，而市民社会具有超越国家的首要性。就此而言，他能够接受如下结论：资产阶级的权力主要是共识性的。在这种形式中，霸权观念倾向于相信这样的观念：在西方，要么通过压制后者，要么通过使两者合二为一，资产阶级权力的统治模式——“文化”——也是决定性模式。因此，它遗漏了暴力在最后关头所拥有的最终决定作用。<sup>①</sup>

因此，葛兰西的思想就允许了这样一种结论：社会主义的战略应该关注于文化霸权的争夺而不是国家政权。

### 3. 二线防御工事与再联合

安德森对葛兰西的批判也是对新左派的文化转向——这包括《新左派评论》自己的文化转向——的含蓄批评。这也标志着《新左派评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迷恋的终结。在1976年的总结中，安德森对《新左派评论》（以他为代表）的政治悲观主义，以牺牲经济和政治分析来重点关注哲学的做法，以及远离政治实践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sup>②</sup> 他的批判反映了《新左派评论》在1968年之后重新定位于一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尽管有相对抽象和相当非教条的标记。<sup>③</sup> 《新左派评论》退守二线防御工事是其自身发展轨迹的结果：经过迂回西方马克思主义，实现对经典思想

<sup>①</sup> Anderson, '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 *New Left Review* 100, November-December 1976. p. 72. 也见 Forgacs, 'Gramsci and Marxism in Britain', pp. 79 ff., 19.

<sup>②</sup> P. Anderson,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NLB, 1976.

<sup>③</sup> 《新左派评论》编辑部中的很多人是隶属于托洛茨基主义的第四国际这一国际马克思主义集团的成员。关于《新左派评论》的革命性和托洛茨基主义定位，见 Elliott, *The Merciless Laboratory of History: Aspects of Perry Anderson*, pp. 63-92.



家更为尊重的评估,从而把政治分析和经济分析这两个正统重心的复兴视为对在政治上令人失望的“文化转向”的一个根本纠正。为了校正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平衡,再度强调资本主义国家的起源和形式,一度在《新左派评论》和安德森的作品中变得十分明显。他对原来关于英国的安德森—奈恩论题进行了重新研究。这一研究不再像过去那样强调文化和英国特殊论,而是倾向于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背景中来定位英国国家的本质。<sup>①</sup>

《新左派评论》坚定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是作为70年代后期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产生的一种不断增强的危机感而出现的。这在关于工人阶级主体行动的地位和如何回应撒切尔主义的辩论中找到了自己的本土表达方式。对重新参与本土斗争的迫切需要与《新左派评论》对欧洲马克思主义的失望相结合,使之重新恢复了对经典传统的力量的信心,相信这种力量能够促成对本土马克思主义文化以及历史编纂学——包括它的新左派的前辈——得出更具同情心的评价。<sup>②</sup>关于当代问题的共同基础是由威廉斯和密里本德创立的。后者关于国家的持续性研究使他远离了新左派的“文化主义”,这种立场在《社会主义纪事》对经济、政治和工人阶级运动这些更为传统的关注焦点中也得到了反映。当左派被迫去考虑如何最好地分析和击败撒切尔主义时,这一流派研究的价值就越来越清楚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威廉斯——就他而言——开始

① 关于对安德森—奈恩论题的重估,见 P. Anderson, 'The Figures of Descent', *New Left Review* 161, January-February 1987, pp. 20-77。柯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G. A. Cohen,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 Oxford: OUP, 1978)重申了历史唯物主义,对《新左派评论》的转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② 这种重新评价的结果有安德森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Anderson,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1980)、《新左派评论》与威廉斯做的系统访谈(R. Williams, *Politics and Letters: Interviews with New Left Review*, London: Verso, 1979)和《新左派评论》委托拉尔夫·萨缪尔就英国共产主义传统所写的《英国共产主义的失落世界》(Raphael Samuel, 'The Lost World of British Communism', *New Left Review* 154, November-December 1985 and 156, March-April 1986)。

分享安德森关于文化主义重点论的代价这种疑虑。回首 1979 年,他断定早期新左派高估了文化变迁的政治可能性:

为这一意识(改变文化模式)所付出的代价是低估了当代资本主义中没有被改变的其他一切东西。当时,大家普遍觉得:某些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属于过去的时代,你可以从它们身上跨过去。结果是极大地低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权力。<sup>①</sup>

对国家的强制性能力及其意识形态和文化功能的再次强调,成为 70 年代晚期和 80 年代早期各种力量重新联合的一个因素。重要的新左派人物走到一起,清楚地表达了一种“坚定的左派”立场,以抗击密里本德所说的“新修正主义”。这些坚定的左派人士对“后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持怀疑态度,并且对大部分欧洲人撤离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政治的做法进行了抵制。密里本德对《今日马克思主义》的撒切尔主义分析提出了批评,认为它“在理论上完全是不确定的……是一种阶级观念、结构观念和社会观念本身都不再被认为是合适的分析工具的主观主义”<sup>②</sup>。威廉斯则要慎重一些,他接受了后结构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的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但对其政治含义则表示出了忧虑。对于他来说,“当代理论扬言要制造出一种其解放观念将被还原为文本性政治的主体”<sup>③</sup>。当然,并没有出现统一的新左派立场。可是,其他人尤其是对《今日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具有重要影响的霍尔,对新发展的共鸣变得越来越强烈,最终,右倾的政治潮流使得“坚定的左派”看起来逐渐被围困,甚至连《新左派评论》都承认马克思主义出现危机了。安德森最初希望充满活力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资源能够扭转这一危机。

---

① Williams, *Politics and Letters: Interviews with New Left Review*, p. 364.

② R. Miliband, 'The New Revisionism in Britain', *New Left Review* 150, March-April 1985, pp. 5-26, p. 13.

③ 这一评论是在以下文献中做出的:J. Higgins, *Raymond Williams: Literature, Marx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 London: Routledge, 1999, p. 168.

## 结论：新左派遗产的诸方面

1956年为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早期新左派把马克思主义从官方共产主义中解放出来，各个后期新左派流派则极大地丰富了它的理论资源，因此，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它已经很好地融进了英国的知识生活——不是作为僵硬的教条，而是作为批判观念的丰富而具有弹性的资源。这一过程是由欧洲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广泛发展而造就的，但同时也是由英国情境和知识传统所塑造的。英国新左派思想家既使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又在这一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英国贡献。这一动力最明显地存在于新左派对文化的分析中，在这里，新兴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逐渐与既有文学和文化批判传统结合在一起，促进了对文化形式和实践的非还原论的唯物主义解释。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霸权和决定等概念都得到了细致入微的考察和重新研究。一些人——包括《新左派评论》的作者和威廉斯都开始感觉到“文化转向”被夸大得太甚，而在新左派的后期，则观察到了对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兴趣的明显复兴。新左派在这些领域中的工作又引发了在宪法改革、英国的相对经济衰落和左派政治战略等问题上的更广泛辩论。这种重点转换的资源之一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另一个则是对本土激进遗产的重新评估——现在，它不仅通过吸收、同化而得到扩张，同时也在适应那些更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到1976年，安德森正是诉诸一种英语世界的历史唯物主义，以作为对抗欧洲人大范围地撤离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潜在堡垒。<sup>①</sup>

毫无疑问，新左派的理论实验扩展了英国的知识文化。不过，对它的更广泛的政治意义的评估经常是：在一个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被普

---

<sup>①</sup> Anderson,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pp. 102 - 103, also *In the Track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ondon: Verso, 1983, pp. 19 - 27.

普遍认为已经失败的阶段，它的知识活力与它的政治无力性形成了对照。有些左派批评家认为新左派促进了这种失败。埃伦·M·伍德强调，“第二代”新左派对民粹主义的拒绝是战后左派历史上的一个划时代转型的症候，当一部分左派知识分子“不再把它自身视为大众斗争的同盟军，或者甚至不再是一个先锋的时候……关键是，他们不再把他们自己当做属于解放运动的知识分子，而开始把自己当做为了这个运动的知识分子，或者……就是运动本身”<sup>①</sup>。在这种表述中，后期新左派——甚至是那些通过开创意识形态和文化的“自主状态”以及把理论工作摆在优先地位而在理论上献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左派流派——被认为应当（至少部分地）对普遍出现的“从阶级撤退”负责。因为“后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和身份政治（被视为是在弱化/碎片化社会主义左派）就是“从阶级撤退”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就他们查明了左派遗产核心之中的那些困难而言，批判新左派的“理论主义”是有价值的。新左派的工作的确促进了重新定位左派的主体性行动概念，远离以阶级为基础的分析，以及对复杂的、差异性的社会身份的承认。同样真实的是，有些新左派思想家抵制了这种转变。无论如何，它的政治后果仍然议而未决。因此，同样还是真实的是，新左派也牵扯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中，在这个意义上，它承认了需要质疑、批判和改造马克思主义。这必然包含着放弃理论不可动摇的优越性这一主张，让马克思主义传统在各个主要方面暴露出它的问题，并呈现出它在这些方面的薄弱之处，即使有些新左派流派团体姗姗来迟，力图加固它的防御。对于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来说，其重要发展有着比左派自己的“理论主义”更为复杂的成因和结果。更加具体地说，认为一些新左派使意识形态和文化“自主化”了，或者使知识分子成为了它的“主体行动”

---

<sup>①</sup> Meiksins-Wood, 'A Chronology of the New Left and its Successors: or, Who's Old Fashioned Now?', p. 35.

概念的核心,这些想法都是误导。就像忽视了它们内部的发展一样,它忽视了各种各样的新左派之间的连续性和交叉影响,这一点在先前的讨论中已经得到了论证。重新聚焦作为一个整体传统的新左派及其吸收、同化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复杂历史,能够得到更加细致入微的解释。虽然这样做留下的“答案”会很少,但无论如何,它留下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这些资源产生于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张力中,它葆有着独立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命运之外的价值和意义。最后,批判新左派是“理论主义的”,误解了其理论工作的目的,在其中,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仍然处于核心地位。新左派一直保持着被威廉斯称为理论研究的“操作性”观念的东西<sup>①</sup>,这被恰当地概括在了霍尔的下列坚持之中了:“理论和政治,不是作为真理意志的政治理论,而是作为本地化的、接合的知识的理论……但是也是作为一种实践,它总是在思考它对世界的干预,通过这种干预,它能带来一些不同之处,使自己发挥一些作用。最后,是一种知道需要保持知识的谦逊的实践。”<sup>②</sup>要不是偶尔缺乏谦虚的话,新左派的理论实验似乎正好符合霍尔开出的这张处方。

(汤建龙 译 张亮 校)

---

① R. Williams, 'Notes on Marxism in Britain since 1945', *New Left Review* 100, November-December 1976, pp. 81-94. Elliott, *The Merciless Laboratory of History: Aspects of Perry Anderson*, pp. 10-11, 他也就与《新左派评论》的关系提出了同样的论证。

② Hall, 'Cultural studies and its Theoretical Legacies', p. 286.

## 2. 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及文化转向

斯图亚特·霍尔

我们都承认,如果没有理查德·霍加特,就不会有文化研究中心。但人们并不都认为,如果没有《识字的用途》,就不会有文化研究。在早先的一篇文章中,我称《识字的用途》为文化研究的三大“奠基作”之一。<sup>①</sup>而在本文中,我则借机进一步详细阐述我的这个看法。因此,本文提供了对《识字的用途》所处的“特定时刻”的一些思考——早期文化研究从该书中汲取了什么,并且它在方法上的哪些成就又可以归功于《识字的用途》?本文也描述了它与那时更广泛的论争之间的联系,以及该书在我们称之为“文化转向”过程中起到的构形作用。这里的后一个短语“文化转向”其实是一种不那么得体的提炼,理查德·霍加特并不会使用这个短语,而我在这里也没有必要从概念上阐述它。“文化转向”只不过记录了一个与我在别处称之为日益发展的“文化中心性”有关的不可避免的事实——一种令人惊讶的全球性扩张与文化工业的复杂性;文化对社会及经济生活各个方面不断增长的重要性;它对不同批评、理性话语及

---

<sup>①</sup> Stuart Hall,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entre: Some Problems and Problematics', in S. Hall, D. Hobson, A. Lowe & P. Willis, ed., *Culture, Media, Language*, London: Hutchinson and The Centre For Cultural Studies, 1980.

学科的调整作用；它作为一种主要的建构性分析范畴和方法的出现，这个方法是一种“文化渗入当代社会生活每一角落，创造出一种次生环境的扩散，并调停一切事物的方法”<sup>①</sup>。我这里的观察以一个假定为前提，即诸如“文化转向”这样的东西确实跨越整个西方社会出现，它的知识场域恰恰在“二战”之前就已形成，并在“二战”之后的英国以愈演愈烈的态势出现；因此，以其独特的方式属于那一时代的《识字的用途》的确是文化转向早期的一个实例，同时也在产生这一现象过程中发挥了开创性的作用。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识字的用途》这个计划是筹划已久的。它的最初计划是分析大众出版的各种新形式，而它在第一部分所提出的激进革新——即试图在一种对其读者及受众文化的深度“阅读”中将之语境化——只是后来才加入的。不过，到1957年出版之前，它的大致意图已经变得很明确了。该书试图对以下问题提供一个综合性答案：大众报纸杂志与它们重点针对的工人阶级读者的各种态度之间是什么关系？更为紧迫的是，新兴而又更受商业驱动的大众交往形式正如何改变着旧的工人阶级态度及价值观；简而言之，这种新的“识字能力”是在被用于什么“用途”？

请注意，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中，“工人阶级文化”这个术语可以交替地运用于典型态度、价值观、战前数十年中工人的生活的方式，以及在他们之间流行的出版、娱乐和通俗文化的各种形式。批评家们已经指出，上述这些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来源——后者不是由工人阶级工人自身生产，而是由商人阶层为工人阶级生产出的；并且，正如雷蒙·威廉斯在很早以前关于《识字的用途》的一篇评论中所谈到的那样，“‘工人阶级文化’与已经日益支配我们这个世纪的大众商业文化等同”，这导致了破坏

---

<sup>①</sup> Stuart Hall, 'The Centrality of Culture: Notes On The Revolutions Of Our Time', in K. Thompson, ed., *Media and Cultural Regulation*, Vol. 6 of *The Culture, Media and Identities Course Books*, London: Sage and Open University, 1997, p. 215.

性的后果。<sup>①</sup> 无论如何,即使理查德·霍加特并没有把一种简化至另一种,他也确实假定:在早期,一种十分紧密的联系在出版物及其读者之间已经开始出现,这让他可以将它们描述为构成了某种诸如“‘旧’秩序”的东西。他声称,在工人阶级与大众文化的新形式之间,这种相互强化的关系不能再进行假定;并且,这正是关于文化转变之总体判断的核心,而这种文化转变也正是该书整体上最终所提供的东西。

人们所读、所思以及他们如何生活三者之间的关系缺省始终是一个复杂而又争议颇多的问题。《识字的用途》第二部分并没有一直努力去“描述普通工人阶级生活的性质,以便对出版物更为仔细的分析可以置于现实语境之中”<sup>②</sup>,结果更加剧了这种关系缺省。这导致《识字的用途》前后两部分显然不同的两种表述之间出现了无法解决的张力。当然,霍加特当时就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下文中将会看到这两种书写”),并且他后来也经常承认这一点。<sup>③</sup> 可无论如何,它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与其他人提供的许多简单化、还原性的、怀旧的或经验主义的说明相比,这里有一种复杂而又充满差异的文化转变概念在起作用。这场争论不是由新/旧、有机/无机、精英/大众、好/坏之间的简单对立来推动的。霍加特意识到了“证据”的无系统性,并敏感于怀旧的诱惑:“我来自于工人阶级……这种非常情绪化的牵连显示了相当重要的危险。”<sup>④</sup>他既没有掩饰日渐丰裕的生活的影响,也没有夸大变化的速度和程度。涉及文化衰落命题的语言表达都做了谨慎的调整:

(我)坚持于如此强大的一种古老的言语形式,这并不说明古老传统强大而活跃的持续性,但传统并不会完全死亡。在如今这个难

① Raymond Williams, 'Working-Class Culture', *The Uses of Literacy Symposium, 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 2, Summer 1957, p. 30.

② 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58, p. 324.

③ Richard Hoggart, *An Imagined Life, Life and Times*, vol. iii, 1959 - 1991,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92.

④ 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p. 17.



以理解的世界里,作为一种确定的、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值得依赖的参照,它得到了重温并受到依赖。<sup>①</sup>

“态度的改变比我们通常所意识到的更为缓慢。”<sup>②</sup>尽管如此,其诊断的总体大意仍然毋庸置疑:

我并不是认为,在上一代的英国有过一种还相当“民享的”城市文化,而现在它只有一种大众的城市文化。我是说,由于很多原因,大众宣传家所提出的诉求比早期提出的更为迫切有力,并采用了更加全面而集中的形式;我们正在向缔造一个大众文化的方向发展……并且,与它正在取而代之的那种总是未加修辞的文化相比,新的大众文化在某些重要方面并不如前者那么健康。<sup>③</sup>

在这里,“诊断”是一个有用的术语——这也就是“健康”一词所表明的一因为它提醒了我们这一结论应归于什么,以及它受到了利维斯及《细绎》所提出的文化批评多大影响:在 F. R. 利维斯自己的文化著作中所采用的陷于纷争的立场;在 Q. D. 利维斯颇有影响的《小说与阅读公众》的核心部分所说的衰落的叙事;文化抵抗的艰巨规划,这种文化抵抗提供了有关《细绎》之教育方案和诸如《大众文明与少数文化》<sup>④</sup>之类宣言的一些信息;以及,《细绎》影响下的作者诸如丹尼斯·汤普森等人提出的对低劣的广告语言的批判。该书也享有由保守批评家和作家(其中有些是美国人)所提供的对大众文化悲观主义批判的一般基础。它的引文来自于托克维尔、阿诺德、本达、劳伦斯、艾略特、约翰·杜威、奥尔特加·伊·加塞特等等,这些引文赋予了文化衰落叙事以权威性。在对各

---

① 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p. 28.

② *Ibid.*, p. 13.

③ *Ibid.*, p. 24.

④ F. R. Leavis, *Mass Civiliz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Minority Press, 1930; Q. D. Leavis, *Fiction and the Reading Public*,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32.

种形式的文化研究的不断攻击中，马尔赫恩竭力指出，无论任何人——雷蒙·威廉斯除外——努力从他所谓的“文化批判”的元文化话语中挣脱出来，他们都注定是要重复它。虽然承认霍加特对反抗这一趋势做出了重大努力，但马尔赫恩仍坚持认为，霍加特与这一传统的“松散联系”仍然未曾改变。<sup>①</sup>

然而，正如马尔赫恩自己所承认的那样，“谱系并非是命定的”<sup>②</sup>。撇开支配马尔赫恩话语的那一假定不谈——即一种始终已在的可供选择的理论已是颇有成效，并且，在一种错综复杂的马克思主义中，它已经了解到自身向着简化主义发展的趋势——看似更为有趣的是，注意到在努力与这一文化衰落的主导话语决裂的过程中，《识字的用途》正好成为“一个断裂的文本”的方式（正如马尔赫恩承认的那样，雷蒙·威廉斯的《漫长的革命》亦是如此）；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识字的用途》开辟了文化研究与“文化转向”其后所基于其上的可能性。

主导性的《细绎》叙事是紧接着一个未曾说出的假定来建构的，即工人阶级读者和受众享有有限的文化资源与道德体系。只有《细绎》在拯救昔日之遗风，在和文学传统提供的权威著作的长久共处之下，其感性已经被精细化，而它的道德风骨也已经因竭力一直从事批判性文学批评而变得僵硬（“这就是如此，不是吗？”）。它提供了一个抵抗那种大众诉求和新兴的低劣文化之劝诱的阵地。霍加特的陈述显然很了解那一出发点的局限性。

我倾向于认为，论述流行文化的著作经常会丧失它们的某种力量，由于它们没有充分地澄清何谓“人民”，也由于不适当地将它们对“人民”生活之特殊方面的考察与人民所生存的更广泛生活联系起来，并将之与人们带到娱乐中的一些态度联系起来。

<sup>①</sup> F. Mulhern, *Culture/Metaculture, The New Critical Idiom*, London: Routledge, 2000.

<sup>②</sup> *Ibid.*, p. 174.

乔治·奥威尔对流行文化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一个例证,即使是他也“从未完全丢掉从爱德华七世时期音乐厅的舒适内室来看待工人阶级的习惯”<sup>①</sup>。

相反,《识字的用途》中所暗含的一个主张认为,工人阶级受众并非中产阶级与大众媒介可以加以规划的空洞容器——一张白板——无论他们想要什么。他们并不仅仅是“虚假意识”或“文化荼毒”的产物。<sup>②</sup> 他们有其自身的“文化”,尽管它可能缺少由文学传统所提供的精密性和权威性,当然也并不是统一的,但是,这种“文化”以其自身的方式,与有教养阶层的文化一样致密、复杂,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并且具有道德。因此,文化产品的作用不能被“读尽”或直接从为他们消费而生产出的产品内容来推断,因为,为了具备一切深层的“社会效果”,它们必须进入已经得到充分阐释的社会文化世界并积极地与之相协商。在此意义上,阅读总是一种文化实践。

其他的姑且不论,这个思想包含了一种有益的经验,甚至是一种深刻的思想洞察,即社会意识形态在实际上如何起作用?无论“旧”流行文化在商业上如何具有组织性,并在诉求上是天然的,如果它看似少了种“外来的攻击”,那并不是因为它是那一文化的真正产品,也不是因为它能简单地被强加在工人阶级受众之上,而是因为,它更接近于——更忠实地反映,或更好地说,更为“确实地”根据以下常规来运作——工人阶级文化的习惯、态度以及未曾言说的假设。而且,在一个城市工业的全部阶级的复杂形成史中,它通过长期共处实现了自身更充分的“本土化”。如果大众文化的种种新形式影响了变革,那只能是因为,这些文化形式过于将自己置于一种文化活生生的机理和复杂的态度中——它们正是寻求将自己纳入于这一文化中。这些形式根据这一文化的常规来运作,而这一文

---

① 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pp. 9, 15.

② Stuart Hall, 'De-constructing The Popular', in Raphael Samuel, ed., *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ist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1.

化同时也从内部改变并中断它们、驱离它们，并将它们归于新的情感、习惯及判断模式——这就是我经常说的“拉直行动的弹簧”。

于是，我们不仅是追问这如何归功于“文化批判”的话语，如何源自于它，而且还要追问它在多大程度上与那一话语决裂，以及以哪些重要方面与之相决裂？这样才是恰当的。在它的写作实践与思想实践中暗含着什么方法上和概念上的革新，而新的方向可以基于这些实践之上？人们无需苦心推敲也可以列出它们。有一种“文化”概念在这里起着作用，它很不同于激励了文化批判传统的那种文化概念。对于“文化”，霍加特意指工人阶级如何言说和思考，他们在谈话和行动中分享着有关生活的何种语言和一般性假设，怎样的社会态度提供了他们日常实践的信息，他们使用了什么道德范畴，从而对他们的自身行为及他人行为做出评判——当然，这包括了他们如何把这一切用到他们阅读什么、看什么和唱什么上去，即使只是格言式的。这种关于文化作为“使之有意义”的实践的看法确实与“文化”作为评判的理想法庭的看法大相径庭，后者的标准是“业已得到思考和诉说的最好东西”，也正是这个标准鼓舞了自阿诺德直至艾略特及利维斯的传统。这一目标让这晚近意义上的文化成为研究对象的中心和必要部分，无论实现得如何断断续续，它就和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中的第三个定义——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一样界定了一种断裂，而且，尽管有着重大的差异，但它还是界定了一种沿着平行方向迈进的断裂。对文化研究来说，这是一个形成时刻。

这其中蕴含着一种深刻的洞见，它就如一条线索贯穿于随后文化研究的曲折发展和转向之中。它提出了一个批判性的挑战。它让文化分析不可逆转地反对任何还原论趋势——无论是向纯粹意识形态、“经济”还是“阶级利益”还原——不过，它并没有否认社会利益影响到意识形态和文化如何发展，也没有否认社会定位对哪种观念得到采纳并获得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当然，这对它的理论工作也产生了影响。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能被假定；并且，因为它不能机械地操作——就像马克思曾

经说的思想领域之内对经济的“反映”那样——所以，它不得不在自己所有的具体性和历史特殊性中重新概念化。文化不是由自由流动的观念所组成的；它不得被理解为是嵌入在社会实践中的。但它并不是更为决定性的“基础”在某种依赖性的“上层建筑”中的反映。文化研究中心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问题在这一概念上的难题中得到了展示，并也由此表明中心为什么会走一段如此漫长的理论“弯路”。

第二，有人坚持认为必须对“生活方式”加以自在自为的研究，这种坚持是对所有理解文化变革之尝试的一种必要的语境化，而不只是从文本分析中推导出的。我们可以称这是存在于霍加特方法核心的社会责任；并且，文化研究的跨学科特征（这一特征后来多少有些被人文学科的洪流所遮掩）正是来自这一源头。

第三，也有人强调文化主要是作为一个意义问题：不是作为自由流动的“价值观”的意义，抑或是作为体现在文本中的观念的意义，而是作为活生生经验之一部分的意义，它塑造了社会实践并铭刻在各种社会结构、体制和关系之中；文化分析是“对在一种生活的独特方式中暗含而又清楚表明的意义和价值观的澄清”<sup>①</sup>。对此，E. P. 汤普森在他对阶级更为敏锐的意识之下，强调为“生活方式”。

第四，霍加特让“细绎”的文学一批评方法适应了阐释一个文化的活生意义这一社会学任务，在此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方法论上的革新。有人说它是“社会学的”，但显然，这要求某种比一般经验社会学方法更具有革新性的东西。在这些阐释过程中暗含着一种不折不扣的“社会解释学”：“我们必须努力超越习惯而看到这些习惯代表了什么，必须透过各种陈述而了解这些陈述事实上意味着什么（那可能和这些陈述本身正相反），必须察觉掩盖在惯用习语和仪式化仪式背后不同的情感压力”<sup>②</sup>。

---

<sup>①</sup>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5, p. 57.

<sup>②</sup> 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p. 17.

当然,在霍加特有其工人阶级背景,并有着丰富的童年记忆和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从内部解读文化”对他来说是可能的。学生们试图按照《识字的用途》的方法论规则,而老师们则试图教会学生如何将之运用于一部作品——这是“一个中心”建立所要求的東西——这些做法不会是侥幸的,而需要更为严格的教学协议。这个方法论要求从一开始便暗含在“中心”的建立之中。中心在早期就建立了两个工作小组来探讨这样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我所主持的——它试图阐明社会/文化关系,以及这种关系该如何去思考——在这个小组中,阅读广泛地涉及“其他学科”,跨学科和文化研究的观点首先在这一点上结合起来。而在第二个小组中,理查德·霍加特领着学生完成了对许多文本的细读,例如布莱克的《老虎,老虎》、《儿子与情人》的开篇,奥威尔的《射象》,西尔维娅·普拉斯“为语调而阅读”的《父亲》——也就是说,为了演讲模式和对受众的隐含态度而阅读。但这些都是早期的做法。

《识字的用途》作为一个“断裂的文本”提供了这种混杂而不完善的开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化研究发展中接着出现的许多思想因而都是这一开端的发展:抵抗其文化叙事,然而却加深了认识论上的断裂,而这种断裂则得到了它的方法论变革的例证。诚然,这里的许多主线都没有在概念上得到充分的发展,即使是在“英国与当代社会学派”演讲中也是如此,这篇演讲制订了中心最初的计划。<sup>①</sup>然而,当文化研究中出现对“转向理论”的抱怨时——霍加特自己就以最为尖锐的方式做了这样的抱怨——人们很难设想,除了通过借助概念上的不断质询和方法论上的自我反思(可以说是“研究这一断裂”)来加深这些转变,中心还能从哪里开始。

因此,可以举例说明,向一种充分跨学科规划的文化研究的转向,以

---

<sup>①</sup> Richard Hoggart, 'Schools of English and Contemporary Society', in *Speaking To Each Other*, Vol. II,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70.

及与其主导话语的“文学”的决裂,这些都暗含在研究社会和文化——它与其文本共“处”——的律令里,并且,它在20世纪70年代中心的工作中以各种方式得到了广泛应用,尽管《识字的用途》没有什么东西像威廉斯“文化理论作为一种对整个生活方式之中各要素之间关系的研究”<sup>①</sup>那样吸引我们,或者说,像我们在70年代试图转化它时那样吸引我们,即在一种社会结构中研究“文化”及其与其他实践的关系。

“文学”的痕迹依然残存在霍加特对语言的精细而敏感的关注中,也存在于他(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所坚持的主张中,即流行文化和大众文化文本必须被理解为起到了“作为艺术——即使作为坏艺术”的作用:这个评论强化了对语言作为一种文化模型和符号形态的关注,文化正是在其中操作的,同时,它并没有完全回避大众文化争论中传统的高雅/低俗、好/坏范畴。通过与符号学、后结构主义及话语理论的对话,它和坚持回到必然的“经由符号的延迟”建立了联系,没有这种延迟,所有的文化研究都有成为还原主义的危险。<sup>②</sup> 受众积极地把某种东西引入文本中,而并非只是文本的听众——也就是说,“阅读”是一种社会实践,一种能动的交流。在大众交流研究中——它组织了中心早期研究的许多方案,这个观念在对主导“功效”传统的批判中被采纳。这当然也支撑了我自己有关“编码/解码模式”的研究<sup>③</sup>,并随后在与巴赫金对话观念具有建设性的接触中,在“能动的受众”、读者一反应路径中得到复兴,这甚至可以追溯到所谓“民粹主义”关于受众与流行文化的晚近研究重点之中有些过火的各种要素。

文化是对内嵌于“生活方式”中的意义的阐释性研究,这一遗产在许多研究中都可以发现。这些研究运用了人种学、参与观察和结合吉尔兹

---

①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p. 63.

② Stuart Hall, 'Black Diaspora Artists in Britain: Three "Moments" In Post-war History',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61, Spring 2006.

③ Stuart Hall,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entre: Some Problems and Problematics', in S. Hall, D. Hobson, A. Lowe & P. Willis, ed., *Culture, Media, Language*.

所谓的“深描”的其他人类学手法，除此之外，它们把我们带到“表意实践”的语言上。当文字材料“按照”现存态度“研究”，并在各种新的方向上改变它们时，这些文字材料才拥有真实的社会功效，这种观点包含了社会意识形态实际上如何实现其功效的一种模式，而这种功效比影响力、意识形态控制、虚假意识等现有模式要先进得多；它预见到许多将效法多音性和转码理论，并预见到对各种文化研究的冲击，即发展得更充分的“霸权”和文化权力的葛兰西模式——它依赖于“共识获胜”，阿尔都塞的“三大实践”和“多元决定论”，以及一种截然不同的流行概念<sup>①</sup>，等等。

《识字用途》的出版产生了巨大反响：部分是因为内发兴趣，以及它的方法和论点上的优秀和创新；部分也是因为其牵涉到更宽泛的有关战后社会变化步调及方向的讨论。大众文化商品化的增长、电视的诞生、青年文化的萌芽，以及大众消费的增强都是被称为“丰裕社会之争”必不可少的部分。这些力量对工人阶级产生了影响，而这种影响对工党、其选举前景以及安东尼·克罗斯兰在他预言性著作《社会主义的未来》中所称的“社会主义的未来”有着特殊的反响。工党的阶级基础是正在被社会—文化变革所侵蚀吗？确实，文化在工党思想中起到某种残留作用。直到被新近的阶级态度以及随着攻击商品化而显现的价值观揭示出为止，在工人阶级文化密集的、防御性的、次级的法人结构中，工党主义的这一根基并没有成为很严肃的反思的主题。霍加特的著作直接参与了这些焦虑。这些问题刺激了50年代工党的修正主义论争，并且它也是诸如艾布拉姆的影响深远的《工党必定失败吗？》这类著作的语境——这本著作否定性地评价了社会变革之后，工党在其核心工人阶级拥护者之中的前景；它也在盖茨克1959年著名的工党大会发言中得到了总结，在这次发言中，它把我们带到了文化与政治论争的核心，盖茨克

<sup>①</sup> Stuart Hall, 'De-constructing The Popular', in Raphael Samuel, ed., *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ist Theory*.



尖锐地质询了工党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是否可以在“汽车、电视、洗衣机和冰箱”的来临中幸存下来。托尼·布莱尔的“新工党”及仰慕文化在这些争论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前因。

理查德·霍加特并没有直接地提出这些问题，而在此书中也没有大量地描绘工人阶级政治。众所周知，他选择致力于多数人，这是大众宣传者的诉求主要所针对的人群，他也有意地贬低他所谓的“有目的的、政治的、虔诚的并自我改进的少数人”的作用<sup>①</sup>；比如说，他与雷蒙·威廉斯正相反，后者把政治视为“高级工人阶级传统”的一部分，并把政治机构的建立视为其最杰出的文化成就之一（“一种基本价值观向社会领域的延伸”<sup>②</sup>）。然而，《识字的用途》的开篇表明，霍加特的论点从更广泛的关于战后丰裕情况的争论中，并从被称为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化”的情况中确定了自身地位。“人们常说，现在英国并没有工人阶级，一种‘不流血的革命’已经发生了，它大大减少了社会差异，以至于我们大多数人都已经栖居于一种几乎平坦的平原中，一个中产阶级下层到中产阶级的平原……我们可能会受到一种情况的打击，即工人阶级改善他们命运的程度，以及获得更多权力和财产的程度……（他们）不再感到自己是‘下等阶层’的成员……”<sup>③</sup>当然，这结论是慎重而复杂的，但在其攻击性上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至少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确实成了无阶级的……我们正在成为文化上的无阶级。”<sup>④</sup>这在早期新左派圈子中成为争论的焦点，尽管我所称的“某种意义上的无阶级”在其中获得了更为宽泛而批判性的意义。<sup>⑤</sup>

---

① 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p. 22.

② Raymond Williams, 'Working-Class Culture', *The Uses of Literacy Symposium, 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 2, Summer 1957, p. 31.

③ 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p. 14.

④ *Ibid.*, p. 142.

⑤ Stuart Hall, 'A Sense of Classlessness', *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 5, Autumn 1959; R. Samuel, 'Class and Classlessness', *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 5, Spring 1959; E. P. Thompson, 'Commitment in Politics', *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 6, Spring 1959.

文化研究与“最早的”新左派的更广泛的联系已经得到了普遍的注意。特别是，《识字的用途》也已对我在该书出版期间所处的那个环境产生了形塑性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出于某些偶然的原因，如当代资本主义改变的性质、新消费主义的后果、战后社会变革的政治，以及政治与文化的关系，这类关注在当时的激烈论争中构成了关键的争论话题。50年代中期，初生的“新左派”作为一种独特而非正式的学生构成已经在牛津大学出现。它后来与其他形式结合为一种运动，这是由1956年的一些事件所触发的——英国联合法国、以色列入侵苏伊士运河、苏联对匈牙利革命的反应，以及它们对展开政治辩论的冷战放松控制的影响。<sup>①</sup>

《识字的用途》的出版在这些圈子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来自牛津大学的各种左倾学生进行了积极的讨论，这种讨论涉及战后资本主义的性质、福利国家所表现出的历史折衷特征、改变中的阶级性质、苏联试验的性质、冷战的冲击、帝国主义的复活、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以及在这些新历史条件下左派的前景。它的许多成员都是文学批评家，并熟悉利维斯、《细绎》有关大众文化的论点，尽管多数人都在很大程度上既拒绝它有关文化衰落的假设，也否定其文化抵抗规划的精英和保守特征。有些人已经与雷蒙·威廉斯进行了交谈，并已经阅读了《文化与社会》早期章节的草稿。在此环境下，文化不是被看成一种独立价值，而是所有社会实践的一种存在条件，并因而也是政治与社会变革中的一种积极力量：它提供了我所谓的“完全不同种类的证据”，我在工党俱乐部杂志《号角》某期中提出这一点，并在1957年编辑了该文，而它正是由对《识字的用途》的回应所决定的。<sup>②</sup> 这一切都为霍加特此书的被接受提供了深厚的基础，并激发了热烈的论争。《大学与左派评论》是后来两份奠基性的新

<sup>①</sup> Stuart Hall, 'The "First" New Left', *Out of Apathy*, The Oxford University Socialist Discussion Group, ed., London: Verso, 1989.

<sup>②</sup> Stuart Hall, Editorial, 'Clarion', *Journal of the Oxford Labour Club*, Abingdon: Oxon, 1957, p. 3.

左派杂志之一，它在1958年的第二期杂志就是由一组重要的《识字的用途》专题论文集构成，其中包括了雷蒙·威廉斯颇具影响力的评论。霍加特和威廉斯都投稿给之后的期刊，而威廉斯则成为新左派之中的领军人物。

这些论争其后被批评家解读为在文化研究话语中文化包容政治的证据，但这似乎是一种有些不当的发现。这是扩展文化和政治定义的努力的一部分——它毫无疑问仍然处于原始阶段，这种努力成为新左派和文化研究所特有的：把文化看成一切社会实践的构成基础之一——包括政治——只要它们是“指意”的（也就是说，就像马克斯·韦伯一度提出的那样，只要它们具有“意义相关性”）。除非社会团体和阶级通过“最终的经济决定”，并通过“在他们背上安上政治牌照”而始终已在地铭刻在他们指定的政治位置上，正如尼科斯·普兰查斯曾经生动描绘出的那样，招募社会力量到政治岗位，以及他们在权力竞争中，这种动员如何能不——也——成为一个文化问题？并且，这些程序如何能出现，却没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意义的构成基础，而人们正是通过这些来理解其生活的意义的？马尔赫恩主张，这让“文化”成了一切事物——它有些过度了，“没有确定的构成或倾向……一大堆驳杂的可能性”。人们只能回答，并非一切事物，而是在一种维度上的，也是一种存在条件上的所有意指实践（这当然也有着存在的物质条件）；并且，也不是毫无“倾向”，而是决不会是最终决定了的，因而也总是向着多种可能性开放——并因而总会带有一定程度上的偶然性。认为政治的“建构功能”是“决定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关系的秩序”<sup>①</sup>，这种主张只是把水搅浑了。

理查德·霍加特用“美国化”一词来暗指为其主张设定范围的一系列更为广泛的变化。当新左派更为直接地讨论这些问题时，美国也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参照点——由于非常充分的理由。文化的商品化，大众文

---

<sup>①</sup> F. Mulhern, *Culture/Metaculture*, p. 173.

化各种新的动力形式——电视、流行音乐、广告、青年文化、大众更充分地并入到市场之情况的扩张,以及大众消费主义现象,都以战后最强大的当代形式在美国发生。这标志了自英国到美国,在发达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领先例证”的目录中的一种转向。50年代,这看来好似已经解放了各种爆炸性的新兴文化力量;只有回顾性地说,才可以清楚地看出该书在多大程度上属于一个新局面的开端,并以其自身替代性的方式提出了这一开端。

这里我们无法详细地讨论这一转向,但回顾起来,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它的粗略轮廓。一种战后的繁荣,并伴随着上升的生活标准是存在着的。长远的再分配转换通过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得到实现,但这种转换比提倡者所估计的更为有限(尽管伊曼努尔·沃勒斯坦正确地指出,把资本吓破胆就足够了。并且,在这个时代,唤起了对全球化、市场力量、新的全球劳动分工、新自由主义革命和“世界新秩序”的强烈逆潮)。实际上,丰裕并没有这样来表征“无阶级性”;相反,它标志了那一长期转向的早期阶段(尚未完成的),也就是说,从旧的、分层的、植根社会的、等级阶级结构的和具有新教伦理特点的西方欧洲资产阶级社会,向美国被更加削平的“后工业”阶级结构转向,后者基于公司资本、货币、声望、生活方式、享乐主义和消费。隐含于其下的是一种长时期的转向,也就是说,从19世纪的企业家资本主义,凭借帝国主义的“全盛时期”的神话、第一次世界大战、无产阶级“时刻”的失败,以及两次大战期间的沮丧情绪,转向一种权力的汹涌激增,这由法人资本的集中、管理革命和20世纪晚期的福特主义经济规模得到了表征。大众社会、大众文化、大众消费主义以及大众市场成为这一历史转向不可分割的方面。准确地说,如何理解它们真正的相互依存性、随后的演变及其与文化的关系,这依然是文化研究尚未实现的任务之一——在日渐盛行的超理论氛围和后政治氛围中,或许永远丧失了。当然,在《识字的用途》之后紧接着的几十年里,事态的发展将要由福利国家与社会——民主共识的历史折衷所

支配。但到了 70 年代末——并在全球化范围内得到了大规模的改组——我们正在试图理解的这种力量开始以不可阻挡之势，也以对文化的深远影响回归到这个舞台，并且，它的确改变了世界。

(殷曼特 译)

### 3. 雷蒙·威廉斯的新左派政治学

罗宾·布莱克伯恩

1988年1月26日，雷蒙·威廉斯的逝世带走了英国左派最权威、最一贯和最激进的声音。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此时他的各项身体机能均很不错。许多报章刊物都登载了威廉斯的悼文，它们普遍认为：随着这一最尖锐的批判家的去世，民族文化已经令人痛心地消失殆尽了。威廉斯以极其新颖的方式研究文学、文化研究、传播和成人教育，开辟了研究和实践的新领域。这种文化工作是与其民主的“漫长的革命”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它的合法性和重要性如今已被许多之前并不同意其反资本主义政治学的人所承认。威廉斯的喜剧或小说包含政治主题，但就像他的所有著作一样，是用一种与公认的政治话语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的。对左派来说，威廉斯工作的意义绝不仅仅属于左派。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尽管如此，在《新左派评论》这份与威廉斯有着特别联系的杂志中，关注威廉斯著作的政治意义并着手估量他的逝去究竟带来了多大的损失——这其实非常困难——却是恰当的。整理他遗留下来的思路不仅费时而且费力，而且我们也不能指望这样就能为它们编织出一个完美的结论。但无论以多么片面的方式，将那些与威廉斯的洞察力和成就紧密结合为一体的他对政治问题的关切记录下来，却是应当做的。

## 抗议与文化理论

雷蒙·威廉斯是《新左派评论》的创始人之一，曾投稿 18 篇，涵盖了《新左派评论》的每一个发展阶段。在过去的每个世代中，他的稿子都激发了人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基本原则问题的批判反思——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是爱德华·汤普森的文章；在 70 年代，是特里·伊格尔顿和安东尼·伯内特之间的交锋；在 80 年代，则是《新左派评论》第 148 期中弗朗西斯·马尔赫恩对《走向 2000 年》一书的探讨。《新左派评论》还曾与威廉斯合作出版了访谈集《政治与文学》(1977 年)，该书是对他作为社会主义思想家的生活和工作的最完整概括。当然，这并不是说《新左派评论》在回应威廉斯的问题时总是切中要害的，也不是说我们始终都在充分利用他的智慧、辨别力和支持这些无价资源。其中的原因既和《新左派评论》的注意力始终在变有关，也与错误的接合有关，而前者更加不容易解释清楚。不过，威廉斯原本可以对《新左派评论》的历史发挥更大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sup>①</sup>

不过，这仅仅是他对“新左派”诞生所做多方面贡献中的一个——50 年代，他是《大学与左派评论》的支持者，60 年代后期是《五一宣言》的编辑，80 年代早期是社会主义协会的创始人，以及在各种各样的工作小组、运动、计划中以不那么正式的方式所担任的作家、演讲人和参与者等角色。

在《文化与社会》(1956 年)和《漫长的革命》(1961 年)出版后，威廉

---

<sup>①</sup> Edward Thompson, 'The Long Revolution: Part 1', *New Left Review* 9, May-June 1961; Edward Thompson, 'the Long Revolution: part 2', *New Left Review* 10, July-August 1961; Terry Eagleton, 'Criticism and Politics: the Work of Raymond Williams', *New Left Review* 95, January-February 1976; Anthony Barnett, 'Raymond Williams and Marxism: a Rejoinder to Terry Eagleton', *New Left Review* 99, September-October 1976; Edward Thompson, 'Afternote' to 'Romanticism, Utopianism and Moralism: the Case of William Morris', *New Left Review* 99, September-October 1976; Francis Mulhern, 'Towards 2000', *New Left Review* 148, November-December 1984.

斯都——绝非最后一次地——成为左派争论的主题。帕尔姆·杜德发现他与“某某改良主义”别无二致。爱德华·汤普森和 C. L. R 詹姆斯不仅背景不同，而且隔洋相望，不过，在赞美威廉斯的成就和质询他的重点与空白时，两人却殊途同归，当然是以完全不同于杜德的方式。他们问的是：李尔波恩和帕特尼辩论中那些流行语出处何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概念的出处又何在？在“共同意义”和“感觉结构”中阶级意识和革命到哪里去了？<sup>①</sup>

威廉斯以宽广的胸怀接近前社会主义的甚至反社会主义的各种传统，这让左派批判家感到惶恐。但是，这让他能够去开发那些被忽视了的社会批判资源，构建出了一种强有力的、被证明能够抵御政治气候风云变幻的社会主义信仰。他对统治阶级霸权形态的洞察力，以及其著作中挑战这种高霸权形态的能力，源于他的决断：从最坚固的地方下手检验已确立的文化模式，而不使自己满足于让纯粹激进谱系感到宽慰的简单化做派。50年代威廉斯的主要写作动力是去建立（重建）一种作为人类秩序的工业资本主义批判，而不是去追究生产力领域中的明确的经济失败或者所谓的失败。在《漫长的革命》中，可以识别社会形态的隐性维度和政治变迁的层结构的新概念工具得到了继续阐发。威廉斯坚持认为，政治和经济制度遗漏了经验和社会实践的重要领域，并且对完整生命形式和长时段给予了关注。这些都对女权主义的开山之作、朱丽叶·米歇尔1966年发表于《新左派评论》第40期上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一文的标题以及总体方法方面的某些内容，给出了预示。可以这么说，正是因为拒斥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中的一些已有范畴，威廉斯对英国社会形态或文化工业的分析是或者转变成历史唯物主义的了。

---

<sup>①</sup> Edward Thompson, 'The Long Revolution: Part 1', *New Left Review* 9, May-June 1961; Edward Thompson, 'The Long Revolution: Part 2', *New Left Review* 10, July-August 1961; C. L. R. James, 'Marxism and the Intellectuals', *Facing reality*, May 1962, reprinted in C. L. R. James, *Spheres of Existence: Selected Writings*, London: Allison & Busby, 1980, pp. 113-130.



威廉斯对保守主义传统的持续关注与他对新实践、新制度的大胆拥护是一致的。文化得以生产和再生产的模式始终是他的核心关切，由传播技术的变革所开启的民主可能性也是如此。在《新左派评论》编委会的早期讨论中，时任主编的斯图亚特·霍尔提出了这些问题，并着手实验一种理解当代大众文化的新途径。这些努力都得到了威廉斯的支持。他与教育、传播有关的著作开创了全然不同的讨论氛围和可能性空间，这些都是当时的官僚们无法完全忽视的。在多次再版的企鹅丛书版本《传播》中，他不仅赞同传播方式的公共所有，而且也赞同，它们的运行管理权应当让渡给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组成的自我管理机构。虽然威廉斯并不是呼吁成立英国开放大学或第四频道的直接负责人，不过，他为此进行的鼓与呼，显然让这两个机构拥有了更完善的制度。

既然如此，那么，当时的工党教育部长为何不邀请威廉斯参政呢？1968年4月的一期《听众》周刊有助于解释这个问题。《听众》周刊由英国广播公司出版。那一期除了有伊萨克·柏林爵士和爱德华·希思爵士的文章外，还有威廉斯一篇题为“我为什么示威？”的文章。在该文中，威廉斯解释了他为什么会参加反越战示威以及在德国大使馆外抗议鲁迪·多茨克被枪杀的示威活动。其中的文字特别值得详加引证，因为它很好地展示了威廉斯的能力，即利用最尖锐的干预活动，把问题置于一个新的出人意料的语境中，以向我们说明我们自身行动所具有的更广泛重要性的能力：

在今天的许多城市中，抗议游行已经成为政治活动的一个常规部分。而过去的英国——如在彼得卢和宪章派的游行中——也有一种先于自由主义民主的示威形式。那些由没有选举权的人所组成的游行队伍代表了被排除在政治决策之外的大多数人。他们举着标语走街串巷，因为这仍然是最迅速和最显而易见的传播方式。今天的传播方式大大发展了……但议会民主在舆论的压力下已经变得日益形式化……更有甚者，现代组织化资本主义实际上把决策

转移到了许多非民选的组织中去,在此压力下,具有议会民主所具有的一切力量和局限性的代议制民主理论实际正在被自身所超越。在取代代议制民主的过程中,现代传播系统发挥了关键作用。它根本不是民主的,而且也完全没有假装是民主的,除非是以完全否定的方式。在鲁迪·多茨克被枪杀后,德国学生走上街头抗议新闻垄断。他们因此出于自己的良好动机,让多年来一直是新左派理论的核心组成的一个观念走上了街头:在任何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社会里,报纸、广播和电视构成的传播系统都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制度——这主要体现在它对必要信息的提供,筛选、强调或是拒斥某些信息的能力,以及施加影响和进行参与的力量中。但是,这个制度……在交易中永远都偏向富人和新的传播巨头,因为他们通过简单的收购而获得了这种巨大政治权力的控制权……在经济计划和传播中,议会已经把许多决定性领域中的权力让与了完全非民主的制度,而且这些制度也是议会丝毫不准备去挑战的。西欧各个社会民主党所招致的失败,可以通过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妥协得到测度,因为它们从来都没有把自己是迈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手段这种严肃问题当回事。就在它们的失败所造成的夹缝中,新的运动正被创生着……面对此情此景,人们自然会清醒冷静地认为:政治体制的腐朽和堕落,以及事实上现在被引导来反对世上穷人的残忍暴力,将继续得到一切行之有效的手段的抵抗。<sup>①</sup>

## 帝国主义与悲剧

威廉斯的成长背景使得他对反殖民斗争和农民起义尤为同情。他的某些价值观就源于此。当威廉斯的父亲还是一名铁路工人的时候,他

---

<sup>①</sup> Raymond Williams, 'Why Do I Demonstrate?', *The Listener*, April 25th 1968.

家住在威尔士边界附近,靠近潘迪的乡村,社区中既有农场主、农民、教师、牧师,也有少量的工会成员。在向《新左派评论》讲述早期政治经历时,他回忆了建在潘迪的左派读书俱乐部,及其组织的声援西班牙和中国的活动,同时也提到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以及柯尼·希利亚客士的演讲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sup>①</sup>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自然会形成一种初步的但具有持久影响的“感觉结构”——一种具有地方色彩的国际主义以及一种并不那么明确的政治文化模式。那么,战时经历是如何塑造了他对第三世界人民反军事独裁、反地主统治、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态度呢?在1975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对此给出了解释:

我成长于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父亲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样的环境中,好战的工联主义与憎恨战争——与和平主义相差无几吧——势均力敌地搅合在了一起……所以,提到社会变革,我们是好战的;但提到战争,我们又是和平主义的。但我们终究无法在这些矛盾中长期生存下去。1938年,我还自称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但在1944年,我却参加了诺曼底登陆。我记得有这么一天,一个纳粹党卫军坦克团进行反攻,就在那种情景中,我生命中一个特殊时刻变得清晰了,确切地说,因为我而变得清晰了。我发现很重要的一点,即被我们攻击的是纳粹党卫军,而不仅仅是德国士兵,当然其中也有少量的乌克兰士兵,以及来自希特勒帝国其他一些仆从国的散兵游勇。他们是纳粹党卫军这一点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传达了一种我已从新闻报道、西班牙内战中得知的意义。从那时候起,我再也不认为,运用军事手段保卫革命,是我要反对的东西。相

---

<sup>①</sup> Raymond Williams, *Politics and Letters*,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9, p. 31. 左派读书俱乐部帮助培养了一大批战后杰出的英国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这足以证明它没有被具有强大适应能力的人民阵线的陈词滥调所同化。威廉斯记得,当年他这个仅十八九岁的潘迪左派俱乐部新人是如何跟他在剑桥遇到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者谈话的:“我想和最革命的共产党人在一起。”(Raymond Williams, *Politics and Letters*, p. 41)

反,我相信,一场没有准备通过军事力量保卫自身的革命是没有意义的……当我翻看中国、古巴和越南的革命史时,我感觉到他们不仅仅在目标上而且在取得胜利的方法方式上也基本上都是一致的。<sup>①</sup>

对于 20 世纪发生的那些革命,威廉斯了解很多,而不仅仅是些只言片语。他特别厌恶那种把可避免的和不可避免的革命苦难都变成了可怕的哑剧,同时却遗忘了帝国主义的暴行的人。在《现代悲剧》(1966 年)里,他思考了这些主题以及由“反混乱的混乱斗争”带来的苦难:“我们必须切近的经历中认识这场苦难,而不是根据名称来报道它。不过,我们要关注全部行为:不仅仅是罪恶,还包括反抗罪恶的人;不仅仅是危机,还有从危机中释放出的力量,以及人们从危机中得到的勇气。”<sup>②</sup>在前述 1975 年的文章中,威廉斯反对在“实行政治民主的社会”里任何诉诸身体暴力的行为,除非是保卫民主自身。<sup>③</sup>但是,在他看来,依据其目标以及民众参与范围的不同,示威和罢工、静坐和抵制可以帮助从中心开始萎缩的民主壮大起来。

威廉斯著作有一个典型特征,即在其主要著作中都可以找到对当代问题的直接的政治反思,当然,其方式或许在一个历史学家看来并不那么恰当。威廉斯的所有著作都有历史维度。但这种历史的眼睛是看着当下的;在那里,当代经验得到有针对性的援引,以对文化理论进行批判的检验。在威廉斯的笔下,在利维斯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真实性和经验的试金石解放了一个以前几乎没被批评承认过的世界。因此,在像《现代悲剧》这样的著作中,威廉斯能评论说:“在英国调兵遣将镇压南阿拉

① Raymond Williams, 'You're a Marxist Aren't You?', in Bhiku Parekh, ed., *The Concept of Socialism*, London: Croom Helm, 1975, pp. 231 - 243, p. 238. 我要感谢凯文·戴维让我注意到这一文本。

② Raymond Williams, *Modern Tragedy*, revised edition,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9, p. 83.

③ Raymond Williams, 'You're a Marxist Aren't You?', in Bhiku Parekh, ed., *The Concept of Socialism*, p. 239.

伯‘持不同政见的部落’的这样一天,我正在写作。”这使他从工党政府的这些举措中得出结论:“我一生中不断经历这类事件,因此,我太了解它们及对它们的报道了,以致我不能认同那种日常的幻象。我的许多同胞都反对这些政策,在不少特殊情况下也曾成功阻止过。但很难令人信服的是,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已经投身于人类解放事业,甚至是承认其他所有人的基本人权——这是任何真正革命的动力所在——的事业。就说我们自己的情况吧,在一个被巨大的经济不平等和组织化操纵所掌控的社会中,其实还有太多的这种承认需要去完成。”<sup>①</sup>

## 人类生态学的挑战

威廉斯不仅仅出现在越南团结运动的讲台上,而且也研究乡村抗议活动和海外文化侵略的一般意义,目的是为了建构对文化和文明的社会主义理解。《乡村和城市》(1973年)揭示了隐没在英格兰“乡村宅院”文化和田园牧歌式的习俗背后的本土的资本主义掠夺过程以及海外殖民地的奴役过程。同样,通过建构一个精确的社会语境,威廉斯将那些道德敏感性已经超越了田园牧歌层次的作家的著作进行了准确的定位,而不是使之消散于无形。他敦促英国读者,如果想要了解自己社会的过去,那就去求教威尔逊·哈里斯和尼·瓦·西昂戈这样的当代第三世界作家。在反对“新都市”术语——那些预示了后来的“后现代都市”争论的诸多重要术语中的一个——的过程中,威廉斯阐明了一种新的“社会意义”,并准备对整个“人类生态学”担负起责任来。<sup>②</sup>

在1987年秋季进行了一次关于近期反乌托邦小说浪潮——如保罗·斯欧克斯的《零度地带》和彼得·戴维斯的《最后一次选举》——的对话中,威廉斯嘲笑这些充斥着厄运的预言和讽刺作品的影响力不会是

---

<sup>①</sup> Raymond Williams, *Modern Tragedy*, p. 79.

<sup>②</sup> Raymond Williams,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73, p. 329.

按照一代或两代人来计算的,至多是几年时间而已。如果《现代悲剧》将自身置于一个被帝国主义和革命控制的世界中,那么,《乡村和城市》则为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生产主义”变形的彻底的生态学批判预备好了场所。70年代后期,威廉斯成为社会主义环境资源协会的发起人。他率先回应爱德华·汤普森关于核武器竞赛的危机正不断升级这一论题。在《核裁军政治》中,他声称,“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建立和平,而且需要建立的不止和平”,因为在核军事力量和掠夺、失业的持续存在之间有着本质联系。<sup>①</sup>

当威廉斯始终如一地攻击隐藏在劳动大众支持的背后的、田园牧歌文化或消费主义文化的脆弱幻象时,他不能预定一个正在发展中的阶级主体这种观念。他对社会意义的追寻集中在主体间性及其物质前提上,他总是争辩说:社会意识既是在阶级和阶级中的集团之间,也是在它们之中形成的。运用这种合理的方式,威廉斯对60年代暧昧的国际遗产、围绕70年代英国局势的深入争论或是80年代的“后现代”假象,都给予了阐明。而这种方式所关注的是复杂的社会总体、代际转换以及地理位置的联结。

对复杂的事物进行不断的限定,这是威廉斯特有的模式。促进其形成的不是什么对中庸之道的反思,而是对精确性和真实性的探求,以及他的一种意识即人类社会的能力是累积发展的。一方面,他的著作涉及了资本主义文明逐渐显露的危机以及被部署起来抵抗它的那些主要力量;另一方面,对文化形式及其所要求的组织的多样性的敏锐感觉,让威廉斯形成了一个主张,即人类社会应对杀气腾腾地进行着的经济竞赛和军备竞赛过程加以控制。威廉斯提到的生态学危机是严肃的和有经验根据的,因为他希望建立谨慎和有效的社会抵抗形式。如果说威廉斯的

---

<sup>①</sup> Raymond Williams, 'The Politics of Nuclear Disarmament', *New Left Review* 124, November-December 1980.

社会主义有时是在效仿和继续莫里斯对资本主义的浪费和破坏的可怕控诉,那么,他从来没有屈从于后者那种诱人的简单化做派——或是对问题的,或是对问题的解决方法的。社会主义既不是现成的,也不是离开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绝境的平坦道路。通过吸收对社会主义的生态学批判结论,他发现,这使得全球“共同意识”的建构变得更加紧迫也更加困难了。威廉斯所关心的要务的政治核心在《走向 2000 年》(1983 年)中得到了最为显著的体现。在该书中,他试图让以阶级为根本的政治遗产与“新社会运动”发动的必要修正协调起来。在他看来,对于重建一个高于特定团体的阶级利益的“普遍利益”感来说,后者——尽管受到了宗派主义的影响——是重要的。但另一方面,他坚持认为,由社会运动提上议程的重要问题将会“带领我们进入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制度以及……其阶级制度”<sup>①</sup>。

## 工党联盟和社会主义

威廉斯在文化实践政治上有一个值得一提的与众不同的重点。这也是他最广为人知的一点,即他特别关心政党和政府组织的有效性和充分性,尤其是这些组织是否有能力促进“漫长的革命”的民主。这是一个能在威廉斯著作的许多观点中察觉得到的主题。虽然工人运动体制是集体记忆和智慧的主要文化体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足以胜任摆在它们面前的任务。在 60 年代中期发表在《新左派评论》第 30 期上的《英国左派》一文中,威廉斯指出,工党结构实际上是由非民主的集团选举决定的,因此,其中的社会主义左派就被锁困在了一个由短期的集体利益政治和费边社改良主义主导的联盟中。“工党是一个联盟这一事实导致了明显的理论贫乏。因此,任何试图超越这种一般界限的尝试就会立刻

---

<sup>①</sup> Raymond Williams, *Towards 2000*, London : Chatto and Windus, 1983, pp. 172 - 173.

导致这个复杂联盟出现内部紧张。”即使是工党提出的最积极的社会变革也被灌注了“道德家长主义”精神，同时，工党政府的外交政策则“因为冷战”、“危险的沙文主义”以及“吉卜林式帝国主义”而“恶化”。左派在工党内的结构性从属地位让左派在党外找到了一个重要任务——核裁军运动(CND)，以及视该运动为“军事警戒保证措施”的共产党和传播更广泛的文化与政治“新左派”。1965年的年初时分，威廉斯就认识到：“对所有那些按部就班(也就是‘异化世界中的无希望的按部就班’)的人来说，英国青年人的声音是可怕的，因为它是一种深刻的和有生命力的声音；并且，当它变得有政治色彩时，它是在反对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不是支持或反对议会政治中的某个特殊集团，这一点非常重要。”<sup>①</sup>

尽管深刻批判工党主义和工党本身，但威廉斯也看到，它所吸引的阶级忠诚存在超越它的既有结构和意识形态实现转变的潜在开放可能性。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欢迎工党内部更激进左派的出现，因为它力图改造而不是简单捕获现存组织。他后来成为《新社会主义》创始编辑之一。这是1981年由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创办的一份杂志。当时，党内右派的优势在威尔逊—卡拉汉政府(1974—1979年)遭到可耻的惨败后一下子就委顿如泥了。《新社会主义》是詹姆斯·库兰用天赋和信仰来编辑的，出版了威廉斯许多力图干预现实的重要论著：在煤矿工人大罢工期间，他抨击“游牧资本主义”及其傀儡的麻木不仁以及撒切尔政府，赞扬煤矿工团的异常顽强；另一方面，他也对左派之于工党奇怪的联邦制结构的持续依附进行了质询。在辩论工党是否会与中间派结成反撒切尔联盟时，威廉斯一语中的地指出，工党本身始终是某些社会主义者和大西洋主义者、亲资本主义的工党右翼组成的联盟，因此，“不管它是大联盟还是小联盟，事实上，联盟的倡导者们已经抛弃了改变信条和

<sup>①</sup> Raymond Williams, 'The British Left', *New Left Review* 30, March-April 1965.



观点的斗争”。在威廉斯看来,要么与中间派联盟,要么继续与工党的前座议员联盟,这意味着集结在一个极其虚弱和不连贯的议程周围,实际上是断然放弃了更新和壮大社会主义政治这一重要工作。在1987年8月的《新政治家》与特里·伊格尔顿进行的访谈中,威廉斯警告左派注意工党主义联盟所包含的妥协暗示。他认为,大选指向中间派与工党前座议员的再次结盟的开始。当他坚持认为“与中间派重新结盟不只是左派的事务”时,他相信,如果它导致选举改革,或许会开辟出一条社会主义者与绿党、激进民族主义者结成联盟的道路。威廉斯相信,“工党在总体上转变为社会主义政党”是一个虚假的、经常让左派哑口无言的目标。但是,他明白,任何新的社会主义形式都需要建立在工人阶级运动以及撒切尔时期在工人运动内发展起来的社团抵抗运动的基础上。<sup>①</sup>

与传统的工党左派政治相反,威廉斯拒绝把英国的国家结构作为社会主义行动的必要地平线。他非常坚定地寻求与欧洲其他地区的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期待向英国国家得以建构的那些原则发动社会主义的挑战。1982年,威廉斯为社会主义协会写了一本题为“民主和议会”的小册子,其中他不仅对行政机关的秘密原则和等级制进行了控诉,而且也对英国政治代议制实际上主张的寡头政治和差别性特征进行了批评。对威廉斯来说,实行比例代表制和打碎威斯敏斯特现行的议会制度是社会主义者相互补充的两条政纲。这本小册子的终篇是关于对国家进行民主化改造的一个全面规划。它实际上把这个规划理解为民主地控制经济和文化过程的一个必要前提。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威廉斯为什么会有如此持久的影响?原因之一就在于他的这些力图干预现实的努力,在于他不懈地关注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的文化和政治伴生物,以及在于他提出了与建成真正的民主社

---

<sup>①</sup> Raymond Williams, 'Splits, Pacts and Coalitions', *New socialist*, March-April 1984; Raymond Williams and Terry Eagleton, 'The Practice of Possibility', *New Statesman*, 7 August 1987.

会所需要的制度变革有关的诸多非常现实的问题这种主动性。

## 重新开始的漫长革命

威廉斯时常表示,他更愿意把自己理解为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和历史唯物主义者,而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他也使用“马克思主义者”这个术语,是因为它感觉上“比共产主义者这个术语更文质彬彬些”。但不管怎样,将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投身其中的传统简化为“一个不管有多么伟大的单个思想家”的名字,是错误的。但另一方面,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主张、并以“文化唯物主义”的形式对这些基本主张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时,威廉斯是一点也不犹豫的。历史唯物主义帮助社会主义者去认识究竟是什么阻碍了获得解放的人类力量的成长:“不只是选举的对手或是传统的对手,而是一个敌对的组织化社会形态……。”<sup>①</sup>

只有不同于费边社传统和斯大林主义传统的、广泛的自我管理精神得到了发展,才能挑战这种敌对的社会形态——这必然要去夺取资产阶级霸权在受压迫、受剥削人民内部的根源:“从我自己的思考和经历以及对别人生活的观察中,我认识了霸权的真面目以及一个特定社会的感觉结构的饱满力量。在我们的一生中,只要努力,我们就能揭示存在于在我们之间并且在深入我们之中的这种异质形态的各个层次。”威廉斯没有将意义的文化构造同物质生存的紧迫压力对立起来,即便是这种压力落在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对富裕的工人身上。

“我信任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开展的必要经济斗争,”他写道,“就像多年前称伟大的工人阶级机构是伟大的创造性成就以及政治斗争的不可缺少的首要方法一样,我相信,这仍然是我们社会中最富创造性的活动。

---

<sup>①</sup> Raymond Williams, 'You're a Marxist Aren't You?', in Bhiku Parekh, ed., *The Concept of Socialism*, p. 241.

但是……我知道有一项非常必要的、与文化霸权过程有关的工作需要去完成。我相信,只有最持续的理论工作和教育工作才能既在总体上也在细节上战胜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意义和价值体系。这是一个我称之为‘漫长的革命’的文化过程,我的意思是,这是一项真实的斗争,是为了民主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经济胜利的必然斗争的一部分。人民在斗争,并通过行动得到了改变,这是事实。但是,对于像主导的感觉结构这样深入人心的东西,只有新的积极的经验方能改变。但是……一场成功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任务将涉及感觉和想象,这就和它要涉及事实或组织一样。”<sup>①</sup>

其实在玛格丽特·撒切尔第二次大选胜利之前,在被广泛分析的左派在学院文化中取得的成就与“新右派”在大众文化的斩获之间,惊人的差异就已经很明白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威廉斯自己在文化研究中取得了卓越成就,差不多同时期,在历史以及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领域,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也是层出不穷。可就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学界变得有影响之后,撒切尔主义先是巩固了保守党,接着是巩固了对国家政治的控制。在《新左派评论》第140期(1983年)中,威廉斯指出,除了从来都不实行少数服从多数这个原则外,英国国家的特殊性还为撒切尔保守党提供了其他优势。80年代英国特有的经济和意识形态压力源于70年代工党主义的失败以及撒切尔主义“流动私有化”的妄想,它以惊人的社会成本为代价获取了思想狭隘的和不平等的消费者的满意。威廉斯质询了随意的信贷政策和因供大于求而导致的大量失业,以及无数使应当由社会决定的意识破裂、个体化的复杂方法。其中已经包含了对不同于此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和替代性的组织原则的

---

<sup>①</sup> Raymond Williams, ‘You’re a Marxist Aren’t You?’, in Bhiku Parekh, ed., *The Concept of Socialism*, p. 239.

关注。<sup>①</sup>

威廉斯从来不仅仅满足于得出结论，或者确保它们得到学界的认可。《关键词》(1976年)的出版既让他加深了关于意义的文化结构的论证，也使得他的结论更容易理解。“个人”、“社会主义”或“资产阶级”的术语历史使得威廉斯恰好能够用这些词来强调——尤其是对那些丝毫不觉得有问题的人强调——某些问题。在关于煤矿工人大罢工的文章中，威廉斯主张，社会主义者必须说明斗争的关键词，从普通男男女女的极其广大的集体经验中获得教益：“复兴社会主义的发展重点现在就在所有这些遭遇重重危机的共同体之中：不是作为特殊情况，而是一个普遍情况。正是在这里，在多样性和多样性的有关方面中，新的大众力量正在形成，并期待一些印象深刻的表达。详细地说来，这无疑将是漫长的和困难的。不过，在挑战‘管理、经济、法律和秩序’这一破坏性的口号——它掩盖了进入了新的蛮横阶段的资本主义真实运行情况——的过程中，在寻求捍卫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煤矿工人勾勒出了一种普遍利益的新形式”<sup>②</sup>。

在《新左派评论》第158期中，威廉斯评说了左派在教育领域、特别是成人教育领域的真实发展，也对一些左派学者采用某种自我孤立的理论程序和政治口号的做法进行了评论。在寻找摆脱文化保卫和臣服方法的过程中，威廉斯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应该无情地盯着那些敌视超越它们的一致文化的许多形式以及它们——仅仅是建立在其否定性和封闭的形式上——的理论和著作吗？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学说提出了撒切尔主义傻瓜式的诊断，教导人们在更加多样化、更加不稳定和更具临时性的社会形势中接受绝望和消除政治敌意，这是偶然的吗？或

---

① Raymond Williams, 'Problems of the Coming Period', *New Left Review* 140, July-August 1983.

② Raymond Williams, 'Mining the Meaning: Key Words in the Miners Strike', *New Socialist*, March 1985.

者主张让长期利益服从短期形式的小资产阶级理论家从来都不会销声匿迹？再或者，在最近的一些艺术中，我们能否再次提出这样的问题，即把被剥削者表现为堕落的人是否就是在延长剥削者进行剥削的期限呢？”<sup>①</sup>

威廉斯留给我们许多问题，有些问题不尽如人意，有些则得到了比人们初次阅读它们时更广泛的分析。同时，他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关于如何找寻现有问题的答案的指示。这些指示就在他的那些杰出的文化批判著作中，在他的许多论文和力图干预现实的文章中，在像《走向 2000 年》这样的直接的政论著作中，特别是在他对历史以及后人的那种值得人们效仿的责任感中。

（夏娟 译 张亮 校）

---

<sup>①</sup> Raymond Williams, 'The Road to Vitebsk', *New Left Review* 158, July-August 1986.

## 4. 爱德华·汤普森：作为行动主义者的历史学家

迈克·贝斯

1980年春，爱德华·P. 汤普森将自己作为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束之高阁，一头扎进了当时那场激情四溢而又有些狂乱的政治激进主义运动。而就在两年前的，他刚刚出版了《理论的贫困》一书，对法国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进行了长篇抨击，指控后者削弱了人的能动性和历史的自我决定性。现在，携着其将华丽辞藻与尖酸刻薄融为一体的典型语言风格，汤普森走出理论的象牙塔，出现在了两大冷战集团的军事基地前。人能够创造自己的历史吗？这差不多就是不断出现在其前30年历史学著述中的主题，如今他要亲自用行动来求解了。

在随后那些年里，汤普森成为被称为双边的欧洲核裁军运动这一极为流行的社会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信件像雪片一样飞来，他不断应邀出现在公共集会上和电视访谈节目中。1984年，他在牛津大学与美国国防部长卡斯帕尔·魏恩伯格激烈交锋，而在这场遭遇战后，双方都宣称取得了道义上的胜利。就在那个现场，他立马成了军事问题专家，把文化史和社会史的概念工具这套全新的理念运用到了军事技术和战略领域中去。

汤普森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扮演行动主义历史学家这

个角色了。他的职业生涯就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学家和知识分子的政治结合这一悖论提出了许多问题。政治介入如何影响一个人作为历史学家的判断力？什么是历史学著述最根本的目的？反过来说，作为历史学家，一个人应以何种方式去影响自己对政治生活的参与？

“我父亲是一名非常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在1976年的一次访谈中汤普森如是说，“他是英帝国主义持之以恒的批评者，也是尼赫鲁以及国大党其他领导人的朋友。所以，我从小就认为政府是虚伪的和帝国主义的，人们应当采取反政府的姿态。”<sup>①</sup>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生于1924年，后来，他把自己童年时代的家描述为“上一代许多有趣的人物经常造访的地方”——从诗人罗伯特·布里奇斯到政治家吕锡安爵士，从泰戈尔、甘地到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汤普森对尼赫鲁的记忆特别生动，“我面前站着令人敬畏的伟大的贾瓦哈拉尔，他问我的板球技术怎么样”<sup>②</sup>）。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汤普森和他的哥哥弗兰克不仅没有继承自己父母的自由主义信念，反而更进一步，一上大学就参加了英国共产党。那时候，汤普森快20岁了。他和他的哥哥都热情信仰一种大众的和民主的共产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当时还没有被斯大林主义的经验击碎。“我哥哥保存下来的书信，”他后来解释说，“与斯大林主义那种可笑的意识形态图像完全不同。他信奉人民，首先是信奉南欧游击运动那种令人荡气回肠的英雄主义。”<sup>③</sup>所以，一到可以参军的年龄，兄弟二人就先后加入到反法西斯主义战斗中。爱德华领导一支坦克部队，先后转战第六战区的北非和意大利；弗兰克则志愿参加了一次突破纳粹战线深入巴尔干的危险行动，1944年，他和当地一支游击队一起被俘，然后被杀害。

---

① ‘Interview with E. P. Thompson’, *Radical History Review* 3, Fall 1976, pp. 10–11.

② E. P. Thompson and T. J. Thompson, ed., *There is a Spirit in Europe: a Memoir of Frank Thompson*, London: Victor Gollancz, 1947, p. 11; and E. P. Thompson, ‘The Nehru Tradition’, in E. P. Thompson, *Writing by Candlelight*, London: Merlin, 1980, p. 138.

③ ‘Interview with E. P. Thompson’, *Radical History Review* 3, Fall 1976, p. 11.

战后的最初十年，汤普森开始面对一个难题：在政治行动主义和学术生涯之间进行艰难的平衡。1948年，他与女共产党员、当时正从事宪章派运动和19世纪后期工人运动研究的多萝茜·达沃斯结婚。同年，他在隶属利兹大学的一个成人教育项目获得一个职位——这是在英国“小麦卡锡主义”发动之前<sup>①</sup>，共产党知识分子得到的最后几个教职中的一个。汤普森一边教书，一边将起码一半的时间投入左派政治活动。他是哈利法克斯和平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约克和平运动组织联合会的秘书长、一家和平运动杂志的主编以及英国共产党约克郡的党委委员。<sup>②</sup>

当晚年回顾这段生活时，他觉得那是自己政治生涯中最野心勃勃的一个阶段。一方面，他觉得自己当时参与的是一种充满希望的草根运动：在工厂大门口和居民小区门口散发传单，直接参与当地的工人阶级政治活动。另一方面，汤普森不断发现自己正与坐镇伦敦的党中央的控制策略——他们想强化对不断日益扩大的、非共产党和平运动阵营的控制——发生冲撞。他曾经看到不少著名的工党党员宁可被开除出和平运动，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和平主义的行动主义立场。发现英国共产党居然试图从外部来控制那些具有独立思想的个人，这让他感到有些苦涩。<sup>③</sup>

不过，对任何以远大事业的忠诚的名义而行的不义，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怀疑和憎恨。他的第一本历史学专著是威廉·莫里斯的传记。该书对埋藏在英国浪漫主义遗产中的激进社会批判理论进行了广泛的再评价。尽管在很多方面都与英国共产党的路线保持了恭顺的一致性，不过，汤普森还是借莫里斯生平抒发了自己的胸臆，因此，他这个“真正的

① “小麦卡锡主义”是汤普森发明的术语。就像霍布斯鲍姆后来所说：“因为在冷战开始之前，即1948年晚春，已经获得学术职位的（共产党人）就上了黑名单，因此，在随后十年里，共产党人获得大学教职的机会实际上等于零。”Hobsbawm, ‘The Historians’ Grou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Maurice Cornforth, ed., *Rebels and Their Causes: Essays in Honor of A. L. Morton*,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8, p. 25.

② 参见我分别于1986年8月5日和11月10日在英格兰伍斯特与汤普森的谈话。

③ 同上。



信徒”的政治价值判断,时不时就窜入了莫里斯的传记描述:“20年前,甚至许多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也认为莫里斯的画作‘未来工厂’是不切实际的诗人之梦,而今天(1955年),从苏联回来的人都在传诵诗人之梦已经实现了……如果威廉·莫里斯今天还活着,很可能不再指望能找到自己所选择的党了。”<sup>①</sup>不过,直到1956年2月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11月苏联出兵匈牙利后,汤普森对英国共产党的教条主义和专制作风的义愤才爆发出来。他和另外一名年轻的历史学家约翰·萨维勒一起,借了一台油印机,开始出版一份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期刊《新理性者》。在那个沸腾的秋季后,他和萨维勒以及其他7000名党员——差不多是英国共产党党员总人数的五分之一——一起退了党。

对汤普森而言,1956年的那些事件标志着他在两大冷战敌对集团之间漫长的往返“朝圣”的开始。对苏联模式的斯大林主义的幻灭感并没有使汤普森像其他前共产党人那样,导致一种极端的意识形态反转,成为资本主义和西方世界的铁杆捍卫者。相反,他开始一视同仁地与两个超级霸权的政策和意识形态进行战斗,以寻求削弱因两者竞争所导致的严重对立的两极政治体系。1958年以后,他参加了核裁军运动,和其他人一同承担负责发动和组织游行示威活动的基金的日常管理。1959年,《新理性者》与另外一个杂志合并重组成《新左派评论》。不管是在发表文章方面,还是在编委会活动中,汤普森都很积极。同时,他依旧作为教

① E. P. Thompson, *Williams Morris: Romantic to Revolutionary*,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55, pp. 975, 760. 很多人都是事后诸葛亮,后来才看到隐藏在这一传记底下的、导致汤普森在1956年与斯大林主义决裂的张力。该书最核心的东西是汤普森力图为“诗歌”、“情操”、个人道德勇气的重要性重新恢复名誉,因为在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得到认可的只是党的钢铁般的纪律、“科学的”经济规律以及无人身的阶级之间的机械冲突。莫里斯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经济决定论做斗争,这使汤普森有机会探索他自己的某些困惑,同时将它们转换为对不涉及当下的、久远历史事件的讨论。直到1976年再版后,即汤普森在再版中将自己50年代插入性的心境去除后,评论者才开始意识到这是一本了不起的传记。Edmund Penning-Rowse, ‘The Remodeling of Morris’,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11 August 1978, pp. 913-914; Peter Stansky, ‘The Protean Victorian’, *New York Book Review*, 15 May 1977, pp. 7, 48.

师在哈利法克斯工作。他全力投入工作，努力推动新左派俱乐部在尽可能多的英国城市茁壮发展起来。而在 50 年代后期，他已经开始着手创作后来让他获得国际性影响的史学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后于 1963 年出版）。<sup>①</sup>

一点用不着惊奇，激发汤普森创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理论关切同他在新左派运动中的政治实践内在相关。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说，他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是同一的：人们如何改变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结构？“新意识”是如何从特定社会集团中浮现出来的呢？这种“新意识”何以可能导致社会转型？

通过 19 世纪研究，汤普森发现：“最革命的工人阶级‘冲锋队’常常根本不是工厂无产阶级——马克思是这样认为的——而是没落的手工业工人；在许多市镇，包括大型工业城市，工人运动的实际核心多数由工匠组成：制鞋匠、马鞍匠、马具匠、建筑师傅、制书匠、小商贩之类，而且，他们不但没有‘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还是工人阶级运动最团结、最富牺牲精神的参加者。”<sup>②</sup>19 世纪的工人阶级不仅比马克思设想的要复杂得多，而且这些不同的集团已经形成了完全取决于其中个别坚定的工人的组织努力的团结意识。阶级团结远非特定生产方式的自动产物，而是存在于将自己与他人联系起来的认识方式中：它实际上是工人阶级在漫长而屈辱的曲折前进过程中，痛苦地建构和提纯出来的一种自我形象。道德勇气，对所处环境的创造性反思，在改变自己的效忠对象的过程中的痛苦抉择，这些都是阶级意识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因素。

这种对工人阶级形成史中文化和人的主动性的再强调，是与一种修

<sup>①</sup>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New Hogtown Press, 1963. 关于该书对随后的社会史研究的影响，参见 Bryan D. Palmer, *The making of E. P. Thompson: Marxism, Humanism, and History*, Toronto: New Hogtown Press, 1981, pp. 65ff; and Harvey J. Kaye, *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 Cambridge: Polity, 1984, pp. 172ff.

<sup>②</sup> E. P. Thompson, 'Revolution Again', *New Left Review* 6, November-December 1960, p. 24.

正了的革命观相伴而至的。汤普森断然反对将1917年的俄国革命拔高为“社会主义转变”的一般模式或图式。在题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1957年）的长篇文章中，他指斥当代苏联共产主义是“反民主的，天生就是官僚主义的，先以家长制的方式继而以专制的方式对待人民”<sup>①</sup>。他煞费苦心地去分析这种中央集权制，不仅把它的源头追溯到斯大林，而且追溯到“马克思思想中的某些含糊之处，以及更多地追溯到了列宁著作中的某些机械论的谬误”<sup>②</sup>。

然而，汤普森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强大的人道主义因素至今依旧鲜活，且能够从它已经与之融为一体的灾难性的教条主义和极权主义中分离出来。他在工党主张的改良主义模式和正统的大动荡革命模式之间小心游弋，试图定义一种忠诚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价值观的革命概念。这种革命是渐进的和非暴力的，其发展的基础是“来自方方面面的坚定的改革压力”以及民众价值观上的主动变革。<sup>③</sup> 不过，它依旧是一种“革命”，因为其目标不在于贪得无厌的资本主义所做的任何调整，而在于全面进入一种共同体逻辑和互助逻辑战胜相互竞争的个人主义的社会。

这种革命观激起了许多左派的批评。这些左派习惯于根据物理学的力学定律把革命理解为阶级斗争的最终仲裁者。早在1958年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就被《新理性者》的一些投稿者批评为“滑到了唯心主义的边缘”，汤普森本人则被批评为是一个太过相信“言语的力量”的“乌

---

① E. P. Thompson, 'Socialist Humanism', *New Reasoner*, Summer 1957, p. 131.

② *Ibid.*, pp. 132-133. 汤普森发现，问题的核心在于，马克思、恩格斯未能完全理解或充分强调“人们的观念是如何形成的，他们的主体性活动域究竟在哪里”。最关键的含混之处在于他们对极重要的“反映”一词的用法，这个词要么意味一种像镜子一样的被动模仿，要么意味将被给予的信息再加工为新的综合这种更主动、更具创造性的过程。在从马克思到列宁、斯大林的发展过程中，对第二种意义的逐渐侵蚀最终导致了一种僵化粗暴的教条，它从根本上反对大众的首创性和真正的思想创新。“这容易多了，”他不无讽刺地写道，“如果人们没有自己的思想，如果‘上层建筑’被去掉，社会全部都是‘经济基础’，那么，这种笨拙的反映工作就玩完了。” *Ibid.*, p. 112.

③ E. P. Thompson, 'Revolution', *New Left Review* 3, May-June 1960, p. 7.

托邦社会主义者”。<sup>①</sup> 他的许多批评者都质问，对一个既存秩序的意识形态霸权既强大又具有弹性的丰裕社会来说，这种和平的革命观念如何发挥其疗治作用呢？这种“革命”会是什么样子的呢？<sup>②</sup>

汤普森依赖历史类比对此做出了回答。就像在 19 世纪早期，宪章运动领导人的坚定的主体性活动促成一种对共同利益和目的的强烈集体意识；而在 20 世纪中期，一场新的、争取民众的自我组织的运动则是非常要紧的。他在 1960 年写道：

问题不是为了创造一个有可能形成自我主动性的社会而“夺取权力”，而是现在就在这个被操控的社会中创造这种主动性……一个坚定的地方议会，面对政府的反对，探求新型市政所有权的可能性；一个有活力的、创造了自己对新的社会福利模式（游乐中心、保育所、服务妇女并由妇女管理的社区服务）的理解的房客协会把人们都吸引到了关于城市规划、种族交流、休闲设施问题的讨论和解决中去；在管理方实际上被迫接受新型工人控制的那些矿井、工厂或者国有企业……任何一个小问题的突破都将直接有助于将原本发散性的激情瞬间凝聚为一场积极的运动。<sup>③</sup>

汤普森在这里寄托了对新左派运动的希望。新左派运动把前共产党人与工党左翼、核裁军运动积极分子与工会成员、东欧集团的持不同政见者与西方世界抵制北约者聚集到了一起，为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共产主义的“无结果的对抗”提供了一种国际化的草根性的替代选择。<sup>④</sup> 他并没有对成功希望抱有太多奢望，因为他认为冷战的意识形态硬化是成功的

① 参见汤普森对这种批评所做的综述。E. P. Thompson, 'Agency and Choice', *New Reasoner*, Summer 1958, p. 6.

② 作为汤普森《革命》一文的回应而发表的论文和读者来信载于：*New Left Review* 4, July-August 1960; *New Left Review* 5, September-October 1960.

③ E. P. Thompson, 'Revolution Again', *New Left Review* 6, November-December 1960, p. 35.

④ E. P. Thompson, 'The New Left', *New Reasoner*, Summer 1959, p. 7.

最大障碍。<sup>①</sup> 尽管如此,他依旧满腔热情地投身新左派俱乐部和核裁军运动的工作,这种热情只能源于真正的乐观主义以及政治信念。

可是,汤普森的希望最终在作为潜在分水岭的60年代初被证明是无法实现的。由于在反抗策略问题上发生内部分裂的核裁军运动逐渐开始不那么意气风发,单边核裁军这一曾将运动不同的支持集团有效集结起来的目标,未能为运动提供一种长期的政治方向。<sup>②</sup> 新左派运动也因为一些相同的原因而解体。60年代后期,当不同的新左派派别回顾过去十年的失败时,它们为过去的失败提供了各自不同的解释:从缺乏真正的工人阶级工会基础到与核裁军运动纠结过深,从缺乏强有力的革命战略到过于理论化的阶级斗争观。<sup>③</sup> 虽然各种解释都包含部分真理性,不过,最准确的原因其实在于:新左派运动构成上的极度多样化以及带有手足相残性质的相互竞争,极其严重地削弱了运动的集体成就。<sup>④</sup>

---

① 例如参见:Thompson, 'The New Left', *New Reasoner*, Summer 1959, p. 17; 'Socialist Humanism', *New Reasoner*, Summer 1957, p. 138.

② Peggy Duff, *Left, Left, Left*, London:Allison & Busby, 1971, pp. 130 - 131.

③ 关于这些观点,可以分别参见 Perry Anderson, 'The Left in Fifties', *New Left Review* 29, January-February 1965, pp. 3ff; E. P. Thompson, '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English', in John Saville and Ralph Miliband, ed., *Socialist Register 1965*, reprinted in E. P.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Merlin, 1978, pp. 245 - 301; David Widgery, ed., *The Left in Britain, 1956 - 68*, Harmondsworth, Baltimore (etc.):Penguin, 1976; Ken Coates, 'How to Reappraise the New Left', John Saville and Ralph Miliband, ed., *Socialist Register 1976*, pp. 111ff.

④ 汤普森本人是在1962年初卷入这种特别苦涩的纷争中的,这导致他于次年退出《新左派评论》编委会。不和的直接由头在于任命了一个新主编,即佩里·安德森,他代表了新左派思想家中更年轻的一个集团。“我们直率地讨论我们中间的‘保守派’,”安德森后来写道,“当时,汤普森也仅仅35岁。”(Perry Anderson, *Argument within English Marxism*, London:Verso, 1980, p.137)所谓“老新左派”和“新新左派”之间的分裂不仅在于不同的代际经验,而且在于理论定位上的深刻分歧。对安德森及其集团而言,1956年的那些事件以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似乎远不如第三世界形成中的新政治运动以及巴黎发展中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重要。让-保罗·萨特和弗兰茨·法农是令他们激动的思想家,与他们相比,威廉·莫里斯就太粗鄙而陈腐了。对于“保守派”——汤普森、约翰·萨维勒、默文·约纳斯、雷蒙·威廉斯、拉尔夫·密里本德等人——而言,安德森所开辟的新方向似乎是超级理论嗜好与反西方气质之令人眼晕的杂糅(汤普森1962年未刊手稿)。1963年初,汤普森和其他“保守派”退出《新左派评论》编委会,这给安德森对杂志的内容和风格进行全面的再定位提供了空间。

在随后的政治行动主义活动中，汤普森继续指称自己是“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人”，稍后又称自己为“自由主义的共产党人”<sup>①</sup>。他拒绝接受“共产主义 = 苏联极权主义”这个公式，坚持认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根源就在于 19 世纪早期工人为了民主的自我管理而进行的斗争。<sup>②</sup> 因为汤普森热烈拥护自己所认为的“和平的革命”，所以，他认为加入工党并无什么自相矛盾之处，并和妻子多萝茜于 1962 年一起加入了工党。<sup>③</sup> 60 年代后期，他大力支持学生运动和反对越南战争的反文化行动主义者；不过，对于前者采取的冲突策略，以及和警察爆发的群殴事件，他也表示了痛惜。他们的“非理性的、自我升华的行为方式”让汤普森深感震动，不过，他并没有因此接受他们的信念：“以大学校园为基础的革命能够绕过工人阶级。”<sup>④</sup>

尽管如此，仅仅几年后，汤普森就成为一场不同的学生运动的核心参与者。1965 年，他和妻子多萝茜从哈利法克斯南迁到华威，在那里，他被任命为华威大学新成立的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他在那里任教的第五个年头，即 1970 年，该校学生为了在教学过程中争取更大的民主而发动了激烈辩论。2 月 11 日晚，学生占领了学校的行政大楼。晚上八点

① 参见我分别于 1986 年 8 月 5 日和 11 月 10 日在英格兰伍斯特与汤普森的谈话。对“共产主义”这一政治标签的顽强坚持，可能应当归结为一种忠诚感和传统，而与当代意识形态队列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对应关系。与 20 世纪后期世界上绝大多数自称是共产党人者不同，汤普森拒绝历史过程中经济因果性的首要性，对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地位等观念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反感。因此，从局外人的角度看，他的政治立场有理由被认为似乎更接近“社会民主主义”而非“共产主义”，虽然他对直接的大众的自我管理的诉求使他与两者的国家中心主义传统相距同样遥远。关于汤普森对脱党问题的讨论，参见他的《致列泽克·克拉科夫斯基的公开信》（‘Open Letter to Leszek Kolakowski’，reprinted in *The Poverty of Theory*, London:Merlin, 1978, pp. 303-402.）

② ‘E. P. Thompson: Recovering the Libertarian Tradition’, interview, *Leveller* 22, January 1979, p. 21.

③ “我们加入工党的申请被工党的一个高层审查委员会拒绝，该委员会与我们面谈，要求我们就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表态。但哈利法克斯的工党组织对这个结果提出了抗议，结果我们被接纳了。”（E. P. Thompson to Michael Bess, 2 April 1989.）

④ ‘Interview with E. P. Thompson’, *Radical History Review* 3, Fall 1976, p. 9; 我分别于 1986 年 8 月 5 日和 11 月 10 日在英格兰伍斯特与汤普森的谈话。

半,打开学校秘密文件的学生打电话给“过去赞成更加改良的行动路线”的汤普森。<sup>①</sup>因为他们发现,文件清楚地表明:学校官员监视学生和老师中的政治活跃分子,根据政治立场对申请入学的学生进行拣选,更有甚者,他们明显打算将刚刚访问过苏联的劳工史学家大卫·蒙哥马利从学校赶走。<sup>②</sup>汤普森的回答是:将相关核心文件复印并于次日早上散发给所有教师。这当然让校方极为恼火。汤普森为自己公布那些文件的举动进行了辩护,其理由是文件披露的信息表明需要对大学的管理层进行全面调查。<sup>③</sup>因为站在学生一边,他发现自己遭受两类攻击:自由主义者和保守党人指责他破坏了大学的隐私权,同时,好战的左派分子嘲笑他还对学校官方的程序的不偏不倚心存侥幸。汤普森争辩说,不能把这种不偏不倚当做纯粹的伪装放弃掉,因为它体现了一种人人都应当为之而战的重要原则。他写道:“现在的问题是,红色的地下工作者和毛主义者站在北伦敦那种革命高度上来藐视我们可鄙的自由主义废话,而他们却很容易出错。他们劝告学生注意,所有学院管理,哪怕是民主的和宪政的防护,都不过是自由主义的‘面具’。就此而言,他们的分析确实能够自圆其说……但他们不能抨击民主是骗人的把戏,同时却帮着守卫它的后防线。”<sup>④</sup>

最终,在官方调查和适当的改革之后,华威大学的喧闹逐渐平息了,但这一事件对汤普森思想发展的影响非常大。在随后的十年里,汤普森

---

① ‘Interview with E. P. Thompson’, *Radical History Review* 3, Fall 1976, p. 9; 我分别于1986年8月5日和11月10日在英格兰伍斯特与汤普森的谈话。

② E. P. Thompson, ed., *Warwick University Ltd: Industry, Management and the Universities*, Harmondsworth: Penguin, Eng., 1970, chap. 6.

③ Thompson, *Warwick University Ltd*, chap. 7. 这种争论实际上与汤普森试图捍卫的自由主义原则并不一致。20世纪后期,他坚决反对国家任何以非法收集的证据起诉刑事犯的企图。而在本案例中,他却愿意使用不合法的手段从学校档案中获取文件,以发动对学校管理层的调查。2月11日晚上,汤普森处于一个经典的悖论中,即被迫违反其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某些方面,或者采取行动,或者保持沉默。他选择公开文件体现了一种基本的判断错误,因为这与汤普森在随后那些年里积极捍卫的基本原则是格格不入的。当然,这一点可以再探讨。

④ Thompson, *Warwick University Ltd*, pp. 151 - 152.

写了一系列立场坚定的文章，捍卫英国的自由主义制度免于他所看到的一系列现象的侵蚀。<sup>①</sup> 在左派那里，他看到一种把“资产阶级合法性”作为权力和金钱控制原则、在其背后大行其道的伪装而放弃的倾向。在右派那里，他目睹在英国社会，在“国家保密法”中，极权主义日益增长，对陪审员的政治筛选，窃听成风，通过“顺从的报章和受管控的电视台”制造舆论。<sup>②</sup> 左与右的这两种倾向，对宝贵的公民自由权利都构成了侵蚀。这些公民自由植根于为了民主的自我管理的历史性斗争，如果没有这些公民自由，他自己理解的新民主精神将变得没有任何意义。

汤普森那些年里的历史研究基本上反映了这种当务之急，即法律和公众对宪法权利的理解的作用问题。在《辉格党与狩猎人》(1975年)中，作为一个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他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在18世纪的英格兰，法律既是阶级统治的压迫工具，同时也是针对滥用权力的宝贵的限制措施。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当然是处于社会对立的两端的，但是，他们的斗争是在共同的(或交叠的)、让双方都得益和受损的价值观和法律制度媒介中进行的。“一个社会的修辞学和规制，”他写道，“并不是虚假之物。在相同的时刻里，它们既可以深刻地修正当权者的行为，也可以使无权者的行为变得具有迷惑性。它们可以掩饰权力的真正现实，但同时也可以制约那种权力、核查它的干扰。”<sup>③</sup>这绝没有提供一种认为对立利益易于达成和解的、盲目乐观的社会冲突观。它只不过提供了一种概念框架。在这种框架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处于一种微妙的相互依赖关系中，并且努力改变将他们连接起来的、习俗性的、共有的社会承诺准则。在《辉格党与狩猎人》中，文化领域成为开展最重要的斗争的战场，在这种斗争中，一个社会集团之于其他社会集团的领导地位能

① 好多篇这样的文章随后被收录到单卷本的《秉烛而书》中(*Writing by Candlelight*)。

② E. P. Thompson, 'A State of Blackmail', in *Writing by Candlelight*, p. 133.

③ E. P. Thompson, *Whigs and Hunters: the Origin of the Black*, Harmondsworth: Allen Lane, 1975, p. 265.



够被改变或者被破坏,甚至被颠覆。对法律的这种理解是如此具有创新性(且如此的非马克思主义),以致另一位社会史学家佩里·安德森质问说:“这难道表示汤普森向右转了?”<sup>①</sup>

就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汤普森对同时既是马克思主义者又是职业历史学家究竟意味什么进行了全面再评估。他直接的关注焦点是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的著作。<sup>②</sup>在他看来,阿尔都塞的思想既是危险的,又已经在左派思想家中赢得了令人警醒的日益泛滥的流行。在题为“理论的贫困”的长篇论文中,他对阿尔都塞的驳斥采用了一种爱开玩笑的(有时又是放纵的)斯威夫特辩论风格,这也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阐述他自己关于“历史学家的技艺”及其对学术话语和具体的政治事件的贡献的看法。

《理论的贫困》的核心是汤普森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老旧区别的拒绝。早在1957年,他就已经抨击斯大林主义关于这种区别的最初版本。<sup>③</sup>在他看来,阿尔都塞丝毫没有减少斯大林主义形而上学这种危险的还原论,而仅仅是用一种奇思妙想的机械形式替代了早期原型那种粗糙的机械论。<sup>④</sup>汤普森坚信,这种思路极为危险,因为它把历史过程非人化了,切断了人的能动性活动与广阔社会历史变迁之间的联系。在阿尔都塞的分析中,人不过是巨大的非人身的经济力量的无意识承担者,对这种力量本身,人几乎不能或者完全不能加

---

① Anderson, *Argument within English Marxism*, p. 201.

② Louis Althusser, *For Marx*, Ben Brewster, trans., London: NLB, 1970; and *Reading "Capital"*, London: NLB, 1970.

③ Thompson, 'Socialist Humanism', *New Reasoner*, Summer 1957.

④ 斯大林主义在经济原因和文化因素之间设置了一种僵硬的线性关系,汤普森争辩说,阿尔都塞则提供了一种周天轮式的模式——汤普森把它比做太阳系仪,这是天文学家用来演示太阳系复杂运动的仪器。如果有人绞动扳手,卫星们就开始围绕它们的行星在各自小轨道中旋转,而行星则围绕不动的太阳在更大的轨道中循环。正是在相同的意义上,汤普森争辩说,阿尔都塞的历史观为宗教、政治和艺术等文化因素分配了“相对自主性”的小轨道,所有这些比较小的领域最终受位于中心的、不动的经济因果性过程的控制。

以控制。

作为一种替代选择，汤普森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个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历史因果观。他辩论说，人的生命是在许多层次——经济的、政治的、心理的、生理的——展开的，任何一个层次都可以在决定一个特定事件的形成过程中临时性地承担因果优先性。这些“层次”按照一种公然藐视传统马克思主义力图将所有历史变迁都还原为其中的经济决定性的方式，持续地相互作用。<sup>①</sup>

在《理论的贫困》中，汤普森花了几页的篇幅举了一个例子，描述了一个假想案例：一个英国妇女，她是自己厂子里的工会组织者、工党积极分子、三个孩子的母亲、业余音乐家、英国国教徒、一个男人的妻子和另一个男人的情妇。所有“层次”都在决定其生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没有哪一个领域能够充分解释其日常活动逐渐形成的独特的生活。汤普森问道：“这个女人只是所有这些关系、结构、角色、期待、规范和职能的交叉点吗？还是说，她是所有这些的承担者，同时，她也由它们所表现，并在它们的交叉点上是完全被决定的呢？”<sup>②</sup>汤普森辩论说，查明真相的唯一方法，不是去求教某些抽象的马克思主义模式或社会学理论，而仅仅就是去观察她的历史，这种历史表现了回荡在她的生活中的社会因果关系的总体。汤普森为这个女人的故事提供了两个假想情节。在第一个假想情节中，她在贞洁观无数次的斗争压力下精神崩溃了，不得不服用镇静剂。在第二个情节中，她在单位里进行了抗争：“她大叫：‘我不是该死的婊子！’……她号召单位同事罢工；与丈夫分手，接着又把情人踹了；参加了妇女解放运动；退出了英国国教。”<sup>③</sup>汤普森坚持认为，人不能被还原为抽象的范畴，不管这些范畴显得多么复杂和精微；从每一个个人在作用于他或她的生活的结构中所持续创造的综合中，一个唯一

<sup>①</sup> E. P. Thompson, 'Poverty of Theory', in *Poverty of Theory*, pp. 150 - 152.

<sup>②③</sup> *Ibid.*, pp. 150 - 152.

的、最终是无法预料的故事发生了。最重要的是，每一个人都拥有采取主动、改变结构的潜能。汤普森相信，就像他故事中的女人一样，每一个人都有两种可能性：或屈服于社会的复杂的压力，或挺身而出，试图掌握它们。

但是，单个人如何能够指望战胜当代社会强有力的结构呢？这里，第二个关键概念发挥作用了：所有社会行为所固有的相互连环性和反射。<sup>①</sup>既然人是社会的产物，那么，他们正是在改变社会的过程中改变自己；他们的作用同时既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个人在社会语境下的任何行动（在它影响或改变社会语境的范围内）最终反作用到同一个人的生活和行为中；因为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深刻地以他们从属其中的社会为条件，社会整体中的任何改变都反过来影响它的成员。以哪怕再小的方式改变社会现实，单个人都能相应地改变其他个人理解他们的环境和选择行动的方式。随着自己制造并把它们反过来传达给比较大的人群的人的数量不断增加，这些新的理解会逐渐增加。最终，那些原本被共同认为是可能的或不可能的、想要的或不想要的东西，都作为极少数人提倡的观念的成果而发生了真实的转变。因此，个人的影响最初可能似乎很小、很不重要，但是，通过人类文化的循环发展，它能够滚雪球般地造成重大的结构性改变。

不过，汤普森指出，这种权力行使也有其内在的界限，因为社会语境必然会干涉每一个人达到自己目的的努力。在更复杂的社会里，许多人的意愿和努力相互交叉、相互联系、相互抵消，最终的结果总是集体的结果，而不是单个人的预期和目的。汤普森把社会过程的这种二元性质称为“我们人类存在在自身的历史中所拥有的极为重要的相反相成状态：

---

<sup>①</sup> E. P. Thompson, 'Peculiarities of the English', in John Saville and Ralph Miliband, ed., *Socialist Register* 1965, pp. 288ff.

部分是主体，部分是客体，我们是非能动的被决定的能动主体”<sup>①</sup>。

人的主体性活动因此像一种发生在各种限制——游戏者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影响其发展的各种限制——内的游戏形式。每一个个人都对文化的塑造享有有限的、但同时也是开放着的机会。集体的结果是不同于任何个人预料的某种东西，但是，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决定社会变迁的总体方向。这就是汤普森在其著作中从没有停止探索和强调的、具有部分自由的主体性活动所享有的宝贵空间。

在《理论的贫困》中，让汤普森感到愤怒的另外一个由头是他在许多同时代学者身上发现的一种日益增长的理论时尚，或者说一种以莫名其妙的蔑视态度对待历史认识的倾向。例如，在书中的某页，他愤怒地记述了自己在剑桥与一群以理论研究为目标的、公开嘲弄专业历史学家的“老套的”经验主义的人类学家的遭遇。<sup>②</sup>为此，他花了好几页篇幅去捍卫历史“客观性”理想，试图再次主张一种精练的、自我批判的实在论经验主义认识论：“对象（真实历史）不可能与它的认识保持客观的（经验确证的）关系的吗？”<sup>③</sup>无疑，汤普森在《理论的贫困》中所做的认识论证明并没有让那些严格意义上的后现代批评者感到满意。因为它们既没有明确抓住由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所带来的那些问题，也没有对一些重要

---

① E. P. Thompson, 'Poverty of Theory', in *Poverty of Theory*, p. 88. 汤普森从威廉·莫里斯《约翰·波尔之梦想》(1886年)中引用了一段名言：“我思考了所有这些事情，男人怎样赢得或失去战斗的胜利，他们为之战斗的事情不管他们失败与否都出现了，它出现后，却不是按照他们想象的方式出现的，其他男人不得不在另外的名义下为他们想象的东西战斗。”(Thompson, 'Poverty of Theory', p. 88)是维科的著作第一次让汤普森注意到历史过程的这一方面，即人的活动既是自由的，同时也是不自由的。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任何隐喻（例如“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不足以充分表达文化变迁的这种自我相关的辩证法。在另外一处，在思考植物隐喻是否可行时，他写道：“困难不在于树木不能思考，而在于，即使它能够思考，也改变不了——不管有多细微——它扎根其中的土壤。”(Thompson, 'Peculiarities of the English', in John Saville and Ralph Miliband, ed., *Socialist Register* 1965, p. 289)

② Thompson, 'Poverty of Theory', in *Poverty of Theory*, p. 37.

③ *Ibid.*, p. 19.

的当代概念——例如德里达的“在场的形而上学”、福柯的“知识学”，或者其他一些有关的重要理念——给予足够的关注。<sup>①</sup> 本文特别感兴趣的是汤普森对客观性的经验论证明，因为它们让我们在惊鸿一瞥中看到了他是如何平衡其作为历史学家和政治行动主义者的角色的。

对汤普森来说，历史分析的本质在于“与证据的对话”，这是一种在历史研究者的心灵与从过去的物理证据、文本证据而来的具体器物之间发生的辩证法。<sup>②</sup> 汤普森对此过程所创造的认识形式提出了几项告诫。首先，原始证据的本质原本就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来自具有确定意图的或者具有潜在误导性的资料来源。其次，由此而来的解释必然是临时性的和选择性的，因为检验和修正过程从来都没有真正结束。最后，历史学家的假设不可能被证明为真，因为它们不过是建立在更加不牢固的、但尚未被证明为假的认识基础上的。<sup>③</sup>

进而，汤普森争辩说，这种方法论基础容许历史学家就事件的因果性和相互联系提出圆满的解释。考虑到竞争性解释的内在一致性以及它们面对“新的和不好处理的证据”的方式<sup>④</sup>，汤普森认为，它们没有理由不能进行富有成效的相互比较。虽然这种检验并不提供通向绝对的或最终的“真理”形式的道路，不过，它当然容许历史学家比较不同的历史说明，并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它们做出裁定。

---

① 本文不太适合详细讨论支撑汤普森的经验论立场的那些复杂哲学问题。有关近来出现的与这些方法论主题有关的煽动性讨论，参见 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关于由该书挑起的论战，相关介绍可参见 Karen J. Winkler, 'Challenging Traditional Views, Some Historians Say Their Scholarship May Not Be Truly Objectiv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16 January 1991。

② Thompson, 'Poverty of Theory', in *Poverty of Theory*, pp. 37 - 50.

③ 在这个方面，汤普森比较了历史认识和科学认识，意指：与人文科学不同，自然科学能够就其认识主张提供积极的证据。汤普森显然误解了以下事实，即大多数科学哲学家其实也很早就放弃了这种向自然科学靠拢的强认识论主张。参见 Thompson, 'Poverty of Theory', in *Poverty of Theory*, pp. 39 - 40。

④ *Ibid.*, p. 43.

这就是历史学家“与证据的对话”。所有历史学家，不管哲学和意识形态倾向如何，都将“接受它的审判”。因此，汤普森写道：“女性主义历史学家会说，或者应当说，这种历史书是错误的，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它是男性写的，而且因为历史学家忽略了相邻证据，或者提出了概念不充分的问题，因此，雄性‘意义’或者偏见就被强加给回答了。它和我与我的马克思主义同事经常在学术圈内挑起的、有些放纵的争论是一样的。”<sup>①</sup>对汤普森而言，成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意味着其最初的假设将建立在一个松散的概念集合上，如阶级、剥削、宗教的阻碍作用等，人们可以按图索骥式地寻找“适合”它们的具体证据。<sup>②</sup>可是，如果历史学家发现了不好处理的或者冲突的证据，那么，他们就应当立刻开始质询这些原初假设，要么修订，要么抛弃它们。

汤普森的良好初衷是让马克思主义学说接受批判的审查，在取消部分重要原则的同时对部分原则进行调整。这让他招致来自左派和右派的同样猛烈的批判。<sup>③</sup>不过，如果我们把汤普森描绘成一个总是走不偏不倚的“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家，那将是误导性的。因为他还有另一种更尖锐、更好斗的声音，这是他专为政治和意识形态论战预备的。在1976年对汤普森进行访谈时，《激进历史评论》的访谈者注意到了汤普森的这种二元性格。因此，他问汤普森：历史学家和辩论家的角色是否能够成功地协调起来？汤普森的回答是：“历史学家应该更宽容一些，因为历史学家应当学会与截然不同的人群进行接触，倾听他们的声音，努力理解他们的价值观体系和思想意识。不过，在政治介入的场合中，很显然，你不能总是那么宽容。如果你太宽容了，那么，你就会被挤压到一种宗派立场上去，从而在你与其他人的关系问题上不断做出错误的判断。”<sup>④</sup>在汤普森的生涯中，这两

① Thompson, 'Poverty of Theory', in *Poverty of Theory*, p. 41.

② Ibid., pp. 45-46.

③ 关于这些批评，参见 Kay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 Palmer, *The making of E. P. Thompson*; Anderson,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④ 'Interview with E. P. Thompson', *Radical History Review* 3, Fall 1976, p. 17.

种立场的张力犹如主题曲一般反复出现。一方面是敞开心怀去接受不同的经验,这就是汤普森称之为“宽容”或“倾听”的立场。另一方面是以偏袒的方式,用具体行动去干预某一社会的政治生活,这是一种同样重要的能力。

无疑,汤普森也认为这是两种在大多数情况下相互排斥的立场,不过,在日常实践中,他通常把它们理解为一个更长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而实现了对它们的协调。在“倾听”阶段,人们应当(竭尽全力地)暂时抛弃成见和个人的价值观念。在面对历史文献或与他人交谈时,历史学家应当努力感同身受地领会“他者”的经验,尽可能地从“他者”的角度出发看待事物。而在“介入”阶段,人们应当回到自己所熟悉的个人角度,让文献或“他者”的观点服从本人的判断和标准。在这个第二阶段,将个人的价值观运用到对过去事件的道德或政治重要性的评价中去,是非常恰当的;而在介入当代政治辩论的过程中,着眼于实现党派的目标,其本身也是同样恰当的。在这两种立场之间来回往复,人们就能够满足以下两种需要:一方面是理想化的历史学家所需要具备的超然和公正,另一方面是就当代问题进行争论时的那种顽强劲。

汤普森从来没有明白地阐述过这种“两阶段说”。不过,在《理论的贫困》中讨论政党的价值观在历史话语中的恰当位置时,他的确提到了这个观念:“只有正活着的我们能够给过去以‘意义’。但是,那个过去总是存在于其他事物之中,是价值论战的结果。在发现那个过程、展现因果性如何实际发生作用时,我们必须在能够强化学科的范围,暂时悬搁我们的价值观。可一旦历史已经被发现了,我们就可以自由地对它进行判断了。”<sup>①</sup>这包含了一套复杂的理论程序。首先,历史学家有责任以尽可能系统的方式了解自己的理论假设和价值判断。因为这些假设和价值观常常是无意识的,所以,人们要通过持续不断的自我质询,努力辨别和澄清它们。这个过程是无止境的。在(临时性地)探清那些主要的、

---

① ‘Interview with E. P. Thompson’, *Radical History Review* 3, Fall 1976, p. 42.

让自己的理论观点变得清晰有序的思想要素后，人们接下来要去评估这些假定是如何按照预先确定的方式限制问题或引导解释的。最后一步是一种系统工作，目的是努力发掘出那些可能支持替代性理论或观点的证据。这种驳斥原初假设、探究相反的证据解释的持续努力，构成了经验检验的精髓。结果不会是“中立的”或“公正的”认识——这是人类所不能把握的东西——而是某种有限得多的东西，即一种在某些根据自己的色调去涂抹过去的画卷的场合中，把握自我的良机。

根据这种原则评估竞争性历史解释的优点，需要对自我审查和每一个作者在研究、写作过程中都会运用(或未能运用)到的自律进行比较、区分。很显然，自我审查只能提供有限的校正，不过，汤普森还是在这种相当慎重的分析阶段，和他在“介入”阶段所提倡的、对过去进行公开的党派性解读之间做出了有意义的区分。实际上，“倾听”和“责任”这两种立场以延缓任何直接描述的细微方式交替出现并且相互重叠。它们之间的准确识别和相互转换并不总像换个帽子那样容易。不过，它们之间的区别还是容许汤普森争辩说：政治责任并不必然污损一个人作为历史学家的判断。

在汤普森看来，历史写作的根本目标是双重的，并且也源于“倾听”和“责任”之间同样的不言而喻的区别。首先，历史写作的目标仅仅是提供关于过去事件的最精确、最全面的说明，用汤普森自己的话说，“发现(历史)过程……揭示因果性实际上是如何发生的”<sup>①</sup>。第二个目的明显是政治的：人们是为了(通过比较)阐明当前那些摆在活跃市民面前的政治问题和道德问题，才去研究历史上的个人的行动和选择的。在《理论的贫困》中，他写道：“如果我们继续，我们将回到历史，将我们自己的意义赋予它：我们将会与斯威夫特握手言欢。因为在现时代，我们认可温斯坦莱的价值观，厌恶那使沃波尔的政治观念声名远扬的粗陋而无情的机会主义。”<sup>②</sup>在这

---

① ‘Interview with E. P. Thompson’, *Radical History Review* 3, Fall 1976, pp. 42–43.

② *Ibid.*, p. 42.



种解读中，一种精确的历史说明并不天然就是引人入胜的，它也给作者提供了一个向今天的听众去重新确证和赞美特定的价值观的机会。因为它确立了一种关于先例和传统的判断力，通过这种判断力，当代人可以觉得有勇气在自己的生活中做出具体的道德选择和政治选择。因此，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汤普森关注的不仅仅是提供一种可靠的编年史。他写道：“工业革命时期，人们失败了的某些事业，也许能让我们看清楚至今仍需诊治的某些社会弊病……那些在英国失败了的事业，说不定会在亚洲或者非洲取得胜利。”<sup>①</sup>这两种目的——精确和辩护——的共存没有让汤普森感到困惑，因为他相信，有良知的作者能够区分它们，并以恰当的方式去安排它们。

汤普森的两种角色——好辩者和相当公正的“倾听者”——或许在其80年代为欧洲核裁军运动而战期间的著作中得到了最好的例证。就像在其历史学著作中一样，在这些著作中，汤普森也没有假装要采取“中立的”、“不偏不倚的”立场。相反，他明确地把自己定位为一名站在左派立场上的独立作家，同时让其对冷战的认知判断接受同样适用于自己的历史学研究的那种严格标准。其结果是一种极具争议的当代史观。在这种历史观中，他对左派的遁词和右派的遁词进行了同样激烈的批评。苏共的总书记、撒切尔主义的官僚以及自己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同伴都遭到过他的批评。这些人反过来也都对他进行了回击。<sup>②</sup>

---

<sup>①</su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p. 13.

<sup>②</sup> E. P. Thompson, 'Notes on Exterminism, the Last Stage of Civilization', pp. 2-3, 17-20; and 'Europe: The Weak Link in the Cold War', pp. 330-345, both in *New Left Review*, ed., *Exterminism and Cold War*, London: Verso, 1982. 在这一系列文章中，汤普森在两个重要问题上对自己的社会主义者同道进行了谴责。一方面，他写道，有些社会主义者还是固守教条主义的观点，认为世界上的所有弊病都源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与此同时却以“自卫反击”的名义为苏联的入侵开脱，同时故意忽略中苏分裂和波兰的团结工会这种不和谐的现象。另一方面，他指出，他们对经济因素那种特有的马克思主义式的强调，使之忽视了意识形态、政治和心理层面那些让冷战之火熊熊燃烧的强大的非理性因素。

因为欧洲核裁军运动的范围超过了以往其他绝大多数裁军运动，并且超出了国家和意识形态的界限，所以，其情况自然非常复杂。引发该运动的原因是北约计划于1983年装备新的更精确的导弹。西方政府认为，这一举动是对苏联在东欧部署新导弹的必要反应。就在最后的时刻到来之际，一股反对美苏导弹的强大的草根运动迅速遍布整个欧洲。1980年春，和平示威组织者还曾因有几百个人参加而骄傲不已，但到了1983年秋，参加者已经差不多达到了400万。<sup>①</sup>

对于这一勃然兴起的运动，汤普森的重要贡献无疑就在于，他努力把原本只是停留在技术层面的争论政治化了，从而推动公共舆论超越核弹的增减这种普遍困惑，将辩论推进到了事关战后基本政治问题的更广阔层面。他为欧美报章撰写了数十篇文章，不断通过信件联系编辑，频频出现在英国电视台的访谈节目或者新闻节目中。他到英国各主要城市发表演讲、举办集会（1980年至1982年间，平均每个月出席10次公共集会），还进行海外演讲旅行，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到匈牙利，从冰岛到希腊，走访了14个国家。<sup>②</sup> 无论到哪里，汤普森的批判锋芒都会指向同一个主题：东西方敌对状态是悬在已经分裂的欧洲大陆民众头上的一个巨大隐患，现在到了欧洲民众发动新的历史力量去终结冷战的时候了。

汤普森最了不起的力量或许就在于这个事实，即他对两个超级霸权

① 例如可见 Ian Boyne, '400 March in Missile Protest', *Daily Telegraph*, 8 April 1980; Jane Dibblin, 'An Outpouring of Protest: Peaceful and Determined', *END Journal* 7, December 1983- January 1984, pp.10-11; Clive Rose, *Campaigns against Western Defense*, London: Macmillan, 1985, pp. 157ff. 1982年秋，盖洛普民调显示，58%的英格兰民众反对为美国导弹提供基地。西欧其他国家的类似民调也都显示了相当高的反对率：西德，25%~67%（因资料来源不同而所有差异）；意大利，40%~54%；荷兰，51%~68%；即便是在没有计划部署导弹的法国，反对率也令人吃惊地达到了44%（Gregory Flynn and Hans Rattinger, ed., *The Public and Atlantic Defense*, London: Croom Helm, 1985, pp. 89, 134, 192, 256; David Fairhall and Martyn Halsall, 'Majority Opposes Trident Missile in Poll', *The Guardian*, 16 November 1982）。虽然文章的标题只提到了三叉戟导弹，不过文献也包括反对巡航导弹的数据。

② 'Interview with E. P. Thompson', *Worcester*, England, 5 August and 10 November 1986.

都给予同等有力的批判。<sup>①</sup>除非先入为主地接受了以下成见,即汤普森或是共产主义的帮闲文人或是中情局的秘密特工(北约和苏联的辩护士都曾直接提出这样的指控),那么,听汤普森的演讲或者读他的著述,就不可能不被它们那种煞费苦心的、力图一碗水端平的做法所打动。<sup>②</sup>在80年代流传于欧洲核裁军运动内部的一封信中,汤普森和妻子多萝茜一起谴责了这样一种观点:“现在的问题是,有一些来自左派的人物试图将欧洲核裁军运动的政策完全挤入反北约这个狭隘的立场去,而拔出任何反苏联的芒刺……可是,如果我们相信,当前局势的‘错误’和战争危险完全就是两强相争中一方的问题,那么,欧洲核裁军运动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如果我们的抗议运动打算重申捍卫公民自由和持不同政见的

---

① 在1980年以后从其笔尖倾泻而出的一系列立场坚定的演讲稿、小册子、论文和书籍中,汤普森清楚地表达了他对冷战的想法: E. P. Thompson, 'Protest and Survive', in E. P. Thompson and Dan Smith, ed., *Protest and Surviv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0; E. P. Thompson, 'Notes on Exterminism, the Last Stage of Civilization', *New Left Review* 121, May-June 1980; E. P. Thompson, *Beyond the Cold Wa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2; E. P. Thompson, 'Europe: The Weak Link in the Cold War', in *New Left Review*, ed., *Exterminism and Cold War*; E. P. Thompson, *The Heavy Dancer*, London: Merlin, 1985; E. P. Thompson, *Double Exposure*, London: Merlin, 1985; E. P. Thompson, *Star War*, New York, 1985; Mary Smith and Paul Anderson, ed., *Mad Dogs: The US Raids on Libya*, London: Pluto Press, 1986; and Dan Smith and E. P. Thompson, ed., *Prospectus for a Habitable Planet*,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7.

② 在西方,不少汤普森的右派批判者都曾经争辩说:这种“一碗水端平”仅仅是汤普森的愤世嫉俗的伪装,意在转移关于和平运动“对共产主义太宽容”、“对“缓和”心虚等传统指控。不过,如果不严重歪曲汤普森的著作和公开陈述,这种争辩是得不到任何支持的。因为1956年以后,汤普森就确立了作为苏联的杰出批判者的形象,在1968年苏联出兵镇压“布拉格之春”后,他的幻灭感就变得更严重了。他也不断用行动支持自己的言论。例如,在70年代的几个场合,他曾传发请愿书和发表公开演讲,抗议苏联集团侵犯犯人的公民权。关于这种右翼批评言论,参见 Paul Mercer, 'The Thompson Technique', in Mercer, 'Peace' of the Dead: *the Truth behind the Nuclear Disarmers*, London: Policy Research Publications, 1986, pp. 321ff; Scot McConnell, 'The "Neutralism" of E. P. Thompson', *Commentary* 31, April 1983; Thomas M. Cynkin, 'The British Antinuclear Movement', in James E. Dougherty and Robert L. Pfaltzgraff, Jr., ed., *Shattering Europe's Defense Consensus: The Antinuclear Protest Movement and the Future of NATO*, McLean, va: Pergamon-brassey's International Defense Publishers, 1985, pp. 41ff.

权力，那么，它就必须准备对东欧集团进行抗议。”<sup>①</sup>

当然，汤普森并不认为两个超级霸权“势均力敌”，或者在军备竞赛中的作用必然是相同的。1981年，他告诉听众：“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个过程是由美国和苏联构成的一个恒等式，也不是说它有一种完全的对称形式。我的意思是要强调这个过程的相互性和相互作用特征。冷战的本质表明，必然有对立的双方：一个动，另一个跟着动；一个发动竞赛，另一个必然随着竞赛。这就是冷战的内在机制，它决定了冷战的军事和安全机制是自我再生产的。他们的导弹召唤出了我们的导弹，我们的导弹反过来也召唤出了他们的导弹。北约的鹰派培育出了华约的鹰派。”<sup>②</sup>因此，这一过程不能限定在军事技术领域。它已经逸出军事技术，侵入政治，从而决定了政治家们根据早已预先构想好的剧本开展工作的议程。它扭曲了两个超级霸权的经济，使西方的市场和东方的官僚都深深地依赖于其军事部门的持续扩张。最终，它侵入两个社会的集体心理，从而将人们原本是多样性的、自发的反应全都推入唯一的二元对立反应模式中去了。

在演讲中，汤普森反复肯定，从这种日益复杂的不可控过程中安全地撤离出来的可能性依旧存在，但是，人们必须在历史趋势变得不可收拾之前快点行动。他主张一种双重战略，在这里，裁军和促进公民自由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首先，他认为，欧洲核裁军运动成员应当努力与铁幕那一边具有相同意向的人建立联系和规律性的交流。他们应当毫不妥协地捍卫东欧集团的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活动家，也应当向东欧人口中相对弱勢的集团伸出手去，与那里的宗教团体、青年团体、工会、科学家或专业人士组织建立联系。同时，欧洲核裁军运动应当在西欧发动

---

① Dorothy Thompson and Edward Thompson, 'END-Retrospect and Next Steps' (18 August), unpublished letter, p. 10; in private papers of Mary Kaldor on END, Brighton, England.

② Edward Thompson, 'Beyond the Cold War', in E. P. Thompson, *Beyond the Cold War*, p. 169. 这原本是1981年11月26日汤普森在伍斯特同业会馆发表的演讲。

强大的运动阻止军备竞赛继续升级,从而给两个超级霸权都施加巨大压力,促其停止部署,进而开始撤出部署在欧洲的导弹。汤普森相信,一旦这两个计划发动起来了,它们就能有力地相互促进。国际军事紧张的缓解将消除苏联领导人占领东欧的主要借口。东欧人民获得解放的切实步骤则将逐步减轻西欧的恐惧,因为这种恐惧正是北约得以存在的最重要理由。一个复兴了的市民社会将(从两个方面)稳步推动军事化社会的严厉制度日益宽松。

在 80 年代的政治实践中,两个原本在《理论的贫困》中埋藏得很深的概念浮现出来了。对汤普森来说,冷战只能被理解为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因素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多层次”现象。因此,走出冷战的出路就在于人的主体性活动。在制定欧洲核裁军运动的目标时,汤普森明显回到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首次探索过的民众的自我确证概念。就像 19 世纪早期英国工人阶级发动骚动,抗议成为剥削性的社会制度的机器一般的工具一样,东西方的民众也将起来造反,抗议那将所有人拖入没有任何幸存可能的热核战争的愚蠢的社会过程。

虽然爆发了大量和平示威,可北约最终还是在 1984 年的早些时候按计划部署了新导弹,而作为发生于 1987 年至 1991 年间的欧洲政治的革命性变局的一部分,这些导弹后来都被拆除了。1989 年,《时代》杂志的外交记者斯道波·泰尔波特就两个超级霸权在刚刚过去的那个世代中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评估。他的结论是:“只是在来自跨大西洋的压力下,里根政府开始就中程导弹问题与苏联进行对话。”<sup>①</sup>在后来的回忆录中,里根总统也肯定,80 年代早期的“欧洲导弹”冲突在其制定对苏政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尽管这种“来自跨大西洋的压力”肯定是一个比欧洲核裁军运动更广泛的阵营,不过,人们

---

<sup>①</sup> Strobe Talbott, 'Back in Business', *Time*, 12 June 1989, p. 34.

也难以否定以“对两个集团都说‘不’”为旗帜的、庞大的反核武器集会的长期影响。<sup>①</sup>

汤普森是如何处理历史学家和政治行动主义者这两种不同的身份的呢？政治的偏见意味着对（在其他东西上存在着的）“不好处理的”证据或理念的系统压制，因此，任何试图在汤普森的主要著作中寻找这些偏见的人很可能都会失望。因为他虽然明确地把自己定位为政治左派，却拒绝进行这样的压制。<sup>②</sup> 就像乔治·奥威尔一样，汤普森经常以同样辛辣的笔调批评自己同一个战壕中的战友，因为他自己既将批判的锋芒瞄准敌对的意识形态右派，但同时也准备接受与自己的专业意识形态传统不同甚至相反的观念和假设。<sup>③</sup> 汤普森的行动主义和历史学研究之间的基本关系就存在于这样一种更精深微妙的层面。

对于汤普森的著作，最经常出现的那些批评都是围绕着他的过分乐观主义或“理想主义”这个问题展开的。例如，像汤姆·奈恩、佩里·安德森这样的批评者就坚持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夸大了早期工人

① 里根写道：“我所提出的零—零选择源于西欧的核政治现实……在苏联宣传机器的策动下，成千上万的欧洲人走上街头，抗议在欧洲部署额外的核武器，认为它们的存在将导致未来只会在欧洲范围内发生核战争——赫尔姆特·科尔在访问白宫的时候告诉我，在让欧洲人确信美国是一个嗜血黩武的国家问题上，现在的攻击性宣传变得极老练和有成效。对美国的这种看法让我感到震惊；我们可以说是地球上最具道德感和宽宏大量的人，但现在我们却被——用科尔的话说，有效地——塑造成了恶棍。很清楚，我们必须用更有效的工作，转变世界上对我们的道德感和建立一个和平的无核世界的责任的认知。在与内阁和我的军控专家进行深思熟虑的讨论后，我决定提出零—零建议。”（Ronald Reagan, *A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0, pp. 295–296, see also pp. 552–559, 590–591.）

② 这种概括必须将前面已经提到过的1955年版《威廉·莫里斯》排除在外。它后来出了1970年完成的第二版，以“清除”1955年版中那些明显的政治威胁。

③ 实际上，按照佩里·安德森的看法，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已经包含许多“不好处理的证据”了。利用该书叙述过程中所提供的丰富例子，汤普森的批判者完全可以建构出一种与该书主题相反的论证。（Perry Anderson, *Argument within English Marxism*, pp. 30–49.）

运动所赢得的长期成果。<sup>①</sup> 从类似的立场出发,历史学家迈克·霍华德辩论说:作为一名和平主义的行动主义者,汤普森过高估计了欧洲人的政治成熟度;他在欧洲核裁军运动中所写的著作和发表的演讲的主题都是在没有超级霸权的前提下保持欧洲和平,这如果不是太盲目乐观的话,那也过于含糊不清了。<sup>②</sup> 如果说严重的冲突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间发生了,例如在罗马人和匈牙利人之间,在波兰人和德国人之间,总之在欧洲漫长而血腥的历史上结为世仇的那些民族间发生了,那么,谁来为他们做最后的决断? 谁来捍卫和平? 汤普森的著作从来不考虑这些问题,他似乎就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了一个相当不牢靠的想法上:对以往暴力的记忆和对毁灭的恐惧,将在欧洲人中间激发出史无前例的理智和自制力。<sup>③</sup> 在这里,汤普森的历史研究的盲点和他的政治活动的盲点似乎合二为一了:同样是在这里,他对欧洲历史上人的主体性活动的积极评价,与其对欧洲未来充满希望的建议合二为一了。

这种在汤普森著作中频频出现的癖好可以很好地理解为他信仰

---

① 依据安德森的看法,汤普森过高估计了19世纪早期刚刚形成的工人阶级所释放出来的革命力量;在这个方面,把人的主体性活动膨胀为反对必然性的力量,是汤普森更大的一种趋势的一个例证:他“夸大了有意识的选择和行动在过去的社会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Perry Anderson, *Argument within English Marxism*, p. 57)。安德森引证了汤姆·奈恩得出的更冷酷的结论,表明完全可以就同样的历史过程得出一种更悲观的评价:“伟大的英国工人阶级是19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释放出来的一种像泰坦一样巨大的社会力量。但是,它最终没有成为领导和重塑英国社会的力量。它没有打破另外的模式。相反,19世纪40年代以后,它迅即成了一个明显就是很听话的阶级。”(Tom Nairn,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Left Review* 24, March-April 1964, p. 3, 引自 Perry Anderson, *Argument within English Marxism*, p. 44.)

② Michael Howard, *The Causes of Wars and Other Essays*, 2d edi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chap. 1, pp. 116ff.

③ 在1984年写给捷克人权组织77宪章运动成员的信中,汤普森说:“在我们的运动成功之前,欧洲很可能就发生核战争了。为了达到我们的共同目标,就需要旨在监控过渡、限制发生‘不稳定’事件的东西方的大众运动能够达到史无前例的成熟度。”(E. P. Thompson, ‘The Two Sides of Yalta’, in *The Heavy Dancer*, p. 181)在这个方面,汤普森的主要弱点就在于,就在当代欧洲大陆的政治发展一点也没有展现出什么远大“成熟度”的时候,他却奢望欧洲人“达到史无前例的成熟度”。

的有力表达。在去世前不久的一次访谈中，访谈者问作家伊萨克·巴斯维斯·辛格，他是否真的相信人类拥有自由意志。辛格面无表情地说：“我必须相信，此外别无选择。”同样，汤普森的生涯似乎也全部建立在这样一个假定上：虽然在任何既定时刻，人类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塑造自己的历史，这一点并不十分清楚，但是，人们之所以还是要采取有意义的行动，部分原因就在于这种希望本身。如果没有一种作为替代可能性场域的、个人和集体的努力能够在其中变得非常重要的历史判断力，那么，人的意义重大的主体性活动能够改变当下历史发展的契机也就迅即消失于无形之中了。

因此，汤普森著作的力量和弱点其实都来自同一个地方：他渴望证实、扩展这种历史判断力，以表明过去的人和当代的人都能够对自己时代的事件发生影响。这种立场的缺陷就在于，总的说来，它倾向于过高评价人类的潜能。相反，它的优势在于这种自我实现预言的逻辑，因为有这种顽强的希望，人类有的时候确实部分改写了历史的发展趋势。

作为历史学家，汤普森的影响最终是根据下列说法得到评价的：他的才华就在于使当代历史学家确信，应当重新评价大众运动和“大众文化”在社会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就其行动主义而言，现在就盖棺定论显然为时尚早。一方面，回过头去看他在 80 年代的那些演讲，有的时候它们的确具有预见性，但有的时候又是完全空想的。他对和平的、完全民主的欧洲的梦想远远没有实现。但另一方面，他成功地将自己“部分自由的主体性活动”标准运用到了历史中，因为通过他在欧洲核裁军运动中的工作，他激励了许多欧洲人全面重新评价自己在世界政治中的位置，而这些都是他通过在草根阶层实施劝喻的力量实现的。

（张亮 译）



## 5. 爱德华·汤普森的伦理激进主义及其遗产

迈克·肯尼

E. P. 汤普森(1924—1993 年)的辞世让英国失去了一位最优秀的历史学家和最著名的学术名家。汤普森的形象横亘学术与政治两个世界,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他成为英国和欧洲反核武器运动的卓越领导者之后,这种情况就更为突出了。因为他的逝世,我们也失去了一位在英国文化中已经变得极为少见的“公共道德家”:他是一个从伦理观念出发抗议一切国内国际不公正事务的人。事实上,他的一些核心理论关切——著名的如他炽烈的爱国精神以及在个人事务与身体政治中培育“德行”的责任感——与 20 世纪的政治理念相去甚远,反倒与 18 世纪后期的政治激进主义更合拍。本文力图大致勾勒出汤普森思想的基本特征,同时说明:他对特定“德行”观的倚重,将他与共和思想传统以及更晚近一些的伦理社会主义传统联系到了一起。也就是说,汤普森继承并发扬了自 18 世纪以来一直激励着英格兰激进主义的公民不服从传统。这种不服从传统内容丰富,既有宗教性的也有政治性的。

### 汤普森的伦理观

因为出版了一系列专论 18、19 世纪英国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著作,汤

普森在战后有阅读能力的公众中声誉雀起。这些著作中流传最广的当属《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这本书实际上超出专业历史学研究,深刻影响了众多学科的研究者。也正是通过这本书,汤普森成了我们这个时代唯一一个既被人文学者也被社会科学家广泛征引的跨学科大师。

除了历史学著述,汤普森还创作了许多关于当代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杂文和论文。高度发达的伦理敏感性是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著述联系起来的主线。这推动他投身于一个接一个的道德使命和政治使命,创作出了浸透着爱恨情仇与个人好恶的历史学著作。在汤普森这里,学术争论常常会在欲置对手于死地的尖刻辩论中不断升级,这种写作模式让他的文学技巧和修辞才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学术争论尚且如此,政治争论就更不用说了。但凡读过汤普森专横跋扈的《理论的贫困》(1978年)一文的人,有谁能忘记他倾泻在主要敌手路易·阿尔都塞及其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追随者身上的那些冷嘲热讽呢?那些曾有幸看过汤普森私人通信的人都觉得它们是一笔不可小觑的财富,其中既充满愤怒,也饱含对传统观念的诙谐抨击。

不过,很遗憾,我们对深藏在这些不同类型的介入活动背后的伦理动机的形成原因和理论资源所知甚少。因为我们缺乏详尽的汤普森传记,以把他的生活还原到他所经历过的那个动荡不安的历史语境中去。也因为对汤普森的伦理观缺乏理解,所以,知识左派都容易对他的理论构架中的错误——著名的如他的道德主义、爱国主义和反理论主义倾向——发动隔山打牛式的批评。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1981年)对汤普森著作的“解构”中,佩里·安德森强调了汤普森历史学著作的高水准与他对当代政治发展的分析的贫乏浅薄之间的断裂。虽然行文中颇多赞赏,不过,安德森在与汤普森旷日持久的理论争论和政治争论的尾声处得出的结论,或许还是不恰当地扭曲了后者的理解力。因为他为了将汤普森打扮成一个朴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将后者身上的

“资产阶级”杂质荡涤一尽，结果，他对汤普森的理解极为片面。

非社会主义的传统和观点完全可能对汤普森的著作发挥更加积极的影响，但安德森的批判却模糊了这一点。浪漫主义、社会主义、各种自由主义乃至托利主义在汤普森身上所发生的创造性的伦理互动和政治互动，引来的常常是人们的曲解中伤，而非严肃的探究。因此，把汤普森放置到英国本土更早一些的激进主义理论传统的语境中重新解读，将能使我们获益良多——这些英国本土的激进主义理论传统既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也有非社会主义性质的，它们的代表人物包括托尼、柯尔，当然首先还是奥威尔，以及布莱克、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等浪漫主义作家。

### 爱德华·汤普森的“形成”

汤普森生于1924年。他的母亲是美国人，父亲先后做过卫斯理宗牧师、小说家、历史学家和颇具才华的诗人。1939年，爱德华·汤普森的哥哥弗兰克——他的生命虽然短暂，但对爱德华却影响深刻——加入英国共产党，这个举动让全家为之震惊。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不久，弗兰克志愿参加现役。几年后，当时还是剑桥大学学生的爱德华追随弗兰克加入英国共产党，然后参加英军，作为一个坦克部队军官在意大利参战。战争结束后，他周游美国，参加激进会议，然后陪伴自己的母亲访问巴尔干。此后，他作为英国青年志愿旅旅长投身南斯拉夫的一项铁路建设计划，并在那里遇到后来的妻子多萝茜·达沃斯。回国后，这对小夫妻定居哈利法克斯，爱德华作为利兹大学校外部的文学讲师开始工作。他积极参加当地英国共产党的支部活动直到1956年，然后成为羽翼尚未丰满时期的新左派运动（1956—1964年）的领军人物。他的第二部出版物《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不仅使之成为一名激进学者，而且使之成为一个为道德责任大声疾呼的公共人物。这就是他直到1993年去世时常常并不那么舒服地扮演着的双重角色。

对于汤普森在英国共产党中的“公共”政治生涯以及加入英国共产党对他作为历史学家的影响(尤其是参加由唐娜·托尔、莫里斯·多布、埃瑞克·霍布斯鲍姆、约翰·萨维勒、拉斐尔·萨缪尔等组成的天才的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评论者往往给予了恰如其分的关注,与此同时,却对造就了他的道德良知和复杂的理论意识的那些力量和人物关注较少。在他的早期生活中,他的父亲爱德华·约翰·汤普森和哥哥弗兰克·汤普森对他的成长影响重大。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完成的一本书中,汤普森曾回顾过自己的父亲和哥哥以及他们对自己的影响。<sup>①</sup>在这些地方,他不再咄咄逼人,而是变得深思熟虑起来,提供了许多有关其人生和理论形成的生活细节。这些细节最清楚地刻画出来的一个主题就是他对文化边缘性与德行的联系的理解。

这可以在他与他哥哥的关系中得到说明,虽然他父亲在很多方面对他的影响也很大。(我们现在还能猜测的是,对其作为一个男性和作家的形成而言,除了他父亲和哥哥的关系外,战争经历也发挥了极大作用。)1981年,应斯坦福大学之邀,他主持著名的坎普讲座,对自己的哥哥、一个在“二战”时期负责与巴尔干游击队联系的英军联络官生命的最后几个月进行了再思考。时年23岁的弗兰克于被捕前6周被空投到巴尔干南部。随后他协同一支注定要遭厄运的共产党游击队前往巴尔干中南部建立一块解放区。1944年5月,这支小部队被保皇党武装包围、俘虏,他在遭到严刑拷打后被处决。

在这些演讲中,汤普森超越后来在巴尔干和英国流传的不同版本的神话,对自己哥哥的最后岁月进行了重新探索 and 评价。就像在其他著作

---

① E. P. Thompson, *Alien Homage: Edward Thompson and Rabindranath Tago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他曾在坎普讲座中回忆过自己的哥哥,后来这些演讲以“深入敌后:失败任务的政治学(巴尔干1944年)”(E. P. Thompson, *Beyond the Frontier: the Politics of a Failed Mission; Bulgaria 1944*, Stanford, Cal. and London: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Merlin, 1997)为名出版。对这一事件的研究由汤普森夫妇发起,这些演讲最后由多萝茜·汤普森编辑出版。

中一样,他利用近来才引起注意的文献,细致地挖掘自己哥哥与家人的通信,把这种历史上的普通人、自己厕身其中的事件变成一种载体,对历史方法论和因果性以及更普遍意义上的历史解释政治进行了广泛的思考。演讲还对个人的道德作用在历史过程中的中心地位、从事斗争中的个人必然会遭遇的那些生存论疑虑和伦理疑虑,以及一个令人感动的、努力超越禁锢其良知和政治原则的情势的“有德”公民的榜样,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反思。

## 英雄与烈士

汤普森的伦理责任同样因为他自己在公共政治经验过程中遭遇的那些创伤——20世纪四五十年代陷入英国共产党内的斗争,苏联入侵匈牙利,在新左派运动初期(50年代末60年代初)遭到的打击——得到了发展。在新左派运动初期,他完成了一系列对他本人和其他人来说都很重要的文章,这些文章刊载在他与约翰·萨维勒合编的一份仅在英国共产党内发行的简陋的油印时事小册子(被饱含深意地命名为《理性者》)、新左派刊物《大学与左派评论》和《新理性者》(这也是与萨维勒合编的)上。<sup>①</sup>若干年后,在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面无表情地说:“33岁那年,我开始进行理性思考。虽然我也曾竭力摆脱这种习惯,但始终未获成功。”<sup>②</sup>这些文章集因(英国)共产党的政治堕落而产生的个人苦闷告白和对社会主义理念的伦理缺陷的广泛检讨于一身,明白地揭示出了同时期退出共产党的那些英国知识分子的痛苦反思。

这些篇什的创作正值他从事自己的主要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

---

① E. P. Thompson, 'Reply to George Matthews', *The Reasoner* 1, January 1956, pp. 11-15; 'Through the Smoke of Budapest', *The Reasoner* 3, March 1956, Supplement, pp. 1-7; 'Socialist Humanism: An Epistle to the Philistines', *New Reasoner* 1, January 1957, pp. 105-143; and 'A Pessay in Ephology', *New Reasoner* 10, October 1959, pp. 1-8.

② E. P.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Merlin, 1978, p. i.

成》研究和写作的时期。因此,《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个文本应当在汤普森从自己的个人经历和政治经历中总结出来的伦理结论的背景上被审读。由此一来,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学术化评论所未曾发现的许多主题就呈现出来了。不服从的和边缘化的个人的牺牲和斗争是该研究中许多叙事的中心。这些人有时作为被放逐的“预言家”——他们以救赎的方式诊断社会疾病和痛苦——出现,有时连命都丢了。其他一些时候,他们的斗争和理念则为特定社会集团的前途和经历提供了戏剧化的包装。对那些杰出的激进人物的审判和迫害因此成了揭示他们生活的“榜样”特征的方式:“公众从哈迪身上又一次发现了生而自由的英国人所喜爱的那个独立自主的形象:一个坚强而具有尊严的平民,对国家权力表示藐视。”<sup>①</sup>他很推崇这些在那些年代的骚乱中丧生的领导者,认为“我们应当把这些人视为英雄”<sup>②</sup>。

汤普森笔下的男主人公和某些时候的女主人公常常都是些边缘化的人物,他们听任自己生活于其中的那些文化价值和规范文化的引导,不过,他们力图摆脱边缘化地位的斗争却造就了一种巩固的道德独立意识和坚定的自我感。通过对这些人的斗争的历史学重建,汤普森探究了强有力的自我感——既为个人也为集团——的出现是如何为强大而独立的公民的形成奠定基础的,他坚信这种公民的形成是民主进步的重要前提。他对自我的说明与他的德行观密切相联。因为在他看来,德行是一种或多或少能够提高而不是始终裹足不前的前进性特性。就像某些前人一样,他常常把德行表达为两种矛盾力量——批判理性的严格和游戏与欲望的自发性——在一个个人身上的融合。这源于一种更开阔的历史洞察力:批判理性会因为人的创造、情感和欲望而变得鲜活和深化。

---

①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English Working Clas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7, pp. 148 - 149.

② Linebaugh, 'One and All, One and All: Edward Thompson (1924 - 1993)', *Left History* January 1993, p. 96.

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激情”想获得“善的”道德目标,就必须听从合理性和自我理解所强加的结构束缚和“命令”。在他的历史学著作和政治著作中,汤普森一方面拒斥过度学院化的纯理论哲学,一方面拒斥过度乐观的快乐主义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文化,为防范这种融合的不稳定性提供了好的榜样。因为上述两种情况都说明了割裂理性与欲望割裂所具有的危险。

## 德行与公民

汤普森常常被人指用简单化的直接形式讨论自由主体。而事实上,他的伦理责任是由既不仅仅是“浪漫的”也不仅仅是“唯意志论的”人的复杂图景支撑的。个别主体投身于抗拒社会生活中的变迁和强制的连续性斗争中。他们永远要对外部力量——最显著的就是异化和剥削——和主导性的社会价值观的内化“严阵以待”。可最终,他们还是要与它们短兵相接,因为个人在内心深处终究还保留着必需的道德能力,且受到自我确定性这种基本追寻的驱策。他在自己的评论中将这些立场形势巧妙地置于莫里斯和浪漫主义作家的信念上:历史是“屡败屡战的人类主体创造的”<sup>①</sup>。

当汤普森在把这些伦理责任和自己的马克思主义遗产调和起来时,他无疑面临着一个独特的理论问题:既然他感觉当前条件下的个人与他们的本质、其他人是异化的,并且注意到了剥削关系实际发生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存在,那么,个人的道德感从哪里出现呢?尽管他没有给出直接的回答,但实际包含了两个隐含的回答。一方面,他相信,社会进步与合理性在历史过程中作用的不断强化深刻地交织在一起。这使意识尤其是自我意识——使个人得以开始超越那些构成必然性王国

---

<sup>①</sup> E. P.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p. 88.

的力量强加于他们的限制的痛苦过程的自我意识——的变换成为可能。可是,意识并不足以保证道德,尽管个人的良知就存在于意识的附近。就此而言,建立在个人良知基础上的、不管面对什么结果和诱惑都要坚持的“做证”观念成为贯穿汤普森历史学著作和政治著作的一个重要隐喻和迷恋对象。正如珀涅罗珀·科费尔德所指出的那样,汤普森深入英国不服从传统之中,这导致他认为个人应当“公开坚持他或她自己的信念……每一个人都有‘做证’的义务,即使这意味着反对宗教信仰和政府,要面对来自朋友以及敌人的敌视与批评”<sup>①</sup>。

下面这段话出自汤普森发表在《大学与左派评论》上的一篇文章,难能可贵地简要说明了前述各种观念是如何支持他的社会主义政治责任的:

我坚持认为,人就站在史前史的终点和自觉历史的起点的交界处。我们只有鼓起全部勇气才能超越这个阈限。我并不认为这意味着人类的完美是一个乌托邦神话。因为无阶级对立的社会并不是一个任何社会摩擦都不存在的社会。莎士比亚了解的一切邪恶以及德行都将继续困扰人类的灵魂……如果人类能够做出明智的选择,那么,他们就可以开启一个相互丰富的新时代,设计出一种能够让德行大行其道、邪恶得到限制的社会制度。如果今天想要的证据似乎否定了这种希望,那么,我们依旧可以抗争,拒绝成为环境或我们自己的牺牲品。<sup>②</sup>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研究的是英国历史上这样的社会政治语境:在其中,人们可以不受限制地讨论各种公共话题,充满睿智的伦理批判思想茁壮成长,“德行的影响”不断壮大。在他的脑海中,这样的场所经

<sup>①</sup> Cordfield, 'E. P. Thompson, the Historian: An Appreciation', *New Left Review* 201, 1993, p. 16.

<sup>②</sup> E. P. Thompson, "Socialism and the Intellectuals", *University & Left Review* 1, January 1957, p. 36.



常处于传统政治和体制构架之外,为了维护那种“很有哥们义气的”漫谈文化,它们都能够容忍不同的观点和持续不断的争论。在全部研究中,汤普森着力展现这些民主的原型空间是如何被建构成具有公开的原则、得到遵守的规范和章程的社团或协会的。该书第一段所描写的是伦敦一个革命社团的成立会议。通过他的描写,自觉的与受公开的章程支配、向所有(男)人开放的社团结在一起的“生而自由的英国人”跃然纸上,并成为贯穿全书不断突显的主题。对理性思考的漫谈形式、不同工人集团之间集体合理性的深化、开创超越国家起源的公共空间并使之合法化的斗争之间相互关系的重要记述,支撑着这些历史地推导出来的反思。

生活在汤普森历史学著作中的那些理性的和浪漫主义的市民,通过提高理性思考能力,戏剧般地再现了那些调整自我的内省冲动和自我冲动的斗争。德行是对理性和欲望进行适当“掌控”的结果,它与理性思考、根据理性认识进行负责的争论和论证的自发意愿直接相关。研究者们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德行在汤普森思想中的中心地位,部分原因在于这种中心地位是与他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尴尬地共存一处的。在大部分情况下,汤普森是用目的论的社会主义未来观来表达这些责任的。不过,就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结构而言,与他的其他政治观念相联系并从各个方面提示这些政治观念的德行观实际占据核心地位。他终其一生都为之追寻的社会主义也因此在这种理想——他坚信——必然实现的范围内规定了自己的政治表达或“形式”。正因为如此,他与社会主义正统和马克思主义正统的关系始终不像他的很多理论上的同志那么教条。

## “英格兰性”政治学

汤普森的这些伦理观点并不源于抽象的思辨或形而上学的冥思,而

是长期研究思考英格兰文化传统和理论传统的结果。然而，因为安德森曾对汤普森的爱国主义的局限性有过批判——安德森将这种局限性一直追溯到英国共产党 20 世纪 30 年代宣扬的进步的民族主义观——所以，人们后来纷纷对汤普森据说不够深思熟虑的英格兰性学说提出了批评。对此，汤普森报以沉默。这表明他实际上拒绝回应理论左派并非基于成熟的批评判断所提出的这些责难。汤普森对英格兰的描写、他与英格兰文化和体制的关系，要比安德森等人所以为的复杂得多。汤普森最初对主体的责任源于一种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构成了行动与力量在不同的民族语境中以完全无法预料的方式实现的联合。（他常常与英国混用的）英格兰的社会和历史发展在与其它民族国家进行有意义的比较之前，首先必须按它自己的方式得到理解。60 年代中期，安德森和奈恩曾抛出有关制约英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缺陷的论点，在对此进行回应的时候，汤普森批评了那种要把法国革命当做解释资产阶级革命的理想模式的观念，认为这种模式并不适于评价英国独特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因为他坚信英国的制度发展和文化发展模式自成一体，所以，它的激进传统的文化和政治也是自成一体的。正因为如此，汤普森问心无愧地大声赞美那些曾经孕育了普通民众的经验和抵抗的传统习俗，虽然他的社会主义同志对此很不以为然。60 年代早期，《新左派评论》周围的英国新左派发生分裂，而这也正是其中的一个核心话题。在仅供编辑部成员内部传阅的一份内部纪要中，汤普森对当时已经控制了杂志理论走向的安德森等人的路线进行了抵制，因为他从中察觉到了理论上的国际主义和对英格兰/英国文化的敌视：

发生在这个固执、守旧、不善变的岛国之外的事件似乎总是更“真实”、更具批判性、更紧急……我们的确应当尽量掌握第三世界、巴黎、波兰、米兰的情况，可与此同时，难道我们周围就不存在一种正在形成中的、不仅对我们而且对其他人都有教益的话语？这种话语对我们的确有点陌生，我们几乎不能理解它，因为它是用一种我

们不再能够理解的方言在述说。它来自芸芸众生的亚文化,仅仅属于英格兰人,也没有巧言善辩的代言人——在其他成熟老练的人面前,他们都是卑躬屈膝的。

争吵的主题很重要。汤普森之所以叹息,是因为英格兰话语、民族的激进遗产、根植本土的激进政治观被人们忘却了。他对没有祖国的国际主义知识分子的讥讽,与奥威尔对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苛责极为类似。在同样一份纪要中,他把这种类似性拿出来炫耀了一下:

我担心,提前与第三世界阵营站到一起不仅仅是学术的。它同样有一种没有祖国的成分在里面,与30年代某些左派知识分子——奥威尔曾讽刺过他们的结果——鼓吹的工运中心主义潮流颇为类似……现在的潮流似乎不再是模仿“工人阶级的”行为举止和搞穷人崇拜,而是让自己属于农民革命运动,即放弃自己的“西方”性。<sup>①</sup>

不管是在对其他左派思想家的猛烈抨击中,还是在自己的历史学著作中,汤普森都对偏离本土理论实践模式的危险性提出了警告。在对雅格宾·约翰·泰尔沃的研究中——该文于其身故后发表在《过去与现在》杂志上——他得出了一个当代激进知识分子需要严肃对待的教训:“他是一个前车之鉴,因为要求自己的政治希望和策略尽量深入到其他国家的发展过程中的那些改革家所冒的风险他都冒了。”<sup>②</sup>

有点不可思议的是,汤普森的“爱国主义”不同于时代对本民族过去的呼唤,而更类似于18世纪90年代之前的爱国主义,那时候,在防御性地回应法国大革命时,英格兰性还在诉诸“教会和国王”。很多研究者都

---

① E. P. Thompson, 'Where Are We Now?' (internal memorandum to the *New Left Review* editorial board), April 1963; available in the Lawrence Daly Papers, Modern Records Center at Warwick University, MSS 302/3/19.

② E. P. Thompson, "Hunting the Jacobin Fox", *Past & Present* 142, 1994, pp. 138 - 139.

看到,这种爱国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那种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语境中其实根本不能维持,但汤普森顽固地拒绝接受这种批评。不过,对所有这种左派爱国主义的模式缺陷而言,安德森的批判忽视了汤普森对英格兰的过去的传统解释所发起的空前强劲有力的挑战。在其全部历史学著作中,汤普森都在质疑“官修”国史的定论和教条,并且再一次像奥威尔那样,坚信爱国主义是社会主义传统的核心。对他们而言,1789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都不如农民起义、英格兰内战或宪章派骚乱重要。

汤普森还和奥威尔一起分享了可以被恰当地描述为“专门主义”的社会哲学。这种社会哲学让他们对社会集团和个人的经验与文化中的独特方面,而非关注人类社会的普遍方面的支撑性理论范畴形成了更浓厚的兴趣:汤普森用专门的英语写作,这种英语由“对具体的事例的偏爱……对日常用语的喜好,对形而上学沉思、抽象和系统的理论化的不信任”构成。<sup>①</sup> 这种姿态使得他们都藐视许多现代政治理论和社会理论潮流的总体化野心。

这种共享的遗产有助于解释汤普森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理论化推测和政治理论化推测的猜疑,以及为什么他的历史学著作会间或流露出“托利主义”的情绪。虽然汤普森依旧坚信,爱国主义应当把公民引向政治不服从,可是,在英国,他所采用的方言和论证方式却呈现出保守党人的特征。他知道自己这个方面立场的意识形态脆弱性,可在70年代以后那些“欧洲怀疑论”文章中,他对这种含混还是颇为自得的:

我不认为每一代人能得到很好的教导,就像没有历史一样去行动。我也不能认为它是清白的,并让它从零开始设计自己的制度。我希望提醒货币权利的理论家、大规模现代化论者和那些不能

<sup>①</sup> Dennis Dworkin, *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 History, the New Left, and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Studie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15.

容忍我们的宪政丧身欧洲大屠杀的人注意柏克所说的话：“通过高歌猛进和他们对自然过程的蔑视，他们被盲目地交到了投机者和冒险家、炼金术士和江湖医生手中。”<sup>①</sup>

法国大革命中的现代化论理性主义者之于柏克，犹如欧共体和新自由主义的现代化论者之于他这个 70 年代的“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他们表现出来的共同之处是轻松和启迪。汤普森表达自我的散文风格，他对修辞技巧——讽刺挖苦和夸张——的大量使用召唤出了一种英格兰式的理论研究风格和对过度理性化与表格化的形式的小小敌意，而这让人想起迈克尔·奥克肖特。正因为如此，政治右派批判家也能在汤普森这里找到共同语言。

## 找回失落的遗产

一旦汤普森著作的伦理维度得到揭示，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他身上聚集着不同的、在马克思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东西之外的理论传统和相互关系。他对有德自我的说明可以很好地将他与更早些时候的共和主义传统以及个人主义思想联系在一起。同样，他浸淫其间的不服从的“非国教”传统也以重要的方式塑造了他的敏感性。

因为人们那么不愿意承认汤普森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和伦理思想家，所以，他那些最令人感兴趣的遗产统统被人忽视了。其实，他的下列论证特别重要：在英国，民主讨论和辩论常常是在规范的体制化政治之外蓬勃发展起来的。他不无煽动性地宣称，正是在人们认为会出现政治的那些地方——中央国家、统治城镇的社团、贵族的宫殿——以外的偏僻所在，对自我确定和批判的理解的更真实的追求出现了。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的英格兰，就是在教堂、小酒馆、住家和那些没有宗教建筑

---

<sup>①</sup> E. P. Thompson, “The Secrete State”, in *Writing by Candlelight*, London: Merlin, 1980, p. 295.

外观的宗教场所,自由的思想生活发展起来了,民主经验出现了。他的政治文章揭示出了一个深层次的责任,即壮大——他坚信——在当今应当重新高举、并从本土价值观和语言中重新发明出来的公民概念。他表明,承担了许多如今由官僚和精英们执行的功能的“古典的”道德独立的公民观,是如何可能存在于 20 世纪后期的激进政治的核心中的。

以事后诸葛亮的方式看,他的下列企图同样很具迷惑性,即把相当古老的——根据行为与不服从、理性与欲望的和谐来理解的——德行概念更新为公民权的伦理支撑。他的公民概念是一种由最终根据自己的意识和良知来决定公共事务的、有道德责任感的个人构成的公民形象。有德的公民看样子具有坚韧而独立的心灵,以及在经历过抵抗边缘化和不义的斗争后形成的判断。因此,贯穿其历史学著作的主题始终是那些普通个人主体,而不是伟人或看得见的领袖,这些普通人一方面永远挣扎在冲动和必然性两极之间,另一方面具有自我决定的要求和成为自立公民的欲望。与某些批评家爱贴的简单化标签相反,不能简单地将汤普森说成是前现代化论者或反现代化论者,因为他的伦理理解中也包含对现代性核心中的敌对趋势的思考。

当然,支撑汤普森学术和政论著作的伦理观念在一些重要方面也存在瑕疵。例如,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去解释英格兰的文化特性和历史,并希望将本土激进传统与其他国家——著名的如法国——的传统分割开来,而这就使得他的理论和概念词汇变得贫乏。这种特性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他的其他重要理论理念的发展,例如,他对公民权的说明始终都不够充分。

我们看到,他的许多解释者、追随者和批评者都可以从他的著作中得出让人不安的不同的政治结论,这表明他的著作其实并没有一条足够严格的政治逻辑。在理论方面,汤普森在对程序民主观念的追随和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排除这种民主体系的后果的欲望之间摇摆不定。这里的民主指的就是有理性的、思想独立的公民能够协商一致的那套东西的

规则,以及不可预知的那套东西的体系特性和政治特性。他从来没有彻底放弃目的论,相信集体的自我意识可以通往作为人类解放最高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然而,这是不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必要组成部分呢?他几乎始终在回避这个回答问题。

我们决不能因为这些含混和瑕疵而否定汤普森是一个政治思想家和伦理思想家。他比同时代其他英国知识分子更积极地投身各种公共争论和学术争论,如关于政治主体的重要性、普通人在形成保障市民社会的连带的文化联系过程中的作用、伦理争论的政治重要性,等等。直到逝世,汤普森才不再是核心政治的参与者,并最终承认自己的观念被风行于八九十年代的学术时尚吹到一边去了。不过,他所体现的许多理论传统和特征——对国家不当行为的苛责反对、道德原则在政治中超越直接的功利计算的崇高地位、对超越国家的政治自我活动的自由主义传统的赞美——在我们时代的公共社会中已经衰落了,它们不仅很有意思,而且可能很重要。虽然他的政治学说具有弥赛亚主义色彩,自相矛盾,可能最终无法实现,但是,支撑它们的伦理基础却源于让18世纪以来的理论争论和政治辩论变得生动的观念和辩论传统。随着这个独一无二的历史学家和坚忍不拔的公共道德家的逝世,我们看见了这种丰富遗产的解体、消散。鸟瞰同时代的政治图景和理论图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损失。在现时代的著作家中,有谁能轻而易举地把斯威夫特的嬉笑怒骂、莫里斯的想象力、布莱克的绝望和托尼的伦理信念熔为一炉呢?我们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中,谁能权威性地言说我们政治决定的道德成本,并得到人们的认真倾听呢?

(张亮 译)

## 6.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与工人阶级

诺拉·卡林 伊恩·博查尔

在1981年工党年会上，工党领袖金诺克受到了工党左派的猛烈攻击。在自我辩护中，他引用了享有盛名的英国共产党党员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教授的诸多近作<sup>①</sup>，后者被赞誉为“现在世的最睿智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过去几年中，霍布斯鲍姆关于左派的观点引起了广泛讨论。他的“1978年纪念马克思的演讲”，后来取了个争议性的标题“工党前进的步伐停止了吗？”，引来了共产党内部和其他左派部门的诸多批评性评论。<sup>②</sup>过去两年，他在《今日马克思主义》上发表的另外两篇文章《西欧左派状况》和《马岛事件余波》，都曾先行以压缩版的形式刊发在《卫报》上<sup>③</sup>，从而在读者中赢得了广泛共鸣。

在1981年支配工党左派的唯意志论的乐观情调，现在让位于马岛事件之后的悲观主义；而霍布斯鲍姆最近关于工人阶级民族主义和传统

---

① *Labour Weekly*, 8 October 1982.

② Eric Hobsbawm, 'The Forward March of Labour Halted?', in M. Jacques & F. Mulhern eds., *The Forward March of Labour Halted?*, London: NLB in association with *Marxism Today*, 1978.

③ Eric Hobsbawm, 'The State of the Left in Western Europe', *Marxism Today*, October 1982, *The Guardian*, 27 September 1982; Eric Hobsbawm, 'Falklands Fallout', *Marxism Today*, January 1983, *The Guardian*, 20 December 1982.



工人阶级衰落的文章正好迎合了这一氛围。在很多方面，他对工人阶级的看法都与安德烈·高兹相类似，虽然前者的观点明显地比后者更加连贯，更加清晰易懂。<sup>①</sup>同时，他关于无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观点受到了《卫报》亲社会民主党的专栏作家彼得·詹金斯的支持，这一事实毫无疑问温暖了那些试图同社会民主党和激进保守党结盟的共产党员的心。<sup>②</sup>

作为一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成就是无可置疑的。他写了大量的涉猎广泛的历史性综合著作（如《工业和帝国》、《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同时，也写了许多关于诸多主题——特别是19世纪工人阶级——的较为详实的论文。此外，作为一名英国教授，霍布斯鲍姆冲破了冷战壁垒，分别担任了康奈尔大学的博文客座教授和匈牙利科学院的荣誉院士。在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中，唯有爱德华·汤普森和克里斯托弗·希尔的成就可与之比肩。

霍布斯鲍姆没有将自己的研究仅仅局限于学术史。他经常在共产党刊物、左派及中间派期刊（如《新政治家》、《新社会》等）上广泛地评论当代问题。他已经写过从罗宾汉到拉姆齐·麦克唐纳的众多历史人物，也写过从秘鲁到奥地利的诸多国家。同时，他也时常假借弗朗西斯·牛顿之名化身为一位受人尊敬的爵士乐评论家。在他最近一份作品清单目录中所列条目达到几百项。

霍布斯鲍姆目前的身份是一个左派机构的领导人，其主要工作实际上是要证明自己著作中批判性评价的合理性。但除此之外，霍布斯鲍姆还是一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是当时在法西斯主义和人民阵线时期转向共产主义并甘愿留下来面对当时一系列极为不同的问题的那一代人中最富才华的党员之一。下面的论述首先将会概述霍布斯鲍姆的政治演变，然后试图评价他目前立场的根基。

---

<sup>①</sup> Cf A. Gorz, *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London: Pluto Press, 1982, and review by I. Birchall in *Socialist Review* 50, 1983.

<sup>②</sup> *The Guardian*, 29 December 1982.

## 霍布斯鲍姆的政治演变

### 1. 20世纪30年代

霍布斯鲍姆曾对促使他加入共产主义运动的社会环境进行过这样的描述：

我所属的环境……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欧的犹太中产阶级文化，现在几乎不存在了。这一环境经受了1914年资产阶级世界的崩溃、十月革命与反犹太主义三个方面的影响。

在当时形势下，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走进了死胡同，而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共产主义或犹太复国主义，那些选择前者的人，如霍布斯鲍姆，都意识到“旧制度正在土崩瓦解……坚信苏维埃革命是积极的选择”<sup>①</sup>。

1932年，霍布斯鲍姆在柏林成为一名共产党员，那时他还是一个15岁的学童。为了逃离希特勒的魔掌，他们一家离开德国转赴英国，大约于1936年他加入了英国共产党。<sup>②</sup>在这种背景下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无疑为霍布斯鲍姆毕生的承诺奠定了基础。但是认识这种承诺的特殊性是非常重要的。20世纪30年代是人民阵线时期，同时也是防御斗争和防御失利时期。当时统摄全局的有两个主题：一是法西斯的威胁；另一个则是这样一种认识即俄国是唯一能够与法西斯抗衡的可靠堡垒。正是这一信念——而不是对工人阶级自我运动的信仰——将霍布斯鲍姆引向了马克思主义。从这一方面来看，霍布斯鲍姆是这一整代人当中的典型代表。50年来，人民阵线主义，不论哪种形式，都是他政治学的典型特征。

30年代后期，霍布斯鲍姆在剑桥将他的学术成就(党的口号是“共产

<sup>①</sup> E. Hobsbawm, *Revolutionaries*, London: Weidenfeld & Nicdson, 1973, pp. 250 - 252.

<sup>②</sup> “An Interview with Eric Hobsbawm”, *Radical History Review* 19, 1978 - 1979; *World News*, 13 October 1956.

主义学生的首要任务就是做一名好学生”<sup>①</sup>)与作为一位社会名流的声望结合起来,担任剑桥大学校报《格兰塔》的编辑,并为其撰写了许多关于电影、爵士乐和书籍的文章。

不过,在这些光环背后,霍布斯鲍姆显然成了一名受到信赖的共产党员。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似乎并未引起他的焦虑。在“二战”爆发之后不久,霍布斯鲍姆及他的大学同学雷蒙·威廉斯被委派写一本关于苏芬战争的小册子,“它的论点是此次战争是1918年芬兰内战——曼纳海姆和白军最终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的延续”<sup>②</sup>。当时,哈里·波立特由于不同意第三国际的战争路线被暂时免去了英共总书记的职务,因此,这一任务毫无疑问地只能委托给对党绝对忠诚的人。

## 2. 战后十年

在服完战时兵役后,霍布斯鲍姆一方面继续他的学术事业,另一方面仍作为党内积极分子工作,而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在这二者之间发挥了关键性的纽带作用。

霍布斯鲍姆在谈到1946—1956年间的这一小组时写道:“我们作为历史学家的工作是深深根植于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工作当中的,我们相信,这一点包含着共产党员的身份,是无法与我们的政治承诺和活

---

① *Marxism Today*, July 1979.

② R. Williams, *Politics and Letters*,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9 pp. 42-43. 遗憾的是我们没能找到这本小册子。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马克思纪念图书馆都没有关于这一小册子的任何描述,基思·麦克利兰在霍布斯鲍姆的帮助下曾经编辑了一本详尽的文献目录,但他也没能找到这份材料。威廉斯教授对于进一步提供材料的要求也没有做出回应。

③ E. Hobsbawm, 'The Historians' Grou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M. Cornforth, ed., *Rebels and their Cause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8, p. 26; see also B. Schwarz, 'The "People" in History: the Communist Party Historians' Group', in R. Johnson et al., ed., *Making Histories*, London: Hutchinson, 1982; R. Samuel,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 1880-1980: Part One', *New Left Review* 120, March-April 1980; 'An Interview with Eric Hobsbawm', *Radical History Review* 19, 1978-1979.

主义教育和宣传活动,并通过四个“周期段”实现集体的理论发展,这四个周期段主要是研究党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方针政策,比如16世纪绝对君主制、工业资本主义下工人阶级的生活标准等问题。

但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并非不关心世事,他们有意地与当时科研机构内反右翼主流倾向的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如T.S.阿什顿、休·特雷弗·罗珀(现在是戴克勋爵)建立关系。1952年,他们共同创办了《过去与现在》杂志,以此作为在冷战期间探讨“科学的历史”的论坛。起先编委会成员大多为共产党员,但也允许非马克思主义成员对文章的否决权。该杂志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特别是自1958年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占据编委会多数之后,更是如此。

人民阵线思想是历史学家小组观念的根本基础。霍布斯鲍姆在1978年回顾该小组经历时写道:“我们和党在观念上都把我们自己看做……广泛激进运动的领导人,就像我们在20世纪30年代所经历的那样……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认为自己延续了历史的主要民族传统,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也准备加入我们的工作。”<sup>①</sup>

在1949年写的一篇回顾上世纪英国工人阶级史的文章中,霍布斯鲍姆对社会主义前景持乐观态度。在这里,人民阵线的思想再次成为他思想的核心:

纵观工党现实政策的起起伏伏,在阶级意识斗争的抉择上,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两次世界大战见证了共产党的诞生,而20世纪30年代后期共产党的影响力获得了显著增长。战争及战后岁月在劳工史上首次表明,共产党的领导已在工会中牢牢地站稳了脚根。当然了,这一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可现实的普遍趋势却不容置疑……在我们那个时代,量变就有可能转化为质变。而现在,时机正在迅速成熟。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积极性和领导能力。<sup>②</sup>

① C. Hill, R. H. Hilton & E. J. Hobsbawm, 'Origins and Early Years', *Past and Present* 100, 1983, pp. 3-14; 'The Historians' Group', pp. 32-33.

② 'Trends in the British Labour Movement since 1850', *Science and Society* 13, no. 4, 1949.

最近,霍布斯鲍姆指出,这一时期,除了在一些特别敏感的党史领域外,党员身份并没有带来任何强制的学术限制。最起码,这与我们从其他来源了解到的党的生活是完全不一致的。<sup>①</sup>

尽管如此,霍布斯鲍姆似乎已经学会了适应党的要求。人们能够在他的著作中搜寻到他赞扬斯大林、谴责法西斯主义者铁托的徒劳无益的工作,虽然他看上去与那些热衷于此事的人相处得很愉快。<sup>②</sup>

---

① 参阅 ‘The Historians’ Group’, in M. Cornforth, ed., *Rebels and their Causes*, and ‘An Interview with Eric Hobsbawm’, *Radical History Review*, 1978–1979。不同的观点可以参见 E. P. Thompson, ‘Caldwell’, in R. Miliband & J. Saville, ed.,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77; E. P. Thompson, ‘Edgell Rickword’, *Poetry Nation Review* 9, 1979。具体事例请参见《现代季刊》第6卷第1期(*The Modern Quarterly*, vol 6, no.1, Winter 1950–1951), 霍布斯鲍姆也曾给这个杂志投过几篇稿子。这期还包含一封来自(法国共产党期刊)《思考》的信,在信中它批评《现代季刊》忽视了日丹诺夫的工作,它质问道:“是否充分理解了苏联的真正作用即领导作用?”同时,还刊登了《现代季刊》编辑约翰·刘易斯的注释,他向《思考》杂志所批评的缺陷表示歉意,并说道:“然而,我们意识到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将邀请读者来协助我们提升这本杂志。”

② 他对正统观念说了一些恭维之词,在评论保罗·斯威齐的《社会主义》时,他针对斯威齐对辩证法的阐述评论道:“不论是列宁还是斯大林都不会同意的。”(*Science and Society*, XIV 1, 1949–1950)。他在报道1949年匈牙利关于卢卡奇著作的争论时告诉我们,“正如日丹诺夫指出的那样,过分重视马克思19世纪40年代纯粹黑格尔主义式的著作(马克思本人没有发表这些著作)的习惯是有缺陷的”( *New Central European Observer*, 26 November 1949)。在1950年,霍布斯鲍姆为约瑟夫·利维——匈牙利工人党政治局委员——抨击卢卡奇的批判性论著的英译本撰写了序言。在序言中,他为文学争论的政治干预的合法性进行了辩护,他写道:“马克思主义者与早期那些作为‘人类灵魂的建筑师’(斯大林语)的作家不同,他们把文学的重新创作看做一件在党的领导下有意识地集体规划的工作。”(Introduction to J. Revai, *Lukacs and Socialist Realism*, 1950.)

此外,忠诚的压力导致了一些奇怪的回避和扭曲。在对1914—192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全面书评中,霍布斯鲍姆根本没有提到罗莎·卢森堡(*New Central European Observer*, 16 September 1950)。在对萧伯纳的《社会主义》富有洞察力的研究中,他揭示了萧伯纳怎样、何时放弃工人阶级的,他用其他两方面的事情——对官僚制的信仰和对“超人”的迷恋——填补了鸿沟。可是,当他探讨萧伯纳30年代向苏联共产主义的转变时,显然无法从早期趋势找到内在的连贯性,从而陷入了尴尬的混乱之中(*Science and Society*, XI 4, 1947)。最后,他以赞同的口吻报道了匈牙利共产党对卢卡奇的攻击,而卢卡奇受攻击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发展了这种“危险”理论,即“从经济观点来看,处在更高层次上的社会并不必然拥有更高的文学、艺术(或)哲学”。霍布斯鲍姆也一定非常清楚,这里讨论的理论根本不是卢卡奇的,而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中发展出来的(*New Central European Observer*, 26 November 1949)。

在1948—1951年间,霍布斯鲍姆向半月刊《新中欧观察家》投了20多篇文章,这个期刊是由共产党控制的,主要用于报道“人民民主”方面的事件。所有这些文章的根本特征就是完美无瑕的正统性:为俄国外交政策辩护,批判铁托,以及不断警告西德被鼓动起来反对俄国集团的危险性。

在这一时期,霍布斯鲍姆讨论当前事件的所有文章的典型特征,就是坚信俄国和东欧国家体现了一种新的、更高水平的社会组织,任何拥护工人阶级的人的首要职责就是保卫这些国家。因此,在《世界新闻》的另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揭示计件工作为何一直都是雇主对付工人的武器——中,他感觉必须作如下补充:“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将不存在任何剥削,各行各业都实行按劳付酬。”<sup>①</sup>但有时也会陷入牵强附会的逻辑之中,就像他在比较20世纪40年代民族运动与1848年匈牙利革命时所做的那样:

20世纪40年代的民族运动实际上是由一个新阶级即工人阶级领导的,并且由于苏联军队的出现消除了外来的干涉,因此,这场民族运动避免了19世纪40年代的错误。<sup>②</sup>

在1954年,霍布斯鲍姆在《政治季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此文中,他向外界描述了共产党的工作方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始终都在费尽心力地为党内民主进行辩护:

党的政策的讨论,是建立在各级领导层发布的一系列报告、建议和其他材料的基础之上的,这种讨论几乎从没有间断过……过去十年来,在党的基本原则很少出现分歧;然而,现在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大家都普遍地感觉到批评和建议机制是不完善的……因此,在维护党的纪律,特别是这一条例——即少数观点的持有者必须贯彻执行多数人的方针,同时,在党的政策尚未修改之前必须坚决执

---

<sup>①</sup> *World news*, 16 January 1954.

<sup>②</sup> *New central European Observer*, 18 March 1950.

行——方面几乎不存在任何困难。<sup>①</sup>

但两年后，这种惊奇的自满在他面前爆炸了。

### 3. 1956年

1956年英国共产党爆发了一场混乱而又复杂的危机。有些人可能借机幻想摆脱25年之久的墨守成规的党员身份，于是，各种中立和矛盾立场也随之出现了。<sup>②</sup>在这年复杂的争论中，存在三个相互交织的不同问题：(1)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与匈牙利革命；(2)党内民主；(3)共产党与工党的关系策略问题。

霍布斯鲍姆介入了这三个问题的所有讨论。在给《工人日报》的一封信中，他表明了他在俄国入侵匈牙利一事上的立场<sup>③</sup>：

所有社会主义者都应当能够理解，闵真谛的匈牙利(闵真谛是布达佩斯天主教的枢机主教)可能已经成为反革命和外界干涉的基地，对于周边的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来说都将是一个严重而又敏感威胁。

如果我们站在苏维埃政府的立场上，那么，我们应当对其进行干预；如果我们站在南斯拉夫政府的立场，那么，我们也应当赞成干预。

但霍布斯鲍姆接下来附加了各种保留条件：如，匈牙利发生的是人民运动，匈牙利共产党犯了诸多错误，镇压人民运动至多只是一种“悲剧的必然结果”，等等。由此他得出结论：

虽然我们赞同匈牙利现在所发生的事情，但我们的心情却无比沉

---

① ‘The British Communist Party’, *Political Quarterly* 25, no. 1, 1954.

② D. Widgery, *The Left in Britain 1956-1968*, London: Penguin, 1976; R. Miliband & J. Saville, ed.,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76; I. Birchall, ‘The British Communist Party 1945-64’,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1st series) 50, 1972.

③ *Daily Worker*, 9 November 1956.

重,因此,我们也应当坦率地说,我们认为苏联应当尽快从匈牙利撤军。

假如英国人民对我们党的诚意和判断充满了信心,那么,英国共产党就应该公开地表达上述意见;如果他们没有信心,那么,我们还如何指望他们追随我们的领导呢?

如果他们不追随我们的领导,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希望帮助现存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知道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运动呢?

这种既支持俄国人但又觉得内心痛苦的模棱两可立场<sup>①</sup>,与霍布斯鲍姆稍后答复共产党总书记 G. 马修斯时所做的评论是一致的:

我们已经错误地描述了事实,或者说根本没有面对事实,可不幸的是,虽然我们欺骗了少数其他人,但我们也欺骗了我们自己。从根本上说,我指的不是苏共二十大揭示的事实或其他类型的事实。早在赫鲁晓夫发表讲话的前几年,我们当中的许多同志就已经对这些事实,换言之,对这些事实的道德确定性,产生了强烈的怀疑,而马修斯同志对此却毫不怀疑,这使我非常惊讶。当时保持缄默的原因是压倒性的,我们这样做也是对的。不,我们未能真正面对的事实是那些关于英国、关于我们的任务以及我们错误的事实。<sup>②</sup>

霍布斯鲍姆也对党内生活做了一些尖锐的评论。1956年,许多人在反对共产党的官僚集权统治的时候,也彻底放弃了民主集中制。在投给党的争鸣刊物《世界新闻》的许多文章中,霍布斯鲍姆坚持认为“我们党

① 虽然我们并不特别赞同汤普森,但是,霍布斯鲍姆对俄国“心情沉重的”辩护与汤普森的下面这段话形成了鲜明对比:“波兰和匈牙利人民在街道和广场上写满了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也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找回了荣誉。这些革命不是由集智慧和权于一身的某些人发起的,而是由共产主义者即与他们完全相同的共产主义者发起的。斯大林主义的风吹向哪里,共产主义者就会在哪里播下社会主义的种子。人类兄弟的果实将会获胜,那时斯大林主义的风已经逝去。”(Edward Thompson, ‘Through the Smoke of Budapest’, *The Reasoner*, November 1956)

② *World News*, 26 January 1957.



应当坚持民主集中制”，但他也强调应当修改党的某些特殊实践以便使它们更易于接受基层党员的影响；因此应当放弃小组投票；争论应当从讨论发言而不是从已通过的欧洲共产党草案开始；在出版刊物中应多一点讨论；同时，在争论中辩败的少数人在执行多数人立场的同时也有权继续争辩；最后，领导层应当表现出承认错误的意愿。<sup>①</sup>

上述这些都是很好的、实际有效的共识，它们与集权专制的斯大林主义和猖狂泛滥的自由主义——主要特征是关于党内民主的激烈争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把批评党的领导当做党内民主的中心工作具有两大缺陷。首先，可以清楚地看出，1956年底许多党员的行为，如在资产阶级刊物上攻击党，建立宗派性期刊，这些都明显地违反了通常被描述为“民主集中制”的任何东西，这种批评只能在完全特殊的情况下——即当时苏联动用所谓“社会主义”军队去镇压匈牙利工人起义时——才被证明是合法的。其次，霍布斯鲍姆以公开的机会主义言辞为一种更加自由的政体进行了辩护。在以《列宁论党代会》为题的文章中，他指出，列宁赞同在大会尚未召开的情况下组成集团的权利，这一结论是正确的，但无疑也超出了许多党员的意料。不过，他赞成这一论述，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样可以防止党员的流失：

党被分裂了……这将很难避免这种印象，即执行委员会……在操纵代表大会。毫无疑问，这是不正确的。但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一旦这一印象传播开来，甚至将会有比现在更多的同志退党。<sup>②</sup>

在批评党的策略中，霍布斯鲍姆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具有说服力的论

---

① *World News*, 13 October 1956.

② *World News*, 1 December 1956. 霍布斯鲍姆引用列宁来反对自己政党的放肆做法，自然激起了正统派的愤怒。一位长满老茧的苦工的女儿琼·西蒙宣称：“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并不真正知道阶级团结意味着什么，因此，当党无法满足他们的个人需要时，发泄对党的不满在危机时几乎会变成一种职业病。”霍布斯鲍姆被指控为“最虚伪的”，同时也被指控为“只是从书中找一些陈词滥调并机械地把它当做指示教条接受下来”（*World news*, 15 December 1956）。

点。在这里，他批评最激烈的地方在于，党没有遵循广大左派的联合政策所需要的那种逻辑。因此，他论述道，既然党认为工党中的左派发展是重要的，那么，就不应当试图从工党中招募新党员。

我们可以直接地扪心自问：如果我们是积极的工党成员，我们的任务就是组成当地政党，选择候选人，也许会代表委员会，那么，我们还会急切地加入共产党吗？<sup>①</sup>

第二，他指出了党在和平运动中的失利，并把这些失利归咎于宗派主义：

我们没能及早地认识到，我们可以在反对战争和美国好战政策的基础上，而非在与我们的其他观点——如对铁托和苏联政策的理解等方面——达成一致的基础上来动员人民大众。<sup>②</sup>

但霍布斯鲍姆的改革热情现在正在冷却。他在另一篇关于英国政党制度的文章中阐述道，英国的两党制扼杀了民主；但他认为，如果存在一个可靠的支持第三方政党的选举核心，那么，这一情况就会由于群众的压力而得到改变，换言之，共产党的选举策略就能被证明是合理的。<sup>③</sup>

1956年危机严重动摇了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霍布斯鲍姆说，“因为斯大林的关键问题实际上是历史问题”，所以，历史学家们“不论是作为私人还是作为共产主义战士，可以说，都被迫在职业权限上面临这种情况：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所有这些问题都被隐瞒了”<sup>④</sup>。

但是小组分裂了，其中的许多主要成员包括希尔和汤普森等都离开了党组织。虽然小组继续存在了下来，但多年来它在党内的活动却大大减少了。而它的长远结果在于，小组有了新一批相互联系的“同盟者”：共产党之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如爱德华·汤普森、克里斯托弗·

① *World News*, 16 June 1956.

② *World News*, 26 January 1957.

③ *World News*, 9 February 1957.

④ ‘The Historians’ Group’, in Maurice Comforth, ed., *Rebels and their Causes*, pp. 39–42.

希尔,尽管存在某种政治隔阂,直到现在这种隔阂仍然存在,但他们个人间的友好联系和职业上的休戚与共关系都持续保留了下来。

#### 4. 新左派的兴起

1956年危机之后,两个新期刊《新理性者》和《大学与左派评论》创立了。霍布斯鲍姆分别为这两个期刊的第一期投了稿件:投给前者文章客观地描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学术机构对马克思的态度;而投给后者文章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适应于一切的详尽教条,而是建立在共同方法之上的一家之言”<sup>①</sup>。霍布斯鲍姆与叛党者沆瀣一气,这很难令英共中央满意。但他的立场却很简单:他并不想产生分裂,但既然分裂已经发生了,那么,他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维持这种团结。霍布斯鲍姆仍旧是一位人民阵线主义者,但此时的人民阵线主义与原先的人民阵线主义存在一些差异。传统的人民阵线总是对与右翼结盟的新阶层保持开放的态度,却无法容忍来自左派的反对者。然而,霍布斯鲍姆却敏锐地认识到,1956年之后的一段时期,一个新的却无党派的左派——在许多情况下,这是对于共产党自己的左倾分子而言的——出现了,而且它将在左派的最终重组中扮演某种角色。

20世纪60年代,霍布斯鲍姆极为敏感地把握到了对那些将影响下一代左派形成的新事件。他赞扬古巴革命,分析美国的黑人运动,同时也写了一篇预测美国在越南战败的犀利文章。他在牛津召开的第一届越南专题研讨会上做了发言,这个会议是由新兴的革命左派分子主办的,其中包括彼得·宾斯和塔里克·阿里。<sup>②</sup>他甚至很欣赏鲍勃·迪伦:

---

① ‘Dr Marx and the Victorian Critics’, *New Reasoner* 1, 1957; ‘The Future of Marxism in the Social Services’, *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 11, 1957. 前一篇文章后来收录在1964年的《劳动者》文集中。

② ‘Cuban Prospects’, *New Statesman*, 22 October 1960; ‘Crisis in the Ghetto’, *Labour Monthly*, September 1967; ‘Vietnam and the Dynamics of Guerrilla War’, *New Left Review* 33, September-October 1965.

“一位瘦弱的、长相稚嫩的美国歌手，像詹姆斯·迪恩(除了死亡愿望外)——不过比他的头发更卷曲——与霍尔登·考尔菲尔德(但不像他那么没有政治意识)的结合体。”<sup>①</sup>

霍布斯鲍姆将 60 年代的学生运动称为“原始的反叛”<sup>②</sup>。从 50 年代中期开始，他就一直都在从事前资本主义和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社会运动史研究，从农民起义中罗宾汉式的强盗、千禧年主义、前工业城市的暴民到马克思青年时期的革命秘密社团。他把这些运动看做革命传统中令人着迷而又宝贵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他同时也认为，在“前政治”运动和由现代政党比如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共产党领导的运动之间存在一条非常重要的分界线，后者取代了农民抵抗的悠久传统。<sup>③</sup>

1979 年，霍布斯鲍姆在回顾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断言道，尽管它们揭示了“我们本应该注意到的其他方面发生的事情”<sup>④</sup>，但它们却证明了一点，即一个“严格组织的政党”存在的必要性。因此，我们既不支持也不谴责学生造反运动，而是主张通过党的引导之手来予以调控和超越。

早在 1960 年，霍布斯鲍姆谈到美国新学生运动时写道：

这些孩子将走向何方？既然他们才刚刚开始运动，因此下定论就可能显得为时过早，就像在目前这个阶段过分强调他们思想和政治上显而易见的幼稚、迷惑和缺陷一样，都是不公平的。<sup>⑤</sup>

60 年代中期，随着霍布斯鲍姆个人威望的提升和党的可信度的下降，他变得更具批判性。在为《新左派评论》所写的文章中，他犀利地批

① *New Statesman*, 22 May 1964. 该文是用弗朗西斯·牛顿的笔名发表的。对他来说，理解摇滚太吃力了。他把摇滚的吸引力归咎于“幼稚”，并评论道：“常见的摇滚歌迷，除了智力相当迟钝的之外，往往都在 10 到 15 岁之间。”(F. Newton, *The Jazz Scene*, 1961, p. 62)

② *Revolutionaries*, pp. 241–243. 我们在米德尔塞克斯理工学院的一位同事记得，霍布斯鲍姆在一次学生会议上发表演讲，“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原始的叛逆者”，这一言论引来了哄堂大笑。

③ *Primitive Rebel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59.

④ ‘An Interview with Eric Hobsbawm’, *Radical History Review* 19, 1978–1979, p. 116.

⑤ *New Statesman*, 17 September 1960.

评了詹姆斯·克鲁格曼的《大不列颠共产党史》，认为这一著作既不“严肃”也“不够学术”。<sup>①</sup> 1965年，他在马克思纪念图书馆举办的讨论大会的发言中（这一发言后来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为题发表），向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发起了全面的攻击。在这场恳求获得更大开放性的讨论中，霍布斯鲍姆强调指出，自1956年以来，根本不可能再坚持说在共产党之外不存在马克思主义者了。当他质问“如果我们忽略了托洛茨基或把他当做外国的代理人，那么我们如何讨论苏联的历史”时，许多年长的听众一定会感到不寒而栗。他坚持认为：“事实上，今天根本不可能再做出这种简单的声明：只存在一种而且是唯一一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且它只能在共产党中找到，我们许多人就是在这种声明的基础上长大的。”<sup>②</sup>

从根本上说，所有这一切仍是人民阵线主义。然而，1968年风暴瞬间使他放弃了原有的观点。在1968年6月1日，霍布斯鲍姆在《黑矮星》——这是1968年极左分子和学生先锋队的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针对法国事件，他评论道：

法国所发生的事件是不可思议的，是令人着迷的……它是否为其其他国家指明了道路呢？这已经不是巴黎第一次这样做了。我认为它现在可能也是如此。

在他这里，法国共产党只是作为“犹豫不决”的谴责对象被提及。

但这种狂喜很快就变酸了。第二年，他对《新政治家》的读者说：“1969年那些年轻的激进分子的革命观念是，如果在现实中没有坚守住街垒，那么他们至少会制造出类似的噪音，好像他们坚守住了一样。”<sup>③</sup>

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霍布斯鲍姆逐渐对“极左分子”变得不耐

---

① *New Left Review* 54, March-April 1969.

② *Revolutionaries*, pp. 109-120.

③ *Ibid.*, p. 13.

烦。他越来越多地将自己的任务视为纠正左派中散播的各种歪理邪说，捍卫作为真正正统的“共产主义”（即斯大林主义）。因此，他强烈抗议嬉皮士和新左派把切·格瓦拉打造为英雄的各种努力：

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种坚毅的作风，而格瓦拉则使自己成为一个坚强的人。但是在没有纪律、组织和领导的情况下，反叛是没用的。<sup>①</sup>

与此同时，霍布斯鲍姆坚持认为，格瓦拉主义对于拉丁美洲的正统共产党而言并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选择。<sup>②</sup>

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霍布斯鲍姆发现一种更加难以把握的现象，就是妇女运动的兴起。60年代之前，他的著作中充满了各种欢快的大男子主义的评论，如：

因此，对于粉丝而言，爵士乐绝不仅仅只是一种可被享受的音乐，犹如人们享用苹果、酒和女孩一样。<sup>③</sup>

正像有些女人只有在床上才能彻底地成为自己一样，有些男人只有在行动中才能实现自我。<sup>④</sup>

到了1978年，霍布斯鲍姆承认，男性历史学家忽视了妇女问题，这一点理所当然地应当受到批评，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他写了一篇关于19世纪社会主义肖像学中的男女形象的文章。不幸的是，他在这一新领域的探险并不成功，因为他所描绘的妇女的“强大形象”结果被比利时情色画家费西安·罗普斯绘制成了一个相当下流的裸体女人。<sup>⑤</sup>

① *New Society*, 4 April 1968.

② 'Guerrillas in Latin America', in R. Miliband and J. Saville, ed.,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70.

③ *The Jazz Scene*, p. 224.

④ *Bandits*, 1972, p. 115.

⑤ E. Hobsbawm, 'Man and Woman in Socialist Iconography', *History Workshop* 6, 1978, pp. 130-131; Richardson, 'In the Posture of a Whore? a reply to Eric Hobsbawm', *History Workshop* 144, 1982.

## 5. 欧洲共产主义

70年代中期,两个方面的因素使霍布斯鲍姆坚定并加速了右转的倾向。第一个因素是1973年智利的右翼政变。对霍布斯鲍姆来说,这一事件的教训并不是阿连德没有及时地捣碎国家机器,而是在于阿连德行动太快激起了这场政变。“……与‘合法性’相比,对‘革命’的选择并没有真正的发生。”阿连德要求武装力量介入政府方面的社会斗争,结果,这些力量却调转枪头反对他本人。霍布斯鲍姆对意大利共产党的分析表示赞同:

阿连德的失败,并不是单纯地因为他的人民联盟在技术上无法打败军队,而是在于这一联盟脱离了本该与其形影相随的广大群众。<sup>①</sup>

第二个因素则在于欧洲共产主义的兴起。意大利共产党的发展给霍布斯鲍姆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早在1974年5月,他就主张道:

意大利共产党现在称之为“历史性妥协”的东西,实际就是把社会变革的步伐调降到中间阶层中那些潜在的同盟者或潜在的中立分子所能接受的程度。<sup>②</sup>

在1975年和1977年,霍布斯鲍姆对意大利共产党领袖乔治·纳波利塔诺进行了一系列的访谈。在这些访谈中,纳波利塔诺论述道,“在和平条件下,意大利和西欧国家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唯一现实的道路在于民主进程内部的斗争”,这包括广泛的联盟和对社会的逐步改良。<sup>③</sup>霍布斯鲍姆似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当做推销纳波利塔诺的经理人。在英国

---

① *New Society*, 20 September 1973; *Marxism Today*, October 1974 and July 1976.

② ‘Lecture to Birkbeck College Socialist Society’, *Marxism Today*, October 1974.

③ ‘E. Hobsbawm with G. Napolitano’, in G. Napolitano, *The Italian Road to Socialism: an Interview*, London: Journeyman Press, 1977.

共产党中，霍布斯鲍姆似乎已经与欧洲共产主义派系结成联盟。在1979年10月，他与鲍勃·罗松一道加入了《今日马克思主义》编委会，此时，这个杂志开始采用了一种新的修正主义形式，并以一种更加公开的形式成为英国欧洲共产主义的传声筒。

欧洲共产主义加倍欢迎霍布斯鲍姆，因为这样做不仅可以在当前传递出友好的信息，而且还能够与正统重新建立联系。由于很容易将欧洲共产主义看做人民阵线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就像霍布斯鲍姆在70年代一再坚持的那样，人民阵线

不只是一种临时性的防御策略，或甚至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它同时也是一种为了达到社会主义而经过深思熟虑的策略。<sup>①</sup>

## 6. 低迷时期

这种新共产主义是建立在传统之上的，也是对传统的修正；它在学术上不仅开放而且在团结的范围上更加广泛，可是，这种新共产主义的短暂梦想在70年代就破灭了。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欧洲共产主义就陷入混乱之中。意大利共产党已经放弃了“历史性妥协”路线，法国和西班牙共产党遭遇了严重的选举下降问题，与此同时，英国共产党也牢牢地堕入了久治不愈的顽疾之中。除了所有这些之外，工人运动明显处于严重低迷期。值得赞扬的是，当霍布斯鲍姆看到工人运动时，他认识到了某种衰退，完全不像那些过分迷恋工党决议的人。至少可以说，他所得出的结论是令人震惊的。

《工党前进的步伐停止了吗？》最初是1978年做的一次演讲，可以看做一场支持英国欧洲共产主义者反对米克·卡斯特罗等人所倡导的“经济主义”和“转向工业”的辩论。毫不奇怪，霍布斯鲍姆遭到了新斯大林

---

<sup>①</sup> *Marxism Today*, July 1976.



主义者如肯·吉尔和凯文·平等人的尖锐攻击,但同时也获得了皮特·卡特(在1978年早期,他曾呼吁人民游行要“团结主教和泥瓦匠”)的支持。<sup>①</sup>

但是,霍布斯鲍姆的态度经历了如下变化:从批评优于共产党工业策略的“左派演进”路线,迅速地发展为全面的悲观主义。在1982年《西欧左派状况》这篇文章中,他凄凉地描绘了一幅几乎所有西欧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政党全面衰落、颓败的图景。<sup>②</sup>他认为,左派在危机中没有获得任何好处,原因在于

与20世纪30年代不同,今天的左派既不能指出一个免除危机的替代社会(苏联似乎是这样的社会),也无法指出在短期内极有希望克服危机的任何具体政策(当时凯恩斯主义或类似政策似乎给人以这种希望)。

改革和苏联都未能提供帮助。因为工人阶级的自我行动从一开始就被忽视了,此时更是所剩无几。因此,在霍布斯鲍姆看来,随着传统政党的瓦解,工人阶级自身也将会瓦解:

传统社会主义劳动团体的核心即手工劳动阶级今天正在缩小而不是扩大。几十年来,工人阶级的生活标准达到了甚至1939年的高收入者都难以想象的水平,他们已被改变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分裂了。在这种状况下,我们不能再假定,所有的工人都将认识到他们的阶级处境必将使他们团结在社会主义工人政党之下,虽然仍有数百万的工人相信这一假设。

如果左派陷入混乱,那么右派就成功了。在《马岛事件余波》一文中,霍布斯鲍姆为民族主义的复兴感到担忧,他把马岛战争描述为“一次

---

<sup>①</sup> *The Forward March of Labour Halted?*, pp.20-37.

<sup>②</sup> *Marxism Today*, October 1982.

极为辉煌的行动”<sup>①</sup>。在谈到撒切尔夫人的民族主义时说：“我不愿说但我仍不得不说这是半法西斯主义的倾向。”（霍布斯鲍姆显然太明智了，没有迷恋当前这种无知观点，即撒切尔夫人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虽然他知道再也没有比法西斯主义更能复苏人民阵线的方法了。）

最后，既然人民阵线主义就是一切，那么，对失败和低迷的唯一回答就是更广泛地拓宽阵线。霍布斯鲍姆把密特朗赞誉为“极富才干的政治家”，因为他通过“动员一切可能的支持力量来反抗那些不得人心的、反动的、反民主的政体”，并以此取得了政权。<sup>②</sup>（霍布斯鲍姆写这篇文章的时间刚好是在密特朗效仿拉姆齐·麦克唐纳削减失业福利的一个月前）。霍布斯鲍姆坚持认为，大部分英国社会民主党都“属于左派”，因此，社会民主党的分裂可以遗憾地看做“那些长期关注工党的、中间偏左的中间分子的减少”<sup>③</sup>。很明显，社会民主党的吸引力是被作为新人民阵线的一部分来宣传的（尽管我们并不清楚霍布斯鲍姆是否像他的同事即欧洲共产主义者鲍勃·罗松那样也欢迎像爱德华·希思这样的激进的托利党党员）。多年之后，霍布斯鲍姆告诉我们，革命是行不通的，最终他追随了一个在选举支持率上不断下降且无论如何都不愿与共产党打招呼的政党。在他的分析中再也不存在那种可以被合理地描述为“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事实上，把此时他的立场说成传统改良主义的右派更为恰当。这些都是政治现实的苦果。

## 霍布斯鲍姆和工人阶级

### 1. 斯大林主义

霍布斯鲍姆受过斯大林主义的熏陶。这样说并不是随意的，而是经

---

<sup>①</sup> *Marxism Today*, January 1983.

<sup>②</sup> *Marxism Today*, October 1982.

<sup>③</sup> *Marxism Today*, October 1982; *The Forward March of Labour Halted?*, p. 180.

过非常简单的观察得出的结论：他作为共产主义者的头二十年都是在斯大林教条几乎未受质疑的运动中度过的。

成为一位斯大林主义者意味着什么呢？首先，最重要的是对国际运动的归属感，这种国际运动是一场能够动员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工人的运动，是一场先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后再由“几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的运动。

霍布斯鲍姆本人经常唤起作为大众国际运动这种归属感的力量，但其中可能包含某种浪漫主义，就像他回忆“那种奉献感时一样，这种感觉使党在奥斯维辛中都还能让党员用香烟来交纳党费（在一个毁灭集中营中，香烟是极其宝贵的，而且几乎不可能得到）”<sup>①</sup>。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对于这一运动的历史合法性尤其敏感，因此，斯大林主义变成了当代的雅各宾主义。当他在写到罗伯斯庇尔时指出，我们能在其背后感觉到斯大林的影子：

在 1936—1939 年西班牙内战期间，以牺牲无政府主义者为代价来加强共产主义者的过程，实际上是以牺牲赫伯特式的无套裤党人为代价来巩固带有圣茹斯特印记的雅各宾党。<sup>②</sup>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1956 年事件并没有使霍布斯鲍姆系统地批判斯大林主义，而至多只是使他持有一些实用主义的保留意见。他把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阶级分析的任何尝试，都视为“一种文字游戏”而加以抛弃。<sup>③</sup>

然而，霍布斯鲍姆对东欧阵营的信仰慢慢地蒸发了。如果斯大林主义的政治怪胎是建立在一个更好的经济体系之上，那么，吞下这些怪胎还是有可能的。但到了 1975 年，他承认情况并非如此：

我们本以为，衰落的资本主义是完全不能与蒸蒸日上的竞争对手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比以前更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媲美的，但事实却相反。资本主义在生产上超过了社会主义，甚至凭借其技

---

① *Revolutionaries*, p. 6.

② *The Age of Revolution*, London: Peter Smith Pub Inc., 1999, p. 94.

③ Cf. review of M. Djilas, 'The New Class', *The Cambridge Review*, 7 June 1958.

术上的优势和更加雄厚的财富开始从外部重新渗透、融入到社会主义经济之中。<sup>①</sup>

同样地,那种世界运动的意思也已经消退。在与某位意大利共产主义者的讨论中,霍布斯鲍姆说道,他“不确定此时此刻人们是否还能够谈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sup>②</sup>。

然而,霍布斯鲍姆在斯大林时期所获得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宿命论的、机械的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这种马克思主义没有给工人阶级的自我活动留下任何空间。因此,当斯大林主义的确定性消失之后,留下来的只是一个空无,它构成了今天霍布斯鲍姆悲观主义的核心所在。

## 2. 霍布斯鲍姆和英国工人阶级

这一觉醒过程是与霍布斯鲍姆作为学院历史学家的著作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他著作的涉猎范围异常广泛,包括各式各样的主题,比如17世纪封建社会、秘鲁的土地占有和19世纪早期欧洲的秘密社团等。但他对于英国工人阶级史的研究必须被视为核心。在这一领域,他已经获得了最高的荣誉,取得了最为显著的成就,他的政治观点也已经成型并获得了肯定。同时,他这一工作的核心也经历了同样的发展历程,即从战后十年的乐观主义转向80年代的悲观主义。

霍布斯鲍姆处在运动的最前线,这使他在英国大学里为认真研究劳工史赢得了一席之地。虽然他坚持认为,与那些“特别是……在小聚集地、分支地区和各阶级之间通过口头传统传承下来的”、被视为“英雄道德史诗”的神话学相比,这种研究在学术上应当变得更合理、更值得尊重,但他相信承诺也是必不可少的。为劳工运动所进行的研究和写作都应当与可靠的学识结合起来:学院派历史学家的任务应当是“进一步巩

---

<sup>①</sup> *Marxism Today*, October 1975.

<sup>②</sup> *The Italian Road to Socialism*, pp. 96 - 97.

固那些承诺者所赢得的新领地”<sup>①</sup>。

到1974年之前,他可以宣称,新的劳工史学家已经成功地在英国和美国站稳了脚跟。他们“越来越专注于对普通人和领导者、有组织的人和无组织的人、‘保守劳动者’和激进或革命的劳动者的研究”:简言之,就是专注于对阶级而不是对运动或政党的研究。<sup>②</sup>

霍布斯鲍姆许多著作就是这一类劳工史研究的光辉典范,特别是收录在《劳动者》(1964年)这一卷中的文章。例如,他对19世纪早期破坏机器、原始循道宗和英国总工会的研究,就开辟了一片新天地,激励了一代马克思主义劳工史学家。

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来说,在工人阶级研究上却存在一个核心的问题,霍布斯鲍姆始终没有正视这一问题或者说没有对这一问题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关键)只能在某些时刻某些地点得到实现,而在其他时刻其他地点就无法实现呢?解释社会主义失败和改良主义持续存在的原因,对于我们理解过去和现在并制定出未来的战略都是极为重要的。

霍布斯鲍姆对英国工人阶级改良主义的考察似乎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英国“劳工贵族”的各种评论为出发点的。但他相信,收入较高、组织较好且技术熟练的工人阶层的存在,可能除1850—1889年这段时间外,根本不可能为工人贵族的存在提供一种令人满意的解释,于是,在1970年他又饶有兴趣地重新考察了列宁对这个问题的评价。<sup>③</sup>

---

① ‘Commitment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 *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

② ‘Labor History and Ideology’,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7, 1974.

③ ‘Trends in the British Labour Movement since 1850’, *Science and Society* 13, no. 4, 1949; see also *Revolutionaries*, pp. 121 - 129. Cf. T. Cliff, ‘The Economic Roots of Reformism’, *Neither Washington nor Moscow*, London: Bookmarks, 1982, pp. 108 - 117. 霍布斯鲍姆界划并描绘了19世纪工人阶级中潜在的上层阶级的物质条件和政治意向,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他是要为在历史学家中建立的“工人贵族行业”负责的。但这一事实并不能改变如下事实:他认为工人贵族并不是对改良主义的一种充分解释,就像他最近在尽力指出的那样。(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Labour History Bulletin 40, 1980, pp. 6 - 8)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1949年关于《1850年以来英国劳工运动的趋势》的文章中,他相信,改良主义并不能阻碍人民阵线向社会主义进行质性飞跃的可能性。但1963年当他重写这篇文章时,之前的那种乐观主义已经消失殆尽,而是以更为严肃的态度来寻求改良主义继续存在的原因。他提出了三点解释:一是工会斗争和工会意识的“自发性”或“经济主义”,就像列宁在《怎么办?》中描述的那样<sup>①</sup>;二是工会结构已经部分地纳入国家之中(在英国,工人阶级近一个世纪以来都太过强大,因而统治阶级不可能希望他们自动解散,在这里,工人阶级运动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深、更久地陷入到调解和合作的网络之中);三是英国工人阶级的非革命性传统。<sup>②</sup>

在1963年这篇文章中,关于传统重要性的这一段落是值得引用的,特别是对于霍布斯鲍姆所使用的个体心理结构的非凡隐喻而言:

我们需要一种更高程度的政治意识和特殊努力来防止工人运动转为纯粹的改良主义……一场自觉的社会主义运动,尤其是共产党,提供了这一特别因素。如果工人阶级能够在他们形成某些归属感的關鍵发展阶段使自己参与这一运动,那么,工人阶级就具有一种内在保障机制来防止这一运动向改良主义的蜕变……但是,如果工人阶级所参与的运动很大程度上是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模型中形成的,比如英国的情况,那么,工人阶级将不具有这种机制。由工人阶级自发的经验衍生出来的忠诚和理论惯性,将维持传统的归属感——除非发生特别重大的灾难,即便如此,这些灾难也绝不会轻易地迅速地爆发开来——工人阶级也将会带着这些传统归属感。<sup>③</sup>

① Cf. *Revolutionaries*, pp.121 - 129.

② Hobsbawm, *Labouring Men*,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4, pp.316 - 343. 写于1949年的《1850年以来英国劳工运动的趋势》一文的最后几部分在收入该书时被重新改写了。

③ *Ibid.*, p.335.

霍布斯鲍姆多次回到了英国工人阶级自我确证的“传统”上来，例如，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与法国雅各宾主义相比，英国缺少起义的传统。<sup>①</sup>他在攻击“违反事实的”劳工史时表达了全部含义，这样也就使马克思主义史丧失了任何批判性价值，只剩下最陈腐、最肤浅的东西：

历史是指实际发生的事情，而不是指可能发生的事情……现在有时可能性如此之高以至于我们根据某种现实主义就能正常地推测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非可能发生的事情。例如，在评价19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劳工运动的发展时，我们就可以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1920年前后可能会形成一个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取代类似工党之类的东西，因此，我们并不能因为社会民主联盟(SDF)或共产党没有认真地期望将来可能要完成的事情来批评他们，而是要在他们切实能够完成的事情——如在地方政府选举中取得更大的成功——的限度内来批评他们。<sup>②</sup>

为什么霍布斯鲍姆如此确信传统之于英国劳工运动的重负是无法消除的呢？部分是因为他关于英国工人阶级历史的观点是片面的，虽然他的学识非常渊博。他拒绝以“英雄道德史诗”般的风格来从事劳工史研究，并决定把自己的研究重心集中于劳工运动的长期的社会和经济背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也就把一切革命的和近似革命的情况排除在考察范围之外了。因此，他很少谈到工人阶级斗争如宪章运动的最高点、1889—1893年新联盟的高潮、1910—1914年和1919年的战斗浪潮或者1926年的总罢工。

虽然马克思主义者需要理解低迷和缓慢发展时期，但高潮也同样是历史的一部分。为了证明自己片面观点的合理性，霍布斯鲍姆明显地贬

---

① Hobsbawm, *Labouring Men*, pp. 371 - 385.

② Hobsbawm, 'Labor History and Ideology',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 7, no. 4 (Summer, 1974), pp. 371 - 381, pp. 376 - 377.

低了起义因素在如宪章运动中的作用,进而把总罢工界定为“同情和团结性罢工”,而不是界定为马克思主义者在一些欧洲国家领导的支持选举改革的“政治罢工”。<sup>①</sup>(他似乎没有意识到罗莎·卢森堡关于反对在群众罢工中做出这种错误区分的论述。)

但霍布斯鲍姆之所以会否定英国工人阶级的任何革命潜能,也是因为他的作品完全缺少把工人阶级的自我活动当做革命力量的观念。既然工人阶级的自我活动是纯粹“自发的”、“自私自利的”、“经济主义的”,那么,一波接一波的斗争和战斗只能归咎于左派的领导。因此,他对“激进化”时期的界定,依据的并不是工人阶级的自我行动,而是竖立在多数工会之上的“社会主义者的领导”的出现。这样带来的后果就是,他把1957—1962年“左派领导层”在工会中的“崛起”,甚至是在英国运输总工会中对“卡森斯的稍微有些意外的继承权”,放在了与1889—1893年、1910—1914年伟大的武装斗争相同的高度上。<sup>②</sup>

马克思主义对英国劳工运动的贡献,就在于为其提供了“大量的骨干或潜在骨干,提供了大量的领导人和智囊团,而非追随者”<sup>③</sup>。“社会主义联盟留给共产党最主要的遗产就是工人阶级精英和先锋队的传统,而非群众运动的传统:即有思想的、爱读书、富有战斗性的工人——他们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了社会主义事业上——的传统,而不是普通人的传统。”<sup>④</sup>考虑到英国工人运动的非革命的本性,这种左派先锋“在运动中一直都具有某种现实的功能,虽然是非革命性的功能,换言之,就是使改良主义成为更加积极有效的改良主义”<sup>⑤</sup>。

①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Labour History Bulletin* 45, 1982, p. 6; *Labouring Men*, p. 381; 'May Day 1926: Nine Days that Shook Britain', *Comment*, 2 May 1964.

② *Labouring Men*, pp. 327-328, 332. 弗兰克·卡森斯继位过程中的突发因素是其前任的突然死亡。

③ *Revolutionaries*, p. 105.

④ *Labouring men*, p. 236.

⑤ *Ibid.*, pp. 332-333.



因此,霍布斯鲍姆努力地做那些被他看做历史“必然性”的事情,并用一种永久的人民阵线主义代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观点,结果,原先的马克思主义干部现在成了工党左派和工会骨干。

### 3. 政党与阶级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非常强调研究普通民众而非领导者的重要性。同时,作为一名终身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也清醒地认识到了党组织的必要性,他时常提醒我们说,没有纪律任何革命都不可能实现。但他所使用的党的概念似乎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斯大林主义的扭曲。在列宁主义传统中,政党应当组织阶级中的少数积极分子,为了争取大众组织如工会或苏维埃的阶级领导权而战斗。前者不会取代阶级,或者说,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夺取政权。而斯大林主义却彻底地埋葬了这一传统。在东欧,共产党占领了国家机器,但工人阶级却没有积极地参与进来;而在西欧,大量的党员将自己描述为“工人阶级的党”,结果,模糊了党和阶级之间的差别。

霍布斯鲍姆的许多著作都存在着这种模糊。因此:

事实上,众所周知,社会主义的胜利已经导致了党向国家的转变,反过来,党向国家的转变也促使社会主义取得胜利……<sup>①</sup>

并不是工人阶级本身夺取政权并执行领导权,而是工人运动和党,(除了采用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外)很难看出这有什么别的解释。<sup>②</sup>

从这个观点来看,苏维埃(显然霍布斯鲍姆任何时候都没有谈到)必然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冒险行为。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实际上利用

---

<sup>①</sup> *Marxism today*, July 1977.

<sup>②</sup> 'Class Consciousness in History', in I. Meszaros, ed., *Aspects of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London:Routledge & K. Paul, 1971, p.17.

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也理所当然地被许多当代社会民主党员斥为“无政府主义”。显然，霍布斯鲍姆是赞同他们这种做法的。<sup>①</sup>

但必须承认，霍布斯鲍姆也意识到了党取代阶级的某些危害性：

在左翼讨论已经为“替代主义”进行洗礼的极端事例中，运动取代了阶级，党取代了运动，而官员机构取代了党，（经正式选举的）领导层又取代了官员机构，在众多著名的历史事例中，官方授意的总书记或其他领导人则取代了中央委员会。<sup>②</sup>

实际上这是托洛茨基《我们的政治任务》一文中的一段话，虽然霍布斯鲍姆不屑于让他的读者注意到这一段。但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工人自我组织和工人民主的观念，因此，他根本无法解决托洛茨基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

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那样，霍布斯鲍姆关于党的替代主义论点必然导致一种宿命论的历史观。对于任何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而言，巴黎公社都可能被当做这一时代的制高点，而他在《资本的年代》中却只有极少悲观色彩的段落涉及这一历史事件。他告诉我们，马克思

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一次尝试即巴黎公社的态度是极其谨慎的。他并不认为，这次革命会有丝毫的成功机会。它所能取得的最好结果就是与凡尔赛政府达成协议。在这场必然失败的运动结束后，马克思为此写了一个极为感人的讣告，但这本伟大的小册子（《法兰西内战》）的目标是为了教导未来的革命者，从这一点来看，马克思成功了。然而，在巴黎公社的实际进行中，国际组织也就是马克思却始终保持沉默。<sup>③</sup>

实际上，这是对事实的一种歪曲。当时至少有 29 个国际组织成员被选

① A. Rosmer, *Lenin's Moscow*, London: Pluto, 1971, p. 46.

② Meszaros, *Aspects of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p. 16.

③ Hobsbawm, *The Age of Capital*,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7, p. 140.

入公社,因此,决不能把马克思等同于国际组织;同时,大部分的论述表明马克思当时尽了自己一切所能,试图在公社运动期间同巴黎所进行的活动保持密切联系。<sup>①</sup>

#### 4. 经济主义

如上所述,在霍布斯鲍姆关于工人阶级的过去和现在的讨论中,存在一个不变的主题,就是坚持认为工人阶级斗争会受到自发性的严格限制,即他常说的“经济主义”的限制:

一场运动并不因为它战斗的或甚至是由左派领导的,就具有很小的经济主义和狭隘性。自1960年以来罢工运动的最高涨时期——1970—1972年和1974年——都是这样一些时期,即纯粹为了工资而进行的罢工占据了所有比例的最高值,在1971—1972年超过了90%。坦率地说,正如我之前试图表明的那样,实际上工会的经济主义意识有时候会使工人之间相互斗争,而不是建立更为广泛的团结同盟。<sup>②</sup>

当然目前这一立场有着完美的证据。列宁对于“工会意识”的分析就是一个明显的来源,同时葛兰西——即那位为欧洲共产主义者所钟爱的古怪乏味的葛兰西——也可以被引用来为如下观点辩护:“甚至最激进的工会主义也仍是资本主义社会附属产物的一部分。”<sup>③</sup>

当然,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必然赞同一点,即单纯的经济斗争决不可能粉碎资本主义,为此必然需要一个为社会主义理想而战斗的政党。但尽管如此,霍布斯鲍姆的批评依然冒着把小孩与洗澡水一起倒掉的风

---

① M. Winock & J.-P. Azéma, *Les Communistes*, Paris: Seuil, 1964, pp. 182 - 183; Y. Kapp, *Eleanor Marx*, Vol. I,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 London: Virago, 1979, pp. 125 - 128.

② *The Forward March of Labour Halted?*, p. 18.

③ *Marxism Today*, July 1977.

险。他的那种等同论再次缺少了工人阶级的自我活动。因为如果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其自身的任务，那么工人阶级自我活动的任何形式，不论多么有限，都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大多数的工人最初都是围绕着与他们自身有关的剥削问题如工资、工作条件等等才加入这场运动的，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当然，现在革命者的任务就不仅仅是为他们鼓掌欢呼，而是通过集聚、联合抵制、尊重（工会派出的）纠察员等方式寻求团结，以普遍地动员他们。许多工会官员作为既得利益者会阻止斗争的普遍开展，使“诸多外部因素”逃脱纠察防线，这也是完全正确的。这一切都提出了许多战略问题。但如果这些斗争一开始就被当做“经济主义的”而不予考虑，那么，那些战略问题甚至就不会被提出来。

因此，霍布斯鲍姆的著作，不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似乎都经常缺少斗争意识，没有意识到甚至在小范围的局部争端中所蕴含的潜在可能性。结果，在1972年一次关于“工厂工人代表”的广播中，霍布斯鲍姆评论了当时正在进行的码头工人罢工运动：

在这场码头工人的争论中，无法忽视的事实是，有两帮工人都力图使对方失业。在这种境况下获胜的那一帮未必就是最能代表工人阶级或国家的那帮：他们只是最强大的而已。<sup>①</sup>

从这种悲观的解释中人们很难猜到，这个争论还涉及五名码头工人因为非法纠察而被拘留，同时，这种团结展示的结果迫使英国劳工联合会下令发动总罢工，也迫使保守党政府虚构了一个合法借口，释放了那五位工人。

用霍布斯鲍姆的话来说，拒斥经济主义的逻辑是彻底改良主义的。

---

<sup>①</sup> *The Listener*, 27 July 1972. 在更小的范围内，我们可能会注意到，1973年正值伦敦迪龙斯大学书店店员罢工时，霍布斯鲍姆走近并要求跨越警戒线，因为他需要一本非常重要的研讨会用书。工人花了20分钟时间才说服他，不让他跨越警戒线，然后他离开了，并没有主动提出在伦敦大学分发集合单，而是告诉纠察人员说，店员是非常“难于组织的”（毫无疑问，他们早就知道了）。（目击者报道。）

一方面,它导致了如下情况,在这里,既然工人选举的代表可以替他们行事,那么他们本人就一味地被要求保持被动状态(如意大利共产党要求工人所做的经济牺牲)。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工人控制”的观念完全是根据劳工运动之外的情况来写的。因此,在评论普里比切维奇的著作《工人代表运动与工人控制(1910—1922)》时,霍布斯鲍姆论述道:

普里比切维奇清晰地表明,对于好战的激进分子和普通人而言,“工人控制”是不现实的。除为了工人阶级利益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外,好战的激进分子并不知道“工人控制”的任何其他含义。大部分激进分子最终转向了共产主义,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他们真正关心的是阶级权力。而普通成员也不会关心“工人控制”的含义,只要它能够在车间环境的确定中给予他们的代表以更大的发言权。口号已经随着那些年的激进运动消亡了,至今都不复存在。关于“工人控制”本身,普里比切维奇先生也是非常明智的。他认为(a)“工人控制”决不可能代替分级管理和决策;(b)工人控制也不可能通过工会来执行。<sup>①</sup>

## 5. 民族主义

在前面的部分中,我们可以找到霍布斯鲍姆对于民族主义奇怪的矛盾立场的一些线索。他作为一个长期背井离乡的中欧人,能够流利地说好几种语言,在他的亲身经历中,并不存在他所倾向的那种东西,即爱德华·汤普森有时倾向的那种伤感的民族主义。如他1969年写道:

我是一名逃亡者,如果没有一本合法的护照和足够的现金使我能极短的时间内到达最近的合适国家,这种流亡的经历仍会使我隐约地感到不安。比起那些普遍把公平权利和公民自由当做首要

---

<sup>①</sup> *New Statesman*, 20 June 1959.

问题的人们来说,我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内在地理解肯尼亚的亚洲人的处境,也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内在地感受到英国移民官员所带来的恐惧。<sup>①</sup>

但是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国际主义与资本主义客观的国际性质的现实脱节开来,也完全与国际主义中工人阶级的客观利益相分离。更确切地说,国际主义成为一个策略问题。它意味着要忠诚于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组织。事实上,自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发生以来,“国际主义”这个词在大多数共产党那里就成了亲俄政策的一个代名词。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已经成了共产主义者与更广泛的群众联系的一种手段: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共产党所推崇的“民族传统”,或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特别关注的“民族文化”。

在此背景下,我们就能够在霍布斯鲍姆的文章中看到矛盾的发展过程。一方面,他已经做了非常有价值的工作,揭示了民族主义的起源。他提醒我们,在19世纪,民族并非“不是一个自发发展的结果”,而是必须被建构的“人为产物”。<sup>②</sup> 在1977年,在评论汤姆·奈恩的《英国的分裂》时,霍布斯鲍姆警告说:“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真正的危险在于引诱人们把民族主义当做意识形态和纲领来加以欢迎,而不是现实地引导人们把它当做事实接受下来。”然后他以列宁的话来结尾:“不要把民族主义涂红了。”<sup>③</sup>

早在1952年,霍布斯鲍姆就曾写过一篇题为“英国历史上的反战斗

① *New Society*, 2 October 1969.

② *The age of Capital*, p.117.

③ *New left Review* 105, September-October 1977.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主义甚至已经扭曲了霍布斯鲍姆作为历史学家的最好工作。因此在《工业和帝国》(1968年)中,国际主义视角的缺乏使他不能对19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的衰退”给出一个适当的解释。奈杰尔·哈里斯把这一结果的典型特性描述为“幼稚的民族主义与它不可避免的补充物民间说教的经济学”的一种结合(*International Socialism* [1st series], No. 36, 1969)。这种经济学仍是英国最现代的经济学史,这揭示了竞争的贫困。

争”的文章,当时正值英国军队在朝鲜战斗。这篇文章考察了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的反战运动,他总结道:

本文特意强调了过去 150 年来或者说英国历史上所有反战运动的优点,而不是缺点。这样做是因为今天它对于增强我们对自身力量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正如詹姆斯·康诺利在 1914 年所说:“我们的祸根在于我们相信自己是软弱的。其实我们并不弱,我们是强大的。”<sup>①</sup>

我们如何解释这一事实,即这样一位在冷战最为严酷时期抱有必胜信念的有识之士,却在一些小的战争如马岛战争之后完全走向了反面观点呢?唯一的原因,似乎是当时霍布斯鲍姆相信“社会主义”阵营坚不可摧:现在他没有参照的选择点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他已经抛弃了原来的观点。霍布斯鲍姆已不再相信工人阶级是客观的国际主义者了,现在他所剩无几的信念放在了受启蒙的中产阶级的身上:

我不愿说这是受教育者与未受教育者的一种分裂;但事实确实如此,我们能够在优质报章上,当然包括《晨星报》,发现反对撒切尔主义的主要坚持者。<sup>②</sup>

几乎没有证据能证明上述断言;当然,我们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也没有尽力考察与休·科克里尔的著名文章《战争和工厂》<sup>③</sup>相类似的问题,后者分析了各种工作场所的意识水平,并评价了为国际主义路线而斗争的诸多问题。但当时,这类文章只有在工作场所从事组织工作的政党构架内才能被创作出来。

---

① *Communist Review*, October 1952.

② *Marxism Today*, January 1983.

③ *Socialist Review* 7, 1982. 表明霍布斯鲍姆的评价是错误的另一更小的迹象是,1983 年 2 月份,牛津大学学生俱乐部投票显示,它愿意为国王和国家而战。可就在前一天,广播一台的电话访谈清晰地显示,大部分人都不愿意为国王和国家而战。

相反，霍布斯鲍姆却过于草率地做了那些非做不可的事，可他却没有证明这些事为什么是非做不可的：

就像反法西斯战争非常明显地表明的那样，在真正的人民战争中，爱国主义的联盟证明其政治上正在被极端化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迈克尔·富特之所以受到指责，可能是因为他对1940年“丘吉尔式的”记忆、英国的孤立无援、反法西斯战争和所有其他事情考虑得太多了，很明显，这些反响也存在于工党对马岛战争的回应中。但我们不应忘记，我们“丘吉尔式”的记忆不只是爱国主义的光辉记忆，而且还是反抗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胜利记忆：是劳工胜利和丘吉尔失败的记忆。在1982年想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但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我必须提醒你们注意这一点。把爱国主义完全抛给右派是非常危险的。<sup>①</sup>

在这篇言辞激烈的演讲中很难理出确切的逻辑。或许《晨星报》使用的标题“GTOCHA!”比《太阳报》的更大，广泛的民主联盟就有可能在大选中获胜。但不管怎样，这怎么看怎么像“把民族主义涂红了”。

## 6. 历史客观性的限制

霍布斯鲍姆经常试图利用他巨大的学术威望来支持他的政治判断。他提醒我们他是“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来言说的，并反复地以此支持自己的主张。在讨论过去的作品中，他的学识是可靠的（但不是绝对可靠的，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他的许多观点都有翔实的证据加以巩固。但是，当他冒险进入现在时，他的虚假的客观性经常被认为是纯粹的印象主义而已。

事实上，霍布斯鲍姆也经常承认他的判断中存在着印象主义的痕迹。因此：

---

<sup>①</sup> *Marxism Today*, January 1983.



完全不存在测量阶级意识即社会主义意识的最高程度的简单方法。但是,如果我们把所有社会主义组织的积极成员——完全不同于工会的激进主义——当做一个粗略的标准,那么我就能猜测到,20世纪50年代初之后的一段时间阶级意识呈现某种下降趋势,大概在60年代后期就破碎了。①

对于一个知道在1869年欧洲大陆的电报线路有多长的人来说②,猜测是一个薄弱的证据来源。但《马岛事件余波》这篇文章更糟;在那里,他告诉我们阿根廷的入侵引起了“一种近乎普遍的愤怒感”。

我们如何知道呢?

我认为,这是一种能够被实际感受到的公众情感。任何对这种情感共鸣敏感的人都知道这种情感正在蔓延,而任何没有意识到这种草根情感的左派成员,以及没有意识到这种情感决不是媒体的造物,至少在现阶段还不是,而是一种真实的愤怒和耻辱感的人,都应当认真地重新审视自己评价政治的能力。③

我们当中最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不得不依靠“情感共鸣”,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答案只能存在于上面展开的论述中,即共产主义运动——霍布斯鲍姆长期以来都是这一运动的一员——现在已经支离破碎、无法恢复了。革命党的任务之一就是使我们准确地把握变化的情绪和意识类型,就像布莱希特写的那样:

个人只有两种情感共鸣

而党则有着一千种

既然英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各种团体的小联盟,那么,它就不再

---

① *The Forward March of Labour Halted?*, p.16. 强调为我们所加。——卡林和博查尔

② *The Age of Capital*, p.76.

③ *Marxism Today*, January 1983.

能够扮演这一角色了。

于是，霍布斯鲍姆试图把握当代现实的努力也经常变得不切实际。由此他郑重地劝告我们：

工党的未来和向社会主义的发展取决于动员那些记得甲壳虫乐队解散日期的人们，而不是那些记得沙特尼纠察队日期的人们。<sup>①</sup>

这段话写于1981年。当时斯卡复兴乐队的唱片《鬼城》在暴乱席卷全国的那个月里升到了排行榜首位。霍布斯鲍姆却仍回到了他60年代那种可爱的拖把头造型。霍布斯鲍姆关于工人阶级日益萎缩的论文到处都被讨论。<sup>②</sup> 很容易看到，他忽略了黑人和妇女在劳工运动中日益增长的作用，没有分析白领工人在工人阶级中的角色，也没有从全球范围而不是国家范围来考察工人阶级。

但在这背后存在一个更为根本的要点。霍布斯鲍姆现在看到的正在消失的工人阶级实际上从来都不存在；它只是斯大林时代的一个神话。与其说霍布斯鲍姆是一位预言家，还不如说是一个受害者，是把马克思主义歪曲到面目全非的那个时代的产物。但我们仍然能从霍布斯鲍姆这位历史学家那里学到很多东西，虽然他的著作需要一种比现在所受的评论更具批判性的评价。但如果把他作为当今斗争的向导，那将是非常不明智的。

（冯潇 译 孙乐强 校）

---

① *The Forward March of Labour Halted?*, p. 181.

② Steve Jefferys in *The Forward March of Labour Halted?*, pp. 103 - 113; D. Hallas, 'Is the Class Contracting?', *Socialist Review* 10, 1982; C. Harman, '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Socialist Worker*, 16 April 1983.

## 7. 作为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拉尔夫·密里本德

列奥·潘尼奇

在国际左派阵营中，拉尔夫·密里本德就像一座灯塔。他集中体现了一个创造性的独立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究竟意味着什么，而且在确定批判事业的主题这个问题上，他也一直发挥着领导作用。他与1956年后英国新左派的涌现以及随后数十年间马克思主义学术的繁荣活跃，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像爱德华·汤普森在社会史或雷蒙·威廉斯在文化研究中一样，拉尔夫·密里本德在政治学研究中也发挥了领导作用，一方面是正本清源，另一方面是奠定基础，这种基础就像他自己曾经说的那样，是“一种长期缺乏的，也就是说作为政治学研究的根本导向的、批判性的和非神秘化的方法”<sup>①</sup>。对于我们而言，如同汤普森、威廉斯一样，密里本德所实践的是一种富有想象力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这使我们获益匪浅。当代许多指责认为，经济主义、决定论或者极权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所固有的东西，而密里本德的实践则证明，这些不过是最拙劣的陈词滥调、最粗鲁的滑稽模仿的一种复归。

---

<sup>①</sup> 密里本德的《危机时代的政治教学》是其1974年10月7日就任利兹大学政治系主任的就职演讲（Ralph Miliband, 'Teaching Politics in an Age of Crisis',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Review*, Volume 18, [1975], p. 145）。

与此同时，也许比我们这个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贡献更多的是，拉尔夫·密里本德一直致力于证明保有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前景的必然性，并通过建构一种替代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新社会主义，探寻促进这种制度实现的可能性。他的这种社会主义实践方案既没有受到列宁主义也没有受到工联主义的拖累。即便是遭到诸多政治失败以及近年来左派知识分子遭到谩骂、纷纷逃避的情况下，他仍然坚定不移地坚持这种主张。

我认识拉尔夫·密里本德已经 27 年了。他是我的老师和论文指导教师，后来一度成为短暂的学术同事，过去十年我非常荣幸地和他一起担任《社会主义纪事》的主编。我们成了非常好的朋友。1962 年，他写文章缅怀 C. 赖特·米尔斯，沉痛哀悼自己的好友去世。现在，我终于体会到拉尔夫本人当时的感受了。我不想单独撰文评价他的工作。但是，我想我一定要写写他的为人为学。<sup>①</sup> 这就是我要在这里做的事情。我会适当引用他自己的话，包括引用他的一些现在不太容易找到的著作中的话，以及那些理解和赞赏他的人的观点。

### 从布鲁塞尔到海格特：一个年轻人的个人朝圣

1983 年，拉尔夫亲笔写了一份八页笔记（本来打算写的政治自传）。我们从中可以了解他早年生活的辛酸以及父母给他的持久影响。他 1924 年出生在布鲁塞尔一个波兰犹太移民家庭，除了 1937 年到巴黎短暂拜访过亲戚外，拉尔夫在布鲁塞尔度过了生命中的第一个 15 年。他们家在布鲁塞尔的圈子都是些地地道道的犹太移民：他们共同的语言是意第绪语（他们仅仅接受了那种语言的初等教育），大部分人会说一些糟

---

<sup>①</sup> 密里本德论米尔斯的文章第一次出现在 1962 年的《新左派评论》和《每月评论》上（Ralph Miliband, 'C. Wright Mills', G. William Domhoff and Hyt B. Ballard, ed., *C. Wright Mills and the Power Elite*, Boston: Beacon Press, 1968, p. 3）。

糕的法语。这些移民密切关注的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连同他们自己在波兰和俄国反犹主义中的经历,共同增强了一种孤立文化。这种文化反映了这样一种感受:“在外边的世界里,犹太人或多或少被敌视,至少被怀疑,得不到信任甚至理解。”<sup>①</sup>

尽管置身于战争期间的这种犹太移民文化,但拉尔夫的父母拒绝被这种文化禁锢。他母亲波兰语非常好,这在圈子中“极为罕见”。在圈子中“最不寻常”的是,她是“一战”后来到比利时的年轻未婚女性,自学的法语也相当好,而且也突破了那种把犹太移民和非犹太世界隔绝起来的障碍。“她天性开朗,爱和人交往……她可能第一个在我的精神中培养了一个概念,就是我一定要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以后学有所长的人,其实就是律师。”

不过,是他的父亲——一个典型的地地道道的犹太人皮革工匠——使他对政治产生了兴趣。拉尔夫年轻时成为律师的自我想象实际上源于他父亲对一个巴黎(犹太)律师迈耶·亨利·托雷斯的喜爱,通过新闻报道,年幼的密里本德见识了托雷斯在诸多重要案件中的表现。12岁的时候,拉尔夫就和他父亲一起密切关注法国政治,他们甚至“一起正儿八经地讨论法国每天发生的事件,政局的变化,这个那个领导人的优劣”。事实上,他们关注的对象是法国政治而不是比利时政治,与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列奥·布鲁姆有很大关系,后者于1936年成为人民阵线政府的总理。

我的父亲没有坚定的政治信念,但肯定是左派,虽然是以一种游离的方式。“一战”刚刚结束后的一个短暂时期里,他曾是华沙的波兰社会党的积极分子。我家的政治氛围是通常而宽松的左派:无法想象犹太人,我们这种犹太人,一个犹太出身的工匠,个体经营的,贫穷的,说意第绪语的,没有被同化的,没有宗教信仰的工匠,竟

---

<sup>①</sup> 参见名为“政治自传:第一手稿”的笔记,标注的时间是1983年4月7日和5月22日。

然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且是非教条的。右派大多反犹，左派很少或者根本就不反犹——毕竟布鲁姆是法国总理。

尽管记得母亲因为他了解政治而自豪，以及父亲赞同他的观点，不过，至少在近年来回顾自己的年轻时代时，拉尔夫并不认为自己具有特别的政治意识。虽然那时他已经阅读了许多法国经典文学作品，但是他记得在15岁之前没有读过任何一本政治著作。只是由于想和他最好的朋友（后来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因为宣传托洛茨基主义而被杀害）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1939年15岁时，他才不情愿地加入了平生第一个政治组织：犹太复国主义左翼青年组织“青年卫士”。正是在这种语境中，他“发现了《共产党宣言》，尽管不是以一种盲目的被迫方式”，并参与了“关于世界时局的讨论”，这种讨论以伦敦城和张伯伦为反面典型。

1940年5月16日，拉尔夫和他的父亲在纳粹入侵前徒步逃离布鲁塞尔。他们一直走到奥斯坦德，原本想逃往尚未被占领的法国，后来改乘最后一艘船到达英国的多佛。拉尔夫的母亲和妹妹则想办法躲藏在战前认识的一个比利时农家而避开了纳粹的魔掌。在这个农家及邻居们的保护下，战争期间，她们和另外18名犹太人就一直隐藏在那个距离德国军事基地仅数公里之遥的村庄里。

拉尔夫和他的父亲于1940年5月19日到达了英国后即前往伦敦。在那里，他们先是短暂寄居在奇斯威克一个犹太商人家里。后来，他们以难民的身份向一个女房东租了一间房子，房租和几先令的餐费由市政厅的公共基金提供，直到他们找到了一份从炸毁的房屋里搬运家具的工作。1940年夏，即到达英国之后只有几个月，16岁的密里本德有了另外一次决定命运的旅行。从拉尔夫43年后的描述中，我们了解到令人恐惧的1939—1940年对于他来说究竟是怎样一段集中的政治沉思期：

我独自来到海格特公墓马克思墓前进行个人朝圣，那时埋葬马克思的地方依然简朴，有一块不大的石碑，而不是现在的巨大纪念

碑，显然，这个地方现在已经被斯大林主义玷污了。那是一个非常炎热的下午。公墓彻底荒芜了，天空蔚蓝，艳阳高照。我记得我站在墓地前，握紧拳头，暗自发誓我将忠于工人事业。我想不起来确切的模式，但是我对其中的要点确信无疑；我认为自己是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或是共产主义者——确切的标签没有什么意义。我不知道自己在行动中有多忠实地遵守了誓言：我确信我应该做得更多，而且永无止境。但是，从那一天起，我从没有放弃这个信念：这是正义的事业，我属于它。

多少年之后拉尔夫幽默和诚实地指出年轻时的誓言绝非自我欺骗。他站在工人一边，但是：

另一方面，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方面，我无意成为一名工人。在这里，我已经接受了母亲的期望，她相信我可以在体力劳动之外往更高处发展……当秋天伦敦遭到轰炸的时候，我们（即拉尔夫和他的父亲——作者注）开始工作，即从炸毁的房屋里搬家具，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虽然我们5~6个搬运工的头头和卡车驾驶员（除了我们之外所有的英国人）相信起码可以做得更好，在午饭后，车停在奇斯威克的高街后，我们去电影院，汉默史密斯的高蒙或康莫的下午场电影，或以其他方式打发时间，比如去英国皇家植物园转转。不过，我们工作起来还是很辛苦的；当然，我们也发现了中产阶级的吝啬、势利和友好；我还在这些特定的非熟练工人阶级身上看到了那种友善、狡猾和冷漠的奇妙混合，对主人，他们装作顺从，实则鄙视。

但我清楚地记得我所感受到的他们和我之间的距离，不仅是因为我是犹太人或比利时人或难民，而且是因为我是一个成长中的“知识分子”，这绝对不是我自封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感到自己在精神上和政治上比他们优越。尽管我学得很快但英语还是不够

好,而且我的身份是一个彻底的“非知识分子”。但我一定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感受到了那种差距。也许是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观点不合时宜,以及对他们不太有把握,我从来没有和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讨论政治。

不久以后,他的正在成长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变得更为可靠。他尽可能多地待在奇斯威克公共图书馆,阅读《工人日报》和其他一些早报、《劳动周刊》和《基辛档案》,正是在那里,他读到了哈罗德·拉斯基的著作。既然和(拉尔夫此前从未知晓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联系上了,所以他申请做拉斯基的学生,而且令人非常吃惊的是,居然被接受了。拉斯基对他的影响是直接而持久的:“他的学识,他的睿智,他对学生那么和蔼可亲,居然认识那么多大人物和权贵,这让我这个 17 岁的学生十分着迷。”<sup>①</sup>在皇家海军服役三年后,拉尔夫回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继续研究,和拉斯基的关系十分密切,直到 1950 年拉斯基 56 岁英年早逝。当他在做《法国大革命时期(1789—1794)的大众思想》博士论文的时候(他是为了完成博士论文而苦熬多年的研究生之一),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得到一个初级教职。在那里,他一直待到 70 年代初(其间曾到芝加哥的罗斯福学院有过一次短期任职,后来芝加哥的黑人市长哈罗德·华盛顿就是他那个时候的学生之一)。

## 政治学教师

拉尔夫·密里本德是一个伟大的老师,但是他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关系长期以来却非常不愉快。与它显现的声望相比,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始终不是一个非常激进的地方。在战后那些年里,任命教职通常要考虑改变那种激进的声望。密里本德认为,对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系

---

<sup>①</sup> Ralph Miliband, 'Harold Laski: An Exemplary Public Intellectual', *New Left Review* 200, July-August 1993, p. 175.



来说,拉斯基的英年早逝是“一个严重的打击,至今也没有复元,或者我可以更准确地说,从那以后根本不允许它复元”<sup>①</sup>。拉尔夫以一种特有的幽默把战后政治系大多数老师传统的狭隘视野,比做多萝茜·帕克尔在一出喜剧里所描写的“人类情感运行的全部范围就是从A到B”。这就是当时的思想风气:把重大的问题从“严肃的人的严肃思考”中排除掉,“所谓严肃的人就是那些不会提出这样问题的人……政治系的其他老师,在听到对英国现有统治阶级的批判性观点时,会立即反驳说:不是这样的,而且它的好的一方面是……”<sup>②</sup>。

密里本德不是那种愿意将就同所谓“学术共同体”中的同事之间差异的人。就像1972年他在利兹大学政治系主任的就职演讲中公开提出的那样,他“非常具有多疑精神”<sup>③</sup>。在对待1968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出名的学生造反问题上,他的同事的反应让他有了这种看法。<sup>④</sup>他当时对学生给予了有原则的但是冷静的支持,而学院也因为学生运动整个学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被关闭了,他感到了大部分同事对这件事的反感:

急躁、愤怒、生气、害怕、蔑视,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显得完全不可理解,不管如何,这些人至少被认为是有兴趣于社会现象的研究和理解的。在不同的传统和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管理者和教师不理解他们的造反学生关心什么,也不打算去真正地了解。他们沉迷于成见之中,这些成见和学生有时形成的成见一样粗鄙。

值得注意的是,在米尔斯逝世后不久撰写的评论文章中,密里本德准备

---

① Ralph Miliband, 'Teaching Politics in an Age of Crisis',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Review*, Volume 18, 1975, pp. 129 - 130.

② *Ibid.*, pp. 136 - 137.

③ *Ibid.*, pp. 139 - 140.

④ 拉尔夫在这种语境中特别喜欢讲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家罗宾斯爵士的那个有名的故事,当时后者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院长。在反驳一群质问他的学生时,罗宾斯声称学生们“在俄国不会过得更好”。对于密里本德来说,这个评论证明了“激进者并没有特别认识到,俄国并不是一个模式,而是一个反模式,是一个社会主义不是什么的重要例子。”(*Ibid.*, p. 145)

批评 C. 赖特·米尔斯,他认为米尔斯关于知识分子的进步作用的信念存在错位,即:“一个自由的人有义务帮助其他人获得自由。如此浪漫天真的观点是令人尴尬的;它构成了威胁。难道不是他自己在学术伙伴中树立了敌人吗?”实际上,就有时候在学术伙伴中引起的敌意而言,可能很少有人会去在密里本德和米尔斯之间做出选择。差别在于,就像密里本德所说的那样,米尔斯“站在左派一边但不是左派,他是一个孤独的游击队员”<sup>①</sup>,而密里本德总认为自己属于一个知识分子共同体。他可能是如最近有人给他的赞语中所说的“英语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sup>②</sup>,但是政治学协会当然不构成他所谓的共同体;他感到自己所属的共同体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共同体,这个共同体足以包括那些虽然从未上过大学、但至少在劳工运动中的人。

拉尔夫发现自己在发展共同体方面的各种作用是在大学之外,但是他强烈地觉得有义务在大学中培养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当他和利兹大学校长会见的时候,校长鲍耶尔爵士(前保守党内阁总理)问他对于政治系以后有什么抱负,他立即回答说,他想让它成为欧洲最好的社会主义政治系。如果说鲍耶尔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吓得收回成命,那是因为他有一种撒切尔夫人所鄙视的、保守党人固有的文明而大度的“错误”的行为做派,能够辨别出拉尔夫主张中显而易见的正直:“教政治,如果他是左派的话,要对构成社会主义议程的所有事情的有一种不妥协的追根究底的精神,以及对每一种规划、每一个文本和每一个历史图景和当代图景有一种不妥协的追根究底的精神。毕竟,马克思说过他喜爱的名言是‘怀疑一切’。”<sup>③</sup>

① Ralph Miliband, 'C. Wright Mills', G. William Domhoff and Hyt B. Ballard, ed., *C. Wright Mills and the Power Elite*, p. 7.

② Robin Blackburn, 'Ralph Miliband, 1924 - 1994', *New Left Review* 206, July-August 1994, p. 15.

③ Ralph Miliband, 'Teaching Politics in an Age of Crisis',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Review*, Volume 18, 1975, p. 145.

实际上拉尔夫总是很为他的老师志向和职业而自豪。拉斯基曾经培养了他,他把拉斯基当做最伟大的政治学老师,拉斯基的作为对他的影响巨大。C.赖特·米尔斯给他的第一印象是,“他向新一代学生成功地陈明了大部分老师设法去掩盖的东西:坚持不懈的、批判的、中肯的和学术的社会分析和调查;但是不要像殡仪馆处理尸体那样,不带感情地去处理问题;承诺不需要教条;激进主义不是艰苦思考的替代物”<sup>①</sup>。拉尔夫想引导他的学生参加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共同体与大学共同体那种“舒服到令人倒胃口”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照。温柔地说“是的”的沙沙声,学生酒吧的醉话,或者是虚情假意的相互问候,让拉尔夫产生了这样的观点。他和学生们想寻找的共同体是:“首先,或者必须是进行真正的理论研究;关于这种工作,学生们必须被告知的第一件事情不仅是艰苦和要求严格,而且大部分工作也是寂寞的。在那里首先是自言自语然后才是对话。”他对学生有高的期望:他们需要“走开,阅读,尽全力解决问题然后回来讨论这个问题”。不过他也是同等地要求老师这样做:

每个人都热衷于讨论和对话。但是真正的讨论、对话和质疑——没有阻隔的和不论资排辈的——并不容易;这样的对话排斥专制的灌输,威胁着或者折磨着每一个权威人物……在教学上要有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当然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上我们要比学生了解得更多。但是我们是否总是知道得更好这一点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如果“更好”意味着我们对政治系统的动态有更深刻的洞察力或者是对警察行为有更深刻的洞察力,那么我能想象得到老师们不会比他们的学生了解得更好,甚至是十分糟糕。<sup>②</sup>

密里本德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有一个关于当代社会主义问题的著

---

① Ralph Miliband, 'C. Wright Mills', G. William Domhoff and Hyt B. Ballard, ed., *C. Wright Mills and the Power Elite*, p. 3.

② Ralph Miliband, 'Teaching Politics in an Age of Crisis',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Review*, Volume 18, 1975, pp. 140-141.

名研讨班。在这个研讨班上，他鼓励学生七嘴八舌，虽然有时候我更喜欢他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在上课的过程中他会更多地去弥补。拉尔夫是一个天才演说家，自从他去世后不止一个人评价说，左派政党没有利用好他作为一个演说家的巨大能力是多么令人惋惜。但是拉尔夫从来没有对此后悔。他知道他作为公共演讲者的才能在大量的学生那里没有浪费，这些学生聚集在一起聆听他规划、精心制作、付出了大量精力、智慧和热情的论题。

我自己就是一个例证。1967年，22岁的我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报名参加了一个完全传统的公共行政研究班。（在英联邦奖学金申请表上我错误地说我想研究经济计划。）我坐在那儿，疲劳且忧郁。这时，一个后来参加即将到来的造反运动的学生，一个老是从我身旁路过的加拿大人看我有些可怜，告诉我可以去五楼听“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课。那天的主题不是马克思也不是米尔斯，而是戴高乐的回忆录，在不知不觉之中展现了国家和资本主义经济、阶级结构之间的关系。就像拉尔夫常常干的那样，他巡视着拥挤的报告厅，用三个或四五个比喻来修饰一个论点，他盯着某人的眼睛，目光炯炯有神。这次，他抓住了我。目光确实炯炯有神。下课后，我迫不及待地跑到研究生秘书那里报名参加政治社会学研究生课程，但是被拒绝了：太迟了，而且名额早已满了。在他下一次讲课结束后，因焦急而发抖的我等着密里本德博士，想看看他能否帮上忙。我立即明白了这个最慷慨的老师在支持一个被鼓舞的学生方面能够做到什么程度。

我认为，他决心激励学生确立这样一种感觉，即他们的工作事关政治，这一点使他成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老师。他使我们确信仅仅知道怎样批判传统政治科学和社会学是不够的，而且一个政治上紧要的事情在于超越先锋姿态和口号，并且让我们致力于建设一门充满活力的、不屈不挠的和可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我们这些跟随他做博士论文的人从来不会仅仅是为了获得一个学位和一个教职而写一篇论文。我们写

一部书——他经常影响我们的——是为了在促进进步的社会变革的可能性上发挥应有的作用。从最理想的意义来说，他总是公平地对待我们。只要是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他那间阴暗的办公室接受个别指导，我都能够感受到真诚的欢迎，接下来，往往是建议我们到伦敦的斯特兰德喝杯咖啡和吸一支烟继续我们的讨论。“我不会替你写你的该死的论文，列奥！”当我有一天向他抱怨我所遇到的一些僵局的时候他打击我，我马上理解了，他通过这种方式表达的意思不仅是明显的，而且我开始明白在这个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方面，自己比他更加专业一些。即使我感到自己没有他了解的多，他也一直对我说你知道或者能够知道得“更好”。

我的个人经历并非是唯一的。实际上，我的论文只是他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初指导的 25 个或 30 个人的博士论文之一。这个数字我一辈子也赶不上。他是如此受欢迎，部分是因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吸引了众多的激进学生，因此教师队伍中为数甚少的激进分子不可避免地承担了这个任务。同时这也是因为拉尔夫非常热心、幽默、开明和慷慨。和他一起做研究的不仅是那些最激进的学生。因为他没有时间去搞教条主义，所以实际上拒绝了许多好战分子，却吸收了很多其他方向上的学生进入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共同体。

在担任利兹大学系主任之后，他对“学者共同体”的概念的厌烦也许并不奇怪，管理一个系让他感到不开心，他也不太擅长管理一个系。像其他欧洲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那样，70 年代后期他开始在北美担任不少一个学期的教职（波士顿的布兰代斯大学，多伦多的约克大学，不过，他主要待在纽约城市大学研究中心）。在北美学生给他这个老师的赞扬中，有一封来自马克·纽菲尔德的信。80 年代中期，他在渥太华的卡尔顿政治经济暑期学校听过密里本德的课，现在他在特伦特大学教国际关系。在这封今年夏天收到的信中，他特别好地抓住了密里本德作为一个老师的特点：

那时候我已经拿到了硕士学位，尽管我是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

来到卡尔顿的,但是我还是想寻找另外一个立场。没有一场斗争,我是不会放弃我的自由主义—改良主义政治立场的——我把斗争带到了拉尔夫·密里本德的课堂……不管怎样,我记得我用加尔布雷雷斯所谓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等观点,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在适应政治的过程中集中的观点。我记得课堂上很多人跳起来反对我(我确信他们是冲着我来),让密里本德忽略我的问题而去对待更重要的问题。但是他很快使他们安静下来,回应说,加尔布雷雷斯的观点是重要的,必须理性地讨论它。然后他进一步指出值得考虑的细节……他给予我的期望值深深震撼了我,我想在那一刻我意识到:每一个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工作的人不必牺牲精神的严谨或道德操守。(你必须理解,我是在一个对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一切都充满敌意的环境中长大的,那个环境比北美的通常情况还要敌视马克思主义。)

## 新左派时期的政治著作

“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精神严谨和道德操守”,这句话界定了他的政治立场和教学生涯。他的教学和著作是一个全面的长期的政治学规划的重要方面: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学在20世纪50年代的思想觉醒和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都遇到的道德破产中的复兴。就此而言,我们甚至可以说,拉尔夫比英国新左派中他那些著名的同时代人更了不起。

英国新左派的与众不同之处不仅在于它的出现比6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青年激进运动普遍高潮期——这种高潮在1968年的反越战示威、学生造反和车间工人暴动中达到顶点——要早<sup>①</sup>,而且在于在它的思想形成过程中,它更加自觉,更加有创造性,更加马克思主义,也更直

<sup>①</sup> 参见林春近期的出色研究《英国新左派》(Lin Chun, *The British New Left*,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3)。

接地与工人阶级文化和政治联系在了一起。在一个关键时刻：1956年6月，爱德华·汤普森和约翰·萨维勒一起油印出版了英国共产党的一个内部刊物《理性者》（后来在一些别的地方被叫做“非法出版物”）。一年后（先后被党内停职，然后退党），他们创办了独立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期刊《新理性者》（报头援引了马克思的话：不去驳斥错误就是鼓励思想犯罪。）<sup>①</sup>在群星荟萃的编辑委员会中（包括多里斯·莱辛、罗纳德·米克、迈克尔·巴洛特·布朗、彼得·卫斯理），拉尔夫是唯一一个不曾加入过共产党的人。50年代早中期，密里本德是工党内部比万左派一个不快活的和散漫的支持者。同《新理性者》以汤普森、萨维勒为代表的那些“民主的共产主义者”在一起，密里本德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真正的政治同盟军。

拉尔夫最优秀的品质之一就是他的一贯准确的判断力。这一时期他所得到的十分独特的称赞就是（他认为）需要在新左派内部营造能够表达不同观点的宽松空间。当1959年《新理性者》和《大学与左派评论》（1957年由一群特别早熟的牛津大学研究生主办的，其中包括来自牙买加的斯图亚特·霍尔和来自加拿大的查尔斯·泰勒）合并为《新左派评论》的时候，密里本德敏锐地察觉到两个编辑部中都存在的反对合并的倾向。尽管（或者更像是因为）他能够和两个群体都相处好，密里本德意识到“两个杂志各自代表着思想和经验的非常不同的趋向”，他做出的区分是，《新理性者》群体代表着属于劳工运动的知识分子，而年轻的牛津大学激进分子代表的是为了劳工运动的知识分子。《新左派评论》很快就出现了危机困扰，佩里·安德森1963年作为主编接管了《新左派评论》，随后他和汤普森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分歧，这些都证明了密里本德当初的忧虑是有先见之明的。

---

<sup>①</sup> Ralph Miliband, 'Thirty Years of The Socialist Register', John Saville, 'Edward Thompson,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1956',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94; cf. Lin Chun, *The British New Left*, esp. pp. 10-16 and 6.

正是在这种语境中,1963年4月,密里本德、萨维勒和汤普森发起了能够体现《新理性者》所鼓动起来的精神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年度调查。当时,尽管汤普森在《新左派评论》深感苦恼之后借故退出共同编辑部,但是在《社会主义纪事》中,他用了大量篇幅睿智地反击了《新左派评论》的年轻孩子们。密里本德试图淡化这场争吵,并发挥了一个编辑所能起到的积极作用。但对于那些他感到放弃了或者损害了社会主义规划的人,密里本德是不宽容的和无情的。《新左派评论》那些聪明的年轻同志当然不属于这种情况(1963年安德森24岁,而密里本德和汤普森都将近40岁了),他十分关心他们之间的争论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力图以这种方式避免完全分散的新左派集体发展到其建立一个新基础的巨大潜力一下子消失的地步(而汤普森则悲观地认为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sup>①</sup>密里本德和《新左派评论》相关人士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早些年,他特别促成了他的好朋友伊萨克·多伊彻和他们之间的联系。

英国新左派所开创的精神空间,给当代学术界留下了广泛而不可磨灭的巨大影响。在文化和政治意识方面,它对众多知识分子和学术圈之外的积极分子(特别是英国的)也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但这个理念也产生了一种新的实践,即去发现新的社会主义政治。密里本德比其他人要更加坚毅、更一贯地致力于这种挑战。的确如此,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出贡献就是清楚直接地阐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实现那种挑战。

首先,在英国的语境中,左派第一个要务就是确定首要的工作,正如

---

<sup>①</sup> 林春的英国新左派研究强调了“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和民族文化的激进化的领导上作用”,但是她明确地指出“和老左派相比较,新左派主要的失败在于它缺少组织化力量,因为除了一两个杰出人物之外,新左派没有表现出任何能够创造出取代僵死的左翼组织的趋势”。在文章中,她甚至争论说:“密里本德是孤独的,他认为放弃旧的左派政党不得不提出一个大的问题,即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现存的或者即将创造的什么组织可能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但新左派并没有切实地理解这种对一个新组织的需要,他们甚至有这样一种感觉:“在规划、组织以及理论术语方面替代它的是什么还没有一个清楚的观点。”(Lin Chun, *The British New Left*, pp. xvi-xvii and fn. 8.)



他在《社会主义纪事》第三卷中所提出的：

工党仍是“工人阶级政党”，在这个意义上，目前没有别的重要的政党取代它。当然这一直是英国社会主义的根本难题，这不是一个好像马上就能解决的难题。首要的步骤是现实主义地看待工党，能够期望它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这种观点的依据只是在于，社会主义者可以开始讨论所有任务中最重要任务，即创立英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sup>①</sup>

1961年密里本德出版了《议会社会主义》，很快被普遍认为是英国新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在工党的内部危机即反对领导层将党的纲领简化为社会主义政策的修正主义倾向中，该书在学生和工党积极分子中都显示了巨大的影响。密里本德详尽地考察了自从1900年以来工党主义政策的历史，提出了一个清晰的观点：一方面，修正主义的观点在党的历史上屡见不鲜，然而，另一方面，他也揭示了在当下语境中的修正主义的本质，即“工人运动和当代资本主义之间大和解的内在不稳定性”。密里本德证明，包括大多数劳工左派和工会持有的工党主义，总是教条的，它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对代议制的传统解释。这就把领导从大众党中孤立出来，使他们不愿和不能用激进的目的教育和动员它们的阶级成员和基层积极分子。密里本德有一个观点，即：即使工党领导层“通过寻求他们所谓的民族政策而总是试图掩盖它的阶级性”，工党仍然是一个阶级政党。通过这个观点，他预见十年后在“富裕的”工人阶级和工党政府之间爆发的冲突。他的研究也指出了政党内部的合法性危机，这一点也刻画出80年代后作为一个组织的工党的特征。的确，在批评1958年罗伯特·麦肯齐著名的英国的民主精英理论（熊彼特的观点，还掺杂了大量伯克的观点和一小部分罗伯托·米歇尔的观点）时，密里本德不仅预

---

<sup>①</sup> Ralph Miliband, 'The Labour Government and Beyond',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66, p. 24.

见了导致了体制性反叛的政党活跃分子中间的“彻底的徒劳和挫败感”，而且预言了20年后支持党内民主的所有关键性争论。<sup>①</sup>但是正如他预见到了愈演愈烈的党内造反一样，对于党内改革的界限的严谨分析，以及在60年代到70年代中间更多更伟大的洞见也使他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1966年，他指出：“对于工党的社会主义者而言，去相信……在任何实际的或总体的意义上使工党领导转变为左派的前景，这是不可能的或不现实的。”因此，对于社会主义者而言，在当下的议事日程中建设一种取代工党主义的大众政治是十分必要的。密里本德坚持认为，共产党在过去负担太重，做事情太官僚化和缺乏意识形态的创造性。对于各种各样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其他小政党来说，他们的宗派主义和独立性是他们坚持一种源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暴动模式的结果，这根本不可能获得自由民主的、发达资本主义体制中的工人阶级的广泛而持久的支持。当整个问题的基础在于基于真正的大众需求的规划仍然不存在的时候，宣称自己是新的左派政党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使他回到了能够拓展社会主义者共同体的教学方式上来。正如1966年他提出的：

目前的问题不是某一个政党和政治上的联合，而是在社会主义教育方面全面而持久的努力，无论是在工人运动中或者是在可能适合的工人运动之外，社会主义者要跨越存在的界限，从传统的模式中解放出来，要耐心地 and 灵活地贯彻执行。这种努力不是要取代具体斗争中的直接参与，而是属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素。<sup>②</sup>

密里本德在增进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恰当的马克思主义理解方面的重要性直接与此相关。密里本德这方面的工作开始于1965年在《社

---

① Ralph Miliband, *Parliamentary Socialism*, London: Merlin, 1965, pp. 344 - 349; Ralph Miliband, 'Party Democracy and Parliamentary Government', *Political Studies*, Vol. VI, 1958, p. 1704.

② Ralph Miliband, 'The Labour Government and Beyond',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66, p. 25.

会主义纪事》第二卷上的一篇论文《马克思和国家》。密里本德非常清楚左派的全面失败——包括他提出的一个新的规划所面临的困难——与这项任务的内在困难有着关联，最大的障碍无非是统治阶级的实体的和意识形态的强大权力，以及他们用这种权力保卫他们的战略利益的顽固性。他最重要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1968年)和《马克思主义和政治学》(1977年)不仅指出了政治学的发展方向，而且超越了此前占据这一领域的多元主义、精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分析。在资本主义权力系统的合法性丧失的进程中，这些著作可以看做密里本德对其所做的贡献。这些著作质疑了那些想要改变系统的人并且表明了怎样去实施的根本性的战略要点。

尽管没有详细说明，但是，现在把关于密里本德著作中引起争论最多的一些重要观点强调一下是特别合适的。第一个问题涉及他的著作的流畅性、文章一贯的清晰性、观点的机智风格、经验证据的丰富性以及材料来源和概念的兼收并蓄。所有的这些方面赋予了他的著作一种“从流行模式中解放出来”的特点，这一点对于社会主义教育的广泛和持久十分必要。有人指责《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是“前理论”，掉入了精英—多元主义的理论框架(而这正是本书公开批评的对象)，不仅在写作风格上而且在理论演进阶段都反映了一种急躁。然而，如果有比满足于马克思主义框架而无所作为的人更多的人去说明国家的新理论，那么，这么做绝对是一个必要的步骤。不管怎样，批评密里本德掉入了精英—多元主义理论概念当然是夸张的。仅就《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来说，它使受到了英国的和北美的政治学教育的学生感到：他们能够做的不仅仅是要批判主流范式，而是要寻找到可以取代它的理论。密里本德让我们确信，这种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范式。不过，他也阐明了这种马克思主义范式是一种没有和非马克思主义精神世界隔绝的、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如果它能够积极地把其他学科的最好的视野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化中间来的话，这的确可以说就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需要说明的第二个问题是,不要错误地理解密里本德和普兰查斯之争的理论和政治意义,认为他们各自拥有不能通约的立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建构一个课程纲要时常常把他们处理为工具主义者和结构主义者被证明是一种误导。这不是说在方法、关注的问题和解释方面他们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差异。然而他们不会模糊课题的共同的地方,即提出一个相应的有细微差别的观念:西方的调节国家不是独立于资本的决定性权力,而是相反成为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和再生产的一体化的因素。两位理论家都认为国家相对自主于源于资本主义的直接压力,但是应当把这种自主性理解为在阶级冲突、经济领域的竞争性质和资本家阶级自身所导致的矛盾的背景下有效而稳定地保护系统的关键条件之一。因为他们都被一种希望所鼓舞,即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主义观点有助于阐明社会主义战略,所以他们的工作是一种建议,即进一步分析“相对自主”的各种变体,这也是一种在不同的国家和形势中评价超越界限的手段。这种界限就是:如果没有造成资本主义的信心危机和积累危机,改革就不可能进行。

如果他们只是止步于此的话,新的国家理论可能是一种无效的推论,但是 70 年代末,密里本德的《马克思主义和政治学》和普兰查斯的《国家、权力和社会主义》表明,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超越传统的矛盾而生硬的关于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框架。在密里本德对无产阶级专政概念和列宁的民主集中制的概念的批判当中,包括他对结构化改革概念(这个概念首先由高兹在 1968 年的《社会主义纪事》中提出)的拓展,在新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方面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密里本德试图系统化地表述什么样的国家才是新的社会主义政治应当指向的目标,怎样通过一种立足于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行政多元论的战略(“双重权力”)来实现它。当普兰查斯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直接民主的乌托邦概念进行了尖锐批判的时候,当普兰查斯坚持认为必须通过社会主义民主的代议制机构进行的时候,这些方面和密里本德提出的立场是非常一

致和相互补充的。密里本德非常清楚,对新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这种发展很难走远。直到去世的时候,密里本德都忧心忡忡:他“无法充分地说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比如满足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的严格和详尽的规定是什么”。因为没有“清楚地指出为什么而斗争”,不管它对当下的思潮影响多么巨大,新左派要建构新的政治这一承诺将不会实现。<sup>①</sup>

在1977年的《马克思主义和政治学》出版前一年,密里本德已经在他的重要文章《继续前进》中表达了他的沮丧:“1956年之后的20年,英国社会主义左派的主要问题依然是把自己的组织变成为一个有效的形态,能够吸引到实际的支持和坚守进一步成长的名副其实的承诺。”<sup>②</sup>非常不幸的是,英国的左派知识分子没有像密里本德想象的那样在社会主义方向下继续前进,而是像其他地方大多数左派知识分子一样,在80年代资本主义的复兴中逐渐地失去了它们的方向。

当时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反对新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思想反动,因为通过回到保卫社会民主福利国家的方式寻求使资本主义复兴转变方向的人不在少数。这些涉及对相对自主概念的挑战,相对自主概念再次强调了国家独立于资本主义经济和阶级结构的决定性。对于国家自主性方法的所有形态(斯科波尔、诺顿林格尔、柯平等等)来说,一个巨大的讽刺在于:它们的出现恰恰使国家的相对自主的界限得到了严格的验证。在70年代中期以来的资本主义危机的新时代,凯恩斯主义政策和社团主义结构的不稳定性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到了80年代初,随着撒切尔一里根体制的兴起,政府和官僚们自豪地沉浸在一种意识形态中,即声称国家从属于全球资本主义市场需求的必然性,甚至从属于资本主义本身的标准和主张。经过十年的历程,当社会民主主义政体(包括瑞典的)发现回旋的自由受到了制约,即资本主义增长的新的局限、逐

---

<sup>①</sup> Ralph Miliband, 'Thirty Years of *The Socialist Register*',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94, p. 6.

<sup>②</sup> Ralph Miliband, 'Moving On',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76, p. 128.

渐增长的资本流动性和对部分资本主义的更新的意识形态斗争，它们不久就放弃了所有的借口：混合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不会依赖于且不必然包含资本积累的界限。陈旧的“后资本主义”“混合经济修正主义”现在已经失去了市场，尽管它在 50 年代有那么一些可信度。相比较而言，几乎没有一个学术理论不去适应它的时代，80 年代的国家自主理论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相对来说这种发展使密里本德困惑了，他在某种程度上（在我看来是过分地）容忍了斯科波尔的批评。<sup>①</sup> 密里本德对学术界的渐变相当宽容（他对“学者共同体”从未有任何的幻想），可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共同体内的一点动摇却会使他愤怒，特别是在英国左派内部。在 1985 年《新左派评论》25 周年纪念期刊上，密里本德发表了著名的批评性文章《英国的新修正主义》，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他的这个特点。他并不否认“对于传统和自满的社会主义概念已经有许多重要的洞察、必要的更正和批评……关注社会主义进展的人极其认真地采纳了”由霍布斯鲍姆、霍尔、拉克劳和墨菲等人提出的工人阶级的保守主义、重组和衰落、作为社会变革的主体的新社会运动的重要性或者其他需要关注的反对“国家主义”的市民社会问题。但令人不能忍受的是，这些观点常常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许多需要说清楚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战略的核心问题，例如着迷于新的社会主体与旧的社会主体、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虚假分化。

在这方面，他提出的观点如此重要而又显示了一个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激情和见识，以至于值得我们详尽地援引他的著作。<sup>②</sup> 首先，社会主义主体，无论是社会运动或工人阶级，或者无论什么，来自何处：

---

① R. Miliband, 'State Power and Class Interests', *Class Power & State Power: Political Essays*, London: Verso, 1983; 'State Power and Capitalist Democracy', S. Resnick & R. Wolff, ed., *Rethinking Marxism: Essays for Harry Magdoff and Paul Sweezy*, New York: Automeia, 1985.

② Ralph Miliband, 'The New Revisionism in Britain', *New Left Review* 150, March-April 1985, p. 8, p. 13, pp. 15-16.

新修正主义一贯低估了甚至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属于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的社会变革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事业,不仅因为工人阶级可能不支持它,而且因为统治阶级反对它,即使工人阶级踊跃地支持它,也将是艰巨的事业。“统治阶级”不是一个口头数字:它意味着非常真实的和强大的权力集中,与资本和资本主义国家有着紧密的联系,阶级权力和国家权力的合二为一,武装起来的重要资源,连同它的广泛的同盟,决定用它们来完全阻止对这种权力的实质性挑战。在我看来修正主义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这种权力:在对它的性质、意义和含义的分析和实际认知上大部分相关文本太简单。

第二,在变革的能动主体问题上:

组织化劳动斗争的首要性源自这一事实: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其他的群体、运动或力量,不能够构成对业已存在的权力和特权的实际的和巨大的挑战……这绝不是说妇女运动、黑人运动、和平运动、生态主义者运动或者其他运动不重要,或者没有作用,或者放弃它们的分散的认同。绝不是如此。这只是说……像有人经常说的那样,如果组织化的工人阶级拒绝做这项工作,那么这项工作将不会完成;作为一个充满冲突的、逐渐增长的极权主义和残酷的社会系统的资本主义社会将继续发展下去,一代又一代延续下去,资本主义毒化了这个系统:资本主义已经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无法得到人道和理性的利用。

第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国家问题上:

统治阶级和它的同盟的权力能够被克服:但是这种克服要求一个有效的国家。这么说不是国家主义、精英主义、非民主和男性沙文主义(“国家是男性的”),或者没有意识到分类的危险。但是这样可以避免这些危险,即低估和否定国家的作用,而且试图在“双重权力”系统中把阶级权力和国家权力合并在一起,在权力的民主实践

和生产过程中的最大限度的自我管理以及生活的每一部分中这种双重权力把大众力量、政党、工会、工人委员会、地方政府、妇女团体、黑人议员等每一种积极力量都囊括在一起。但是国家在整个进程中必须发挥重要的作用……不仅要包容而且要征服社会主义运动的抵抗，还要履行许多不同的职能，包括在“大众权力”名义下对不同的和可能冲突的力量进行裁决……国家和它的不同的地方机构要能够对政治、市民和社会权力提供最终保护；国家将为反对各种性别主义、种族主义、歧视以及即使当资本主义被超越之后也将是常见的权力滥用等现象提供最终的援助。

特别让拉尔夫气愤的是，英国的新修正主义通过诋毁工党比万左派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特别是他们坚持一种非大众的社会主义立场。密里本德并不是一个幼稚地看待劳工左派的能力或前景的人。1976年他指出：“我的观点，我一直重申的，是工党的实际变革进程中的信念是英国社会主义者所有幻想中最为有害的。”<sup>①</sup>他没有改变这个观点，但是他认识到工党内的新的生力军，他们中受到了新左派思潮影响的大部分人，已经对党的历史上的传统的工党主义提出了最严重的挑战。他被一些讽刺激怒了，即忽视了由托尼·本和许多新的活跃分子把党的中心转向大众动员和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性，以及误解了或歪曲了让议会领导人为党的会议所通过的社会主义政策负责的全部含义——这么做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支持社会主义政策的社会主义教育和动员工作能够继续下去。然而，和《卫报》上的观点一样，《今日马克思主义》上这些讽刺和误解都成为了老生常谈（确实，二者相互提供了这种误解）。当面对《大学与左派评论》的创立者之一的令人厌烦的评论时，即嘲笑本“在一个非常时刻从事社会主义事业……当工人阶级的信念终结了的时候”，密里本德的回应是严厉的：“在谴责英国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力结构方面，工党

<sup>①</sup> Ralph Miliband, 'Moving On',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76, p. 128.



内阁中没有一个人像本(包括奈·比万)那样明确和专业。他几乎无可指责。应该受到诋毁的是其他方面,但这最好让社会主义的敌人来做。”<sup>①</sup>

密里本德没有宽恕自己。在批评新修正主义几个月之后,约翰·基恩致信《卫报》编辑部,回应密里本德在一个论坛文章中提出的在工党失败和边缘化后成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呼吁。“(密里本德的)理论著作的读者将会知道他是一个保守的阶级还原论者,敌视民主多元论。实际上,他的阶级和政党中心论将导致极端的先锋队政治:特别是极权主义、男权主义、内在的种族主义和亲苏偏见。”<sup>②</sup>这是一个令人伤心的评论,它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英国(不只是英国)思想争论的水平究竟达到了怎样的深度,在国家问题的争论中密里本德坚持反对把国家权力还原为阶级权力,在英国左派中,密里本德最坚决地批评列宁的著作和实践中非民主的方面(这一工作开始于他在1970年的《社会主义纪事》中发表的知名文章《国家和革命》)<sup>③</sup>,但在这些方面,密里本德又被新“市民社会”理论家所诟病。

即使抛开试图把密里本德和种族主义捆绑在一起等等的卑鄙手段不谈,认为他受到了亲苏偏见影响而大肆辱骂的人也不在少数:这是一个从来没有加入共产党或任何先锋队政党的马克思主义者,年轻的时候反对入侵匈牙利,成年之后不仅反对苏联军事干预阿富汗而且利用了这一次机会,(在1980年《社会主义纪事》的重头文章《军事干预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中)不仅对所有的共产主义体制的军事干预(包括越南干预柬埔寨)感到遗憾,而且承担了所谓“第一次著名的尝试”即对发达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不均衡的国家关系进行了理论探索。苏联的体制改革是

---

① Ralph Miliband, 'The New Revisionism in Britain', *New Left Review* 150, March-April 1985, p. 16.

② *The Guardian*, August 8, 1985.

③ Lin Chun, *The British New Left*, p. 179, fn. 78.

否是真正的改革？密里本德长期坚持的个人检验标准是，这种体制是否允许建立一种废除资本强制的组织。（“你知道他们那儿为什么没有咖啡吗？”他从俄罗斯访问回来问我。“当然是中央计划。”我回答说。“别傻了，”他说，“咖啡在革命被谋划的地方。”）

为了说明基恩的攻击是多么不公平，重温一下拉尔夫从他自己最重要的书《马克思主义和政治学》中选择的话是值得的：

必然地或者有选择地依靠压制所有的对立面和窒息所有公民自由的体制从政治的意义上来说一定会表现出从资产阶级民主灾难性地倒退，无论它们可能取得多少经济和社会成就……构成资产阶级民主的公民自由，尽管不充分，是长达数世纪的不懈的大众斗争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任务是捍卫这些自由并且通过消解它们之间的阶级界限使它们尽可能地扩大。<sup>①</sup>

这就是拉尔夫对这种类型社会主义的毕生坚持的承诺。1981年拉尔夫创立了社会主义学会，即一个致力于社会主义教育和研究的组织，不像涉及这一问题的其他知识分子，拉尔夫帮助建立了这一组织，不管这些会议有时令人多么厌烦，他都经常地、准时地出席指导委员会会议。他还组建了一个小型社会主义智库，经常和托尼·本会面，和本·希拉里·温恩莱特一起积极建立切斯特菲尔德社会主义大会以及从中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运动。然而，这仅仅是拉尔夫经常参加的工作的延续。从60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教育中心到他70年代来到约克郡时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在学术象牙塔之外发展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共同体的承诺。

与此同时，在80年代他继续发表著作（特别是1982年的《英国的资本主义民主》和1989年的《分化的社会》），在这些著作中，他仔细地、公

---

<sup>①</sup> Ralph Miliband, *Marxism and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189 - 190.

正地和中肯地说明了新修正主义者所忽略的阶级和国家的关键问题。甚至在他生病期间,他也坚持不懈地献身于促进社会主义的事业,尤其是他强打精神写作的最后一本著作。正如该书的标题《怀疑时代的社会主义》清晰表明的,在书中他明确地反对这种观点:社会主义事业在20世纪末已经无法挽回地死亡和消失了。他还专门描绘出区分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的政治、经济体制架构,试图概要地说明导向社会主义民主的结构化改革的类型。这并不意味着他清醒地看到了当下的前景。的确,甚至在他向出版者递交最后这部著作之前,他又计划写一部新书,把不仅仅是前共产主义国家才大量抬头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宗教种族主义等“根本性的挑战”严肃地摆在了“每一个倾向进步的人,特别是社会主义左派的面前”。这些话出自他于1993年2月在阿姆斯特丹发表的演说<sup>①</sup>:

在依靠工薪收入阶级去创造一种能够消除其阶级分化的“阶级意识”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和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太乐观了。显然,这么做过于低估了阶级分化的力量。也没有考虑所谓的认识论维度,即容易把社会疾病归结于犹太人、黑人、移民、其他种族或宗教团体,而不是社会系统以及那些具有同样民族、种族或宗教信仰背景的操纵社会系统的人。为了获得这种阶级意识就需要一种大多数工人阶级(及更高的阶级)以及实现的那种智力飞跃,但是其他人却受制于强烈的困惑而做不到这一点……阶级地位生成了比马克思主义所假定的更加复杂和更难以捉摸的阶级意识。因为它既可能通向进步立场,也可能通向反动立场……

这是清醒的反思,但是不会带来绝望。正如他在演讲即将结束的时候所说:

---

<sup>①</sup> 这篇演讲(《种族和民族主义:从左派的观点来看》)是在他去世后出版的(‘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A View from the Left’, *Socialist Alternatives*, Vol. 3, No. 1, 1994, pp. 1-15)。

长期来看,有效地制服基于人种和民族的种族主义,使它成为没有大危害的小麻烦,这种希望只有在如下社会形成后才可能实现:在这种社会中,人们享有安全的物质存在,其基本的公民权和政治自由得到了保障,合作和友谊是真正存在的而不再是社会组织的修辞原则。共产主义体制没有创造出这些条件;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也未能创造出来……一个根本不同的社会秩序现在还很遥远;但是,如果认为这种替代选择纯属幻想,并不存在需要为之奋斗的目标,则是对保守主义目前所鼓吹的不存在任何资本主义替代选择的各种主张的无条件投降……对于左派来说,各种形式的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不仅是自身的绝对义务,也是为一种根本不同的社会秩序而斗争的内在组成部分。

许多人惊诧于或者抱怨密里本德拒绝与过去十年当中的知识分子的退却同流合污。但非常了解他的我们却并不感到惊讶。我们这个时代如此多的失望和困惑都与左派长期发展趋势相关,即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日程表总是与我们的屡战屡败相互掺杂在一起。拉尔夫太纯洁了,以致不会使用这种“厚颜无耻”的说辞。在《怀疑时代的社会主义》中,他开篇就明确地提出:

就我来说,我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实现它需要很多代人的奋斗,并且永远不会完全“达成”。也就是说,社会主义致力于努力达成其设定的目标的过程。<sup>①</sup>

从他的儿子爱德华在1994年5月27日他的葬礼上的致辞中,我们可以把握到拉尔夫·密里本德对未来一代发自内心而又刻骨铭心的期望和信心:

往往有一个普遍的假定,即知识分子和学者总是思考、写作和

---

① Ralph Miliband, *Socialism for a Sceptical A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 p. 3.

教学,没有时间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当他们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强迫他们接受他们最新的思想。对于拉尔夫来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从来没有听他说“现在不,我太忙了”……他可能面对最后的期限,但是我们的需要超越了其他的一切……在我们幼年的时候,他绝对是一个神奇的讲故事的人。我们往往笑话他错过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销售机会,即没有把他经常讲给我们的关于“嘘嘘”和“嘻嘻”的历险故事,以及约克郡荒原上的两只羊的故事等等印成书——至少人们不会想到它们出自一个社会主义学者之手。拉尔夫喜欢我们的政治观点并且热情鼓励。的确,我记得在一个12岁小孩在和感到相当惊讶的应邀到家里吃饭的朋友或学者辩论时,他不止一次地跳出来支持那个陷入困境的小孩……因为拉尔夫希望我们的观点是坚定的。

拉尔夫·密里本德就是这样一种人。推进社会主义的困难之一就在于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难得一求。

(刘力永 译 张亮 校)

## 8. 自由、欲望和革命：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的 早期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保罗·布莱克里奇

虽然麦金太尔在今天作为凯尔文·奈特所标榜的“革命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最主要的代表人物而享有盛名<sup>①</sup>，但在麦金太尔最近著作的脚注中我们隐约地感觉到，还存在另一个麦金太尔，他对社会和道德理论的贡献可以与《德性之后》以及其他后续著作的贡献相提并论。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麦金太尔对马克思主义伦理理论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这在今天仍然值得阅读。可是，虽然这一贡献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麦金太尔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期却被他著作的研究者不适当地忽略了。<sup>②</sup> 这是不幸的，因为对这一时期麦金太尔的马克思主义论

---

① A. MacIntyre, 'Politics, Philosophy and the Common Good', in K. Knight, ed., *The MacIntyre Reader*, Notre Dame, I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8, p. 235.

② 实际上，已经出版的关于他的思想的两本论文集除了离题式触及之外都没有探讨他的早期马克思主义（J. Horton and S. Mendus, ed., *After MacIntyre*, Notre Dame, I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4; M. Murphy, ed., *Alasdair MacInty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这种不足在奈特编辑的麦金太尔著作选集《麦金太尔读本》中被放大了。尽管奈特编的选集收录了麦金太尔1958—1959年的论文《道德荒野笔记》是值得庆贺的，但他只是简单地把它定位为后期观点的误导性的先兆，而不是把它视为一个非常不同的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扭曲了这篇论文的影响力。与麦金太尔一系列的学识相比，麦克迈耶尔对麦金太尔道德理论的介绍虽然涉及了他的早期马克思主义，但这仅仅是对他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成果的一种非常有限的解读（P. McMylor, *Alasdair MacIntyre: Critic of Modernit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文进行总体分析本质上不仅是引人入胜的,而且也能阐明他的思想发展到最近结论之间的发展过程。

麦金太尔以如下名言作为《德性之后》的结束语:“我们不是在等待戈多,而是在等待另一个——毫无疑问非常不同的——圣·本笃。”他的这一名言是以先验地否弃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对现代世界的适用性为前提的。他指出,首先,托洛茨基后期的政治乐观主义是建立在随后对苏联未来的虚假预测的基础之上的;然而,其次,托洛茨基对斯大林主义的分析导致的必然结论是“苏联并不是社会主义,同时那种本该阐明人类解放道路的理论实际上却导致了黑暗”。因此,麦金太尔认为,“每一个认真对待托洛茨基晚期著作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被迫采取一种完全异质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悲观主义,而当他成为一个悲观主义者时,他在某种重要程度上也将不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了”<sup>①</sup>。十年后,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麦金太尔描述了一种甚至对马克思主义更具毁灭性的批判。他认为,马克思没有认识到“尽管无产阶级化使得工人的反抗成为必要,但它也常常剥夺了使工人发现适用于反抗的道德要求的善和美德观念的各种实践形式”<sup>②</sup>。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麦金太尔在60年代首先详尽地阐述了这些观点的各种形式,当时他仍旧是革命左派的一员。这一时期将麦金太尔同他的同伴区别开来的东西,并不是他对托洛茨基的批评或他对工人阶级斗争碎片化的分析。相反,他通过批驳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和拒斥任何人性论,进而把自己与比较正统的极左分子区别开来。有趣的是,尽管这些潜在的论述预示了他正在形成的政治悲观主义(这在《德性之后》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但在最近的著作中他在某种程度上又推翻了这些论述,这也表明

---

① A. MacIntyre, *After Virtue*, Notre Dame, I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nd ed., 1985, pp. 262 - 263.

② A. MacIntyre, 'The Theses on Feuerbach: A Road Not Taken', in Knight, ed., *The MacIntyre Reader*, p. 232. 第一次发表在 C. Gould and R. Cohen, ed., *Artifacts, Representations and Social Practice*,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4.

他现在的思想和早期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鸿沟并不像过去那样巨大了。

## 马克思主义和道德

众所周知，马克思和伦理理论之间存在着一种矛盾关系。一方面，在他一些更加机械的表述中，他的历史“科学”似乎是在解释行为而不是作为一种行动的指南。实际上，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他明确地摒弃了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他认为，只要“公平”是根据以“现今的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分配来理解的，那么，公平地分配劳动所得的要求就忽视了资产阶级这一主张的正确性，“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sup>①</sup>。伍德对这些论述发表了评论，他声称马克思拒斥了公平的概念，因为在他看来，公平是与特殊的历史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并认可这种生产方式的。<sup>②</sup>伍德的观点存在一个问题，马克思显然对资本主义的不公平做出了大量的论述，因此，佩佛有理由认为马克思坚持了一种“义务论”伦理学。<sup>③</sup>当然，在《印度史笔记》中，当马克思描写到“吸血的英国恶棍”“无耻地鲸吞”着这个国家，残酷的或卑鄙地杀害人民的时候，“按惯例来说”他听起来是位道德论者。<sup>④</sup>

通过区分两种不同的道德要求（不幸的是马克思混淆了两者），即解放的道德和正义（或法权）的道德，卢卡斯试图理解马克思全部作品中的“悖论”。“一旦我们认识到法权道德应当作为意识形态和不合时宜的东西来谴责，而解放的道德应当作为道德本身予以接受的时候，马克思主

---

① K. Marx,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 [1875], in D. Fernbach, ed., *Karl Marx: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and after*, Harmondsworth, Eng.;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74, pp. 343-344.

② A. Wood, *Karl Marx*,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1, pp. 130-132.

③ R. Peffer, *Marxism, Morality and Social Justi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46.

④ K. Marx, *Notes on Indian History*,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 House, 1950, pp. 110, 124, 127, 163.



义在道德态度上的悖论就得到解决了。”<sup>①</sup>与卢卡斯相反,杰拉斯认为,正义道德和自我实现道德之间的区分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因为个体只能在政治背景中实现他们的真正潜力。因此,依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的评论,杰拉斯认为,如果后革命社会不能用乌托邦的方式来理解的话,那么它们必定包含某种分配正义的观念。<sup>②</sup>杰拉斯坚持认为,最好的做法并不是将马克思自我实现道德和正义道德区别开来,而是要辨识出两种正义观,一种是隐性的,一种是显性的,这样做能够帮助我们解释“虽然马克思的确认为资本主义是非正义的……但他又不认为他是这样想的”的原因。马克思因此摒弃了狭隘的“法律实证主义式”的正义,而赞同建立在各取所需原则基础之上的、更加宽泛的分配正义。<sup>③</sup>杰拉斯认为,这一原则不仅仅是资本主义所要反对的标准,而且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它将继续作为在没有绝对富裕的制度中分配“合理”需求的标准发挥作用。<sup>④</sup>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尽管杰拉斯对马克思关于正义探讨的叙述超越了与生产力发展的潜在联系,非常具有代表性,但是他并没有探讨抽象的正义概念转变为具体概念的实际过程。

## 麦金太尔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与上述矛盾——这一矛盾是由马克思与伦理学之间的模糊关系所产生的——的解决方法相比,20世纪五六十年代,麦金太尔试图把对正

① S. Lukes, *Marxism and Mora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29.

② N. Geras, 'The Controversy about Marx and Justice', in A. Callinicos, ed., *Marxist Theory*, Oxford, Engl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232.杰拉斯评价了马克思这一论述:“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K. Marx, *Capital* Vol. III [1894],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1, p. 959)

③ Geras, 'The Controversy about Marx and Justice', in A. Callinicos, ed., *Marxist Theory*, p. 245.

④ *Ibid.*, p. 264.

义的要求与正在发展中的无产阶级为了自由的斗争联系起来。在他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一种阐释》中，麦金太尔明确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文献最初贡献，尽管这本书写于冷战高峰时期并且采取了一种激进的基督教立场，但这本著作成功地预见了新左派诞生之后三年间所涌现的许多论题。<sup>①</sup> 特别是，麦金太尔开始探讨斯大林主义和自由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共同理解为一种机械的历史进步模式的神话。

作为一位基督徒，麦金太尔之所以转向马克思主义，原因在于，就像他看到的那样，马克思的政治理论与他的批判性基督教伦理学有着交汇之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由绝对教义构成的世俗主义，具有极其重要的神学意义，这种教义不仅探讨权力和正义问题，而且也因此探讨救赎和复活的主题，马克思主义史充其量只不过是对其后的说明而已。”<sup>②</sup> 特别是，他感受到了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所面对的形势与当代激进的基督徒遭遇的情形存在着相似之处。正如马克思所面对的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人类自由、工作的现实世界与苦难之间“鲜明的对比”一样，当代基督教也接受了神圣和世俗之间的分裂从而已经失去了对世界的任何批判性视角。事实上，他认为，由于基督教已经被简化为周末去从事的个人喜好，因此，资产阶级的基督教已不再具体地批判社会的不公正，因此也不再干涉日常的世俗存在。<sup>③</sup> 麦金太尔相信，激进的基督徒将会从马克思向政治学的转向——这是马克思克服黑格尔体系中自由和现实之间鸿沟的一种手段——中获益良多。因此，他在《马克思主义：一种阐释》的结尾处指出，基督徒应当阅读的重要文本，除了《马可福音》外，就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因为，正是在这篇早期论著中，马克思在预言和道德方面都是最好的，此时他还没有屈从于在《德意志

---

① McMyler, *Alasdair MacIntyre*, p. 12.

② A. MacIntyre, *Marxism: An Interpretation*, London: SCM Press, 1953, p. 18.

③ *Ibid.*, pp. 45, 10.

意识形态》之后的著作中变得更为明显的“伪科学预言”的诱惑。<sup>①</sup>

不幸的是,虽然此时麦金太尔既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也是一位共产党员,但是他对马克思的解释并没有在共产主义者或基督徒中激起广泛的兴趣。三年后新左派的出现才真正为麦金太尔提供了思想的听众,同时也为他深化这些思想提供了灵感的实践来源。因此,正如麦克迈耶尔所说,虽然麦金太尔的早期著作预示了在新左派思考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诸多主题,但是记住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即如果没有新左派,麦金太尔的计划仍是抽象的,是与实际的政治脱节的。

1956年事件——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苏联入侵匈牙利以及英法入侵埃及——一起为广泛地批判世界总体秩序创造了空间。这些事件深刻地打击了国际体系的中心,同时也为英国独立政治力量的发展创造了空间。作为对这些事件的反应,一种“新左派”出现了,他们试图在东方共产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之间以及左翼政治同盟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之间勾画出第三条道路。<sup>②</sup> 不过,如彼得·赛奇维克指出的,新左派与其说是一个连贯的运动,倒不如说是许多不同的政治观点得以传播的舞台。<sup>③</sup> 有趣的是,这些不同的政治立场通过对斯大林主义道德批判的争论得到了表现。也就是通过对这场争论的贡献,麦金太尔表达了他未来研究的轨迹以及他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拥护。

爱德华·汤普森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致菲利斯人的信》中表达了新左派对斯大林主义的最复杂批评。这篇论文对斯大林主义的分析,更宽泛地说,对马克思的道德理论,都是杰出和原创性的贡献。然而,就核心而言,汤普森这篇论文包含一个致命的矛盾,即使他使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法也不能完全掩盖这一矛盾。他在论文的开头断言,地球表面的四

---

① A. MacIntyre, *Marxism: An Interpretation*, pp. 109, 69.

② P. Blackledge, 'Reform, Revolution and the Problem of Organisation in the First New Left', *Contemporary Politics* 10 (1), 2004, pp. 21-36, p. 23.

③ P. Sedgwick, 'The Two New Lefts', in D. Widgery, ed., *The Left in Britai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6. 这篇论文最初发表在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17, 1964.

分之一都被一种新社会所控制，尽管这种新社会有着诸多令人讨厌的特征，但是它代表着一种与资本主义的质性断裂：

苏联的生产工具是社会化的。官僚并不是一个阶级，而是寄生于社会之上的。尽管它是寄生的，但是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所释放出来的人类力量已使社会财富倍增，极大地拓展了人民的文化视野。<sup>①</sup>

然而，与把苏维埃制度概括为虽在道德上是令人生厌的但在性质上却是社会主义的相反，麦金太尔在任何地方都坚持认为，共产主义的“目的”不是一种政治“目的”，而是一种人道“目的”。<sup>②</sup> 这一表述表明，在苏维埃实验的人道目的和这些目的（至少是部分地）得以实现的非人道手段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因此，当汤普森指出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可以使用各种手段时，他意识到这些手段在道德上并不是等价的。具体来说，在苏维埃的情况中，他认为，最好把斯大林主义制度的缺陷理解为那种作为布尔什维克行动指南的马克思主义模式的不完善性的产物。他声称，这些缺陷包含了一种对马克思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隐喻的机械理解，结果，以大众自觉活动形式体现出来的主体性活动逐渐被忽视了，最终只能通过作为真正社会主义意识的监护人的统一政党才能表现出来。由此，用呆板的抽象物的行动来取代真实个体的行动的不道德性就“以制度的形式体现在‘民主集中制’的僵化形式之中”<sup>③</sup>。因此，汤普森对斯大林主义的道德批判包含了双重呼吁：一是呼吁更加灵活地理解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二是呼吁拒斥列宁主义的政治组织形式。

尽管汤普森的论文确实具有影响力，但它容易受到两个不同但是相互关联的批评。第一，民主集中制组织体现的机械论马克思主义真的能够承担起解释斯大林主义兴起的原因吗？第二，在汤普森的模式中，如

<sup>①</sup> E. P. Thompson, 'Socialist Humanism', *The New Reasoner* 1, Summer 1957, pp. 105, 138.

<sup>②</sup> *Ibid.*, p. 125.

<sup>③</sup> *Ibid.*, p. 121.

果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存在着某些联系,那么这些联系是什么?同时,如果共产主义是一种人道“目的”,那么我们对于斯大林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至少用于实现这一“目的”的可憎手段该说些什么呢?汤普森对这些问题的含蓄的回答表明,他没有像他自己所想象的那样与他这一时代的常识决裂。事实上,效果论伦理学没有多大价值,因为它们为斯大林主义者的行动提供伦理正当性。与这类伦理学相似。汤普森似乎也赞同善的目的能够来源于恶的手段。此外,与居于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苏联制度史一样,汤普森也赞成列宁主义导致了斯大林主义。汤普森默许了上述两种立场,这使得他对斯大林主义的道德批判容易受到来自下述那些人的一种内在批判,他们看到在汤普森的人道主义要求,即社会主义代表了历史地(自我)创造的人的潜能的实现<sup>①</sup>,与任何宣称斯大林主义制度(尽管以一种扭曲的形式)代表了一种与资本主义的进步决裂的断言之间,存在着一种矛盾。这或多或少就是哈里·汉森在下一期《新理性者》上表达的批评形式。

汉森认为:“在现代世界中,共产主义并不是无产阶级的信仰。首先,它是由革命精英所操控的、为了以最快的速度推动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一种技术……[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sup>②</sup>其次,他坚持认为,尽管汤普森的修辞华丽并且无可争辩地诚实,但他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与斯大林主义者,更宽泛地说与马克思主义者,共有一种效果论的道德框架,这种框架尽管很好地论证了手段和目的的相互依存关系,但是它却使前者屈从于后者,从而无法为批判斯大林主义的不道德性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基础。为了取代这个道德框架,汉森建议左派应当把康德作为行动的指南。<sup>③</sup>然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也就把

<sup>①</sup> E. P. Thompson, 'Socialist Humanism', *The New Reasoner* 1, Summer 1957, p. 124.

<sup>②</sup> H. Hanson, 'An Open Letter to Edward Thompson', *The New Reasoner* 2, Autumn 1957, p. 88.

<sup>③</sup> *Ibid.*, p. 79.

道德非历史化了，这在某种程度上显然异质于马克思的历史观。因此，这一论述要求新左派内部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做出一些回应，正是麦金太尔开始为一种高级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辩护，虽然这种人道主义是建立在汤普森的见解之上的，但他已经开始构想一种能够强有力代替汉森的康德主义和斯大林的效果论的选择规划。此外，在发展这些观点的时候，麦金太尔也开始为他那个时代的革命政治学做了些极复杂的辩护。

他批判了汉森对汤普森关于斯大林主义道德批判的回应。《道德荒野笔记》虽然是为了捍卫汤普森的一般观点而写的，但同时也含蓄地批评了汤普森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学说解释的不足之处。麦金太尔在这篇论文的开头部分就对汉森的道德观的康德主义维度进行了典型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变为共产主义道德批判家的前共产主义者经常是真正痛苦的人……他们以道德原则的名义谴责了斯大林主义的罪恶。但是诉诸道德原则的脆弱性在于这种诉求明显地带有随意性。”<sup>①</sup>麦金太尔只批判了斯大林主义的辩护者们，因为在他们那里社会主义的道德核心消失在一种机械的历史进步理论中。虽然麦金泰尔承认，他们的历史理论被斯大林和波普尔理解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但他无法接受把这种理论真正解读为青年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或马克思更加成熟著作的思想（自1953年他改变立场之后）。相反，他认为，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史上起到了消极的作用，他通过对马克思和达尔文进行比较，助长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机械理解，最终把人类史还原为自然史的一种特殊个例。<sup>②</sup>为了取代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统解释，麦金太尔坚持认为，如果想要从马克思论述的相关主题的片段中恢复和重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道德核心，那么就必须要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进行类似的重构。

---

① A. MacIntyre, 'Notes from the Moral Wilderness', in Knight, ed., *The MacIntyre Reader*, pp. 31-32. 这篇文章最初分两部分发表在 *New Reasoner* 7, Winter 1958-1959, pp. 90-100 and *New Reasoner* 8, Spring, 1959, pp. 89-98.

② Ibid., p. 38.

麦金太尔认为,斯大林主义者借助于历史进步的目的论模式“把道德上正确的东西等同于历史发展的现实结果,以至于‘应当’原则被淹没在历史的‘是’之中”<sup>①</sup>。因此,如果有人希望把道德原则重新引入马克思主义之中,那么这种做法,即只是为现存的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发展理论添加上类似于康德伦理学的某种东西,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种历史理论否认道德选择。但是从某种设定的更高立场出发,把任何历史事件都当做不道德的而加以拒斥也是不对的,因为“不存在一套[人们]可以诉诸的、普通的公共准则”。事实上,因为这些策略已普遍地发展为服务于某些特殊统治阶级利益的策略,所以任何如此伎俩都往往会滑落到现有的道德传统之中,从而使现状的辩护者有机可乘。<sup>②</sup> 因此,麦金太尔认为,在冷战期间,东西方所有辩护士们的论述都是建立在一种不完善的理论框架之上的。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作为取代两者的“第三种道德立场”的结构将会是怎样的呢?麦金太尔的回答是,这种立场只有通过“用一种更加准确的观点来代替那种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却流行的观点”才能被建立起来。<sup>③</sup>

斯大林主义者坚持认为历史的一般过程是可以预测的,就像麦金太尔认为的那样,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在对马克思理论中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隐喻作用的误解之上的。在马克思使用这个比喻时,他所表达的既不是一种机械关系也不是一种因果关系。相反,他只不过是利用黑格尔的概念来表达如下过程,即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提供了“上层建筑从中产生出来的某种架构,提供了人际关系得以相互交织的一系列关系,同时也提供了所有其他一切从中发展出来的人类关系的核心”。甚至,麦金太尔写道:“人们在创造经济基础的同时,也创造上层建筑。这不是

---

① A. MacIntyre, 'Notes from the Moral Wilderness', in Knight, ed., *The MacIntyre Reader*, p. 32.

② *Ibid.*, pp. 34-35.

③ *Ibid.*, p. 37.

两种活动而是一个活动。”因此，斯大林的历史进步模式——在这种模型之中，政治发展被理解为经济原因自主发展的结果——离马克思的模型相距很远；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根本特点不是经济基础的变革而是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革命性变革”<sup>①</sup>。此外，由于人类生存条件在本质上是历史地决定的自由，因此，尽管可以合理地普遍预测人们反抗资本和其他压迫制度的趋势，但马克思主义者却错误地把反抗或成功的革命机械地预测为任何特殊的经济过程的自发产物。因此，在发现需要斯大林的历史进步的目的论和康德的非历史的范畴律令的地方，麦金太尔都建议道，“我们要寻求一种把历史中所发生的事情看做为我们提供一个准则基础的理论，而不是把历史过程变成道德至上或把历史进步变成自发过程的理论”<sup>②</sup>。在寻找重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础的过程中，麦金太尔认为，与“自由主义的道德自律的信念”相反，人类行为的目的性特征不仅能够把人类史和自然史区别开来，而且也能够为道德判断提供一个历史的和唯物主义的基础。<sup>③</sup>

麦金太尔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追随亚里士多德或更宽泛地说应当追随希腊人，在伦理和人的欲望之间建立联系：“我们通过揭示人类行为与人的欲望、需求和类似东西联系起来独特方式，能够理解作为人类行为的个人行为和社会实践。”<sup>④</sup>因此，他打算以一种完全不同于康德的方式把道德和欲望联系起来。在康德那里，道德的“应当”是与欲望的“是”完全脱节的，所以麦金太尔坚持认为，把伦理与满足需要和欲望的活动分离开来，这样就把“伦理变成了一种不可理解的人类行为”。麦金太尔虽然因此试图把道德与人的欲望和需求联系起来，但他对弗洛伊德

---

① A. MacIntyre, 'Notes from the Moral Wilderness', in Knight, ed., *The MacIntyre Reader*, p. 39.

② Ibid., p. 40.

③ Ibid., p. 41.

④ Ibid., p. 43.



的阅读使他明白欲望能够被“各种禁忌”“重新导向”。<sup>①</sup>此外,他遵循马克思的路线把人性彻底历史化,但并没有忽视人性的生物学基础:“只是在黑格尔那里人才开始拥有历史,而在马克思那里人完成了一部现实的历史”,因为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成了与人的历史相伴的历史”。<sup>②</sup>所以,马克思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把人历史化,因为他拒绝追随霍布斯的人的需求和欲望的悲观模式,也不同意狄德罗以自然状态反抗当代社会结构的乌托邦式的相反立场。相反,马克思理解了霍布斯观点的有限的历史真理,但与此相对的并不是一种乌托邦,而是工人斗争的真实运动,正是通过这些斗争,工人们才意识到团结是一种根本的人类欲望。

麦金太尔试图通过对伦理学史的独特改写来为马克思的这一建议寻求依据。他认为,伦理学史可以写成三个流派的综合:一是“道德准则史”;二是“人类对欲望的态度史”;三是“人性”的历史。道德准则最初和人类欲望联系在一起,但是新教改革打破了欲望和道德之间的联系。实际上,在新教徒看来,由于人性天生就是堕落的,那么人类欲望就不能作为道德准则的基础。此外,既然人是有限的存在物,那么就不能希望人能够理解上帝的精神,因此也不能指望人能理解上帝的道德准则。结果,“道德律令成了一种与神圣指令的联系”<sup>③</sup>,这些神圣指令“在我们看来完全是任意的”。在这样的世界里,“欲望成了某种反常的、与道德无关的东西”,事实上,一旦道德准则失去了宗教色彩并采取了世俗的形式,它们就会被视为诸如霍布斯那里的“充其量只不过是在相互冲突的欲望之间形成的一种不稳定的休战或和平状态”<sup>④</sup>。把自然状态的欲望与道德准则对立起来,如狄德罗,是对宗教改革后的观点的一种不当反

① A. MacIntyre, *The Unconscious* 2nd ed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Atlantic Highlands [n. J.]: Humanities Press, 2004, p. 62. 本书的第一版出版于1958年——新版包含了一篇有价值的序言。

② MacIntyre, 'Notes from the Moral Wilderness', in Knight, ed., *The MacIntyre Reader*, p. 46.

③ *Ibid.*, p. 43.

④ *Ibid.*, p. 44.

应，因为这种策略没有认识到“在阶级社会中欲望本身是被重塑的，而不只是被压抑的”<sup>①</sup>。这一论述必然产生两个问题：第一，这种重塑是绝对的吗？第二，如果这种重塑过程不是绝对的，它有可能被超越吗？为了历史地理解这两个问题，我们必须问，是否会出现一种人性，以至于个体的需要和欲望不再处于一个反对另一个的单纯原子化的对立状态之中呢？马克思指出：“只有根据阶级斗争的历史才能理解人性的出现，每个时代都揭示了那种社会生活形式特有的人类潜能的发展，后者受到那个社会的阶级结构的特定限制。”在麦金太尔看来，当马克思说出这段话时，他已经理解了这个问题的深刻的历史学和社会学内涵。特别是，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根据马克思和麦金太尔的观点，“生产的增长使[人]有可能重新占有自己的本性”。这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是正确的：首先，逐渐增长的劳动生产率为我们所有人在道德和物质上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提供了可能；其次，资本主义也创造一个主体——无产阶级，他们通过为了自由的斗争而体现了一种新的集体主义精神，同时通过斗争，个体开始懂得，他们的需求和欲望只有通过集体的渠道才能得到最好的满足，才会懂得他们真正所需要和渴望的是团结。<sup>②</sup> 依据麦金太尔的看法，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的斗争中为当代道德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条件：它一开始就体现为能够克服“我们道德观和欲望观分裂”的实践活动。<sup>③</sup> 的确，通过这种方式，无产阶级开始认识到，团结不仅是个体成员努力满足他们需要的一种有用的手段，而且事实上就是他们自然而然所欲求的东西。<sup>④</sup>

麦金太尔因此把道德史理解为“不再把道德准则看做压抑欲望的人的历史，理解为人为自己创造并为自己所接受的某种东西”；具体而言，

---

① MacIntyre, 'Notes from the Moral Wilderness', in Knight, ed., *The MacIntyre Reader*, p. 43.

② *Ibid.*, p. 46.

③ *Ibid.*, p. 45.

④ *Ibid.*, p. 48.

它在无产阶级反对异化和认知世界的物化方式的社会主义斗争中达到了顶点。相反，“伦理的自律和功利主义是资本主义意识的两个方面。它们都是异化的形式而不是道德的指南”<sup>①</sup>。所以，一旦政治左派摆脱了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神话和把社会主义具体化为某种无限目的（从而证明以社会主义名义所采取的任何行动的合法性）的做法，那么，社会主义者将会在阶级斗争的历史中真正理解手段和目的之间的相互渗透关系，理解马克思的道德是“一种关于道德的绝对真理的断言”（这与斯大林主义者完全相反），“理解它是一种关于欲望和历史的断言（这又与斯大林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批判家完全相对）”。<sup>②</sup>

不幸的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斗争似乎并不是必然的，在50年代后期这种斗争就几乎不存在了；而新左派则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这个紧迫的冷漠问题。实际上，1960年新左派出版了一本由爱德华·汤普森主编的论文集《走出冷漠》，这是建设新社会主义运动计划的一部分。就像它的标题表明的那样，这本论文集打算对现存的冷漠文化进行分析和批驳。在导论中，汤普森把冷漠界定为人们关注“用私人方法来解决公共恶的问题”的一种趋势，同时综述了冷漠兴起的两种不同的解释，并用自己的观点反驳了这些解释。首先，他拒斥这种观点，即冷漠之所以增长是因为“繁荣没有为不满留下任何空间”；然而，第二，他在部分程度上接受下述观点的正确性，即冷漠是“个体在面对当代制度时无能为力的一种表现”，但他指出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而冷漠却不是。为了替代这两种模式，汤普森认为，当代冷漠的关键原因在于人们“不相信存在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或他们非常不喜欢给出的任何一种替代选择（比如共产主义）”<sup>③</sup>。他因此认为，新左派应该致力于论证一种更好的政治制

---

① MacIntyre, 'Notes from the Moral Wilderness', in Knight, ed., *The MacIntyre Reader*, pp. 42, 49.

② Ibid., p. 47.

③ E. P. Thompson, 'At the Point of Decay', in E. P. Thompson, ed., *Out of Apathy*, London: Stevens and Sons, 1960, pp. 5-8.

度的可行性。他甚至认为英国的社会主义形势是如此成熟，以至于“任何一种探索超越传统政党争论局限性的有力提案都会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连续性提出质疑”<sup>①</sup>。当时这本书的其余部分打算探讨这种可能性。除此之外，虽然新左派并没有坚持某种“政党路线”，但这本书的大部分撰稿人都是在一个共同的宽泛框架内工作的，然而，如汤普森所说，麦金太尔“作为一个托洛茨基分子在某些方面不同于其他撰稿人”<sup>②</sup>。

不管他与他的新左派同志们存在多少分歧，但在下述这一点上麦金太尔同意他们，即认为冷漠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紧迫的政治忧虑；因此，在《打破理性锁链》这篇文章中，他为自己设定的任务是，揭示那种通过诋毁承诺概念来加强政治冷漠的知识分子文化。麦金太尔指出，在现代的风口浪尖上，知识分子习惯于把自己看做激进分子；同时他也注意到，当代知识分子为自己政治信念缺失开脱的主导借口，是看到了工人的冷漠。但是，就像他论述的那样：

或许，着迷于 ITV 和习惯性阅读《泰晤士报》或《卫报》都不可能把一个人简化为生活的无能的旁观者。对不同的社会群体而言，因循守旧的习惯是不一样的。而能够把生活在这些不同习惯中的人们统一起来的原因在于，他们的生活是由他们自己无法主宰的事件和决策形成、推动的。<sup>③</sup>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激进知识分子在最近两个世纪以来越来越冷漠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麦金太尔试图追踪从启蒙运动到现代的知识分子的发展轨迹。“马克思和黑格尔以不同的方式继承了启蒙运动”；他们两个使用了一系列的概念：自由、理性、人性和历史，这些概念对当代思

---

① E. P. Thompson, 'At the Point of Decay', in E. P. Thompson, ed., *Out of Apathy*, London: Stevens and Sons, 1960, p. 10.

② Ibid., p. 14.

③ A. MacIntyre, 'Breaking the Chains of Reason', in E. P. Thompson, ed., *Out of Apathy*, pp. 195 - 240, p. 198.

想家而言仍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sup>①</sup> 然后,麦金太尔重申了他在《道德荒野笔记》中所写的关于满足历史中形成的但具有生物学根由的需要、需求和欲望的目的性行为的重要性的论述。他甚至宣称人类历史“就是一系列的发展的目的,只有通过克服冲突的理性活动才能在历史中获得自由”<sup>②</sup>。但他指出,遗憾的是,“在黑格尔之后关于自由的讨论并没有保持自由与理性之间的重要联系”。相反,暴政是在积极自由的名义下被创立起来的,而“在消极自由的名义下,只有当人们被无知和自然状况所包围的时候才被称为自由的”<sup>③</sup>。此外,随着古典教育理想的衰落,教育变得碎片化,并因此遗忘了维持自由和理性关系的人类总体化的潜能概念。这个过程使知识分子在分裂的文化中无法应对“工业和国家的铸造性压力”<sup>④</sup>。在这种背景下,人文科学被自然科学的帝国主义方法压倒了,结果,寻找对社会过程的机械性解释成了“人文科学魂牵梦绕的梦想”<sup>⑤</sup>。这个过程是双刃的,因为对于那些研究老鼠的心理学家以及类似的人而言,这一过程成了他们的研究模型,但对于那些拒斥这一方法的人来说,他们往往用社会不断发展的普适模型的不可能性来反对这一过程。所以,波普尔拒斥人文科学的机械论模型,并且把马克思主义看做这一弊病的最主要的现代化身,尽管事实是“马克思本人最先谴责这种做法”<sup>⑥</sup>。

麦金太尔批评了波普尔把马克思主义定位为一种机械唯物主义的做法,这使得他能够把他上述马克思“伪科学的”集体主义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之间的对立当做一种虚假的二元论加以拒斥。通过比较,麦金太

---

① A. MacIntyre, 'Breaking the Chains of Reason', in E. P. Thompson, ed., *Out of Apathy*, p. 199.

② Ibid., p. 200.

③ Ibid., p. 201.

④ Ibid., p. 208.

⑤ Ibid., p. 210.

⑥ Ibid., p. 217.

尔坚持认为“对个体和阶级的特性描述必须要协调一致。从本质上说这不是两个相互分离的任务”。因此，波普尔“正确地强调不存在与具体个体的历史或社会相分离的历史或社会；但是同样也不存在与个体的历史或社会相分离的个体”<sup>①</sup>。虽然麦金太尔拒斥关于人类行为的机械模型，但他却继续相信完全可以提出一种关于人类行为的一般模式，因为他拒绝接受用原子论式的选择来取代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波普尔的错误选择相反，麦金太尔重申了目的性行为的重要性：因为被规律统治的机械行为和无规律的个体行为都会打破“理解和行动”之间的联系。这两种社会行为的研究方法的问题在于，它们都会导致政治宿命论：

人们或者能够发现支配社会发展的规律，或者不能发现。如果他们能够发现的话，他们必须承认他们自己的行为从属于这些规律，因此他们必须承认他们发现自己不是社会过程的能动的主体，而是牺牲品，是社会过程的一部分，这一过程是不以人的精神、情感和意志为转移的。如果他们不能发现这些规律，那么他们必然是无助的，因为他们手上缺乏变革的工具。因此无论如何人的能动性必然是无效的。当然，就小范围的变化而言，它可能是不一样的。所有的社会学家都为改良主义的伎俩提供了空间。<sup>②</sup>

麦金太尔提醒我们，这种意识形态并不存在于与日常工作世界相分离的纯粹状态中，而就是从这个世界中生发出来的：“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我们的知识视野是相互补充的。我们的社会生活是这样一种生活，在其中人们的活动变成了非创造性的和枯燥乏味的。我们生活在……一个被预先决定的生活社会之中。”<sup>③</sup>实际上，我们的社会生活是如此枯燥，以至于正当知识分子超越它的时候，他们的努力却被最墨守成规的解释阉

---

① A. MacIntyre, 'Breaking the Chains of Reason', in E. P. Thompson, ed., *Out of Apathy*, p. 220.

② Ibid., p. 225.

③ Ibid., p. 230.

割掉了：因此，维特根斯坦和弗洛伊德的激进意义，或如麦金太尔所述，在这种解释之中被阉割了。那么如何能够挣脱这些预先决定的道路呢？与粗俗的先锋队观念相反，麦金太尔坚持认为，自由不是通过告诉大众去做精英想让他们做的事情而获得的，而是只能通过“帮助他们朝向他们所欲求的地方前进才能够获得。目标不是幸福或满足，而是自由。同时自由必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目的和手段的机械分离完全适用于人的操控，但不适用于人的解放”<sup>①</sup>。在麦金太尔看来，解放政治学是通过工人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自发产生的。<sup>②</sup> 这种洞察力使他从对康德主义的标准马克思主义批判转向了同效果论残余影响的坚定决裂，而在麦金太尔撰文之前，这种效果论一直被视为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负担。于是，因为自由既是社会主义活动的手段也是社会主义活动的目的，所以，与康德主义者相反，这种活动在当代历史中需要一个强大的支柱，而与效果论者相反，这种活动并不是一种由各种手段创造的具体目的。因此，麦金太尔得出结论说，“哲学家继续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仍然是改变世界”<sup>③</sup>。然而，尽管他在这篇论文的结尾处表达了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忠诚，但从该文本来看，这种忠诚实际产生的后果并不是很明显。好在在 60 年代早期，他在托洛茨基主义左派期刊上发表了大量论文，从而使之不断变得丰满起来。

也许，这些论文中最有实质意义的是《自由和革命》。这篇论文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以前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再解释的继续和深化。文章一开始就重申了他对黑格尔的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观的辩护，并且指出马克思通过坚持认为“自由的实现和无阶级社会的实现是不可分割地统一在一起的”而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观念。作为一个黑格尔主义者，麦金

---

① A. MacIntyre, 'Breaking the Chains of Reason', in E. P. Thompson, ed., *Out of Apathy*, p. 235.

② *Ibid.*, pp. 230, 238.

③ *Ibid.*, p. 240.

太尔拒绝把自由具体化为历史的终点，相反，而是把它历史化为通向这一终点的一系列的环节。因此，“每一个时代”的自由人“就是某种程度上可以自己创造自己生活的人”。<sup>①</sup>在资产阶级社会中，麦金太尔把波西米亚人的自由定位为一种不真实的自由模型，“只不过是资产阶级价值的一种颠倒”，与这一模型相反，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因为我们都是作为与其他人相联系的个体存在的，那么自由的实现“就不是与社会相对的个人问题，而是我们想要哪种社会、想成为哪种个体的问题”。如果这个断言是有效的，那么麦金太尔唯一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为了成为自由人，那种以牺牲组织为代价而坚持自我权利的做法忽视这一事实，即只有在某种组织化的形式中，人的自由才能得到体现”。进一步说，因为资本主义阉割了自由，那么，成为自由人就意味着要使自己加入挑战资本主义的某种组织之中：“自由的主题也是革命的主题。”<sup>②</sup>此时，麦金太尔引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渡句：虽然工人阶级通过反对资本的斗争可以自发地产生解放运动，但事实证明工人并不能自发地实现这些斗争的潜能。可是，如果自由无法自上而下地传授给工人阶级，那么自由怎么可能在这种绝望的条件下实现呢？麦金太尔的回答是，社会主义者必须加入革命性政党，后者的目标不是自由本身，而是以这种方式帮助无产阶级实现自由。“自由之路必须借助于组织，它的任务并不是建设自由，而是推动工人阶级建设自由。这种必要性就是先锋队性质的革命党存在的必要性。”<sup>③</sup>此外，与那些社会主义者（例如汤普森）以及其他大多数拒斥建立社会主义政党目标的新左派成员相反，麦金太尔认为他们都受到了这种幻象的影响，“即一个人作为孤立的个体能够逃避现实的塑造和难以名状的奴役”。事实上，

---

① A. MacIntyre, 'Freedom and Revolution', *Labour Review*, February-March 1960, pp. 19-24, p. 20.

② *Ibid.*, p. 22.

③ *Ibid.*, p. 23.



那种设法作为个体生存并试图完全拥有自己主见的个体，实际上越来越可能在思想上成为社会主导思想的消极反映；而那些认识到其依赖于他人的个体，则走上了一条通往真正思想独立的道路。

于是，麦金太尔总结道，“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民主集中制是……不可分离的”<sup>①</sup>。更具体而言，当 50 年代晚期加入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时，麦金太尔就从理论转向了实践。

### 关于麦金太尔对马克思主义的拒绝

但是，在 60 年代初期，忠实于托洛茨基主义精神意味着什么呢？奈特认为它意味着信奉教条：以此来看，奈特所说的教条最有可能是指这种教条式的断言，即工人阶级能够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然而，麦金太尔，至少在 60 年代中期，并没有用这种粗陋的方式来理解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这点在他对卢西安·戈德曼《隐蔽的上帝》的评论中变得非常明显，他并不相信工人阶级在未来的某一时刻一定能转变为革命的主体，而是打赌工人阶级可能会如此。根据戈德曼的模式，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保证社会主义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相反，他们必须要为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的斗争中的革命潜能甚至是胜利进行赌博。<sup>②</sup> 麦金太尔接受了这一论述，甚至发展了这一观点，他写道：“每一个人都不是首先理解这个世界然后再去改变世界。他理解世界的方式部分地取决于隐含在他所采取的行动中的决策。行动的赌博是不可避免的。”<sup>③</sup>把麦金太尔的赌博论判定为教条主义的会错过这一观点，即他相信无论如何我们所

---

① A. MacIntyre, 'Freedom and Revolution', *Labour Review*, February-March 1960, p. 24.

② L. Goldmann, *The Hidden God*, London: Routledge and K. Paul;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64, p. 301.

③ A. MacIntyre, 'Pascal and Marx: On Lucien Goldmann's *Hidden God*', in A. MacIntyre, *Against the Self-images of the Age: Essays on Ideology and Philosophy*, London: Duckworth, 1971, pp. 76-87, p. 84.

有人都在打赌，而那些没有赌注工人的人被迫退回到悲剧性的观点之中：如果我们拒斥马克思，那么我们就退回到康德。为了充分理解麦金太尔与马克思主义的断裂，我们由此必须要问的问题并不是究竟是什么使他放弃了教条，而是究竟是什么使他改变了赌注？

这一事实，即麦金太尔认识到托洛茨基的后期政治观点已被历史驳倒了（这一点是在《德性之后》的结尾处指出的），并没有使他同革命左派进行决裂。与他后期对托洛茨基分析斯大林主义的缺陷的悲观主义解读相反，在对多伊彻的托洛茨基传记第三卷的评论中，麦金太尔坚持认为托洛茨基主义是一个有争论的传统，而在多伊彻手里这种传统的僵化与在阿尔弗雷德·罗斯默和托洛茨基的遗孀纳塔莉亚的著作中的鲜活生命力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分析的总的要点是从“国际社会主义”那里借用过来的，1960年以后麦金太尔加入了这个团体。与这一组织的观点一致，麦金太尔坚持认为，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是对托洛茨基不断尝试完成对苏联科学分析的一个环节的具体化，是建立在一个站不住脚的和不连贯的基础之上的，因为托洛茨基对苏联社会形态和传统马克思主义未来的描述是同那些已被历史驳倒的大量预言联系在一起的。在反驳托洛茨基的预言之后，保持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忠诚，这意味着必然要与托洛茨基主义的词句（如果不是精神）进行决裂。实际上，由于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坚守他们导师思想的词句，所以，或如麦金太尔所言，他们必然与托洛茨基思想的革命精神决裂开来。<sup>①</sup>

尽管麦金太尔有力地捍卫了非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与现代世界的相关性，但在几年之内，他就与“国际社会主义”更宽泛地说与马克思主

---

<sup>①</sup> A. MacIntyre, 'Trotsky in Exile', in A. MacIntyre, *Against the Self-images of the Age: Essays on Ideology and Philosophy*, pp. 52-59, pp. 57-58. 这篇论文第一次发表在1963年的 *Encounter* 上。关于“国际社会主义”对托洛茨基的解读，请参见 T. Cliff, 'The Nature of Stalinist Russia' [1948], in T. Cliff, *Marxist Theory after Trotsky*, London: Bookmarks, 2003, p. 1.

义决裂了。<sup>①</sup> 他在 1962 年最初提出的建议表明,他已经开始重新思考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潜在主体的工人阶级的作用。一年前,在对雷蒙·威廉斯《漫长的革命》的评论中,他批评威廉斯没有看到在个体生活中“个人未实现的潜能与实现这些潜能所面临的障碍”之间的张力。<sup>②</sup> 然而,在《梦游的社会》中他对最近在奥尔德玛斯顿村进行的“核裁军运动”示威游行缺乏影响而感到遗憾,并认为这是大众传媒在工人阶级中间灌输“冷漠和接受政治现状态度”这种权力的产物。此外,他声称,“工人阶级已经被有效地分化为两类:一是被压迫的却无能的,一是强大的却可以被收买的”;并试图以此来解释无产阶级易于受到这种权力影响的原因。他甚至坚持认为,“在持久地扩大投资和持久地扩大消费”的条件下,工人阶级的斗争或至少部分工人阶级的斗争,已经“体制化”了。<sup>③</sup>

虽然麦金太尔似乎对“核裁军运动”的衰落反应悲观,但从短期来看他仍继续维护革命政治学。因此,在《对左派改良主义的答辩》中,他不同意亨利·科林斯对工党的左派改良主义策略的辩护。与伯恩斯坦和 19 世纪 90 年代的修正主义者一样,在麦金太尔看来,科林斯接受了世界的经济结构与关于它的理念之间的机械分离。因此,科林斯没有看到,与其说改良主义是对那些困扰工人阶级问题的一贯反应,还不如说是对资本主义历史上某一特殊时期的一种反映,它“产生于已学会了某种程度的理性和控制的资本主义中”<sup>④</sup>。

然而,虽然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一特殊时期

---

① 尽管 1968 年麦金太尔的名字被从“国际社会主义”的编辑名单中删除了——因为这个组织试图将自己和麦金太尔反对埃塞克斯的激进学生的行为撇清关系——但事实上早在两三年之前他就已经不再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了。

② A. MacIntyre, 'Culture and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5, 1961, p. 28.

③ A. MacIntyre, 'The Sleepwalking Society', *Socialist Review*, May, 1962, p. 5.

④ A. MacIntyre, 'Rejoinder to Left Reformism',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6, 1961, pp. 20 - 23, p. 21.

的反映，但革命政治学能否取代修正主义成为工人阶级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一点并不是很明显。因此，在 1963 年发表于《国际社会主义》的论文《预言和政治》中，他指出，当代的经济趋势为社会主义阶级意识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制造了障碍。在这篇文章的开头部分，他批评了社会主义者对“inevitable”一词的用法；实际上，他坚持认为，既然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否定资本主义连续的必然性之上的，那么，许多社会主义者仅仅转化了与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有关的主导意识形态，而没有转化与资本主义连续发展的必然性有关的主导意识形态，这就多少有点反讽。此外，他指出少数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否定了“社会主义是必然的”的观点，最著名的是列宁和托洛茨基，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提出一种“内在一贯的替代方案”来代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机械决定论的解释，而只是拒斥一种“替代主义”的“自发反应”形式。<sup>①</sup> 麦金太尔公开声称他试图超越这两种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当解释，他认为，战后资本主义已经被资产阶级的“自觉的智力创新”及其代议制改变了：

如果资本家在四五十年代所做的像 20 年代那样，很明显经济的机械规律将引发萧条。但是，就像猪的生产周期不再伴随我们一样，由于同样的原因，萧条也不再存在了：因为参与者的自我意识变化了。<sup>②</sup>

然而，如果这个观点意味着 30 年代大规模的经济危机是可以设法消除的，那么，虽然麦金太尔与机械论的马克思主义的决裂是清楚的，但他自己的政治学却没有清楚地表明他是如何避免替代主义的陷阱的：因为如果资本主义已经克服了危机趋势，那么是什么力量驱使工人去质疑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呢？在 1959 年，他坚持认为，他的人性理论与他关于人对经济过程反应的理解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关系，由此他避免了这种

---

<sup>①</sup> A. MacIntyre, 'Prediction an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13, 1963, p. 17.

<sup>②</sup> *Ibid.*, p. 18.

替代主义的陷阱：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并不是消费不足问题，而是利润率的日益下降，这导致资本家减少了他的投资。这种解释，就像关于无产阶级对于危机的反应的解释一样，都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人性发生变化的认识之上的。<sup>①</sup>

此外，他在1961年重申并深化了这一论述，当时，他认为革命家应该形成一种力图将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三种因素结合起来的纲领：一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深刻的、无可救药的不满足感”；二是“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客观危机的周期性状态”；三是“社会主义理论”。<sup>②</sup>然而，当他写作《预言和政治》时，他已不再认为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这并不表明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者操控的“客观”范围比马克思主义者的传统范围更加固定。相反，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经济过程往往会瓦解工人阶级而不是使工人阶级联合起来：“这里有一个令人伤心的事例，至少在某些行业中在对抗雇主方面处于经济上强有力地位意味着，那些你可能斗争甚至可能获得胜利的问题，恰好就是将你和技术不熟练的工人区分开来的问题。”<sup>③</sup>有趣的是，这一论述在“国际社会主义”小组内部不是一种特别异端的分析。不过，在这个小组的其他地方，这种“担心的原因，尽管不是悲观主义的原因”，是与对一种“乐观主义的确切原因”的分析结合在一起的：即许多普通工人的车间信心。另外，由于威尔逊政府以收入政策为中介向局部信心发起了全面的挑战，以此来应对“时断时续”的危机，那么，这也表明局部力量与总体攻击之间的矛盾为左派在工

---

① MacIntyre, 'Notes from the Moral Wilderness', in Knight, ed., *The MacIntyre Reader*, pp. 39 - 40.

② MacIntyre, 'Rejoinder to Left Reformism',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6, 1961, p. 23.

③ A. MacIntyre, unpublished paper given to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day school in 1963, p. 6. A. MacIntyre, 'Herbert Marcuse', *Survey* 62, January 1967, p. 43.

人阶级中培植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意识提供了一系列的机会。<sup>①</sup> 与这个观点相反，由于麦金太尔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已经不适用于现代世界，所以他对工人阶级当代发展趋势的分析以工人阶级不断增长的碎片化这种悲观主义论调而结束。因此，他把社会主义希望仅仅理解为工人阶级中存在的这种情感，即资本主义抑制了工人自由发展的潜力：“工人的解放根源于下述两个孪生事实，即资本主义无法阻止工人认识到他是不自由的，也无法阻止其与其他工人联合起来解放自己。”<sup>②</sup>

但问题是，如果经济危机起不到激起反叛这种奴役火焰的作用，甚至是妨碍了它们的话，那么麦金太尔不知道该如何解释，除了资本主义扩大工人阶级规模的普遍趋势之外，究竟还存在什么力量能够依据人性而产生作为社会主义实践基础的集体反抗。他缺少一种关于革命意识的客观趋势的判断，并不断地把社会主义积极分子的主体作用看做社会主义意识在工人阶级中发展的重要催化剂。因此，在《预言和政治》这篇文章的结尾处，他论述道，资本主义衰落的条件是，社会主义阶级意识在无产阶级中的增长，而这种增长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不可能的，它“取决于我们”在意识方面做出的那种变化：“因为通过工人阶级的联盟，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哪些东西现在能够使我们按照我们的要求行事，而且也可以了解到在我们过渡到社会主义之前哪些事情会改变我们的行动。”<sup>③</sup>

在发表于《国际社会主义》的下一篇论文《劳工政策和资本主义规划》中，麦金太尔沿着这一总体论述，更加具体地运用了他对历史唯物主

① T. Cliff and C. Barker, *Incomes Policy, Legislation and Shop Stewards*, London: London Industrial Shop Stewards Defense Committee, 1966, pp. 128 - 136. 更早一点的相似论述，可见：M. Kidron, 'Rejoinder to Left-Reformism',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7, 1961, p. 15. 基德隆这篇论文的目的在于支持麦金太尔对上面提到的科林斯的批判。多谢克里斯·哈曼的提示。

② MacIntyre, 'Rejoinder to Left Reformism',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6, 1961, p. 23. A. MacIntyre, *Marcuse*, New York: Viking, 1970, p. 72.

③ MacIntyre, 'Prediction an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13, 1963, p. 19.

义的理解。在这篇论文中,他认为社会主义者应当把说服工党转向社会主义这一目标当做不现实的而加以拒斥,同时他们的目标应是“重建一个摆脱了工党与工会现存关系的政治工联主义”。麦金太尔甚至敏锐地指出了蕴涵在一种新资本主义形式中的积极潜力:在大部分社会学家把新的脑力工人阶层的增长当做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化标志的地方,麦金太尔则注意到,这些被假定为中间等级的职业人员的工作条件变得越来越无产阶级化,因此,他们不仅能够被说服转向社会主义,而且还能够为工人运动增添智力资本。此外,麦金太尔还为这些新扩大的无产者构想了一种社会主义观点。然而,要实现这一潜能就需要一种政治策略,首先需要对新任工党政府提出一系列的要求:第一,“支持工人,反对雇主”;第二,要坚持用教育武装“工人,使他们有能力掌控自己的生活 and 执政”;最后,要废除“炸弹”。接下来,随着这些要求的提出,一种新的政治工联主义就可能会组织罢工,但这并不是对管理层压力的反应,而是力图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地方打破资本主义的有计划的尝试。然而,这项规划成功的先决条件是“几乎每一个工人都能够理解和赞成这一策略”<sup>①</sup>。

遗憾的是,这些战略建议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第一个是一致性问题,这并不是最为严重的问题:一方面否认工党能够被说服接受社会主义;而另一方面,根据上述政策的三个方面,又要同时要求工党政府在本质上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或至少是反资本主义的政府。这个问题之所以不严重,是因为这些要求在实践中很容易被理解为左派与新政府斗争的一系列的“界线”:实际上这正是麦金太尔想象这些要求的方式。<sup>②</sup>然而,麦金太尔对社会主义的策略表述存在着另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当他说实现这个策略的唯一的希望就是“几乎每一个工人都能够理解和赞成这一策略”时,他实质上将革命过程的目的与手段混淆在一起了。因为一

---

① A. MacIntyre, 'Labour Policy and Capitalist Planning',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15, 1963, p. 8.

② MacIntyre, Unpublished Paper, p. 20.

一旦工人阶级作为一种统一的反资本主义的力量行动起来，那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就能够得到保证，事实上它也将取得成功。那么麦金太尔是怎样设想大部分工人从现存的阶级意识向未来的社会主义意识的转变呢？

麦金太尔在《打破理性锁链》中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但只是肤浅地、在非常泛泛的层面上的讨论：“我们深切地需要……为反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人类活动的所有增长点提供内在一致的理论表达，以便使这些活动可以被理性地引导进而成为真正有效的活动。”<sup>①</sup>在1963年提交给《国际社会主义》走读学校的一篇未刊论文中，他侧重阐述了这个框架。在这篇论文中，他潜在地利用了托洛茨基的《过渡纲领》，认为革命的领导阶层需要向新任的工党政府提出一系列的政治要求，尽管这些要求在形式上是改良主义的，但它们在实践中只有通过对社会的革命性变革才能实现。他的意思是，在实现这些要求的斗争中，工人将形成发动那种革命所必需的社会主义意识。<sup>②</sup>然而，由于托洛茨基过渡要求模式的有效性取决于这些要求被提出来的情境，因此不适宜的情境将会否定他们的革命内容。如邓肯·海拉斯所说：“如果在一定时刻‘广大阶层的当下意识’明显地是非革命的，那么它不会被口号所改变。”<sup>③</sup>遗憾的是，麦金太尔的写作背景是典型的非革命的工人阶级意识，而任何过渡性要求都将无法改变这种情况。如果麦金太尔的过渡要求在经济繁荣和相对去政治化期间不能够胜任联系工人的任务，那么就很容易想象他是怎样从对工人创造社会主义意识的斗争潜能所进行极端乐观主义的理解转向极端悲观主义的，特别是考虑到他的这种信念，即经济层面的阶级斗争往往导致工人的分化而不是团结。

---

① MacIntyre, 'Breaking the Chains of Reason', in E. P. Thompson, ed., *Out of Apathy*, p. 238.

② MacIntyre, *Unpublished Paper*, p. 20.

③ D. Hallas, *Trotsky's Marxism*, London: Pluto Press, 1979, p. 104.



因此,如果缺少有利于工人阶级政治团结的任何客观趋势模式,工人对自由的呐喊就注定是原子化的和无助的。这就是他在60年代后期著作中隐含的结论,虽然他在写作这些著作时名义上仍是《国际社会主义》的编辑,但这些著作普遍认为革命是没有希望的。所以,在他为学术听众撰写的马克思思想导论中,他虽然强有力地断言,“马克思晚年最重要的活动”不是写作《资本论》,而是通过行动去“帮助建立和领导国际工人协会”,但是他却最终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依然让工人阶级的政治发展问题处在昏暗中”。<sup>①</sup> 不论这种观察对马克思而言是否正确,但不可否认它似乎适用于麦金太尔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因为他的当代战略见识似乎越来越抽象,并且越来越与使它们获得生机的大众运动实践相脱离。

麦金太尔的社会理论与任何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力量可能发展为变革的能动主体的观点相脱离,这种感觉最初在1964年做的一系列演讲中得到了加强,这些演讲三年后以《世俗化和道德变革》为名出版。在这本书中,他使用了复杂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描绘了现代英美国家的宗教信仰与世俗信仰的比较史。以此为基础,他认为恩格斯关于英国社会未来的世俗化所持有的过度乐观的观点是错误的,这是他对社会主义过分乐观态度的必然结果。然而,麦金太尔不止批评了恩格斯,他还指出,“人们之所以无法抛弃基督教,部分是因为他们无法为理解他们在现代世界中的处境提供后基督教的手段”。虽然他认为这种失败绝不是“最终的”,但他却没有注意到社会主义者努力探究并且能够帮助他们事后证明恩格斯正确的内在趋势。<sup>②</sup>

麦金太尔否定了马克思经济理论对战后资本主义的适用性,如果说这种否定为他逐渐增长的政治悲观主义打开了大门,那么,这一趋势在

---

<sup>①</sup> A. MacIntyre, 'Marx', in M. Cranston, *Western Political Philosophers: a Background Book*, Chester Spings, Pa.: Dufour Edition, 1964, pp. 99-108, p. 106.

<sup>②</sup> A. MacIntyre, *Secularization and Moral Chang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75.

60年代中叶则被进一步巩固了，此时他拒绝把马克思（甚至其他任何）人性模式当做连续的社会主义斗争理论的基础。例如，在他的经典著作《伦理学简史》中，尽管他对道德与欲望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些不切题的评论，但是他的道德立场已经与他早期如此忠实的历史或者唯物主义前提脱节了。<sup>①</sup> 因此，他拒绝把人性思想作为裁决道德主张的标准，结果，把个体的道德还原为一种存在主义的选择。<sup>②</sup> 尽管在1966年他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至少就当时他还没有和《国际社会主义》编委会公开决裂而言，但他却拒绝了任何标准，以至于这种选择能够为任何其他替代选择辩护。此外，由于没有人性理论作为支撑，他的革命理论，至少像他在《自由和革命》中所勾画的那样，成了无本之末。在这种背景下，麦金太尔的社会主义道德像其他任何竞争性的道德主张一样，都夸大了其无法令人信服的根基。事实上，到了60年代后期，他明显不再把马克思主义看做一种科学或行动的指南，而是只把它看做许多竞争的世界观中的一种。因此，当1968年他以《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为新标题重新出版《马克思主义：一个阐释》时，他删除能够表明原初文本是为了宣告一种充满献身精神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实践而写的任何痕迹。因此，在第二版中，马克思与费尔巴哈、黑格尔的基督教之间关系依然存在，但对行动的呼吁消失了，就像大部分基督徒一样。<sup>③</sup> 事实上，虽然第二版作为一本理论著作在形式上比第一版更接近马克思主义，但《国际社会主义》的评论者为这本书的重写感到惋惜，并宣称第一版的激进主义的内核使得这一版要远远好于第二版。<sup>④</sup>

不管1968年麦金太尔与《国际社会主义》的决裂具有什么样的理论

---

① A. MacIntyre, *A Short History of Ethics*, London: Routledge & K. Paul, 1966, pp. 210 - 214. See P. Sedgwick, 'The Ethical Dance-A Review of Alasdair MacIntyre's *After Virtue*', in M. Eve and D. Musson, ed.,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82.

② MacIntyre, *A Short History of Ethics*, pp. 268 - 269.

③ A. MacIntyre, *Marxism and Christianity*, London, 1968.

④ R. Kuper, "Marxism and Christianity",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42, 1970, p. 35.

根源,但他当时一直对他的个人动机保持沉默。不过,他的思想状况还是可以从他1970年出版的著作《马尔库塞》中窥探到。在这部著作中,麦金太尔强调了他对人的解放和自由的概念的持续性拥护。但是,他也坚持了行为叙述缩略的某种东西,例如,他在接受一种为解放而斗争的潜在理想化观点的同时,却同时拒绝用一种理想的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现状。所以,他把当代的学生斗争谴责为“第一次由父母资助的暴动”,后者与其说是“革命运动还不如说更像是儿童运动”。<sup>①</sup> 这种对1968年运动的精英主义批判使麦金太尔保持了对左派解放政治学的一种形式上的忠诚,虽然他无视了发生在身边的现实斗争:因此,与“马尔库塞的学生们”的破坏性影响相比,麦金太尔在1970年赞扬了大学作为学习之地的价值和“权威”。<sup>②</sup>

## 结束语

在第一代新左派活跃的那个时期里,麦金太尔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根源于他的下述论断:任何道德主张,如果想在现代世界被普遍化的话,必须根植于一种历史构想的人性理论之中,同时它必须要在被压迫者为了自由而进行的真实的历史斗争中实现出来。为了这个目的,他在下述方面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他把马克思历史理论的革命内核从斯大林主义的僵化理解中拯救出来,把历史唯物主义从斯大林主义的决定论牢笼中解放出来。可是,他虽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了贡献,但在20世纪60年代他逐渐地与马克思主义左派渐行渐远。这种倾向在1968年达到了顶点,当时,与埃塞克斯的学生相比,他只是作为“警察”发挥了微不足道的作用,这有着更为深刻的根源。一方面,当时的背景对于左派来说是不利的,麦金太尔的发展轨迹可以被理解为是对新左派和

---

<sup>①</sup> MacIntyre, 'Marcuse', pp. 61, 89.

<sup>②</sup> Ibid., p. 91.

核裁军运动衰落的反应。不过，需要对这一背景进行解释，而麦金太尔对这一背景的悲观主义解读从两方面得到了预示：首先他拒斥一种本质的人性观，其次他抛弃了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总的来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两方面的修正，意味着他把当代阶级斗争的碎片化当做社会主义斗争的一种障碍，后者要比《国际社会主义》的其他成员所注意到“担心的原因”所包含的障碍还要深刻。的确，随着 60 年代的过去，麦金太尔意愿上的乐观主义和理智上的悲观主义之间的张力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他最终不得不放弃某些东西。从那以后，虽然麦金太尔仍是一位坚定的国际资本主义批判家，但他的道德理论已经带上了一种深层的悲观主义的色彩。

可是，在他最新的著作中，麦金太尔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转向拒斥影响其早期悲观主义的两个根本假设。例如，在 1995 年版的《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的导言中，他指出，他以前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太过苛刻了——这个理论本身是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基础。此外，他在《依赖性的理性动物》中论述道，他在《德性之后》和《伦理学简史》中错误地假定“可能存在一种独立于生物学的伦理学”<sup>①</sup>。因此，在重新评价他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以及更为一般的人性理论之间的关系时，麦金太尔已经明显地缩短了他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理论距离。实际上，在 1958 年弗洛伊德研究的新版序言中，麦金太尔重申了在精神分析和政治学之间建立联系的必要性，这在某种程度上将使他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本身富有更加完美的意义。<sup>②</sup> 尽管麦金太尔的当代道德、政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但至少他改变后的观点为他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重新对话开辟了可能性。

（刘力永 译 孙乐强 校）

---

① A. MacIntyre, *Dependent Rational Animals*, London, 1999, p. x.

② MacIntyre, *The Unconscious*, pp. 27, 114.

## 9. 斯图亚特·霍尔的学术之路

詹姆斯·普罗科特

### “两大危机”

准确地说,霍尔在政治和学术上变得更加激进是因为发生了他所谓的“两大危机”<sup>①</sup>,也就是1956年在匈牙利和苏伊士运河区分别发生的两大政治危机。苏联出兵镇压匈牙利革命和英法侵占苏伊士运河相继在短时间内发生,这一切促使霍尔产生了明确的反斯大林主义与反帝国主义的思想。

霍尔于1957年离开牛津,成为伦敦南部地区的一名代课教师。同年,他与社会主义学会的同事——加拿大人查尔斯·泰勒以及两位英国犹太人拉斐尔·萨缪尔和加布里尔·皮尔森——共同创办并编辑了《大学与左派评论》。虽然这份杂志主要面向英国读者发行,但由不同国籍的人员构成的编委会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尽管编委中的牙买加人、加拿大人和不列颠人都属于少数族裔,但他们都赞同全球化并支持“多元文化主义”,这与英国传统左派将视野局限于岛国的特点形成了鲜明

---

<sup>①</sup> Stuart Hall, 'Interview with Roger Bromley', in J. Munns, G. Rajan and R. Bromley, ed., *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London: Longman, 1995, p. 663.

对照。苏联对匈牙利伊姆雷·纳吉政府的镇压给霍尔这一代共产党员带来了严重的精神创伤。霍尔回忆说，这次入侵使得拉斐尔·萨缪尔的“全部政治世界”“轰然倒塌”，也表明“斯大林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的蜕变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sup>①</sup>。1956年以后，新左派开始反感此前英国共产党领导人对莫斯科和东欧反资本主义革命所持的富有浪漫色彩的爱慕之情。同样，此时编辑们的年轻气盛也是不可小觑的。因为，霍尔及其同事自觉地将自己看做一代新人，强调应该对社会主义变革发挥新作用。“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霍尔及其新同事的确顺势而起，抓住了历史赋予他们的新使命。

大概也就是在这一时期，霍尔认识到回到牙买加或者“变成一个真正的英国人”都是不可能的。他后来的著作在理论上对“流散”、“混杂”和“身份认证”等所表现出的偏爱大概与他的身份“错位”经历有关，具体说来，这种身份错位也就是他的肤色和牙买加的阶级地位以及移民到英国所产生的精神创伤。他的著作中所不断重现的“滑移机制”和“时尚”、“问题”大概也起源于此。

霍尔在后来写作的一篇论文中指出，种族、经济和文化的同化、改变、顺应、抵制和重新选择并不能在牙买加社会中寻找到其最初的起源。<sup>②</sup>在这种发生了深度混合的微妙的组织结构中，文化共同体早已成为想象共同体。同样，它在表征、发明、选择性记忆和压抑等过程中存在着与霍尔的身份特征相类似的困境。

霍尔认为他自己拥有“双重流散的”身份。<sup>③</sup>在牙买加，他住的地方被认为拥有英国的文化和经济；而移民英国以后，他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他是作为种族的“他者”而存在的。他详细叙述了这种迁移的过程：

---

① Stuart Hall, 'Raphael Samuel 1934 - 1996', *New Left Review* 221, January-February 1997, pp. 119 - 127.

② Stuart Hall, 'Negotiating Caribbean Identities', *New Left Review* 209, September-October 1995, pp. 3 - 14.

③ *Ibid.*, p. 6.

我已经接受了殖民教育，内心对英国非常熟悉。但是，我不是而且从来也不能成为“英国人”。我谙熟两个地方，但根本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准确地说，这就是流散的经历，因为我远远不能体验到放逐和迷失，而更容易理解一种“总是延迟的”“到达”的难解之谜。<sup>①</sup>

尽管一般说来，放逐往往因象征着迷失、错位和痛苦等而不为人重视，但这对不断形成的外在的社会身份来说无疑提供了分析的便利。由于人们的边缘身份能促使其把周围本地人的惯习看做一种具有人类学意义的意愿，因此这种边缘身份对学术活动有很大的教益。雷蒙·威廉斯就是出身于一个居住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边境地带的家庭，因此他很好地运用了这种身份为他带来各种优势。人们正是因为从来没有“真正到达”而可以直接看到那些本地人身上所存在的局限，尽管这些本地人自信地认为他们知道本地域的谎言。这种惯习所具有的形而上的奇妙意义已经成为一座储量丰富的矿藏，霍尔在其论述种族、阶级和霸权的著作中不断对其进行发掘。他对“接合”概念的界定就体现了潜藏于本地人清晰的“常识”的后面的外来意识的缺失。对他而言，这种移民经历就满载种族负荷，因为其传达了关于身份“定位”、“增势”和意识形态等难以磨灭的教训。霍尔在论及其与其家庭的关系以及其与英国和牙买加的联系时，有一种强烈的主体“错位”意识。他写道：“我总能意识到自己在这种‘缺失—在场’与其他事情以及另外一个‘真我’的争执中被建构，因此，这种‘真我’既在此又不在此。”<sup>②</sup>

---

① Stuart Hall, 'The Formation of a Diasporic Intellectual: Interview with Kuan-Hsing Chen', in D. Morley and K-H. Chen, ed.,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96, p. 90.

② Stuart Hall, 'Minimal selves', in A. Gray and J. McGuigan, ed., *Studying Culture*, London: Arnold, 1993, p. 135.

## 新左派

《大学与左派评论》与《新理性者》于 1960 年合并为《新左派评论》。<sup>①</sup>《新理性者》最初是由来自英格兰北部的爱德华·汤普森、多萝茜·汤普森和约翰·萨维勒编辑的。这份杂志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表现出一种批判性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倾向。因此，在《新理性者》和《大学与左派评论》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新理性者》是由比霍尔年龄大的一代人编辑的。这批人成长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人民阵线运动中，以绥靖政治为耻辱，并且毫不妥协地反对法西斯主义。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抛出“秘密报告”以及苏联入侵匈牙利之后，《新理性者》成为共产党内持不同政见者的重要阵地。

与《新理性者》相比，《大学与左派评论》产生于 50 年代的战后学生运动中，并以牛津—伦敦这一主轴主办发行。这份杂志很少卷入共产党内部的教条主义论争。他们将自己看做独立左派重新振作的起点，并有意回避与政党政治发生各种牵涉和关联。这份杂志所追求的编辑路线认为，英国常规的高压政治制度和语言正在走向衰落。但是，英国国内的危机却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欧国家中所发生的霸权的瓦解相似。《大学与左派评论》指出，社会主义复兴不得不以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观念开始，并以对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社会结构和文化变迁的激动人心的重组作为分析的起点。这就要求把时政文章与更为理论化的论文编排在一起，同时出版发行。《大学与左派评论》有意地努力传达出，左派已经进入——如果人们可以借用一个霍尔在 30 多年以后所使用的被广为接受术语的话——“新时代”。

---

<sup>①</sup> 《新左派评论》编委会早期成员包括生活和工作在伦敦到剑桥一线的很多人，其中有苏格兰的肯·亚历山大和 D. G. 阿诺特、斯塔夫郡的阿兰·霍尔、利兹的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和约翰·雷克斯、赫尔的约翰·萨维勒、哈利法克斯的爱德华·汤普森和多萝茜·汤普森、曼彻斯特的彼得·沃斯利和苏塞克斯的雷蒙·威廉斯等。



《新理性者》与《大学与左派评论》在1960年合并,产生了《新左派评论》。霍尔在1960年到1961年之间任杂志的主编。雷蒙·威廉斯回忆指出,霍尔“追求一种更为接近原来的《大学与左派评论》的风格,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种新的文化风格、新的视觉表现方式和与传统左派杂志完全不同的语言表述”<sup>①</sup>。威廉斯赞同这种办刊思路,但他也注意到这种思路并不能获得所有编委会成员的认可,特别是那些来自《新理性者》编委会的成员往往持不同意见。

这份杂志成为“新左派俱乐部”的核心机构,除此之外新左派俱乐部还定期讨论教育、文学、新戏剧和种族的各种问题。这个俱乐部促成了反对核武器扩散运动。伊万·大卫斯也注意到,这个俱乐部的人经常由工人教育协会和全国工人学院理事会的成员构成。<sup>②</sup>因此,新左派起源于成建制的大学系部之外,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也不仅仅集中于伦敦这一大城市之内。<sup>③</sup>

《新左派评论》编委会的意见分歧使霍尔面临各种压力。威廉斯回忆说:

霍尔的作用因大家对期刊的各种内部规章的无休止的扯皮而未能得到充分发挥。我认为,编辑既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支持,以便能够获得适当施展自己才能的空间,也没有对编委会集体负责作出明确的规定。他要面对重重困难,还时常要为左派所面临的独特现状而备受责难。编辑部内部还对应该展开一场政治运动还是应该办好一份杂志进行了无休止的争论,还常常碰到诸如杂志暂时的债务之类的现实难题。<sup>④</sup>

---

① Raymond Williams, *Politics and Letters*,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9, p. 365.

② I. Davies, 'Cultural Theory in Britain: Narrative and Episteme',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10, no. 3, 1993, pp. 115-154.

③ 理查德·霍加特在赫尔大学从事成人教育工作;爱德华·汤普森从1948年到1965年任西约克郡的利兹大学校外部讲师;威廉斯在工人教育协会和东苏塞克的校外进修部工作。

④ Raymond Williams, *Politics and Letters*, p. 365.

霍尔在1962年辞掉了编辑工作,到伦敦大学切尔西学院教授传媒、电影和大众文化课程。<sup>①</sup>他与柏迪·华奈尔将这些问题与为英国电影学会所做的研究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成为大众文化教学法。这项研究最终作为《大众艺术》于1964年出版。在切尔西学院,霍尔开始更为系统地阅读人类学和社会学著作。他需要新的洞见,并借助威廉斯在《新左派评论》中所提出的作为“日常生活”和“整个生活方式”的文化观念,以进一步探索艾略特/利维斯文化传统的局限,这种文化传统也正是霍尔在牛津所面临并严词拒绝的文化观念。除此之外,保守主义走向破产,英国作为一个日薄西山的帝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优势地位的不断下降也显现出其国内经济基础的薄弱,再加上西方消费文化过于浮华浅薄,这一切都为左翼批评提供了极为良好的发展契机。在关注像男女同性恋权利、环境恶化、健康问题和社会不公的具体事例的公众社会运动出现之前,新左派运动组成了一个团结一致的大众阵线,并以此对资本主义的统治提出了富有深意的挑战。

## 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1964年,霍尔成为新成立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人员。这个中心是由伯明翰大学的英国文学教授理查德·霍加特创立的。他注意到,当时的英国大学里根本没有文化研究。因此,这个中心也就成为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冒险尝试。它得到了出版人爱伦·雷恩爵士的

---

<sup>①</sup> 切尔西学院任命霍尔为现在已经不存在的课程——辅修学科的讲师,这大概也增加了霍尔探索新奇事物的信心。霍尔回忆说:“我可能是第一批全职教授电影和媒介研究的教师之一。那里的系主任主要从事传统的文学研究,但是却敏锐地注意到辅修学科领域的这类文化争论将不断出现,并且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事实上,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文化研究’,其主要关注媒介、英国文化等问题,并且我们通常向牙科医生讲授一些未经审查的材料。”(Stuart Hall, ‘Interview with Roger Bromley’, in J. Munns, G. Rajan and R. Bromley, ed., *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p. 665)

企鹅图书公司通过赋税减免契约所成立的公共基金的资助。<sup>①</sup> 另外一笔资金则是来自查图出版公司和《观察家》杂志的一项为期7年、每年2500英镑的资助。还有一些通过申请课题获得的资助,比较著名的有为朗特里信托基金会所做的一项出版社研究。

霍加特最初设想中心主要从事三项工作:首先是历史哲学研究,再就是社会学研究,第三是文学批评研究。对霍加特而言,文学批评是“最为重要的”构成部分。<sup>②</sup> 霍加特的著作《识字的用途》(1958年)以怀旧的笔调详细叙述了英国北部的工人阶级的传统文化。这项研究尽管并不是唯一的或者令人肃然起敬的项目,但显然也成为中心研究项目中的一个“样板工程”。霍加特主要是作为一个精神领袖和当家人,通过高校的等级体制从英国文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影响伯明翰文化研究的发展。他与附近莱斯特大学的伊利亚·诺伊斯塔特颇为相似,因为后者组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社会学系。霍加特为维持中心运转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也赢得了伯明翰大学内部的各种重要力量的尊重和支持。

霍加特出身于工人阶级并有着宏大的志向,还充分认识到“日常”文化的价值,更是坚持认为边缘文化应该得到合理的表达。这一切使他更倾向于反对精英文化的自负与自恋,并且努力证明文化表达的边缘和从属形式有其自身的合法性,值得予以学术考量。但是,霍加特并没有试图为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教学与研究寻找一条政治道路,因为这并不是新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要关注的内容。后来,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霍尔的领导下才出现了这种转折。

顺此值得一提的是,雷蒙·威廉斯认为应该注意,文化研究起源于

---

<sup>①</sup> 霍加特在自传中回忆道,爱伦·雷恩喜欢评论说他仅仅花费了一英镑中的六便士就赚得了慷慨的美名(Richard Hoggart, *An Imagined Life: Life and Times 1959-91*,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92, p. 89)。当时最高的税率是十八先令六便士(97.5便士)。因此可以说,税务局尽可能地提供了90%以上的资金支持中心的发展。

<sup>②</sup> Richard Hoggart, *Speaking to Each Other*, p. 254.

“非都市的”和“非传统的”教学传承。<sup>①</sup> 英国文化研究发轫之初的三个关键人物——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威廉斯和 E. P. 汤普森——都任教于校外教育部门和工人教育协会。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立论相对公允的主张是，文化研究是由一批不适合英国传统大学体制的知识分子创建的。这就意味着，作为局外人并游走于知识和权力的边缘，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文化研究对自身特点的至关重要的设想。因此，继霍尔之后的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理查德·约翰逊认为，文化研究必须不断抵制学院派的作风，应该将文化问题与权力以及“社会可能性”的分析等问题联系起来。<sup>②</sup>

在霍加特的领导下，伯明翰学派的研究主要涵盖了阶级不平等、文化表征和“文化把关”的机制等宏大问题。不出所料，传媒所发挥的作用逐步成为研究关注的重心。这项研究一开始受到了美国信息传播研究的严重影响，没有形成相对成熟的理论。霍尔在学术上为中心作出的第一个贡献大概是将传媒研究剥离美国理论所强调的定量分析和经验研究，使其朝意识形态主题这一方向大步迈进。

霍尔承认，威廉斯所提出的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中的关系”的界定，对文化研究中心的理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sup>③</sup> 威廉斯的“选择性传统”和“情感结构”的概念同样重要。他通过使用“选择性传统”的概念意在表明，从制度和文本两个层面对文化数据进行筛选能够使人充分理解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论争与实践的历史发展及未来走势。对威廉斯而言，选择不可避免地掺杂着一定程度的人为加工，因为“核心”的确定必然导致“边缘”的产生。利维斯在教学中所建构的英国小说家的“伟大传统”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典型例证。利维斯所说的伟大和优秀既有他自己

---

① S. Laing, 'Raymond Williams and the Cultural Analysis of Television', *Media, Culture & Society* 13, 1991, p. 145.

② Ralph Miliband, *Class Power and State Power*, London: Verso, 1983, p. 9.

③ Stuart Hall, 'Cultural Studies: Two Paradigm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 1980, pp. 57-72.

的偏见,也存在着不公正。威廉斯认为,选择性传统作为建构文化的一种方法,存在重要缺陷,即它误认为当代所关注的问题具有永恒的真实性。面对这种指控,利维斯所创建的伟大传统显然不堪一击。

“情感结构”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主要是指一代人在文化形式中所折射出的知识、关切和感受等。新左派组织当然拥有同样的情感结构,其能够形塑他们的人生观、他们的著作以及他们的政治介入方式。而且,文化研究中心在高歌猛进时代自然能够以一种理论与政治兼具的研究表现出一种有机的“情感结构”和一种完全不同的内涵。

爱德华·汤普森将文化看做“一种斗争方式”对文化研究产生了更富“火药味”的影响,也对文化研究中心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饶有兴味的是,除了理查德·约翰逊和比尔·史华慈的著作之外,长期而又详细的历史研究并没有在文化研究中心获得兴盛的发展。另一方面,汤普森的文化史研究总是采取在概念与经验事实之间对话的方法对伯明翰学派的思想 and 论争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成为中心的图腾式的研究,以至于根本就没有促成一股与之相抗衡的历史研究潮流。约翰逊回忆说,与历史研究相比,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学术活动更多地集中在文学研究方面。<sup>①</sup> 即便如此,他还是指出,历史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1974 年到 1979 年的集体著作中,仍然是一个不容小觑的主题。集体著作和博士论文都研究了历史和理论、(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和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变迁、激进运动、国家霸权危机、英国特性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众政治学等一些问题。直到 80 年代中期,各小组的著作仍然以历史的方法研究文化。与之相同的是,部分集体指导的文学硕士也因不断强调历史追溯的重要性,在 80 年代仍然使用这一研究方法。不过,尽管确实应该

---

<sup>①</sup> R. Johnson, 'Historical Returns: Transdisciplinarity, Cultural Studies and History',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4, no. 3 2001, p. 261.

说历史成为伯明翰学派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特别是霍尔不断强调 1880 年到 1920 年这一历史时期对理解当代英国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但历史却从来没有走上学术研究的前台。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大概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对汤普森所持的一种反对态度。尽管他因英国工人阶级历史研究的突出贡献使得后人难以望其项背,但作为一个文化理论家,他明显存在遭人诟病之处。这方面没有比他对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sup>①</sup>所持的推理严密却又不公正的严苛指责更为典型的了。此外,当霍尔及其同事在热情高涨地接受阿尔都塞的理论并出版了自中心成立以来最重要的一部著作《监控危机》时,汤普森却对他们提出了严厉批评。

### “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

当霍加特被问及对霍尔领导的当代文化中心的发展有何评论时,他颇为言简意赅地指出,中心变得“a)更富政治色彩 b)也更具理论深度”<sup>②</sup>。霍尔在探讨文化研究成因的著名论文中指出,文化研究拥有“两种范式”。文化主义是英国的理论传统,与之相伴的是霍加特、威廉斯以及相对次要一点的汤普森的著作。他们拒绝了人类学所强调的文化是社会的“实践”或“习俗和民风”。相反,他们更为关注文化与物质条件、机构和历史传统的复杂关系。文化主义强调这种关系的整体效果能够建构一种决定社会结构的“整个生活方式”。与精英主义的理论研究相比,他们强调文化的“日常”性质。从政治角度来看,文化主义支持左派或者中间偏左的价值观,但并没有与马克思主义合为一体。的确,威廉斯总是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持批判性态度,在这种模式中,经济

<sup>①</sup> H. Marcuse, *The Aesthetic Dimension*, London: Macmillan, 1978.

<sup>②</sup> M. Gibson and J. Hartley, 'Forty years of Cultural Studies: an interview with Richard Hoggar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 1998, p. 19.

被看做能够对文化关系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样一种批评完全被霍尔接受了,因为,他明确反对“庸俗唯物主义”的实在论。

尽管如此,霍尔也清楚地认识到文化主义传统的缺陷。<sup>①</sup> 首先,它所强调的行动与体验能够使文化主义分析中的人本主义取向持久存在,霍尔明确地指出这种观念太天真了;其次,文化主义因还原论而遭到批评,这种分析使得理论并不具有充分的反思性;第三,文化主义并未连贯明确地描述出建构全部历史的各种关系——即霍尔所谓的“文化总体性”——的层次性。

结构主义能够修补文化主义自身存在的广为人知的缺陷,也因此而被接纳进入伯明翰学派的学术研究,并使其以更为完备的理论方法研究文化。对于霍尔而言,重要的结构主义者是路易·阿尔都塞、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当然还有马克思。结构主义对于文化分析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霍尔列出了四点:<sup>②</sup>

1. 理论的决定性。结构主义将文化经验放置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网中加以考察,其中男人和女人都被定位为社会行动者。结构主义反对经典文化主义所提出的对于行动的“富有英雄色彩的确证”,而是将行动置于权力的结构关系中。

2. 承认抽象的必要性。结构主义运用抽象来说明社会现实,并将抽象分为不同的层面,还分析了不同层面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层面与具体行动之间的对应关系。

3. 强调总体性。结构主义考察了行动与作为复杂整体的一部分的历史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复杂整体则是由不同及同源的实践构成的。这种对于“存在差异的整体”以及“复杂整体”的强调澄清了行动背后的语

---

<sup>①</sup> Stuart Hall, 'Cultural Studies: Two Paradigm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 1980, pp. 63 - 64; Stuart Hall, 'Notes on Deconstructing "the Popular"', in R. Samuel, ed., *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ist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1, pp. 228, 223 - 225.

<sup>②</sup> Stuart Hall, 'Cultural Studies: Two Paradigm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 1980, pp. 67 - 68.

境之间的关系,并在具体的文化与历史语境中揭示了“多元决定的”过程。

4. 强调意识形态。结构主义通过在意识形态范围内确定权力和行动的结构以实现对经验的“去中心”。然而,文化主义并不能审视这一领域,因为文化主义对经验作用的强调阻断了其与“一种合适的意识形态观念”之间的联系。

霍尔也认识到结构主义思想存在着追求纯抽象概念、功能主义和理论体系的封闭性等问题,并对其提出了批评。文化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正好能够克服这些缺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化主义拒绝将行动者看做“遭受文化荼毒的人”,并反对将行动仅仅看做对意识形态的反映。霍尔支持葛兰西的观点。因为,在霍尔看来,这一理论能够富有成效地弥补结构主义思想的各种不足,而且还将行动者看做一个见多识广、反思性的行为者。

霍尔对两种范式的颇有价值的讨论也表明,他试图让每一种范式的最有价值的部分在叙述过程中实现有机的结合。但是,他并不倾向于以结构主义取代文化主义。然而,霍加特认为,文化主义经过结构主义透镜的折射所导致的结果是文化研究变得更为理论化和政治化。饶有兴味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论述新时代的论文中,霍尔为社会主义“将每一件事都落实到语言‘结构’的”“问题”而感到惋惜。<sup>①</sup>当然,在英国马克思主义语境中,霍尔在伯明翰时期对于结构主义的支持成为促使这一理论流行的主要原因。

当然,霍尔对结构主义的支持并不是一个完全孤立的事件。“社会主义的”希望因巴黎学生和工人造反的失败而破灭,并由此促成了1968年的重要转折。此后,英国左派更为尖锐地批判了马克思主义自身所存在的缺陷。霍尔认为(由电影和电视协会主办的,《银幕》)和《银幕教育》

---

<sup>①</sup> Stuart Hall, 'Brave New World', *Socialist Review* 21, no.1, 1991, p. 59.



两份杂志在这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sup>①</sup>《银幕》充分运用了各种新的理论,其中包括克里斯蒂安·麦茨所发展的符号学理论、《电影笔记》与《动力》之间的论争、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和米歇尔·福柯提出的语言和话语理论、布莱希特关于现实主义的批判以及大概更为重要的雅克·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霍尔对《银幕》理论持批判态度<sup>②</sup>,他的这种态度有助于阐明伯明翰学派这一时期在研究文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不同特点。尽管他基本上赞同符号学理论,认为其中存在着便于解码常识意义的有益机制,并且由此能够揭示意识形态的控制力量,但是他拒绝银幕组织所支持的文本转向的观点。

银幕组织之所以出现文本转向是因为他们运用了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霍尔认为,拉康接受了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认识到主体“进入文化”的过程对于意义与符号表征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sup>③</sup>然而,在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中,这种转变主要存在于主体之外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中,而在拉康的理论中,这种转变在“符号”、语言和能指系统中内化为主体的建构过程。对于拉康而言,这个过程主要发生在无意识层面,并成为一种主体构成的说明。也就是说,这个过程通过把主体重新理论化为一种形成于知识和语言之间的“身份”,以反对弗洛伊德的完整主体观念。霍尔注意到,拉康主义认为语言是最为根本的,并且通过一系列的视觉类比解释了行动和意义之间的关系——“镜像阶段”、“凝视”、“看”、“视觉情节设定”。霍尔宣称伯明翰的立场是完全不同的,其中最为重要的区别是伯明翰学派强调表意与意识形态在具体的社会与历史结构中发挥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主体获得身份的过程是具体的,具有历史

---

① Stuart Hall,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ories of Language and Ideology', in Stuart Hall et al., ed., *Culture, Media, Language*, London: Unwin Hyman, 1980, p. 57.

② Ibid., pp. 157 - 162.

③ Ibid., pp. 158 - 159.

特殊性。然而在银幕派的理论中,这一过程却是跨文化的、“非历史的”。

克劳沃德从后结构主义的立场上对伯明翰学派的研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指责他们是一种决定论的观点,并且在理论上表现得非常天真。因为,他们毫无疑问把阶级和性别看做“被赋予”的,把文化实践看做阶级和其他结构的表达。<sup>①</sup>霍尔可能受到了这种批评的影响,但是他转向表征、表意和身份认同研究比这种指责至少要早五年。

伯明翰学派与银幕派存在理论分歧的关键在于,伯明翰学派否认文本的确定性,相反却认为文本存在着相互关联的多重意义,然而银幕派的研究却正好与之相反。都德对伯明翰学派在这方面的观点中所存在的矛盾非常感兴趣。<sup>②</sup>他评论说,大卫·莫雷认为伯明翰学派的研究更为清楚地感受到了符号和以符号为基础的话语的多义性特点,并支持对文化进行质疑性或拓展性解读。<sup>③</sup>这是对伯明翰学派所强调的“意识形态斗争”和抵制统治的重要作用的一种引申。从伯明翰学派的观点来看,这种强调在银幕理论中是缺失的,因为它将进入文化的过程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意识形态当做一种总体上受文本驱使的无意识过程。然而,都德也正确地注意到,伯明翰学派的研究反对无限多义的观念,因为它排除了具体的政治介入所应拥有的基础。<sup>④</sup>“倾向式解读”概念的提出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这个概念既支持葛兰西所强调的意识形态统治和霸权,也使伯明翰学派看穿了聚集在意识形态发展过程中“遭到雾霭包裹的”习惯、惯例和“常识”所发挥的政治作用。

然而,“倾向式解读”的概念对伯明翰学派而言却是有问题,因为倾向的判断标准显然是将意识形态和霸权看做一个文本,主体在其中被赋予了身份并提出了许多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行动和斗争的真实特点

① R. Coward, 'Class, "Culture" and Social Formation', *Screen* 18, 1977, pp. 75 - 105.

② A. Tudor, *Decoding Culture*, London: Sage, 1999, pp. 112 - 114.

③ D. Morley, *The 'Nationwide' Audience*,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1980, p. 167.

④ A. Tudor, *Decoding Culture*, p. 113.

的难题。我将在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模型中详细解释这一问题。<sup>①</sup>

## 在中心：伯明翰的教学与研究

仅仅关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理论和文化转向容易对霍尔领导下的中心所取得的不凡成就形成褊狭认识。霍尔主政期间还对教学、培训和出版等进行了一些较为重大的改革。很快就取得的明显成效是，中心的成员并不认为教学、研究和写作之间存在明确的界限。的确，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通过精心组织研究生教学，提出了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并且分成小组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同样，研究工作被期待能够有助于教学和学术讨论。然而，对教学、研究和出版的划分是一种为适应伯明翰学派发展而调配资源的方式，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调整是有着诸多益处的。

首先，从教学角度来看，霍尔所提倡的协作教学在英国大学中是史无前例的创新。伯明翰大学的个别辅导、研讨班和讲座不再存在等级差异，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学生参与的最大化。霍尔和他的同事组成第一学术梯队，采用了讲习班和学术讨论会等教学策略，同时，与学生的沟通与交流被看做教育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心全体人员参加的大会每周都举行，讨论涵盖了从课程内容安排到消防员罢工和撒切尔夫人的振兴计划等时事要闻在内的各种事情。一般理论研讨班向所有的小组开放，也允许对诸如阿尔都塞的价值和葛兰西的意义等理论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

对集体追求的政治目标以及学术内容的讨论大概能够充分地说明中心鼎盛时期的氛围。首先，这里存在着令人陶醉的“情感结构”，并且

---

<sup>①</sup> Stuart Hall, '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 Occasional Paper, Birmingham: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1973; Stuart Hall, 'Reflections on the Encoding/Decoding Model: 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in J. Cruz and J. Lewis, ed., *Viewing, Reading, Listening: Audiences and Cultural Reception*, Boulder: Westview, 1993, pp. 253-274.

令人感到激动的是,总是能够努力探索新的理论领域并发明新的方法和理论以促成这种情感结构。霍尔回忆道,“我们精心安排课程”,“这并不是一个学科而是一个探索领域的开创,其……对文化如何建构日常生活感兴趣。它提供了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契机”<sup>①</sup>。

中心能够提供两种文学硕士学位:一种是通过课程作业和专题论文;一种是通过学位论文。探讨通过课程作业和专题论文获得文学硕士学位的学生所学习的内容是非常有趣的,因为这可以被看做霍尔在主政时期对文化研究从事的基础性的技术培训。<sup>②</sup>

这种文学硕士学位是一种为期 12 个月的“教育”学位,由三门课程和一篇专题论文构成。学院规定要求三门课程中的两门必须通过考试来评定;第三门可以通过一篇不少于 5 000 字的专题研讨班论文来评定。专题论文,也就是一个接近于 12 000 字的研究,一般是夏天写作并于 10 月份提交。

#### 课程 1: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理论与方法课程所强调的主要方法是“文化”应该被在与传统学术研究——文化社会理论、韦伯理论、杜克海姆和“社会”理论、人类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批判、大众社会和大众文化理论——相对照使用。课程的第二部分连续关注五个独立的问题,分别是:

(1) 文化、意义与意义建构——语言和交流在文化“客观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2) 文化与意识形态——文化与信仰体系的关系、认知结构、意识形态和意识。

① M. Jaggi, ‘Prophet at the Margins’ (profile Stuart Hall), *The Guardian*, 8 July, 2000, p. 8.

② 一种是通过论文获得的文学硕士(M. A.),这种学位要求学生全日制学习一学年或者业余学习两学年,论文大约是 5 万字。另外一种是通过论文获得的文学硕士(M. Litt),要求学生全日制学习一年或者业余学习两年,论文大约是 8 万字。

(3) 文化与结构——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文化与文化机构的决定作用。

(4) 文化、亚文化与阶级——文化由各种社群组织及其历史实践构成并传播。

(5) 主导、从属、替代和反文化——它们是整体文化过程的“基本形式”。

## 课程 2: 英国社会与文化, 1880—1970

英国社会与文化课程将经过挑选的文化机构的变化与 1978—1979 年的“具体”时局和 19 世纪 80 年代到 1926 年的历史变化相联系。这门课程主要集中在:

(1) 文化历史和文化分析中的一般问题——文化的场域、文化和意识形态; 在一个宏大的历史框架内勘定时局; 变迁问题; 霸权的观念。

(2) 政治政党、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哲学——包括学校、大众传媒和文学; 与家庭和工作密切相关的“大众阶级”的文化。

(3) 文化转向的相互关系所解释的理论问题——例如, 从人生观到日常实践和“常识”的“层次”问题; 研究近年来的危机、连续和断裂的深层意义。

## 课程 3: 文化研究的对象领域

课程 3 主要被用来增强对文化研究中的一个特定研究领域所包含的基本文献、文化和方法的熟悉程度。事实上, 这就要成为一个现存的小组中的成员。小组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有效的信息分享和参与理论提升的机制建立的。然而, 这类技术教育的目的还包括创造一种集体主义的团结和共同的目标。如果我们不明白霍尔的工作既是一种政治事业又是一种学术活动, 那么我们就不能正确

理解霍尔在伯明翰所取得的成就。

除了教育课程和研究审查之外,中心还将自己看做一个从事文化研究的开放的智库。它热情鼓励并积极支持通过友谊、专题研讨班讲演、座谈会和公共讲座等各种方式与其他大学的学者建立联系。

霍加特偶尔介入研究工作,并以此对霍尔高超的学术研究水平表示赞赏。<sup>①</sup>这当然也可以由在霍尔任期内参与研究项目的毕业生的质量反映出来。在霍尔的领导下,伯明翰囊括了一批对他们那一代人的文化进行研究的最富有才干的学生。保罗·威利斯、迪克·赫伯迪格、詹尼斯·温希普、拉里·格洛斯伯格、安吉拉·默克罗比、保罗·吉洛伊、海柔·柯尔贝、比尔·史华兹、查斯·克里彻、夏洛特·布朗德森、大卫·莫里、多萝茜·霍布森、伊恩·钱伯斯、科林·斯帕科斯、菲尔·柯亨、格雷·麦克伦南、斯图亚特·莱颖、露西·布兰德、盖瑞·沃纳尔、法兰克·莫特都是“伯明翰学派的门徒”。

他们被饱含深情地赋予这一美名,但盛名之下也体现出他们所拥有的非凡的批判性洞见。为了全面理解这种洞见的特点,必须对霍尔在伯明翰时期所提倡和践行的学术作风予以描述。它从开始就是一种无所不用的研究文化的方法。霍尔在1979年的主任报告中列出在校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的研究主要包括政治/女性主义戏剧、妇女和福利国家、秘书工作与技术改进、种族的新闻表征、欧洲的先锋派运动、战后意大利的文化和社会运动、女孩从教育到工作所发生的转变、历史编纂学问题、性别意识形态、战后女性主义作家、意识形态、摄像技术与实践、1800年到1918年下层中产阶级文化、科学与冷战、民族主义与北爱尔兰问题、教室文化、喜剧电视片中的话语、保守主义的流行文化、20世纪50年代以来摇滚音乐的出现、种族和“种族关系”的建构、妇女与福利国家、媒体对运

---

<sup>①</sup> M. Gibson and J. Hartley, 'Forty years of Cultural Studies: an Interview with Richard Hogar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 1998, pp. 11-24.

动的表现、民族主义和抵抗性语言以及战后教育等问题。

这是一个将各种研究活动混合在一起的高效运作的学术团队，有时还因与传统大学体制相冲突而不得不面对令人气恼的政治和经济状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师生比例一直特别高。直到1974年霍加特正式退休时，只有他和霍尔是全职教师。1974年以后，理查德·约翰逊从经济和社会史系调了进来，米歇尔·格林则是一个还在英语系工作的兼职教师。<sup>①</sup>但是，伯明翰学派在整个60年代到70年代坚持完成的学术研究的质量和数量却是令人吃惊的，这也充分表明霍尔和他的同事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并做出了巨大贡献。

1979年的主任报告确定文化研究中心的学术研究重心是：文化史；教育；英国文学研究；家庭/学校；语言；传媒、种族和政治学；政权；妇女研究；妇女和法西斯主义以及劳动。每个问题都既采用传统的个人研究的方法，也采用主题研讨会的方法。然而，他们还要注意研究小组的人员构成，因为这类小组一般是被组建出来从事更为传统的具有等级模式的研究工作。在教学和科研方面，研究小组成为中心激发创造力、开展集体工作的主要构成单位。他们对主要研究内容所涉及的具体文本和一般问题进行集体讨论。在每一个学年结束时，研究小组都被要求向中心报告该年度的工作情况。小组也成为各种文章和著作产生的“苗床”。中心的研究规范与教学规范相类似，也就是尽可能由集体而不是个人来承担更多的任务。这当然与当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生教育活动完全相悖，因为当时主要是通过考试成绩、论文著作提交和研究论题答辩来凸显个体的自律与“原创性”。中心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却尽可能在各个环节上减少成员之间的身份差异。

霍尔改革的第三领域是中心的出版规划工作。中心工作的主要传

---

① I. Davies, *Cultural Studies and Beyond: Fragments of Empi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36.

播媒介是“文化研究工作报告”系列出版物。直到1978年,这份出版物都是自办发行,但因资源匮乏的压力以及不断有要求增加发行的呼声,最终与哈金森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协议。这份杂志在某种程度上为中心成员的全部著作以及在写作过程中的著作的出版搭建了一个平台。然而,它也能够激发出各种对话与批评性的争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富有声望的国内和国际撰稿人如斯坦利·科恩、乌蒙勃托·艾柯、弗雷·杰姆逊、杰奥弗·皮尔森、保罗·克里根、古盖汉姆·默多克和西蒙·弗里斯等人的外来稿件也得以出版。中心也出版了一些刻蜡油印论文和一部分期刊,例如:《妇女论争》、《论意识形态》、《通过仪式抵抗》和《政策与实践(1944年以来的英国教育)》。这个出版规划也获得了能够支持中心活动的丰厚经济回报。

文化研究中心的出版环境非常独特。讲演者和从事研究的学生经常一起写作,并互相评论对方的草稿。霍尔回忆指出,研究的问题和各种回应经常通过内部通讯和论文的方式得到传播。<sup>①</sup>任何人都可以使自己的见解得以发布。

这种协同研究的方法能够扩大集体参与,但是也容易使争论无果而终,因为“厨子越多,汤越难喝”。霍尔主政时期中心的许多出版物都具有开放式专题研讨的特点。霍尔解释说:“如果你阅读我们编写的书籍就会发现,它们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未完成的。它们缺乏你在只有一个作者的专著中所找到的那种论证的严密性,甚至连概念都不能前后一致。但是,我们能够组成我们共同合作的研究领域。”<sup>②</sup>这类出版物因出在开放式研讨班,所以其主题往往有赶时髦或回应当时公共关注的话题的特点。霍尔对马克思的理论方法所作的富有思想性的缜密阅读,<sup>③</sup>以及他

① Stuart Hall, 'Culture and Power: an Interview with Peter Osborne and Lynne Segal', *Radical Philosophy*, no. 86, 1997, p. 39.

② Ibid., p. 39.

③ Stuart Hall, 'A "reading" of Marx's 1857 Introduction to the *Grundrisse*', *CCCS Occasional Papers* (Birmingham), 1973, pp. 1-70.



对葛兰西和阿尔都塞与文化研究相关的论题所做的引人注目的超凡解读,都成为伯明翰研究与出版扛鼎之作。但是协调文化发展与理论连贯性之间关系的难题确实不好解决,而且它们在女性主义理论的新发展中变得更为棘手。

哈金森出版社为中心思想和研究的广泛传播提供了一个国际平台。出版规划甚至对文化的发展进行直接干预。不过,霍尔并不认为中心是一个极力推动阶级革命迅猛发展的政治行动者。<sup>①</sup>他不无道理地指出,如果中心发挥这样的作用,那么它就不得不与大学脱离关系,财政资助也将因此而被撤销。

霍尔关于中心学术工作的设想分为几个明显相关而又完全不同的方面,主要包括文化分析、文化批评和理论。这些任务中的每一项都与政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在霍尔看来,中心从来没有力图使马克思主义一家独大的雄心壮志。霍尔指出,他和他的同事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还原论模式,认为这种模式是粗制滥造的机械化的多元决定论的。<sup>②</sup>当然,马克思主义确实对中心的学术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70年代这种影响尤为明显。因为,在这一时期,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著作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问题提出了新马克思主义的全新理解。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借助对银幕派、克劳沃德和艾理斯的著作《语言和唯物主义》(1978年)的批评,重申了以唯物主义理论研究文化的重要意义。然而,霍尔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社会学、人类学、符号互动论、女性主义、犯罪学、语言学、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拉康精神分析和后结构主义等联合起来对文化研究产生影响的各种理论中的一个构成部分。他认为,主任的职责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推动不同分析、批

---

① Stuart Hall, 'Interview with Roger Bromley', in J. Munns, G. Rajan and R. Bromley, ed., *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pp. 666-667.

② Ibid., p. 667. 如前所述,霍尔就读于牛津大学时就对利维斯传统的某些重要特点提出了反对意见。然而,他也指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还原论相比,利维斯对文化关系的分析更为复杂,也更为准确。

评和理论立场进行对话。这种关系可以被用来表现经济和现实政治中存在的各种矛盾,然而,这种表现的过程也被看做伯明翰实践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当然,这在中心所从事的出版工作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当然,也有几部著作比较特殊,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论意识形态》(1978年)和《文化、传媒和语言》(1980年)。这两部著作的标题就显示出其并不是被预备来作为浅显的教学或研究内容的,或者将这些内容拿来出版。相反,这两部著作的目标是促进书籍和论文的发行,因为其有助于表现当代文化中的矛盾,与这种情况相类似的还有《通过仪式抵抗》(1976年)和《监控危机》(1978年)。

伯明翰的几个学生在60年代到70年代将这种体制称为一种教学和研究的“实验室”。尽管中心也因存在着追名逐利、个人之间的嫉妒和争夺经济资助等问题而不可避免的各种常见的学术摩擦,但比较明显的是它在60年代后期直到1978年之间培养并成功实现了真正的集体主义精神。这在一定程度上源自其成员的坚定信念,因为他们都参与一项新的重要研究,而这项研究则要求在方法论、理论和教学中不断创新。

当然,霍尔成为实际的主任之后,中心通过公开批判资本主义并推进社会主义改革等使其政治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霍尔回忆,在他主政中心期间,经常提出供讨论的首要的学术话题是预言右翼极权主义将再次出现。这也是《监控危机》的一个重要主题。霍尔的柯布顿信托基金会演讲(1979年)回到了这一主题,主要关注如何逐步进入一个正常的法制社会。当然,革命意义上的政治激进主义却从来没有真正进入讨论议程。

那么,为什么许多人将伯明翰中心看做政治反对者结盟的中心?霍尔分析指出,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中心非常明显地推行了知识民主化的路线。<sup>①</sup>它试图通过批判已确立的学科体制、大学的权力机构以及作为意

---

<sup>①</sup> Stuart Hall, 'Culture and Power: an Interview with Peter Osborne and Lynne Segal', *Radical Philosophy*, no. 86, 1997, p. 39.

识形态运作机制的知识制度化,使知识创造走上一种真正的集体主义道路。在霍尔看来,1968年的学生运动是使中心变得更为激进也更富政治色彩的决定性因素。<sup>①</sup>此后注册入学的学生都是1968年参与反抗和占领运动的激进分子。在学生激烈的批判下,反对美国挑起的逐步趋于紧张的越南战争的运动出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机构如家长制、家庭、教育体系、法律和警察等的批判活动也出现了。这一切无疑有助于中心在1968年之后形成独特的学术道德氛围。

### 有机和传统知识分子

然而,霍尔所追求的学术研究理念对文化研究中心产生了更为深刻的政治和伦理影响。这种学术理念的核心是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的观念。霍尔在1992年指出:

“有机知识分子”必须于同一时期在两条战线展开工作。一方面,我们不得不在理论研究的最前沿。因为,葛兰西指出,有机知识分子的工作就是要比传统知识分子知道得更多:是真的知道,而不是假装知道;不仅拥有获取知识的能力,还要更为深刻明确地获知……如果你处于霸权的博弈之中,你就不得不比“他们”更为机敏。因此,文化研究并不存在任何理论禁区。但是,第二个方面也是非常关键的:有机知识分子不能推脱其观念传播的职责,因为知识分子就是要在那些职业上不属于知识阶层的人中传授知识。如果这两条战线不在同一时期一起运作,或者这两种抱负不是文化研究所要追求的全部目标,那么你在参与政治活动的过程中就无法积

---

<sup>①</sup> Stuart Hall, 'Interview with Roger Bromley', pp. 666 - 667; Stuart Hall, 'Culture and Power: an Interview with Peter Osborne and Lynne Segal', *Radical Philosophy*, no. 86, 1997, p. 39.

极推动理论的发展。<sup>①</sup>

这就是霍尔对中心所需要的学术理念的全面表达,我认为这也是对学术活动的实质所做的最好的声明。我们将继续关注本段中的几个问题。

首先,霍尔在葛兰西之后,明确把有机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作了对比。有机知识分子就是承担保存和传播一个特定阶级或集团的特有知识、观念和价值的行动者。有机知识分子并非必然是一个革命的行动者,因为统治集团也需要思想工作者保存和传播存在于精神层面的与其他阶层完全不同的权力关系。然而,比较清楚的是,葛兰西认为有机知识分子能够打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藩篱,并培养一种能结成权力关系网的霸权意识,从而以这类方式在建构社会主义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葛兰西也指出,“传统知识分子”也在寻找“不受外界影响”的“客观的”的权威。霍尔认为,两种知识分子之间最为重要的差别是有机知识分子认识到存在一个明确的阶级联盟,而传统知识分子将他们自己看做“自由的漂浮者”,缺乏这种结盟关系。他的结论是传统知识分子经常因单纯的学院派作风而墨守成规。<sup>②</sup> 与之相比,有机知识分子一般不为学术建制的边界所局限,相反却在跨学科研究方面大显身手。因此最为理想的是,应该更好地陈述问题,更好地探讨答案。

霍尔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是通过学术研究确立知识的相关性。他以此为基础继续指出,有机知识分子认为学术并不存在边界,并强调知识作为一种资源能够对表现资本主义社会特点的权力关系做出回应。这也是他有意拒绝传统所认可的大学与社会之间存在分界线的原因,而是支持文化介入更具对话特点的模式。在这方面,他观察到他和他伯明

① D. Morley and K-H. Chen, ed.,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 in Cultural Studies*, p. 268.

② 无论是葛兰西还是霍尔都不是这一观点的最初提出者。19世纪晚期的德国哲学中就存在方法论之争,参与者包括威廉·狄尔泰、海因里希·李凯尔特和威廉·文德尔班等人。他们强调学术研究中的价值判断问题,并且要求以正确的方法解释社会各阶层在文化中所表现出的世界观。

翰时期的学生“一起构成了一个研究领域”，形成一种大的战略优势。他们也因此而一跃便从传统学术研究的封建领主式反省和自我满足感中解脱出来。

这也充分说明了为什么民族志工作在中心的研究活动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尽管霍尔总是花更多的时间在本地产作、讨论并从事理论研究，而不是从事访问和调查工作，但是，在他主持的一个项目中，保罗·威利斯、克里斯汀·格里芬、多萝茜·霍布森、菲尔·柯亨、翠西卡·麦卡比和大卫·莫里都运用了经过创新的民族志方法开拓和发展文化研究。因此，把中心看做一个清谈场所的观点是大错而特错的。定性研究比定量研究更具优越性，因此也成为研究文化中的经验数据的最好的方法。霍尔主政时期伯明翰所采用的民族志研究的性质和范围显示出中心的研究工作是丰富多样的。隐藏在民族志后面的一个重要的目标是，以“话语劳作”的方式解释霸权的运作过程并促成文化干预。

然而，参入“霸权博弈”的代价之一就是要与已经确立的学术成规进行斗争。霍加特提到了伯明翰学派中有一个关于这场斗争的非常有趣的具体事例。<sup>①</sup> 霍加特叙述说，一位副校长 1968 年认为中心引发了学生的激进主义并促成了叛乱和动荡。该副校长因此提出要关闭中心，或者至少通过成立一个能够记录中心活动的独立委员会来有效地缩减其影响范围。这个委员会找到了中心的一些科研工作的罪证。例如，它批评说科研论文使用大量“抽象、多音节的难懂”语言，一些论文为集体“所有”，委员会认为这与优秀的学术研究相背离。然而，让大学内的批评力量懊恼的是，这个委员会称赞中心的科研工作的质量是最好的，也由此而使其摆脱了在学生骚乱中曾煽动政治行动的指控。

显然，霍尔对“有机知识分子”概念的理解和应用都带有明显的伦理

---

<sup>①</sup> M. Gibson and J. Hartley, 'Forty years of Cultural Studies: an Interview with Richard Hoggar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 1998, pp. 17-18.

特点。对知识分子而言，“知道”并不是责任的全部，相反，他或她应该真正知道，并运用知识来回应权力。有机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就是要在科研、文化和政治介入之间保持一种对话关系。

学生和科研工作者对中心的学术研究所负的伦理责任倍感兴趣。但是，这种伦理责任也被与知识分子的自负以及偏向于认为伯明翰学派的著作具有先验的道德优越性等特点联系起来。霍尔对有机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所做的明确对比，成为这方面富有影响的观点。从理论上说，这一观点至少指明了有机知识分子与政治保持密切关系所产生的优势，同时也指明传统知识分子与政治关系疏远，因此而在精神上缺乏信仰。知识民主化并对大学制度化的教学结构提出挑战也具有重要意义。中心的学生和研究人员都意识到他们是在制度所能接受的前沿阵地工作，这无疑也给他们带来了相当大的文化声望。

这反过来也促成了“伯明翰学派门徒”的美誉，当然，这一称呼有时被贬义地用来指中心的研究人员和研究生。伯明翰的“有机知识分子”经常占据着道德的制高点，好像他们与生俱来就有这种习惯，并且他们的研究著作和写作拥有一种使人改变信仰的特点，好像他们的责任就是要改变控制这一领域各种困惑和模糊思想。这无疑也与中心著作的学术取向有关，它贪婪地寻找着社会批判的规律，而不是积极地从事社会建构的实践。如果中心设想自己的体制能够挑战传统的学科知识体系、大学已确立的教学和管理机构以及远离文化介入的传统学术中立，那么这也必然成为彰显社会批判的充分理由。进一步来说，从教学的角度来看，研究小组的创建无疑是一种创新，它以集体协作的方式促使研究者保持团结，这在英国的三级教育体系中至少是富有想象色彩的，也是非常新颖的。然而，从研究和写作来看，因相对轻视详细的政策、策略和未来发展而给中心带来过分重视抽象批评的指责。

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核心单位，也就是商业/工业企业并不值得严肃调查。伯明翰学派的所有著作都把资本主义看做文化和行

动能够在其中发展的语境。但是,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差异以及国内与跨国组织之间的制衡作用都成为中心的一部秘而不宣的著作。相反,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阿尔都塞的观念输入以后,中心更为关注资本主义国家。后者决定了资本主义运作的主要规则,并且也被看做促使有价值的社会主义变革发生的主要途径。

大概同样富有价值的是,应该研究中心对公共基金严重依赖的生存状况。70年代注册入学的许多学生主要依靠国家资助,经常还要靠大学助教的兼职薪金作为补充。在撒切尔夫人主政时期,压缩了从事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等“自由”主题研究的财政资助,兼职助教的机会也减少了。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和人文艺术“配额”的减少危及了中心的学位授予工作,并且也使得作为学术动力之源的伯明翰学派在80年代出现严重下滑。

## 伯明翰的“事业”

在许多传统学者而不是大学管理者和教育人事部门看来,伯明翰的“事业”经常表现出半颠覆性。这是不公正的。中心更为擅长理论分析,而不是为行动制定可行的计划。这些论述干涉主义政权、学校教育、种族主义和公共安全的著作意欲使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不过,尽管霍尔强调需要显现出观念与政治的联系,但中心对于直接政治行动的话语、争论和学术交流还是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偏向性。事实上,研究小组和学术研究所涉及的全部问题表明,中心从来没有完全集中对一个前后连贯的政治策略进行研究。更不必说,在伯明翰工作的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支持解放的政治。因此,他们研究的话题的范围很大,包括支持阶级抵抗、女性主义和“异性恋规范”的矛盾等。这些理论并不总是重合的。的确,我们在后面将更为详细地解释,妇女研究小组对中心的学术和社会活动中的“男流”统治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如果

这也是伯明翰的“事业”，那么它也就意味着鼓励对文化问题进行最大化、多样性和动态的研究，因为这类研究中很多理论可以运用，其中马克思主义在很多时候更是尤为有用。

尽管在支持激进社会变革方面存在着许多不协调的活动和姿态，但是中心并没有非常明显地直接支持政治变革。中心的真正的理论成就是使学生和公众明确意识到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形态在发挥作用，英国还存在着各种不平等的文化。但是直到今天，这项工作既没有真正产生关于政治行动的明确的观点，也没有形成可以维护的政治策略。可以肯定的是，70年代论述学校青年文化、种族、父权制、大众传媒的失真、工人阶级的孩子从学校到工作的转变等问题的著作都阐述了与阶级相伴的不公正和不公平等重要问题。当然，大概除了保罗·威利斯论述文化的同质性和差异性的才华横溢的著作之外<sup>①</sup>，中心在70年代和80年代倾向于重复关于抵抗行动的一致赞同的全部观点。爱德华·汤普森观察到：

我们不应该忘记“文化”是一个“混杂”的术语，事实上，其通过把如此多的活动集中起来并归入同一个门类而混淆或掩饰了应该在它们之间做出的区分。我们应该把这个共同门类区分开来，并仔细检视其构成要素：仪式、符号模式、霸权的文化属性、习俗的代际传承以及习俗在处于特定历史环境的工作和社会关系中的演变发展。<sup>②</sup>

伯明翰学派的著作正在将经过分解并做出必要区分的抵制行动加以理论概括。尽管阶级划分和种族区分得到了认可，但是文化冲突、融合、裂变的层次和构成部分以及他们对文化介入的各种内涵的分析，都没有得到充分说明。

---

① R. Coward, 'Class, "Culture" and Social Formation', *Screen* 18, 1977, pp. 75-105; Paul Willis, *Profane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8.

② E. P. Thompson, *Customs in Common*, London: Penguin, 1991, p. 13.



这至少会给使用抵制行动概念分析阶级、性别、亚文化和种族流动等问题带来很多难题。当人们考察伯明翰学派对抵制行动所处的霸权结构做出的解释时,这些难题也就搅和在了一起。他们在葛兰西之后清楚地分析了霸权依情况而不断发生变动的协商特点。这就与人们所梦寐以求的文化介入的积极作用联系起来,而文化研究中心也总对文化介入持乐观赞同的态度,因为他们指出在资本主义霸权下仍然值得为所有事情努力一搏。在理论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霸权的重压,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推动国家政权运作的这种压力被粉碎了,并且权力的流动性也揭示出这一问题。就像前面已经指出的,企业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发挥的作用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控制。中心在70年代的研究受到阿尔都塞的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理论的影响<sup>①</sup>,还受到密里本德和普兰查斯关于阶级作用和国家权力的争论的影响。<sup>②</sup>这部著作认为国家在精心编排霸权规则的过程中拥有一定的特权。就中心在所有研究中描述的全部企业而言,它确实作为福特主义<sup>③</sup>的范本被以“混杂”的术语所描述。但是80年代和90年代论述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著作非常明确地指出,与福特主义的要求相比,这些企业在形式与行动方面拥有丰富的多样性和很大的灵活性。企业在消费文化中所使用的商标和宣扬的主题都赋予了人们以活力并将之分化开来,而文化研究中心并未能真正认识这些问题。中心在70年代和80年代所犯的一个重要错误是未能对消费者做出严肃思考。它对消费者的具体体现和定位等问题的

---

① L. 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1; L. Althusser, *For Marx*, London: Verso, 1977.

② N. Poulantzas,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 London: Verso, 1973; Ralph Miliband, *Class Power and State Power*, London: Verso, 1983.

③ 福特主义是由亨利·福特针对汽车的大批量生产而发明的一种发达工业社会的组织生产的方法。很多人都知道福特主义强调大批量生产要与大批量消费相结合。然而,事实上,这一概念相当复杂,主要指严密的科层管理结构、大规模资本密集的生产设备、生产的标准化体系、招募半熟练的劳动力从事重复的机械劳动、严格的工会组织,以及国家对市场的保护主义政策等。

讨论圈定在新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拜物教的设想的范围内。这种局限在 80 年代被其他一些组织所突破,比较有名的是“理论、文化和社会”组织的成员,比较明显的是,它们并没有受到政治的束缚。

我认为 1978 年是中心出现转折的年份。伴随着伯明翰学派最为成功的研究著作《监控危机》的出版,潜伏于背后的张力也得以显现。特别是阿尔都塞“科学的”结构主义与更开放且更具解释效力的葛兰西的理论之间的冲突变得更为明显,女性主义对“男流”的批评在伯明翰理论中也变得更为尖锐。<sup>①</sup>

1979 年,霍尔离开伯明翰成为开放大学的社会学教授。理查德·约翰逊成为继任者。在约翰逊的领导下,日常生活的历史建构问题重新得到重视,一些评论者认为这种变化是对霍尔主政时期过分强调文本分析和民族志方法的一种潜在的批评。特纳写道,约翰逊认为,相对来说,伯明翰的民族志学正在“理论创立过程中”,并呈现出“温和精英主义的专制主义”趋向。<sup>②</sup>

霍尔离开之后,相对公正地说,中心再也没有出现过去的那种干劲和公共影响力。伯明翰的一些最有前途的毕业生正在这领域之外,甚至在英国之外确立自己的职业地位。伯明翰的事业通过文化研究、媒介与传播课程逐步在国内和国际传播开来。在 80 年代,撒切尔对高等教育实

① 中心的妇女研究小组在 1978 年出版了《妇女论争: 妇女从属地位面面观》(*Women Take Issue: Aspects of Women's Subordination*)一书。他们在导论中指出:

我们(妇女研究小组)发现我们不可能加入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其他小组从事研究。如果不能清楚地表达这些观点,我们感觉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学术研究所处的环境本身都被男性统治着。

霍尔回忆说这部著作发起了“一场争论”(Stuart Hall, 'Cultural Studies and its Theoretical Legacies', in L. Grossberg et al., ed.,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92, pp. 277-286)。不过也认识到,尽管女性主义受到欢迎,但“毫不怀疑”的是无论是在这部书出版之前还是出版之后,中心一直存在着蠢蠢欲动的父权制的残余。

② G. Turner,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90, p. 73; R. Johnson, '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Anyway?', Occasional Paper 74, Birmingham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1983.

行财政削减政策,中心的生存面临困境。约翰逊和他的继任者乔治·拉瑞恩为确保中心的学术发展和财政稳定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还顶住了大学将其重新划入英国文学系的压力。中心成为文化研究系,并且首次为增设的硕士点和博士点开设研究生课程。

## 从压迫到赞同和外国移民的身份

霍尔在1979年离开伯明翰中心,成为开放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在米尔顿凯恩斯,他与托尼·本尼特共同开设代号为U203的“大众文化”这门跨学科的研究生课程。这门课程从1982年开设一直坚持到1987年,开设第一年就吸引了1000多名学生。安东尼·伊斯普将U203看做英国对文化研究的最重要的制度介入,其地位仅次于伯明翰中心。<sup>①</sup>

饶有兴味的是,威廉斯曾经对开放大学的课程表示担忧。<sup>②</sup>他认为教学委员会以技术专家教学的方式拓宽了接受人群,但是也将教师与生活在当地的学生隔离开来。正如人们所料,威廉斯对填鸭式的教育方式提出了批评,认为这种教育方式将取消教学与“整个生活方式”的文化之间的关联。<sup>③</sup>在这个针对U203以及可能是霍尔本人的直率批评中,威廉斯为文化研究的结构主义转向表示惋惜。他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唯心主义理论”,其对行动并不能形成令人感到满意的观点。<sup>④</sup>在他看来,结

---

① A. Easthope, *British Post-Structuralism Since 1968*, London: Routledge, 1991, p. 74.

② Raymond Williams, *The Politics of Modernism*, London: Verso, 1989, pp. 157-158.

③ 饶有兴味的是,托尼·本尼特在澳大利亚的格里菲斯大学任职多年以后回到开放大学任社会学教授,此时他的第一个计划是“国家日常生活文化项目”(The National Everyday Culture Programme)。这一项目通过开放大学在社会科学方面所拥有的众多的德才兼备的兼职讲师,研究整个英国和爱尔兰的日常文化与当代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这些遍布全国的兼职讲师所发挥的作用因来自其他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的加盟而得到增强。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本尼特也因抓住了时机而获得了很多荣誉。但是,本尼特作为该项目的带头人并不否认,这个研究计划背后的理论动机是雷蒙·威廉斯的观点——“文化是日常的”。威廉斯坚持认为教学必须与人们的日常社会实践相联系,而整个项目也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④ Raymond Williams, *The Politics of Modernism*, p. 157.

构主义使课程设计者并不“审视”“人们在现实社会中的实际遭遇”，而是将这类境遇置于“更为深层的”结构主义理论框架内，由此必然导致开放大学与社会的“脱节”。威廉斯也对文化研究中结构主义理论的折中主义与偏向性提出批评。他抱怨说，这种理论“包含”“葛兰西和本雅明的”“完全不同的著作”的内容并对文化作了有限解读，例如，这种解读可以通过抛弃对巴赫金和梅德韦杰夫的唯心主义观点的批评得以实现。<sup>①</sup>

霍尔离开伯明翰的1979年也是玛格丽特·撒切尔执掌政权的年份。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他在《今日马克思主义》上发表的那些影响颇大、言辞激烈的文章充分显示，他已经成为撒切尔主义的最重要的公共批评者之一。如果说在70年代晚期之前，他以抽象术语在社会和文化层面对权力、霸权和多元决定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由此梦想成为难以应付的批评强手，那么他在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之后将这些理论付诸实践。撒切尔主义体现了意识形态控制、大众对于极权主义方案的赞同等所有关键问题，所以霍尔在近20年中一直忙于这项工作。但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对反对意见充满了强烈的敌视情绪，这也必然导致撒切尔夫人对霍尔的激怒，并刺激他提出富有创造力的批判性观点。霍尔的一些影响持久的完美力作就是在这些年中写作出来的。

起初，他所质疑的重要问题是为什么工人阶级“自愿”为公开取消其战后福利的政府投票。撒切尔夫人在1979年提出的从紧的公共财政和目光短浅的道德准则，既改变了詹姆斯·卡拉汉工党统治的“萧条之冬”的困境，也直接威胁了公民在健康、教育、失业和福利供给等方面的来之不易的权力。霍尔问道，为什么工人阶级乐意参与这种损害其利益的选举？后来，撒切尔夫人获得了另外两次选举的胜利，并通过托利党内部的一次暴乱最终将异己铲除。正是因为这些情况的出现，霍尔也将兴趣扩展至（与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相对的）英格兰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的文化、经济和

<sup>①</sup> Raymond Williams, *The Politics of Modernism*, pp. 157 - 158.

政治后果等问题。霍尔创造并提出了“专制主义民粹主义”的概念,以描述撒切尔主义以民主方式所终止的正在发展的文明、道德和经济。

霍尔在《监控危机》之后对“专制主义民粹主义”的分析坚持具体历史具体分析的原则。霍尔从一开始就认为传统左派以波澜不惊的态度面对过去的问题。此时,他坚持认为,撒切尔主义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强调直面现实历史,尽管这是通过不可遏制的资本利益勾勒出的失真了的现实。霍尔的分析指明,撒切尔主义是怎样运用存在于表面的各种矛盾要素并将其结合起来实现对大众的控制。他也没有放过左派,而是对詹姆斯·卡拉汉的工党政府引入的“务实的货币主义作风”提出了责难,并认为这为已发展成熟的“专制主义民粹主义”铺平了道路。他严厉批评处于反对者立场上的工党或者对重振阶级斗争怀有几分沾沾自喜的无益的怀念之情,或者与撒切尔主义“改革”的重要原则沆瀣一气,因此而打消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希望。这些年里,主体建构成为霍尔学术研究关注的重心,但在修正社会主义的政治语境中,这成为一种反对资本霸权的力量。

霍尔在这一时期反对左派的怒气大多源自他自信地认为,传统社会主义者并不认为撒切尔主义提出并发展的社会与经济变革具有巨大的震荡性特点。论述“新时代”的论文指出,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出现了一种从有组织的资本积累到有弹性的资本积累的划时代的转变。进一步来说,他认为与这种转变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是,19世纪最后几十年资本主义出现了从自由竞争阶段到福特主义所最终促成的更高级或有组织的阶段的转变。霍尔指出,新时代给人类生活的客观条件和人际关系的主观组织带来革命性的变革,最终也引发了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及其帮凶的绝交或决裂。他因为挑明这一状况而遭到了转向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左翼学者的广泛的批评。

事实上,霍尔有意与一时声名鹊起的后现代主义保持距离,特别是与其所提倡的社会变革的天启模式以及社会关系终结的见解保持距离。

然而,当新兴理论挑战了霍尔对解放政治学的理解时,他对后现代主义的回应则被批评为他想“鱼和熊掌兼得”<sup>①</sup>。论述新时代的论文指明,“后现代主义进行了不可靠的有歧义的研究”<sup>②</sup>。然而,从80年代后期开始,利奥塔关于宏大叙事瓦解的观点成为霍尔论述文化和政治著作的主要理论前提。尽管差异、散播和延异成为他论述身份认同的理论支撑点,但其中也不断伴有社会主义介入的行为。因此,在80年代中期之后,他越来越多地接受了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想。因此以至于斯帕科斯认为,霍尔的著作逐步出现远离以马克思主义解读身份问题的趋势。<sup>③</sup>这种转向背后的主要理论遗产是拉克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1977年)以及拉克劳和墨菲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1985年)。这项工作主要是通过拒绝意识形态要素必须有任何阶级内涵的观点来减弱阿尔都塞的理论影响。拉克劳的理论立场是,通过把主体所接受的质询从社会阶级转变为多元身份而对意识形态进行更具文化主义的解读。这就形成了一种强调个体差异的具体化的意识形态分

① 霍尔强调理论融汇结合的一大亮点是其将存在差异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完全对立的理论大胆地铆合在一起。在20世纪70年代,霍尔毫无顾忌地试图将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和葛兰西的解释路径结合在一起。在80年代和90年代,他将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德里达的哲学、朱迪斯·巴特勒的女性主义理论、拉克劳和墨菲的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福柯的“权力制度”和话语以及社会主义改革的推行结合起来。这种渴求包含一切的无尽欲望也证明了霍尔对各种理论的非同寻常的宽容。特别是对一个与左翼理论传统关系非常密切的人来说,这更是难能可贵的。然而,对许多批评家而言,它也显示出霍尔对理论方法的浓厚兴趣。但是,霍尔却根本没有注意到理论和方法的融汇结合所存在的矛盾性。他指出:

如果一种新的政治意向是具体的并且具有战略意义的话,那么其建构必须基于对现存局势的分析。当然,这种局势分析既不是仪式化的,更不是轰轰烈烈的,并且其也避免了与乐观主义、悲观主义或者必胜主义结合在一起而发挥不切实际的作用,而这三者却常常被看做传统左派的思想特征……我相信,如果我们打算超越现在,那么我们必须运用葛兰西的理论“深刻”而又全面地洞察到事态的原貌,这既不会产生幻觉也不会带来虚无缥缈的希望(Stuart Hall, *The Hard Road to Renewal: Thatche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Left*, London: Verso, 1988, pp. 13-14)。

② Stuart Hall and M. Jacques, ed., *New Time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89, p. 15.

③ C. Sparks, 'Stuart Hall, Cultural Studies and Marxism', in D. Morley and K-H. Chen, ed.,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 in Cultural Studies*, pp. 88-90.

析方法,从而探索意识形态话语如何运作以便质询种族、男女同性恋的身份等,而不是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组织的场所或基础。

拉克劳认为政治的中心矛盾存在于“群众”与权力集团之间,正是通过这种重新定位而摆脱了对阶级问题的讨论,转向对意识形态和表征问题进行讨论。这就为霍尔讨论“专制主义民粹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这一理论明确提出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解读文化,将其看做政治斗争的核心场域,其中存在着获得赞同和实施抵制的过程。它也论述了民族主义问题,霍尔将其用来说明撒切尔主义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巧妙运作,而这种运作则是通过对所谓的“英国性”的拒绝、继承和发扬来实现的。拉克劳对偶然性与话语的强调显然将霍尔从所谓的阿尔都塞主义的意识形态“基要主义”中解放出来。意识形态仍然是他的著作的重心,但他现在是通过可能存在的组织更为严肃地思考意识形态的折射作用。

80年代中期之后,身份问题成为霍尔著作的一个重要主题。毫无疑问的是,这在论述新时代的论文中也有反映。霍尔在其他地方指出,论述新时代的论文把“主体性回归”作为社会理论的焦点论题。<sup>①</sup>但是,它也反映出霍尔对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的兴趣与日俱增。霍尔从来没有充分解释,在他90年代的著作中大量出现的“不对称的身份”和“不断变化的”、“碎片化的”主体性怎样才能转化为社会主义变革所需的集体团结。这使得一些批评家抱怨霍尔的论述新时代的论文采用的是一种“幻境画”方法。<sup>②</sup>霍尔大概一眼就看出对社会主义变革

---

① Stuart Hall, 'Brave New World', *Socialist Review* 21, no. 1, 1991, pp. 57 - 64.

② 吉登斯认为,霍尔的政治见解的核心原则是将市场所带来的不平等和反复无常集中在一起予以纠正。这也就意味着在经济和市民社会管理中增加国家的力量,并且通过联合运用财政和法律等手段限制商业企业的权力。吉登斯批评霍尔并没有遵循论述新时代的论文所主张的原则,并且难以摆脱老一代左派所强调的阶级不平等和强大的社会主义政权等陈词滥调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批评与霍尔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社会主义传统主义进行痛斥的自我定位保持着一种张力关系(G. Mulgan, 'Whinge and a Prayer', *Marxism Today*, November-December 1998, pp. 15 - 16; A. Giddens, *The Third Way and its Critics*, Cambridge: Polity, 2000)。

的期待以及宣传一种将团结和集体行动置于优先地位的理论观点所面临的困境,因此而开始将自己的理论立场描述为“学术的悲观主义、意志的乐观主义”——这一短语最初由罗曼·罗兰创造,并且得到了葛兰西的援引和使用。

霍尔总是承认社会主义和任何激进运动必须根源于对差异的认识。在新左派兴起期间,种族问题大概使他变得更为敏感。由于肤色的差异,霍尔无疑感觉到新左派既没有得到很好的确认,也没有成熟的归属感。他后来的著作试图对集体行动和团结提出构想,并认为这类活动“总是有条件的,从来都不完整,总是通过差异得以运作”<sup>①</sup>。老一代新左派的“社会主义人”的概念存在着家长制和宗法制的内涵,这一内涵已经得到修正并进入了女性主义观点和种族问题。尽管霍尔宣称女性主义使他改变了关于身份、行动和政治的全部思考方式,但是他仍然没有写出很多直接论述这一主题的著作。相反,他的著作修正了“社会主义人”的观念,并对其超验性进行了论述,还以这种新的观点分析了种族问题。他坚持认为,自1951年移民英国以来,这个国家已经变成一个更具多元文化的社会,但至关重要的是,他还主张多元文化主义与种族主义共生共长。<sup>②</sup>

《帕雷克报告》(2000年)提出了一些政策,目的是促使政府和地方社区减少阻止社会融合的种族隔阂和压制。与其相似的是《麦菲逊报告》(1999年),其中提到因种族原因有意地谋杀了黑人少年斯蒂芬·劳伦斯,并认为英国社会存在着“制度化的种族主义”。制度化的种族主义指的是“未觉察的”、“无意识的”种族成规和偏见,其存在于公共机构和个人的日常实践之中。霍尔注意到这个术语至少在两个方面存在问题。首先,对偏见的未觉察和无意识特点的强调淡化了人们对英国社会自觉

① Stuart Hall, 'Then and Now: a Re-evaluation of the New Left', in R. Archer, ed., *Out of Apathy: Voices of the New Thirty Years on*, London: Verso, 1989, p. 154.

② Stuart Hall, 'From Scarman to Macpherson', *Society* (Open University) 3, 2000, pp. 8-9.



的种族主义的真实境况的认识。其次,因将这一术语毫无限制地运用于个人和公众所导致的危险是,容易将种族主义当成一种普遍的社会缺陷。人们因此也认为,这种缺陷如此普遍地存在以至于我们的生活自始至终都有这一问题,所以也根本无法采取有效措施根除它。这就真实地体现了葛兰西的格言,霍尔在这方面确实是一个“学术的悲观主义者,意志的乐观主义者”。他认为麦菲逊关于伦敦警察厅的制度化种族主义观点确实是一个“真实进步”,但也将其看做“不可能短期取胜或获得总体胜利的一场长期战役”中的一个事件。<sup>①</sup>一般来说,霍尔回避了在许多多元文化主义中能够找到的兴高采烈的情绪。<sup>②</sup>霍尔拥有激进的倾向和淡漠的态度,往往更愿意强调“艰难的复兴之路”,特别是论述社会主义的著作表现得尤为明显。

《帕雷克报告》详细地评论说,赢得这场战役的决定性因素是需要从多民族英国的视角修正英国人继承的传统观念。这需要给英国人养成一种新的文化习惯,也就是在促进社会融合的过程中根本不需要考虑种族问题,同时修改民族遗产观念以全面揭示有色人种的贡献。霍尔在其他地方写道,左派所面临的挑战是“将阶级和个体建构为一种群众力量——这也是政治和文化斗争的特点;使存在意见分歧的阶级和没有联系的人们——由文化以及其他因素所导致的——成为一种大众民主的文化力量”<sup>③</sup>。

为了探索英国多民族性和种族混杂的根源,《帕雷克报告》要求重新审查英国遗产并在国内展开大讨论。这样做的目的是形成关于英国内涵的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新观念,这一观念认为有色人种的移民身份(英国黑人、亚裔英国人、牙买加裔英国人、华裔英国人)与白种人的移民身

---

① Stuart Hall, 'From Scarman to Macpherson', *Society*(Open University)3, 2000, p. 8.

② P. McLaren, *Revolutionary Multiculturalism*, Boulder: Westview, 1997.

③ Stuart Hall, 'Notes on Deconstructing "the Popular"', in R. Samuel, ed., *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ist theory*, p. 239.

份(爱尔兰英国人、威尔士英国人和苏格兰英国人)同样重要。

霍尔的思想在这方面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他回忆指出,新左派并不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原则,而是寻求一种“社会想象的”社会主义。他接着指出,这需要建构一种超越目前语言的激进视角,还要投身于现实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当然,这类环境经常紧张忙乱并存在着各种冲突,人们在其中也是不断发生变化。它允许对压迫有不同的体验和理理解,以揭穿历史上英国左派与右派之间的论争的真实意义。霍尔中肯地指出,左派存在的问题是在广为“流散”的政治还没有取代“接合”政治的前提下就认可并接受了差异。<sup>①</sup>然而,他并没有清晰地提出建构“存在差异的整体”的解决方案。他越来越对视觉文化<sup>②</sup>,特别是黑人照片感兴趣,这也就意味着他将美学视为一种手段,由此存在差异的整体得以具体呈现。如果真是如此,这与赫伯特·马尔库塞后期的著作完全相同<sup>③</sup>,因为他们都指出艺术的基本潜能是促使阶级和个体成为一种“大众民主的文化力量”。霍尔无疑反对“资产阶级”将美学看做一种受控的整体,他的根据是美学并没有完全与存在不平等和排斥作用的现实形成对立。即使如此,对“存在差异的整体”的赞扬仍然留下了一些留而未答的难题。

在一定程度上,霍尔后期著作对于差异的混杂性和政治学的强调应该被看做其反本质主义的思维已经发展成熟了,这种思维也体现了他研究文化的独特理论路径。在80年代,他与撒切尔主义的论战以及对左派失败原因的分析都对推动新工党发展的思想和政治环境的创造发挥了作用。但是我们不久就可以看到,霍尔后来也对新工党许多政策提出

① Stuart Hall, 'Minimal Selves', in A. Gray and J. McGuigan, ed., *Studying Culture*, p. 137.

② Stuart Hall, 'Old and New Identities, Old and New Ethnicities', in A. King, ed., *Culture,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 System*,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1, pp. 41-68; Stuart Hall, 'The Multicultural Question',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Centre Annual Lectur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at [www.sheff.ac.uk/uni/academic/N-Q/lectures/htm](http://www.sheff.ac.uk/uni/academic/N-Q/lectures/htm).

③ H. Marcuse, *The Aesthetic Dimension*, London: Macmillan, 1978.

了批评,也进一步为那些认为他的著作存在理论跟风和观念变动的批评家提供可资批评的证据。霍尔希望看到的关于社会和文化的一种前后一致的观点,但这在他的著作中却是不存在的。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所发挥的作用可能也浪费了他的一些精力。

(李永新 译)

## 10. 汤姆·奈恩的民族主义理论:历史发展与当代批判

尼尔·戴维森

就在 20 世纪 60 年代那十年间,加泰罗尼亚、埃斯库达、奥西塔尼亚、魁北克、苏格兰、瓦隆和威尔斯等地的分离主义运动开始产生重大影响。伴随着这些运动的兴起,一种独立的民族主义在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地带日益高涨起来。民族主义进一步要求在众多的社会动乱之中扮演某种角色——虽然这绝不是最重要的角色,但正是这些社会动乱动摇了从 1968 年到 1976 年间的资本主义体系。尽管这些运动中没有一个成功地建立了新的政府,不过有些如加泰罗尼亚、魁北克,以及更晚近一些的苏格兰,则在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政府框架内获得了很大程度上的形式自主性。

在这些事件的刺激下,许多重要的民族主义研究著作应运而生。其中大多数论著是在两个波次中出现的。第一个波次出现于 1977 年到 1982 年间。第二个波次则出现在 1989 年到 1992 年间,是时,东欧民族主义精神获得了更为成功的复兴,开始要求建立新政府。不管批评家怎样批判这些作品,其中那些最优秀的作品还是以一种十分重要的——即使是不全面的——方式促进了我们对这一现

象的理解。<sup>①</sup>

在这些研究中,从明确的马克思主义视角出发把握问题的作品极少。其中之一就是苏格兰作者汤姆·奈恩的著作。他被许多人认为是有关这一问题最杰出的现代理论家。由此,如下事实就具有讽刺意味了:他的贡献强调了一种假定的不适用性,即认为马克思主义传统不适用于作为理解民族主义的工具。这说服了许多的左派成员。在一篇重要文章的著名篇首语中,他写道:“民族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最大的历史性失败。”<sup>②</sup>他在许多文章中都提到了这种观点,其中绝大多数文章都被收入了1977年首版的名为“英国的分裂”的文集中。不过,在近期一部名为“民族主义的面孔”的更为深入的文集中,奈恩再次回到了这一主题。就这本书来看,他不再把自己当做任何一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者了。事实上,他是否还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被继续描述为一个左派,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奈恩不再仅仅是一个研究民族主义的理论家——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其他什么主义的——而成了一个主张民族主义的理论家:他提倡民族主义,但不仅仅是为他自己的民族,而是把它作为一种普适的政治规划,为所有潜在的民族国家的人

① 这些主要的著作以出版时间为序分别是:T. Nairn, *The Break-up of Britain*, London: NLB, 1977; H. Seton-Watson, *Nations and States*, London: Methuen, 1977; J. Breuilly, *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2 and 1993; E.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B.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83 and 1991; A.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UK; New York, NY, USA: B. Blackwell, 1986; E. J.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Cambridge [Engl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N. Harris, *National Liber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St. Martin's 1990; A. D.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91; L. Greenfield, *Nationalism*, London: I. B. Tauris; New York, NY: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Canada distributed by St. Martin's Press, 1992; E. Gellner, *Nationalism*, Washington Square, N. 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7. 关于安德森、哈里斯、霍布斯鲍姆和吉尔纳第一本书的评论,参见 C. Harman, 'The Return of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56, Autumn 1992, pp. 4, 41-49.

② T. Nairn, 'The Modern Janus', *New Left Review* 94, November-December 1975, p. 3; *The Break-up of Britain*, p. 329.

民呼吁民族主义。这是以一种与革命社会主义者为工人阶级的权力而斗争十分相似的途径进行的。奈恩不仅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也放弃了社会主义本身，但他在这个方面所达到的程度却同时被其批判者和支持者们忽视了。<sup>①</sup> 这样的误解不应该再继续。奈恩所促进的，正是对世界无休止地分化为彼此竞争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这种历史趋势的理论辩护。

伴随着斯大林主义的垮台，以及社会民主主义之于资本主义的最奴颜媚骨的萎缩，对民族主义来说，出现了一种强有力的趋势，即它开始成为局部地区抵制全球危机影响的工具。这就苏格兰地区本身而言肯定是正确的。在那里，对布莱尔政府的幻想破灭导致了苏格兰国家党支持率的上升。虽然工人阶级支持苏格兰国家党必然反映着民族主义的增强这一情况从来都没有成为事实，但危险的是，它可能成为事实。<sup>②</sup> 要避免那种可能性，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要依赖于社会主义者去向其他工人有效地证明：民族主义不是我们所面临之问题的解决方案，而只是它们的一个表现。该证明的一个方面——虽然它并不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去挑战那个由奈恩所提倡的理论类型，在这种理论类型中，民族主义不仅被视为是值得向往的，并且也是自然的且不可避免的。因此，本文的第一部分将追溯奈恩的民族主义理论的发展轨迹；第二部分则是对他当前立场的一个批判。

---

① 关于前者，参见 N. Gentchev, 'Lambs to the Slaughter?', *Socialist review* 218, April 1998, pp. 29-30; 关于后者，参见 I. Bell, 'Spirit of Nationhood alive and Kicking as the World Goes Global', *The Scotsman*, 9 February 1998.

② 詹姆斯·凯勒斯很久以前就提出了这一点：“苏格兰国家党的命运确实已经影响到了民族意识的强度，但是，这一意识获得的支持比该党获得的选举支持要大得多。但因为这是主张‘民族自决的’或政治放权的苏格兰国家党，所以，这一点并没有得到必然的关注。就无明显的利益组织和个人——他们的认同紧随对苏格兰的认同——而言，它是苏格兰性的一种表现。”(J. G. Kellas, *The Scottish Political System*,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119.)

## 一、奈恩的民族主义理论：从历史到人类本质

奈恩写道：“我从来都没有隐瞒这样一个事实：即我自己的两难困境和古怪是源于我自己的国家——苏格兰——的国情。”<sup>①</sup>事实上，就奈恩写作生涯的第一个时期——1962年到1968年——而言，他对苏格兰完全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兴趣，相反，他与佩里·安德森（他后来成为《新左派评论》的主编）一起把注意力放在了关于英格兰的历史发展这一论题的建构上。“安德森—奈恩论题”的主要贡献其实是奈恩而不是安德森做出的，至少就其原初表述而言是这样的。<sup>②</sup>就本文的目的而言，该论题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涉及了英国国家被认为是陈旧的那种本质。这与奈恩后来的发展路向息息相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苏格兰的民族主义，并且通过它，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才成为奈恩作品的焦点。

### 1. 英国国家、工人阶级和工党

奈恩承认，内战和光荣革命的综合影响在英格兰建立了一种原始的资本主义经济。然而，他认为，因为那些事件发生在资本主义如此之早的一个发展阶段，所以，与100年后的法国雅各宾派不同，英国资产阶级并不要求从理论上理解它所导致的革命。因此，新统治阶级的文化是由地主贵族阶层比较坚固而持久的价值观所塑造的，这些地主贵族阶层在他们的尚未成熟而又年幼的合作者即资产阶级本身之上实施着霸权。与其他那些追求权力的资产阶级不一样，英国资产阶级并不是在他们获

---

① T. Nairn, 'The Question of Scotland', *Faces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2, p. 189.

② W. Thompson, 'Tom Nairn and the Crisis of the British State', *Contemporary Record*, vol. 6, no. 2, Autumn 1992, p. 308. 这一有趣的文章部分地是以1991年12月17日对奈恩的一次访谈为基础的，对于了解后者的学术生涯来说，这是一个有用的资源。也可参见 P. Anderson, 'Foreword', *English Ques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2, p. 3.

得了经济权之后才变得保守的，而是一直都是保守的。因此，这样一个国家——先在 1688 年被英格兰接受，继而在 1707 年联合王国成立之后又被苏格兰接受——在结构上是前现代的：“当然，虽然不是一个绝对主义的政体，但这种盎格鲁-英国国家仍然是从专制政治向现代立宪政治这一普遍转变的产物：它为走出前者指引了道路，但又未真正达到后者。”<sup>①</sup>英国国家的前现代特征借助帝国（掠夺）的战利品保存了下来，从而超越了它的自然的生命周期，这导致了后来所有的“现代化”对于统治阶级来说都是不必要的。最终，当英国被其现代化的对手超越，并因为大英帝国从殖民地撤退这一做法而受到削弱时，它就进入了一种几乎是永久的、左派政府和右派政府都未能解决的危机状况。

从表面上看，这一分析有点类似于托洛茨基在有关英国的文章中所做的分析。<sup>②</sup>但是，虽然托洛茨基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了被阿历克斯·柯林尼柯斯称为“先天不足”的东西，可是，他还是把它放到了世界体系的背景中，并强调工人阶级能够解决这种由此而形成的危机。<sup>③</sup>而奈恩关注的几乎只是民族领域，而且，他不接受英国工人阶级具有潜在革命性这种观点。同样，他也认为英国资本主义的早期形态是具有决定性的。英国工人阶级是在资产阶级革命（1789—1848 年）的古典时期形成的，但因为英国资产阶级此时已经取得了胜利，所以，无产阶级就只能独自为政治权利和社会进步而斗争，而没有能够像欧洲其他地区的无产阶级那样，从小资产阶级的反叛性中得到帮助。使人有挫败感的是，工人阶级被迫进入了一种“隔离”状态：虽然阶级的隔离状态使他们清楚地知道自

① T. Nairn, 'The Twilight of the British State', *New Left Review* 101-102, February-April 1977, p. 49; *The Break-up of Britain*, p. 75.

② L. D. Trotsky, *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ondon: Sphere Book, 1967, p. 27; 'Where Is Britain Going?', *Collected Writings and Speeches on Britain*, 3 Volumes, London: New Park Publications; New York: distributed by Labor Publications, 1974, vol 2, pp. 14, 39-40.

③ A. Callinicos, 'Exception or Symptom? The British Crisis and the World System', *New Left Review* 169, May-June 1988, p. 103.



己与其他阶级的文化差异,但不能使他们从自己也厕身其中的文化中识别出相反的利益。马克思主义已经阐明了这一情况,即:只有当工人阶级进入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类似于社会等级孤立的状态后,工人阶级才有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

根据奈恩的观点,通常被认为是代表英国工人利益的政党继承了那些特性。这个政党就是工党:领导它的是循规蹈矩和官僚化的右派,英国宪法所鼓吹的那些幻境让它痴迷不已,但起来反对它的,仅仅是一个满足于苍白无力的道德说教的“左派”。总之,对于实现社会主义而言,工党是一个毫无价值的工具。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奈恩的工党批判的前提不是工党背叛了它的支持者,而是工党总是太过忠实地反映了英国工人阶级缺乏阶级意识这一事实。

我无意详细批判奈恩的分析,因为这么做的文献已经有很多了。<sup>①</sup>不过,很清楚,我的主要论题是:尽管英国的国家形式不仅陈腐而且危机重重,但是,它却行使了对社会的控制,以致这一社会并不存在任何能够摧毁或者重建它的力量。

## 2. 苏格兰格子纹背心和五月的梦想

一开始,苏格兰的民族主义并没有指望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什么作用,因而没有提出任何主张。不过,苏格兰国家党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开始获得选民的支持,但左派和右派政治评论员对此都几乎视而不见。1961年,在格拉斯哥的布里奇顿选区的补选中,国家党候选人获得

---

<sup>①</sup> 有关“安德森—奈恩论题”的书籍实在是太多了,这里无法一一列出。实际上,是汤普森的《英格兰的特殊性》(1965年)一文率先像对待安德森那样认真对待奈恩,从而关注到了奈恩在这一争论中的贡献。在《理论的贫困》(1978年)一书中,我们可以找到这篇了不起的(并且极有趣的)论文的最好、也是最完整的版本。在前引柯林尼柯斯的著作中,柯林尼柯斯也对该论题进行了简短但切中要害的批判。关于对该论题中有关19世纪工人阶级政治之各种错误观念的纠正,参见C. Bambery, 'Myth and Reality in British Working Class Struggle', in J. Rees, ed., *Essays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ondon: Routledge & K. Paul, 1998。不过,该文的批判主要是以安德森而不是奈恩为起点的。

了相当可观的 18.7% 的得票率。第二年，国家党主席威廉·沃尔夫在西吕西安选区获得了 23% 的支持率，虽然还是落后胜选的工党候选人泰姆·戴耶尔，但比保守党和自由党候选人的得票总和还要高。最终，1967 年的 11 月，威尼弗里德·尤因以 18,397 票对 16,598 票的结果击败工党候选人，在以往都是工党稳操胜券的汉密尔顿选区赢得了补选胜利。<sup>①</sup> 在 1968 年刊发于《新左派评论》上题为“苏格兰民族主义的三个梦想”的文章中，奈恩注意到了这些发展的意义，尽管他当时对苏格兰国家党的民族主义抱有坚决的敌意。

奈恩认为，苏格兰人先后经历了三次界定其身份的尝试。其中第一次是加尔文主义。奈恩正确地指出，“上升中的资产阶级”并没有激发 1559 年改革。它无关紧要地度过了下一个世纪，只是到了 1746 年后才实现全面控制。事实上，苏格兰教会既扮演国家权利缺失的替代物，又充当了市民社会中的统一性因素。在 1707 年与英格兰联合之后，和苏格兰的法律体系一道，苏格兰教会成为苏格兰国家消失后硕果仅存的制度体系之一。最终，它成为分裂的民族身份得以维持的一个主要媒介。

与我们所预料的不同，奈恩所说的第二次尝试并不是启蒙运动，而是浪漫主义。事实上，在启蒙运动中，苏格兰是法国之外声名最为显赫的一个民族。不过，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并不关心苏格兰的特性，只是力图在政治上把自身认同于英国民族，并注重揭示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则：“虽然启蒙运动只是一个插曲，但浪漫主义却深入了她的灵魂。”<sup>②</sup> 不过，它做到这一点的方式显然不同于其他的欧洲民族：在意大利或者德国，浪漫主义是民族认同形式的一个部分；而在苏格兰，尤其是在瓦尔特·斯科特先生的作品中，浪漫主义则为其充当了民族认同的替代物。

① J. Brand, *The National Movement in Scotland*, London: Routledge and K. Paul, 1978, pp. 258 - 262.

② T. Nairn, 'The Three Dreams of Scottish Nationalism', *New Left Review* 49, May-June 1968, p. 7.

第三次尝试是工业化时期苏格兰的现代民族意识，奈恩认为它必将是精神分裂的。一个因素就是流行文化那种劣质的浪漫主义：萦绕其间的仍然是格子纹和苏格兰风笛、威士忌和布丁、尼斯湖水怪和《忠狗巴比传奇》、加尔文主义和苏格兰对大英帝国的军事贡献。另外一个因素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格子呢”。它最初是对苏格兰想象的拒绝，最终却在一个更加精致的水平上再生产了这种想象。

奈恩写道，苏格兰国家党代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这是一种社会主义者认为只有在两种形势下才具有历史合理性的政治形式：第一种形势是完成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第二种形势是它作为一种动员非欧洲地区的人民将自身从早期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帝国主义中解放出来的手段。因为苏格兰从来就没有出现第一种情况，因而也没有产生对第二种情况的需要。<sup>①</sup> 无论如何，奈恩认为，有两个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苏格兰人的民族热情是应该被支持的。第一，“它作为对英国帝国主义的完整性的抵抗”，以及第二，“因为它代表着权力向更小地区的某种转移”<sup>②</sup>。第一点还算得上是不反对苏格兰分离主义的一个合法理由。而第二点则有点成问题了，因为它暗示：较之于设立在伦敦的政府，设立在爱丁堡的政府可能在政治上——而不仅仅是在地理上——更接近选举它的人。并不支持苏格兰国家党的奈恩指出，苏格兰社会主义者必须发展出他们自己的民族主义形式，并以此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如此长久、如此无望地构想一个国家的苏格兰，难道真的创造不出一一种名副其实而又与时俱进、解放而又革命的民族主义？”<sup>③</sup>

1968年发生在法国的五月事件对奈恩影响很大。当时，他和别人合作写了一本关于五月事件的书，还亲自参与了占领伦敦弘赛艺术学院的

---

① T. Nairn, 'The Three Dreams of Scottish Nationalism', *New Left Review* 49, May-June 1968, p. 13.

② *Ibid.*, p. 16.

③ *Ibid.*, p. 18.

斗争。《苏格兰民族主义的三个梦想》的修订版后来被收录在1970年的《现代苏格兰回忆录》文集中。在这个文集中,革命社会主义对苏格兰民族主义的反对立场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奈恩写道,“穿苏格兰格子呢背心的资产阶级”并非始终没有受到挑战。“我既不想回避苏格兰的本土传统,如工人阶级抗议、约翰·麦克莱恩和克莱德赛德的激进主义,也不想回避矿工的共产主义传统。”但问题是,这些替代方案从来都不足以把他们的阶级敌人驱赶出去。就此而言,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是一个错误的解决方案,因为它在不同的阶级利益之间建立了一个错误的联合。奈恩继续指出,苏格兰人有两个选择,其中之一导向“陈旧的资产阶级民族的牢笼”,另一选择则是导向“革命的”完成,其现实将会摧毁这一牢笼并导向一个“真实的、富有意义的未来存在”。奈恩解释说,在1968年事件的鼓舞下,后一种可能性已经出现了:

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个十足的民族主义者,并且对格拉斯哥和爱丁堡的学生和年轻的工人有着足够的信心,这足以让我相信那些力量会在他们身上出现。我不承认1968年的伟大梦想是异在于我们的;不承认在法国索邦大学墙上的伟大言语就不会出现在国内的阿伯丁或者圣安德鲁斯的墙上;或是,林伍德和邓迪就不会成为法国的弗林斯和南特。我也不会承认,当面临在3月22日运动和尤因夫人之间做选择的时候,我们会因为是“苏格兰”而选择后者。

这种替代苏格兰国家党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明确的苏格兰社会主义反对立场,构成了奈恩对前者的初次让步。为什么“1968年的伟大梦想”首先必须被放到一个纯粹的苏格兰背景中加以思考呢?无论如何,这一论说的总体语调很清楚地是与当时的革命运动相一致的。但这并没有继续下去。

### 3. 欧洲一体化和大英帝国的解体

1972年,英国阶级斗争达到了自1919年以来的最高潮。此时,奈恩

写了一篇长文(占了《新左派评论》第75期的整本杂志)来批判在英国加入共同市场问题上占主导地位的左派立场。当时欧盟已开始为人所知。他的主要观点是,虽然在工人阶级斗争中确实有着显著的好转,但它并没有能够找到新的组织形式。与此同时,工党、英国工会联盟、共产党以及革命左派都忙于把工人的大量不满,导向反对英国加入共同市场这一相对安全的问题,努力使左派支持英国的民族主义。<sup>①</sup>

作为他当前立场的预兆,这一观点有两个需要提及的侧面。第一个是以下主张:当英国左派用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来反对资本主义的共同市场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在用它掩盖(他们对)英国帝国主义政体一体化的维护。第二,现在,奈恩看到了以国家自身之外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即西欧资本的超国家机构——推动英国国家向某个方向转变的唯一可能性。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中,在苏格兰国家党第二次重要的补选胜利之后(1973年11月在戈万),奈恩才重回到关于苏格兰民族主义主题上来。但现在的论调已经完全不同了。其充满争议性的《苏格兰和欧洲》一文最早刊发在1974年的《新左派评论》上。较之于苏格兰国家党的本质,这篇文章更关注对苏格兰特性的历史性分析。在这一方面,它或许是他写过的最好的东西。该文的开头是这个核心问题:为什么在其他民族运动主导欧洲政治的时候,苏格兰民族主义却是缺席的?为什么在20世纪20年代,在现代欧洲国家体系开始成型的时候,它仅仅采取了政治形式?只有迂回过一般的民族主义理论后,奈恩才给出答案。他写道,“与民族性及种族类别不一样,民族主义不能被视为一种‘自然的’现象”。事实上,它必须被界定为是对“反抗极端不发展这一令人不快的事

---

<sup>①</sup> T. Nairn, 'The Left Against Europe?', *New Left Review* 75, September-October 1972, pp. 116-119.

实的一种动员”<sup>①</sup>。现代资本主义世界是在由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所施加的合力影响下出现的。它们迫使所有其他国家去复制它们的成功，以便能够和它们的更发达的对手有力地竞争，或是被这些对手所操控。但是，这并不是简单接受它的先行者所界定的“进步”，而必须拒绝后者所附加的这种“进步”。这一过程与资产阶级革命多少有些类似。它的展开从19世纪60年代的德国统一、意大利统一，一直延续到发生在诸如爱尔兰和孟加拉国这样完全不同地区的当代民族解放运动。

苏格兰在何处适应于这种二元历史发展观的呢？奈恩不寻常地强调，通过1707年的联盟，苏格兰“利用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就，从而进入了——事实上，帮助确定了——资本主义发达世界。在民族主义时代开始之前，苏格兰的资本主义发展就已经完全实现了。因此，虽然苏格兰具有民族主义运动所需要的所有必要因素——上升中的资产阶级、知识界、广泛传播着的对英格兰的敌视传统、本民族的教会——但是，没有一个社会阶级要求发动这样的运动。

直到后一年，当奈恩在《苏格兰红皮书》——它的主编当时还是一名左派，现在则是工党政府的财政大臣——上发表《新旧苏格兰民族主义》一文后，这一分析的政治暗示才开始变得清晰起来。奈恩认为，像西欧其他一些地区一样，苏格兰正在经历着他称为新民族主义的东西。在苏格兰语境中，随着北海上石油公司的出现，美国出现了。这提供了一种帝国主义入侵的功能替代物，由此激发了现代化的、“发展性的”、先前苏格兰并不需要的民族主义。在这里，奈恩放弃了《苏格兰民族主义的三个梦想》中的早期分析。该分析假设苏格兰的自主将会作为社会主义的结果而到来。之所以放弃，是因为奈恩认为它是建立在“两个误解”的基础上的：“高估了社会主义的潜力

---

<sup>①</sup> T. Nairn, 'Scotland and Europe', *New Left Review* 83, January-February 1974, pp. 63, 60; *The Break-up of Britain*, pp. 99, 96.

并且低估了资本主义进一步转变的能力。”依据奈恩的观点，“左派对建立在斗争(它被理解为一种潜在的国际力量)基础之上的工人阶级的理性力量给予了太多的信心”，而对民族主义的非理性力量则又太不信任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主义者没有多少选择，只能接受民族主义的持续影响，“在我看来，以一种抽象的国际主义、一种只存在于热情中的普遍的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名义来反对这种趋势，在总体上已经变得不可能了”。<sup>①</sup>

这些话写于1975年。当时，1968年运动所开启的革命时代正在接近尾声。奈恩似乎把苏格兰民族主义视为工人阶级不能摧毁英国国家的无能性的替代物：“它比其他因素，甚至比1972年和1974年的矿工罢工更多地揭露了旧的共识及两党轮流坐庄政治的老态龙钟。”<sup>②</sup>这些说法令人十分震惊。在20世纪，英国国家仅仅在三个情况下才真正处于危机(主要是作为内部矛盾的结果而不是战争的结果)：第一个在1910年到1914年之间，然后是1919年，最后是在1969年到1974年之间。而在引发这些危机的系列因素中，苏格兰民族主义每一次都是以某种方式追随着爱尔兰的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而出现的。

实际上，奈恩把经典的自由主义形式的国家视为一种在社会之上实施压制的自治主体。他对这种国家的憎恨是不可否认的。但这种憎恨主要不是来自这种国家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来运作社会这一事实，而是来自它在“现代化”方面的无能。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些威胁到了想象中的英国国家统治权的、处于政治最高层的事件，具有了工厂斗争看起来并不直接拥有的特殊意义。

与对民族主义所持的工具主义观点一样，奈恩并没有以更传统的苏

---

① T. Nairn, 'Old and New Scottish Nationalism', in G. Brown, ed., *The Red Paper on Scotland*, Edinburgh: EUSPB, 1975, pp. 47, 49; *The Break-up of Britain*, p. 179. 在该文的再版版本中，本文所引段落的大多数内容并不在内。

② *Ibid.*, *The Red Paper on Scotland*, p. 24; *The Break-up of Britain*, p. 130.

格兰民族主义方式沉浸在苏格兰的光荣历史的回忆中。事实上,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实现了这一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既夸大了联合王国成立之前苏格兰的保守性,又夸大了苏格兰流行文化的盲目性。<sup>①</sup>为此,克雷格·贝弗里奇和罗纳德·特恩布尔——他们自称民族主义“哲学家”——对他进行了谴责。他们对下列人等进行了明确的区分:一类是像奈恩这样的人,他们被认为是在“为社会主义的未来而斗争”,在这一未来中,民族主义仅仅是一种“战术可能性”;一类则是像他们自己这样的人,他们为了“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整体之不可分割部分的文化、历史和人民”而斗争。<sup>②</sup>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种区分还算贴切。奈恩坚持认为,苏格兰民族主义应该得到支持,因为它为由矿工以及类似的其他人所发起的毫无希望的经济斗争提供了一种通往社会主义的替代可能性。在1977年,他强调苏格兰(并且在更小范围内,威尔士)民族主义不是阶级斗争,从而暗示了一种清晰观点:

事实是,在不列颠,新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了旧国家的掘墓人,这样,它也成为一个造成某种类型的政治革命的首要因素——这在英格兰以及其他一些小国都一样。然而,由于这一过程假定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形式,很多都市左派很严肃地把它当做了对革命的背叛而

① 关于前者,《苏格兰和欧洲》说:“在黑暗年代、这个无法形容的17世纪之后,1688年标志着苏格兰的真正黎明。”(*The Break-up of Britain*, p. 109)关于后者,《新旧苏格兰民族主义》说:“[菜园文化]是和下列很多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媚俗的象征、口号、饰品、横幅、战争的呼喊、小饰物、音乐大厅的英雄、图标、传统的谚语和感情(也有不少人是‘简洁的’)——长久以来,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捍卫着‘苏格兰’在世界上的名声。安妮·斯和A. J. 克罗琳为广大的格子呢裙怪物们所提供的,并不比穿着相对体面外衣的人更多。在他们的作品中,没有小费就办不成事。但是,在伦敦共产国际之夜酒吧中,或者在爱丁堡城堡前欢度军乐节的拥挤人群中,事情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太庸俗了!多么难以忍受的、愚钝的、盲目的庸俗啊!人们知道,媚俗是所有地方的流行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但这也太荒谬了!”(*The Red Paper on Scotland*, p. 39; *The Break-up of Britain*, p. 162.)如果考虑到《勇敢的心》所取得的成功,以及美国近期宣布把4月6日定为“格子呢之日”加以庆祝,那么,奈恩的第二点或许并不算非常夸张。

② C. Beveridge and R Turnbull, ‘Scottish Nationalist, British Marxist: the Strange Case of Tom Nairn’, *The Eclipse of Scottish Culture*, Edinburgh: Polygon, 1989, pp. 59, 60.



记述了下来。

理由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被设想成为这个掘墓人,并且,没有其他人能够做到。所以他们告诉民族主义者放下挖掘机,并且忍受“移交”的可怜的限制:革命将会与其他(问题)一起解决他们的问题。同时,他们需要等待时机成熟——即社会主义的时候——再去紧紧抓住他们的小资产阶级,至于现在则需要压抑冲动。本质上统一的联合王国必须被维持直到全不列颠的工人阶级准备就绪。<sup>①</sup>

奈恩最初发展了一种普遍的民族主义,为的是解释苏格兰民族的特殊性。现在,他从特殊性回到了一般性,伴随他的是关于工人阶级政治的悲观主义——这在《新旧苏格兰民族主义》中表现得特别典型。在同样写于1975年的《现代贾纳斯》中,他重新总结了自己的观点,因为在过去的七年里它们已经发展了。首先,提请注意下面一点是重要的,奈恩并不佯称所有的民族主义——或者事实上,任何民族主义——都是完全合乎道德的。尽管承认做判断必须与建立在政治标准上的特殊情况相关,但奈恩坚持认为,这并不是决定性的。最终,所有的民族主义者都具有同样的矛盾本质:

在这样的意义上,民族主义能够被描绘为类似于古罗马的神——贾纳斯,他站在门槛上,一只眼睛看着前方,一只眼睛看着后面。因此,民族主义确实为人类社会站在了通往现代性的通道上。既然人类被迫通过它的狭窄的门洞,它必须拼命地回望过去,在所有它能够找到的地方为“发展的”磨难聚集力量。

这是关于1789年之后民族主义的发展——即作为现代化的精英对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一种必要反应——的通常分析。现在它伴随着对被压迫者的独立角色的消解:“民族主义的新兴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邀

---

<sup>①</sup> T. Nairn, 'The Twilight of the British State', *New Left Review* 101-102, February-April, 1977, pp. 59-60; *The Break-up of Britain*, pp. 89-90.

请大众深入历史,并且,邀请函必须用他们能够理解的语言来书写。”后来在同一篇文章中,奈恩强调,在相似系统的核心或外围,民族主义是不可避免的:“阶级是作为‘无产者’,而不是‘德国人’、‘古巴人’、‘爱尔兰人’等等而出现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从来没有这样一种新的普遍的阶级出现的可能性,因为:

民族主义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才有效,因为它实际上为大众提供了一些真实的、重要的东西——一种以狭隘的知识分子的模式而设定的阶级意识从来都不可能提供出来,一种文化虽然是可悲的,但是它要比我们的作为启蒙遗产的理性主义更广、更易理解、更和大众的现实有关系。如果是这样,那么,民族主义是一种错误的意识就不可能是真的。它在现代发展中必定有一种功能,有可能是一种比阶级意识和这一阶段中单个的民族国家的阶级形式更重要的功能。<sup>①</sup>

奈恩试图通过加入苏格兰工党把他的这一理论付诸实践,这个组织是由工党议员杰姆·希拉尔和阿列克斯·尼尔在1976年1月建立的。回顾苏格兰工党的简短历史,其成员从来都没有超过1000人。这表明:在苏格兰这个很狭小的空间里,在工党和苏格兰国家党之间,只能存在一个很小的改良主义政党。对于奈恩来说,既然“我们必须持续地在两条战线作战”<sup>②</sup>,那么,不偏不倚地联合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就是这一组织的力量源泉所在。但发生在苏格兰的事件让奈恩放弃了那条社会主义战线。

1978年,工党政府成为下议院中的少数党政府,从而面临来自两个方面的巨大压力:社会主义者反对工党抨击工会和福利国家,而撒切尔夫人所领导的复苏了的保守党则抨击工党打压工会和福利国家还不够狠。少数派的工党政府部分地依赖于苏格兰国家党在威斯敏斯特的支

① T. Nairn, 'The Modern Janus', *New Left Review* 94, pp. 12, 18, 22 - 23; *The Breakup of Britain*, pp. 339 - 340, 348 - 349, 354.

② T. Nairn,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ternal SLP document, cited in H Drucker, *Breakaway, the Scottish Labour Party*, Edinburgh: EUSPB, 1978, p. 124.

持,并且需要同时破坏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不过需要表现的像是要满足民族主义者的要求一样。该伎俩得以实施的关键是让苏格兰人建立一个基本上无能为力的议会。为了摆脱——至少是在危机正在爆发的时候摆脱——苏格兰独立这种危机,工党首相希望这个议会能够充分满足苏格兰人的民族愿望。该计划或许有效,但它因为工党内部的反对而胎死腹中了。1978年7月的“苏格兰法案”允许行政放权,前提是公投要得到大多数苏格兰选民的支持。乔治·坎宁安(代表伦敦的伊斯林顿选区的苏格兰议员)对该条例——它要求在公投中必须得到40%的苏格兰选民的支持,而不是简单多数支持——提出了一项修正案。在接下来的竞选活动中,工党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支持“工党投反对票”委员会,而另一部分人支持“工党投赞成票”运动。

在工党之外,苏格兰左派在支持放权上表现了巨大的一致性。1964年,英国共产党就已经采取支持苏格兰“民族自决”的政策。在传统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中,国际马克思主义集团以及激进的支持者都支持放权。只有社会主义工人党不同寻常地站在了左派一致立场之外,即站在了一种可以被称为“有害的弃权”的立场上。<sup>①</sup>然而,问题不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在这一事件中采取了一种错误的立场(教训是事后才知道的),而在于大多数左派都支持放权(这与奈恩后来所宣称的相反)。

最后,只有32.9%的投票者投了赞成票。事实上,总共只有63.8%的投票率。这说明,大多数苏格兰人的注意力——当然也就是大多数苏格兰工人的注意力——可能并不在这里。英国的竞选活动直到所谓的“冬季不满”时期,即英国历史上最后的大规模的总罢工斗争高潮结束之后才开始。这正是来自下层的反对限制工资的压力最终迫使工会领导号召反对工党政府的时候。与1969年到1975年之间的罢工不一样,这

---

① 借助奥·伍列这个卡通人物,“哇哦!我们需要的不是放权,而是革命!”这个口号变得广为人知,乃至《社会主义工人》也都迅速模仿了。虽然这在形式上无疑是正确的,但可能不是让苏格兰工人阶级介入此问题讨论的最佳方式。

时的罢工弥漫着的不是乐观主义和希望，而是悲观主义和失望。在大选前几个月，很多人就感到：选出一个保守党政府将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一事件中，苏格兰国家党不可避免地撤销了对“苏格兰法案”的支持。这虽然遭到工党的谴责，却得到了保守党人的支持。这导致工党政府下台，重新开始大选，最终是第一届撒切尔政府上台。

正如安德鲁·马尔所写的：“带着部分的苦难和幻灭，苏格兰政治界和报界迎来了（公民复决）的结果，这种情绪反映了苏格兰偏远地区的左倾机构发现他们的观点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没有得到广泛认同时的不知所措。”<sup>①</sup>这时的奈恩感觉到了“苦难”和“幻灭”，然而，他并没有因为苏格兰人民缺乏放权的热情而责备他们。对于奈恩来说，应当受到责难的是别人即左派。

在写于1979年公民复决之后的名为“国际主义：一个批判”的文章的一个新尾注中，奈恩写到了这一失败：“在非常不利的情况下，较少的票数确实因为赞成工党政府的放权法案而投了票；然而却被一种旧帝国主义和这里所分析的‘国际主义’的结合挫败。”<sup>②</sup>这其中显示了一些东西。“旧帝国主义”就够直接的了。工党右翼——像乔治·坎宁安和丹·达耶尔在那时和现在都在投身于维护英国帝国主义的国家一体化工作，并反对任何形式的宪法改革：不管这是多么的肤浅，（说它肤浅是因为）它将不可避免地导向分裂主义。那“国际主义”呢？同样的事情基本上都是工党左派干的，虽然强调的重点不一样。正如埃里克·赫弗在他的回忆录中所写的：“我担心给苏格兰和威尔士放权将会削弱作为一个统一的经济体的英国，并且会在整体上有害于社会主义。”<sup>③</sup>奈恩的错

① A. Marr, *The Battle for Scotland*,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92, p. 162.

② T. Nairn, *Faces of Nationalism*, p. 227.

③ E. Heffer, *Never a Yes Man*,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1, p. 165. 赫弗记录了他的观点是如何被议会采纳的：“在下院，我的发言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那些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和罗莎·卢森堡所争论的问题……它们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他总是设想他们正在下院如何如何，这是其政治生涯的悲剧的一部分。

误在于,他假设:苏格兰民族主义遭到的每一次反对都必然以“联合主义者”对英国国家的支持为基础。

在1981年10月回顾关于《英国的分裂》的观点的时候,奈恩写出了他在既是同样进步、又是相对错误的两个“幼稚的但又是强健的对手”之间选取一条道路的努力:“一方面,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把地方性和阶级一起否定掉了;另一方面,无论如何,低层的社会主义否定了民族性的所有进步意义(除非它的边境穿过了英吉利海峡的中线)。”无论如何,对于那些惊骇于“马克思主义者对苏格兰国家党声名狼藉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表示同情的景象”的批判者来说,奈恩拒绝看到任何这样一个批判者可能会持有的一种观点:即把他们的反对当做“无聊的废话、老套的沉渣再起、对受挫的左翼十分重要的说教冲动”而打发掉。对于奈恩来说,那些“大多数人”——这个对民族意识不清醒的“大多数”想必是包括大多数工人阶级的——被一种由“值得尊敬的奴性”和“双重人格似的因循守旧以及对重新做回‘本地人’的担心”所组成的“特殊的苏格兰式麻木”挫伤了。<sup>①</sup>

奈恩同意,复兴了的工党左派——他们后来因为替代性经济战略而被动员了起来——与奈恩在苏格兰所看到的发展中的、更加左倾的民族主义的联合,很可能为英国政府的危机提供一个通向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sup>②</sup>但这样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当那些小心谨慎的希望于1981年下半年得到表达的时候,支持托尼·本的左派已经走到了顶峰,并且,以79人集团形式出现的苏格兰国家党中的左派在这一年也被驱逐了。苏格兰民族主义还远没有从1979年的大灾难中恢复起来。它的支持率一

---

① T. Nairn, 'Postscript 1981: Into Political Emergency', *The Break-up of Britain*, pp. 288, 397 - 398.

② *Ibid.*, pp. 402 - 404; 'The Crisis of the British State', *New Left Review* 130, November-December 1981, pp. 41 - 44. 后者是一篇更加乐观的论文,奈恩不可避免地给它定名为“英国国家的危机”。正如佩里·安德森曾经指出的:语言就像货币一样,在通货膨胀中贬值。正是因为奈恩,“危机”一词,尤其是当它与“英国国家”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像魏玛共和国的德国马克一样不值钱了。

直不高。这种状况直到 1987 年的第三次英国保守党选举胜利才得以结束。1987 年的选举胜利带来了一个新的支持维度，它远超出了苏格兰国家党的范围。然而，远早于此，奈恩根本上的悲观主义就再次得到了重申。1982 年《新左派评论》编辑部爆发的争论最终以分裂告终。这一分裂部分地是由于个性差异所致，但也和如下问题密切相关：斯大林主义——它既在东方作为国家权力，又在西方作为工人阶级组织——的衰落能否兆示一场真正的革命运动的复兴？安德森和罗宾·布莱克伯恩在那个阶段依旧寄希望于这种观点，即认为这种发展还是可能的，尽管有点理论化。而奈恩则站在了认为不可能的少数派一边。当这场斗争以少数派的失败结束后，奈恩选择辞职给予声援。<sup>①</sup>

在那十年的大部分剩余时间里，奈恩都在写关于英国君主政体的书《魔力玻璃》(1988 年)。该书的中心主题关注的是：温莎公爵的意识形态控制已经被那些不需要做进一步讨论的事件所广泛地反驳了。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奈恩重新彻底地投身于民族主义。包含在《民族主义的面孔》一书中的大多数文章都是在 1989 年东欧革命以后写的，而这一系列革命也投影在了这些文章的内容里。这里，奈恩将早期作品中所持的所有立场都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极端。现在，原本只是暗含其中的三个主题最终得到了彻底展开：对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鉴别；引入作为民族主义存在的解释框架的“人的本质”；相应地，是对作为理论可能性的国际主义的拒绝。

#### 4. 揭露秘密的斯大林主义者

有名无实的反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如奈恩)，究竟在多大程度

---

<sup>①</sup> W. Thompson, 'Tom Nairn and the Crisis of the British State', *Contemporary Record*, vol. 6, no. 2, Autumn 1992, p. 320.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快安德森自己就放弃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视角。他自己的解释表明这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的(P. Anderson, 'Foreword', *A Zone of Engage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2, p. xii-xiii)。

上倾向于把斯大林主义国家等同于社会主义？这仅仅是在这些国家崩溃之后才完全显现出来的。那时候，奈恩就像过去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一样，操演着令人眼熟的反马克思主义表演。

既然如此，他自然也就能够把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同起来了：“去认清那些预言的努力——以及在它们之间的斗争——已经说明了过去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情况。幸运的是，他们在消灭地球之前就已经筋疲力尽了。但是，是否连最热切的乐观主义者也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呢？”

奈恩把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也施加到了曾是其灵感激发点的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著作上。依据奈恩的看法，葛兰西不仅不是他所认为的市民社会的倡导者，相反，据称葛兰西的目标就是准备摧毁市民社会：

要对《狱中札记》的内容进行检查这一情况迫使从……多元主义的绕行，以及对任何公开的反中央集权者和反民族主义修辞的避讳。但是，它的观点是建立在第三国际时代标准的国际主义基础上的：现代君主或激进的列宁主义政策，在这个政策内，社会将会被改造得适合统治精英的观点。

以前奈恩确实提到，葛兰西实际上是反对斯大林 20 世纪 20、30 年代为苏联和共产国际指引的方向的，这也正是 60 年代的社会主义者会被他的著作吸引的原因之一。现在，奈恩则揭露说他们都错了：“在任何对‘粗鲁的’苏联霸权的去魅背后都存在一种更加有力的意愿，用哈丁的话来说，这一意愿指向了新无产阶级启蒙的天空中的‘一个超越战术和崇高目标’。”<sup>①</sup>因此，葛兰西被认为在《狱中札记》公开的概念背后包藏一种坚如磐石的“中央集权主义”议程。这种立场与美国学术界最初对

---

<sup>①</sup> T. Nairn, 'From Civil Society to Civic Nationalism', *Faces of Nationalism*, p. 82. 尼尔·哈丁的引文参见 Neil Harding, 'Intellectuals, Socialism and Proletariat', in J Jennings and A Kemp-Walsh, ed., *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s*, London: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91, p. 211.

葛兰西著作所做之冷战思维式评论是遥相呼应的。<sup>①</sup>

## 5. 人类需要民族

1989—1991年间的剧变似乎仅仅给了奈恩一个机会,而不是一个理由,来公开放弃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承诺。继而,他不再强调民族主义是通往社会主义的一条替代性的道路。他现在强调民族主义是人类的命运,因为它对应于人类本质的要求。即使对于奈恩以前的标准来说,这也是极端的。与当时流行的关于全球化的论调相关,他正确地放弃了认为民族国家应该自然发展这一观念。然而,他的替代方案是建立在相反的、却又同样是致命的错误的基础上的。在讨论自1989年开始兴起的民族主义浪潮的时候,他写道,“如果……人们情不自禁地那样(文化对比、敌对性区分等情况的创造者),那么是什么东西来阻止流血和可憎的‘人类本性’再次回归自身呢?如果是真的,那些评论将会成为绝望的理由。”但是,奈恩既不绝望也不消沉,因为这些反应只是误解的结果。在这种描述下,民族主义成了帝国衰弱的原因——自16世纪反对西班牙暴政的荷兰革命开始,一直到20世纪的东欧反对苏联集权的革命。为此,尽管它在不断地分裂现存国家,它也必须受到欢迎:“如果原始人类的本质的作用具有(比欧内斯特·盖尔纳的现代化理论所允许的)更大的作用,那么,是不是说,把我们(如从斯大林主义的国债中)拯救出来的东西也将判处我们只能拥有一个不确定的差异化未来?”<sup>②</sup>

虽然他飘浮不定地围绕着这个主题转圈,使自己远离这“可怕的种族主义和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的简单性”,奈恩最终明确地接受了最古老的保守信条:“换句话说,任何新式样都一方面依赖于建立一种更加合

<sup>①</sup> 例如,H. 斯图尔特·休斯对“霸权”概念的评论:“就像在葛兰西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的,集权主义的思想是穿着自由的外衣的”(H. Stuart Hughes, *Consciousness and Society*, St Albans: Paladin, 1974)。

<sup>②</sup> ‘Introduction: On Studying Nationalism’, *Faces of Nationalism*, pp. 10–11.



理的生物学和家族关系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也依赖于政治世界、民族国家和复活的民族性。”<sup>①</sup>他希望:人类基因组计划以及其他更加普遍的对“生命科学”的研究,能最终证实生物学与和民族性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在1992年的另一篇文章(该文没有收入《民族主义的面孔》)中,这一观点变得更加简明了:

如果差异性从来都不是一个仅仅“被赋予”的,在一个毫无意义的偶然意义上,对它的持续存在必须投注一种不同的眼光。如果经由文化方式而体现的种族之间的差异总是成为“人类本质”,也许它会一直这样下去——以一种与血缘和种族的意识形态毫无关系的方式。<sup>②</sup>

应该被提及的是:奈恩并不试图为1989年以来被他称为民族主义记录中的“污点、赘瘤或者失败”的那些东西开脱罪责。他认为,对于苏联以及其他斯大林集团的压迫者的垮台来说,“杜布罗夫尼克大轰炸或者对穆斯林妇女的政治强奸”是值得支付的代价:“坚持认为小规模阵营可能‘总体上’比大的——尤其是多种族的大阵营——要好,这种观点并不意味着就不会有种族的病症,或者没有民族主义者出错的情况”<sup>③</sup>。

事实上,奈恩确实努力去解释有关民族主义的种族灭绝方面的问题。他宣称,问题不是民族主义本身,而是种族的民族主义——尤其是在那些民族主义被用来动员生活处于“现代化”的威胁之下的农民人口

---

① ‘Introduction: On Studying Nationalism’, *Faces of Nationalism*, p. 13.

② ‘Does Tomorrow Belong to the Bullets or the Bouquets?’, *New Statesman and Society*, 19 June 1992, p. 31. 对这种非理性主义的值得赞赏的反应是由后来的苏格兰民族主义者帕特·凯恩做出的,他谴责了诉诸“生物或物种遗传决定论”的看法:“能够帮助我们度过国际主义解放的骚乱的唯一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条款不是我们的原始本能,而是那些奈恩愚蠢地试图把抛到脑后的‘现代性的环境’……希望打生物科学的牌来取得进步的民族主义游戏的胜利,这意味着你的对手仅仅打扑克就能打败你,而且是用更高的更恐怖的赌注,并且是一手极其肮脏和无耻的牌。在20世纪的上半个世纪中,就不应该去打开民族性和生物学的袋口。”(Pat Kane, ‘Scotland by Starlight’, *Tinsel Show*,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98.)

③ T. Nairn, ‘Demonising Nationality’, *Faces of Nationalism*, p. 63.

的地方。在这一基础上，奈恩不仅寻求解释柬埔寨和卢旺达的大屠杀，而且也寻求解释与爱尔兰农村相比，为什么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主义历史中很少有暴力。<sup>①</sup> 在《新左派评论》上的一篇新近的文章中，他把纳粹德国的兴起也纳入了自己的分析，鉴别了巴伐利亚农村及其首府慕尼黑在灌输法西斯主义方面的中心地位。事实上，与其他一系列因素一起，奈恩把农业生活的持续性和它的被迫进入现代性当做他所谓的“民族主义灾难”的主要原因。慕尼黑是“一个农民文化盛行的小镇”，柬埔寨和卢旺达几乎是百分之百的农民，“磕磕绊绊的工业化过程”对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的影响“要比很多外来观察者了解到的要少得多”，等等。<sup>②</sup>

实际上，这些案例几乎没有共同点。卢旺达的种族灭绝采取了农民内部的关于获得土地途径的冲突形式，并且，这既不是一场农村反对城市的革命，也不是任何可以认可意义上的民族斗争。柬埔寨的斯大林主义确实包含着一种野蛮的反城市偏见，但是红色高棉民族主义的受害者主要不是因为他们的种族，而是由于他们被假设是反对新制度而被杀害的：就“种族”而言，现在在柬埔寨监狱博物馆展览中心被保存的骨骸主要是高棉人的。事实上，在20世纪（纳粹德国之后），第二个最大的系统内暴力的例子——1929年到1956年间的斯大林主义的苏联，几乎不能够说是倚赖于农民的支持，因为，在某个层面上，苏联的工业化可以被视为一场建立在官僚机构反对农民的基础上的内战。为什么爱尔兰的民族主义一再地被迫倚赖于暴力？其理由不在于它是农民在（1798年）现代化过程中受到了伤害，而在于它是对英国国家及其奥林奇分支的体制化暴力的一种反应。毫无疑问，苏格兰人需要为这种暴力的实施承担责任。

简言之，他的整个论证过程都是在进行辩护：可悲的是，那些前现代

---

① T. Nairn, 'The Curse of Rurality: Limits of Modernisation Theory', *Faces of Nationalism*, pp. 90-92, 101-102, 109-110.

② T. Nairn, 'Reflections of Nationalist Disasters', *New Left Review* 230, July-August 1998, p. 149.

的农民是非常易受那些能够导致种族灭绝的种族动员影响的；而令人欣慰的是，我们这些现代性的城市居民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市民民族主义，它允许我们接受民主政体，而没有再次落入部落野蛮主义。但是，“市民的”和“种族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区别是极为可疑的。“种族性”就和“种族”（或者，事实上，“民族”）一样是一个虚构的状态；政治冲突导致种族的分裂，而不是其他的原因，在社会危机的环境中，没有哪一种民族主义不以“种族”差异为开端。考虑到英帝国对苏格兰（以及苏格兰民族意识）施加暴行以及随之而来的种族主义的方式，奈恩能否如此肯定：即使经济条件再坏，那些因素也不会上升至苏格兰民族主义的表层？英国性的遗产不是那么容易逃避的！

这就是为什么德国法西斯主义的问题对于奈恩的观点很重要的原因：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纳粹德国是一个现代的、发展的资本主义力量屈服于以其法西斯主义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极端右翼民族主义的一个例证。如果它能够表示为农民落后的产物，而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那么，无论如何，民族主义的出现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就无需承担责任。但现在，正如鲍曼已经指出的，那种构成了纳粹意识形态的核心的反犹主义恰如奈恩所指出的那样，是抵制现代性的一种形式。<sup>①</sup>但是，这只是解释了反犹主义意识形态的起源，而没有解释德国民族的重要部分，包括它最“现代的”部分如何能够屈服于反犹主义的。正如杰夫·埃利所写的，与早期把纳粹归罪于德国的假想缺陷相反，答案存在于“纳粹上台的直接环境之中——主要的是以下这一系列相继发生的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1923年的战后危机、1929年后的世界经济危机”<sup>②</sup>。在纳粹上台前20年，作为一个整体的德国已经把“农村的落

① Z. Bauman,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2nd edition,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46, 61.

② G. Eley, 'The British Model and the German Road: Rethinking the Course of German History Before 1914', in D. Blackbourn and G. Eley, *The Peculiarities of German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54.

后”抛在身后很久了：

在 1913 年，德国的钢产量就占了欧洲的三分之二……是英国的两倍，比美国少不了多少。它生产的煤几乎和大不列颠一样多，并从英国手里抢占了很多欧洲市场。

更加重要的是，作为结果，其阶级结构发生了改变。在 1880 年，德国社会是一个农业人口占主体的社会，并且工业仅仅限制于小工场：

在 1914 年，三分之一多一点(35%)的人口从事农业，五分之二为工业人口。但是，在工业行业内有一个大的改变：从小企业雇佣一小撮工人到中等规模的企业，并且最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非常大而集中的企业——它们的那些巨大的丑陋的工厂主导着鲁尔、西里西亚、萨克森等地区。<sup>①</sup>

简言之，德国不是一个正在向现代性转变的社会，而是一个已经达到了现代化的社会。鲍曼关于大屠杀的评论也适合于描绘伴随着它的德国民族主义的残暴：“大屠杀诞生在一个现代理性社会，并在一个现代理性社会中实施，它出现在我们文明的高级阶段，在人类文化的顶峰，因此，它是一个社会问题、文明问题和文化问题。”<sup>②</sup>

奈恩似乎相信，与“大的阵营”相对，小的总是美的。“遗憾的是，”他写到了 19 世纪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那些伟大的、典范性的统一计划都以法西斯主义而告终。”<sup>③</sup>基于此的必然结果是他对“小政府”的热情，诸如他所指列举的安道尔、直布罗陀、中国香港、新西兰、列支敦士登、马耳他、摩纳哥和圣马力诺。<sup>④</sup> 他似乎暗示阿尔斯特可能也在其中。<sup>⑤</sup> 这

① N. Stone, *Europe Transformed: 1878-1919*,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60.

② Z. Bauman,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p. x.

③ T. Nairn, 'The Curse of Rurality', *Faces of nationalism*, p. 149.

④ T. Nairn, 'Micro-States', *Faces of Nationalism*, pp. 143-149.

⑤ 阿尔斯特原为爱尔兰一地区，今为北爱尔兰及爱尔兰共和国所分割。——译者注

是国际国家制度的未来吗？起码有三个理由说明这是极不可能的。

第一，这一名单本身就是极端异质的。香港是英国帝国主义的产物（就像那些被奈恩莫名其妙地省略的其他非欧洲“小国”一样——如科威特和其他海湾独裁国家）；新加坡是从帝国主义的撤退中发展起来的；它们两者的经济都主要是着眼于从战后的繁荣中发展起来的出口市场。欧洲的那些例子是小的前资本主义公国的残留，它们曾经一度覆盖了欧洲，并且它们曾经被建成为离岸税港口。那些相当不同的国家都曾从这种环境中涌现，但这种环境本身却是不可重复的。

第二，这些都不是民族。对于“小国家”的讨论是奈恩书中的一个要点，在那本书中奈恩模糊了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区别，这有很好的理由可以说明，因为摩纳哥民族主义的观念至少可以说是难以置信的。但更加重要的是，中国香港的民族主义也是如此。反对中国恢复行使主权的所有力量——从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都是在阶级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开展活动的。在“小国家”中发展起来的民族身份往往倾向于那些保证它们存在的主导力量。在北爱尔兰和直布罗陀（和福克兰群岛），居支配地位的是英国民族主义，而不是领地本身的民族主义。

第三，我们没有理由设想，民族主义的未来发展方向仅仅包括现存民族国家的分裂。民族主义至少很有可能将会在积极的一体化政策中找到表达形式。在这一方面，伊拉克合并科威特企图的失败，以及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努力的成功都揭示了未来的事态。如果说它们所揭示出来的东西不比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分裂所揭示出来的东西更多的话，起码也一样多。

然而，该书这一部分真正所揭示的是另一个因素，即奈恩希望它成为人类存在的一个永恒方面。有一次，他把民族主义和国家做了一次启发性的比较，这两者都“非常不可能消亡”<sup>①</sup>。他对国家持续存在这一点

---

<sup>①</sup> T. Nairn, 'The Owl of Minerva', *Faces of Nationalism*, p. 52.

的接受当然是他关于民族主义不可避免这一论点的一个必然伴生物，但是，奈恩的永恒国家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在一次关于东欧革命的构成要素的讨论中，奈恩说漏了嘴：

有着一场反对一党专制和国家恐怖主义的流行的、民主的革命。有着一场抵抗反资本主义的指令性经济——40年来它迫使东方急行军式的发展——的经济剧变。并且，第三，有着这样一种民族模式，这些革命都以某种方式不可避免地流向了这种民族模式——这是一种新的种族特点，或者是（就像在波斯尼亚）在后共产主义社会的民族宗教的新特点。<sup>①</sup>

根据奈恩的看法，资产阶级的民主、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民族国家，这些都是我们未来的要素。他暗指，谁反对自1991年以来俄罗斯的多国资本主义的糟糕税收，谁就是想要返回到冷战的种族灭绝，似乎那是人类面临的唯一替代选择。事实上，在俄罗斯，反对市场的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新发展”已经一起开始了：即“跨越国界的罢工活动的相互配合”。例如，1996年俄罗斯的矿工延迟了罢工，直到它能与乌克兰矿工的行动协同配合。<sup>②</sup>

## 6. 国际主义的不可能性？

对于奈恩来说，民族主义是如此深地植根于我们的本性之中，以至于以国际工人阶级团结的名义来取代它的努力都是误入歧途。因此，“一首真实的国际歌只能建立在人类本性的解放的基础上：它（首先）意味着民族性，这是民主和个体解放的前提”<sup>③</sup>。正如他对国家所做的界定一样，奈恩自己对国际主义的界定是古典自由主义的：“被理解为一种系

① T. Nairn, 'Demonising Nationality', *Faces of Nationalism*, pp. 57-58.

② B. Arnot and K. Buketov,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ssian Labour: From Acquiescence to Action?', *Abertay Sociology Papers* vol 1, no. 2, University of Abertay, 1998, pp. 7, 9.

③ T. Nairn, 'The Question of Scale', *Faces of Nationalism*, p. 134.

统的外向型的询求态度、一种对其他经验的意义进行富有想象力的搜寻的国际主义，是抵制这一真理——即大多数人住在‘后院’——的缺陷的最有价值的方法。”<sup>①</sup>现在，即使我接受存在着分散的民族文化这一观念（其实我是不接受的），奈恩所渴望的结果仍然是一系列的民族主义，而不是国际主义。这一结论的出现事实上早于奈恩与马克思主义的最后决裂，其实在《国际主义：一个批判》中就得到了最清晰的证明。

他以对“国际性”和“国际主义”的区分作为开端。国际性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客观结果，在这一世界市场中，同样的阶级越来越倾向于穿同样的衣服、看同样的电视节目并且消费同样的食物和饮料，不管他们在地理上是属于何方。然而，经济和文化的整合并没有导致那些人——即使是那些属于同一社会阶层的人——的政治利益的认同。事实上，他们倾向于和他们自己的特殊的民族相认同，这最终包括了支持那个统治它的国家。对于这一观点，我们能认同的比较多。然而，奈恩得出的结论是，国际主义因此是一种意识形态，不管是在马克思主义还是在自由主义的各种类型中，它都为克服民族主义的控制而提出了一个基本的道德议程：“国际主义给这一道路提供了一个道德的替代性方案，自从普法战争、第一国际的终结开始，更为显然的是从1914年开始，世界事实上就是沿着这一道路发展的。”<sup>②</sup>

提及1914年是意义重大的。第二国际的解体对于奈恩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但这并不是因为它证明了国际工人运动的背叛：“在这个意义上，这里既没有背叛也没有后退。”<sup>③</sup>相反，奈恩强调，社会主义政党简单地承认了工人阶级民族主义这一现实。在他们原初形成的时刻，工人阶级自发地是国际主义者和反资本主义者；但是这仅仅持续到了他们——以他们自己的工会、合作社和政治政党——被整合进系统为止，

---

① T. Nairn, 'Internationalism: a Critique', *Faces of Nationalism*, p. 32.

② *Ibid.*, p. 30.

③ *Ibid.*, p. 35.

这是欧洲早在 1914 年之前就已达到的一个阶段。<sup>①</sup> 然而，马克思主义者无法接受这一形势的现实性，他们退居到一种信奉国际主义的根本信仰之中，这妨碍了他们对确实在上升的真正的——并且总是民族的——危机形势做出反应。

最终，对国际主义教条的坚持把社会主义者引向了两条死路：要么他们是斯大林主义者，要么是反斯大林主义者：“前者把国际主义盗用为是为前苏联伟大的俄罗斯国家服务——最终是用了一种仍然比较理论化的术语；后者要么是以疏远和悲观主义（像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的态度对这场或是其他背叛革命的行为做出反应，要么是以对国际主义理想的更为理想化的态度做出反应。”因此，对于奈恩来说，国际主义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所主张的、作为 1917 年以来一直困扰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情绪的补偿物而存在的：“如同整个的萨姆主义一样，这是对以下观念的长期有效的邀请，这一观念认为‘我’（这是指国际革命的主体，而不是一个满脸胡碴、土生土长的阿伯丁或新锡德尔湖的本地人）会更支持偶然在某处发生的革命，而不是碰巧在我（满脸胡碴、土生土长）的定居地所发生的革命。”<sup>②</sup>但是，即使这也不是解决方案，因为那些遥远的革命正是被民族主义所驱动的，而这正是国际革命的主题所反对的：“粗暴一点说——正统所要求的是一种同时既支持又不支持民族运动的看似合理的道路。”列宁为这一难题提供了理论上的解决方案：“既然一般原则是：所有民族主义者的斗争和运动都是坏的；然而，特殊的以及实际可确定的环境能够把它们变好，虽然这只在一时，并且是

① 甚至这段也明显承认：曾经从堕落之前的无产阶级中自然产生的国际主义也被用来强调随后出现的衰落状况。事实上，即使在其形成的年代，大多数无产阶级必须克服改良主义的意识、战略和组织——民族主义是其中的必然组成部分。在我即将出版的两本书中，我在苏格兰语境中讨论了这个问题，参见 *Discovering the Scottish Revolution: the Decline of Scottish Feudal Societ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British Capitalist State, 1688 -1746* ; *Highlanders into Scots, Scots into Britons: the Origins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Scotland, 1746 -1820* 。

② *Ibid.*, pp. 32 - 33, 36.



以一种高度受限的形式实现。”因此，在其掌权之前，社会主义者可以自由地支持民族运动，然后再因为他们拒绝遵守国际主义理念而谴责他们：“每一个新的巴尔干化悲剧都可以为建构一个永远有生命力的原则的基础服务，即只有国际主义的阶级斗争能够阻止这类事，只要下一次修正主义者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能够被阻止。”奈恩强调，对此的另一种选择将会成为一个在心理上不可能的选择，它承认了民族主义的不可避免性。

因此，马克思主义因为拒绝承认民族主义的权力，坚持一种虚假的国际主义理论，并且在国际主义不可避免地缺失的情况下，伪善地支持民族运动（作为“例外”）而受到严厉谴责。然而，还有最后一个控告要加在这份起诉书。正如柯林尼柯斯所说，“每一种普遍主义都是一种伪装的排他主义，这对于大部分西方的知识分子来说已经成为了普遍意义上的信仰的一部分了”<sup>①</sup>。对于奈恩来说，国际主义的普遍主义假扮成了一个大阵营的民族主义的排他主义，例如由那些偏爱英国政府而反对苏格兰自决的社会主义者所表现出来的，或对于当前正在讨论的苏联话题来说，由那些因为偏爱前苏联而反对阿塞拜疆自决的人所表现出来的。

## 二、民族主义的现实：资本主义和改良主义

我已经给了奈恩以非常充分的机会来表达他的立场，而且是尽可能用他自己的话来表达的。下面，在最终与奈恩目前关于苏格兰立场进行战斗之前，我首先要分别研究一下民族主义与现代性、资本主义、改良主义以及国际主义的关系。

### 1. 作为现代性的一个方面的民族主义

根据安东尼·史密斯的观点，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在历史发展中的

---

<sup>①</sup> A. Callinicos, *Theories and Narrativ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79.

位置问题上三种基本观点。首先要说的是原始主义的观点：“这一观点的支持者宣称民族以及种族共同体是历史的自然单位，是构成人类经验所必需的要素……是贯穿于整个历史的人类联系的基本组织原则和基本纽带。”其二是永恒论的观点，它的提倡者强调，“在现代世界中找到的单位和情感仅仅是比能够在人类历史的较早期阶段能有迹可寻的单位和情感更广泛更有效而已”。第三种也是最后一种是现代主义的观点，在那里：

民族是一个纯粹的现代现象，就像资本主义、官僚机构和世俗的功利主义一样，确实是现代发展的产物……这一争论所延续的民族和民族主义，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被精确地定位于18世纪下半叶……任何表现得与它相似的东西，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在中世纪都必须被理解为纯粹的偶然和例外。<sup>①</sup>

（奈恩一度也持有过的）现代主义立场拒绝了所有试图宣称民族主义是人类状态不可避免的一部分的努力。正如已故的欧内斯特·盖尔纳所写的，在这三种观点中，尽管原始主义的理论最经常被人援引，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它几乎不是一种理论，因为它把那些原则视为内在于人的本质的某些东西，或视为社会组织的原则，它们甚至明显到实在不需要进行解释。”如果有人指出，对于大多数人类存在而言，人类本质的这个方面是缺席的，那么，民族主义者则会回答说：

事实上，民族主义者对于这一证据——它使我们中的一些人质疑民族主义情感的普遍性——是有意识的：他们确实经常气愤地知道，在一些社会和历史阶段，民族主义是由于它的不在场而变得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在它与他们自己民族的新近过去相关时，他们很痛苦地明白这一点。但是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解释它，并且

---

<sup>①</sup> A.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pp. 11-12, 8.

他们的解释被包含在民族主义词汇中可能最经常被使用的词语——觉醒——之中。<sup>①</sup>

奈恩不仅知道盖尔纳的批判<sup>②</sup>，而且“觉醒”观念也是他解释苏格兰民族主义复兴以及事实上是所有其他民族主义复兴的基础。读者或许已经注意到了他对这一术语的附带使用，因为他曾经说，“只要考虑到 20 世纪 70 年代民族运动的‘资产阶级’方面，我就仍然深信，就我们的特殊条件而言，仅有中间阶层能够带来这样一种觉醒”，但是现在我们得知“这个联盟条约来得正是时候，刚好可以埋葬一个新生的苏格兰民族主义，但是仅能把它放到一个浅坟中。”并且，从这个浅坟中，“尸体能容易地从临时的墓地中走出来要求他的权利”<sup>③</sup>。在某种意义上，这个观点比盖尔纳的观点要好：不仅是一次觉醒，而且还是名副其实的第二次到来。我们将会文末的结论中来考察欧洲民族主义的拉撒路。<sup>④</sup> 然而，目前，我们还是盯紧现代性问题。

那些接受民族主义是一个现代现象的人倾向于在两种主要的理论方法中二选一。一方面，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追随者强调，民族是被他们称为现代化过程——特别是在涉及工业化的这一阶段——的一个产物。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强调，这些术语忽视了这样一个现实：‘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隶属于一个更加特殊的过程——即生产的资本主义模式的控制。正是盖尔纳的著作也运用的第一种方法在奈恩最初思考民族问题时深刻影响了他，但是，奈恩通过把现代性和资本主

---

① E. Gellner, 'Nationalism', *Thought and Change*,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4, pp. 7-8.

② T. Nairn, 'Introduction: On Studying Nationalism', *Faces of Nationalism*, p. 7. 这是奈恩最令人讨厌的一个习惯的典型例证：以某种心照不宣的方式引用了某个反对其立场的人的观点，然后不做任何实际回应就继续论述下去了。

③ T. Nairn, 'Union and Empire', *Faces of Nationalism*, p. 209.

④ 拉撒路是《圣经》中的一名患麻风病的乞丐，后因耶稣的救治而复原。——译者注

义等同起来，而回避了这个问题。<sup>①</sup>

现在，既然奈恩把民族主义当做人类状态中的一个永恒方面，因此，他也就把它与现代化及生产的资本主义模式分离开来了。虽然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很乐意把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这一观念，当做对他所不赞成的民族主义的一种解释。

## 2. 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

一旦一个民族国家得以建立，那么，那些控制国家机器的人总是寻求加强对本国居民的“民族意识”的控制。正如奈杰尔·哈里斯所指出的：“一旦边界被击溃并且部队开始在周围游弋，国家就开始殖民它内部的一切，操练所有那些居民。那些居民发现自己身陷一种关于忠诚的虚构的共同遗产藩篱之中，这种遗产被假定是属于一种共同文化或生活方式的，但实际上，它只属于那个特殊的国家。”<sup>②</sup>这种情况确实发生着，虽然奈恩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保持沉默。但是，认为民族主义主要是作为教化的结果而存在这一提法却不是全部解释。为什么在国家建立之前，工人就支持民族主义运动，但后来又接受它呢？明显的理由是，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确证了资本主义组织下的世界——其实它是由现实的或者潜在的民族国家组成的——的不可避免性时，它是最有说服力的。然而，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奈恩正确地指出，民族主义为认同——某种意义上“归属”——提供了一个框架；但问题是，它是否就是能够发挥这种作用的唯一意识形式呢？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经指出，民族意识的源头在于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三个基本文化观念”的解体：对一种特殊的与宗教真理相关的书

---

① E. Gellner, 'Nationalism', *Thought and Change*, See the references in *The Break-up of Britain*, pp. 96, 99, 133, 317, 338, 342 and 358. 正像我们上文所见到的那样，他对盖尔纳文章的态度现今已经发生了一种重要转变。

② N. Harris, *Of Bread and Gun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2, p. 24.

写语言(如在基督教国家中的拉丁文)的认同;信仰社会是在一种自然等级中被组织起来的(其顶点是君王,他们是不同于其他人的人);关于宇宙学说和历史的不可区别的观点,这一观点提供“世界起源和人类基本同一的起源”。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的消失意味着人类需要“一种把博爱、权力和时间有意义地联系在一起的新方式”<sup>①</sup>。正如克里斯·哈曼所写的,这种观点把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当做了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后者仅允许对一种“存在着的渴望”的表达,为“心理固有需要的满足”提供一种出口。<sup>②</sup>然而,不用关于人的永恒状态的观念——它将会向奈恩所坚持的立场缴械投降——而用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人类需要观念,安德森的立场同样可以得到重新表达。<sup>③</sup>

正如乔治·克勒文曾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奈恩主编的《苏格兰政治公报》居然说:

如果市民社会把自身从人的社会政治称呼(作为对他们的政党政治称呼的反对)中分离出来,如果个体只是在由仅以一个囊括一切的市民社会单位——民族——而联系在一起的市场上彼此面对……大众的社会忠诚就诞生了。这是一种超越市民社会的阶级斗争、超越语言、超越种族、超越地域的忠诚,即民族主义。对于其不自由并非由市场掩盖的封建农民来说,拥有这样的忠诚是不可能的。

对于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工人来说,这种忠诚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从各个民族的资产阶级的观点来说,它更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如果没有它,就

---

① B.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p. 36.

② C. Harman, 'The Return of the National Question', pp. 42, 43.

③ 对于安德森和奈恩来说,问题都在于他们并不理解1978年以后印度支那据说是社会主义的——事实上起码是“后资本主义的”——国家之间的那些冲突。可以比较 B. Anderson, *op cit*, pp. xi, 1-2, and T. Nairn, 'Postscript 1981: Into Political Emergency', *op cit*, p. 371.

会出现这样的危险：工人将不会认同偶然所属的民族，而去认同他注定所属其中的那个阶级，不管他们在地理位置上具有怎样的偶然性。结果是，如克勒文所言，工人们面临“两种实际上的有条件的忠诚”。一方面是“民族主义，它反映着陷入一种忠诚之中的个体的社会定位，这种忠诚是由市民社会和它的外在国家所强加的”。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它反映着工人的阶级定位和在资本主义中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模式的核心”。这两者在本质上差异是很大的：“前者是由资产阶级社会的外在表现形式被有形地决定的，而后者是由它的本质所决定的。”<sup>①</sup>

### 3. 民族主义和改良主义

因此，一方面，民族主义不应该被视为只“发生”在分裂运动过程中的东西，另一方面，它也不应该被视为只“发生”在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运动中的东西。资本主义体系把民族主义创造为它存在的一个必要的、日常的条件。结果是，它在工人阶级中形成了一部分改良主义意识形态。早在改良主义体现在组织化中之前，它就已经是下面两者之间张力的产物了：即作为人类生命不可改变的特征而接受这一系统；以及对这一系统的特殊方面事实上影响我们生活的方式进行拒绝。革命的任务事实上就是在改良主义意识中扩大“拒绝主义”，直到它成为全部。例如，通过论争和行动的结合起来证明学校的不足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附带的，而是这个系统运作方式的一个直接后果。

困难在于，改良主义政治组织一直把工人阶级朝相反的方向引，从而在鼓励工人接受这一系统的同时强化了民族主义。这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一种著名的倾向：改良主义政党只要求最低水平的工人阶

---

<sup>①</sup> G. Kerevan, 'The Origins of Scottish Nationhood: Arguments Within Scottish Marxism', *The Bulletin of Scottish Politics*, vol 1, no. 2, Spring 1981, p. 118 - 119.

级意识,而不是试图提高它们;只迎合工人阶级偏见的最坏形式,而不是试图去挑战它。第二个是,那些改良主义者想自己接管民族政府,而无视所有有关全球化的话题,这个假设仍然是:民族国家就是“政治”得以开展的区域。因此,奈恩完全低估(或者,故意无视)了改良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左派在民族主义意识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的持续控制这一问题上所负的责任。<sup>①</sup>这与其说是别无选择,不如说是反映了工人阶级中居于压倒性地位的民族主义感情,因为他们有意识地培养这种情感。<sup>②</sup>在工会内部,这以两种方式出现,而两种方式都能从苏格兰工人运动的经验中得到说明。

第一种观点是这样的:特殊的工业或者工厂属于“民族”,而不属于资本主义企业,或者(那时候更加不会)属于资本主义国家。在1984年到1985年的矿工罢工过程中,这一意识形态的灾难性后果变得明显起来。<sup>③</sup>全国矿工联盟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停止全民族的钢铁生产。不幸的是,该联盟的领导者所倚赖的是他们在钢铁工会中的同行官员,而不是工人纠察。后者在1980年的钢铁罢工中早已遭受重创,并且在随后的三年里几乎失掉了超过一半的人数。但让他们失望的是,钢铁行业工会

---

① 这副面具甚至在1989年之前就脱落了。在1981年1月接受采访时,红色高棉领导人之一乔森潘的反应相当不同:“不要更多的社会主义,不要更多的革命……我们的理想是柬埔寨继续存在下去。至于共产主义,我们把它当做领导柬埔寨独立和幸存的手段——只是一个手段,不是理由。现在,经过人民的浴血奋斗,我们已经获得了经验,并因此知道我们不能再沿着这条道走下去了。”(G. Evans and K. Rowley, *Red Brotherhood at War*, London: Verso, 1984, p. 251.)

② 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也是真实的。奈恩经常引用这一例子作为自发的民族感情的一个实例。鉴于《国际社会主义》前几期刊发的下列论文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就不再重复这些争论了:M. Trudell, ‘Prelude to Revolution: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76, Autumn 1997, pp. 71–85, and I. Birchall, ‘The Vice-Like Hold of Nationalism? A Comment on Megan Trudell’s ‘Prelude to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78, Spring 1998.

③ 下面这两段是建立在以下文章(首次)分析和提供信息的基础上的:A. Callinicos and M. Simons, ‘The Great Strike’,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27/8, Spring-Summer, 1985, pp. 84–92; K. Aitken, *The Bairns O’ Ada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73–281。后一本著作是苏格兰全国矿工联盟的半官方历史。

联合会的领导反对停止钢铁生产。

正是在这一点上，苏格兰民族主义者的观点起了作用。在苏格兰，全国矿工联盟地区的官员签署了一项协议，允许足够的煤炭进入马瑟韦尔的拉文斯克雷格工厂的连轧机，以保证锅炉的持续运行。地区主席米克·麦加希给出的理由是，这一交易是“为了苏格兰工业的未来着想”。事实上，进入拉文斯克雷格的煤炭数量不仅没有从它护理和保养基础上所需要的正常水平下降，反而是增加了。由于缺乏与其他工会及苏格兰工会大会的实际上的团结，矿工和他们的支持者的纠察无力关闭这个工厂。就这样，“苏格兰民族的利益”在全国矿工联盟的失败、在英国采矿工业的覆灭以及在保守党的此后 12 年的长期统治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对民族利益的追求还在苏格兰工人阶级中留下了分裂的传统，这也不应该被低估。乔·欧文斯——在这次罢工前，他是在东洛锡安的波尔克迈特煤矿工作的一名矿工——在几年后的一次采访中发泄了他的情绪：

当矿工要求拉文斯克雷格的人不要接受进口的煤的时候，这些人只是向矿工比出了 V 字型的侮辱性手势，这是对波尔克迈特煤矿关闭的另一个有贡献的因素。当然，自那一事件开始，拉文斯克雷格就被关闭了，并且，在拒绝矿工的要求后，他们开始向每一个人寻求同情。我对他们没有同情，就像我对诺丁汉的矿工（即那些在罢工过程中组成了反罢工的民主矿工联盟的人）没有同情一样。我真的希望诺丁汉的矿井能够关闭，这样我就可以嘲笑他们了。<sup>①</sup>

民族主义被改良主义官僚所鼓励的第二种方式存在于把所有阶级的、泛苏格兰的联盟作为保卫工作的方法所做的宣传之中。不管上面所

---

<sup>①</sup> 引自 J. Owens, *Miners 1984-1994*,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91, 编者和被访者并非同一人。



引用的评论如何,1990年6月,苏格兰全国矿工联盟会议上的代表投票支持了使拉文斯克雷格免于被关闭的运动,并且,联盟召集人汤米·布伦南还被邀请在爱丁堡召开的年度矿工节上发言。但是,这仅仅是一系列运动中最近的一次,自从1971年上克莱德造船厂罢工示威以来,在每一次威胁关闭过程中,这些运动都跟随着同样的灾难性的过程。联盟不可避免地由苏格兰职工大会所领导,其构成由一个友好的批评家概括为:是由“工联主义者、神职人员、艺术家、各派政治家(即,他们包括保守党人)、思想家、议员、专业人员以及其他”组成。<sup>①</sup>一方面,他们不可避免地拒绝考虑罢工,而代之以关注“苏格兰大众观点的动员”(这是不必要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已经对受威胁的工人表示同情了),另一方面则试图“说服”政府去干预(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通常完全与雇主保持一致)。在这些运动中,只有在上克莱德造船厂的第一次行动获得了某种成功,因为它伴随着一次武力占领。这次占领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英国工人阶级斗争出现重大好转的背景之下发生的。其他事件则发生在运动的失败阶段,并且因为它们的失败而加深了运动本身失败的程度。这包括了诸如在克莱德班克的辛格、卡伦钢铁厂、巴斯盖特的英国利兰、科珀赫造纸厂、因弗戈登冶炼厂、林伍德、卡特彼勒、拉文斯克雷格等地的罢工行动。正如基斯·艾特肯所写的:

回顾产生了沮丧以及莫名其妙的惊奇,并意识到80年代的联盟问题中几乎没有一个实现了它的原初目标。它们没有拯救卡特彼勒和拉文斯克雷格。它们没有改变政府关于健康、放权或者经济的政策。<sup>②</sup>

直到1993年邓迪的钟表工人发动反击为止,这一战略才受到有效的挑战。并且,直到1996年的冰川旋转填料床工人在格拉斯哥的胜利

---

<sup>①</sup> K. Aitken, *The Bairns O' Adam*, p. 292.

<sup>②</sup> *Ibid.*, p. 295.

为止，这一灾难的怪圈才被打破，虽然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苏格兰工会大会已经在这一经验中得到了任何教训。并且毫无疑问，在一个独立的苏格兰，工人将会面临改良主义正在增加的压力：既要认同“他们的”资本主义，以反对竞争方民族的资本主义，又要联合苏格兰的其他社会阶层以“解决”全球危机在当地的表現形式。问题是，被奈恩界定为工人阶级中的民族主义主导力量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改良主义——民族主义是它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的主导力量。但是，如果这一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是改良主义意识的一部分，那么，就像改良主义在生活的每一个其他领域都能被挑战一样，它也能以完全同样的方式被挑战。事实上，你可以这样讲：他们在多大程度上隶属于改良主义意识，那么他们就在多大程度上保持着对民族主义的忠诚。

#### 4. 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

国际主义是革命意识和革命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像民族主义是改良意识和改良政治的一部分一样。它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包括一个民族的工人与另一个民族的工人的团结，即使要他们本身付出一定的代价：例如，来自远如美国以及澳大利亚的（工人）给予利物浦码头工人的支持。这里的问题是，工人阶级的联合关心反抗雇主或者国家，而不顾民族边界。另一方面，国际主义还包括了一个民族的工人给予另一个民族之人民的民族志向以声援。就定义而言，它还包括非工人，并且一般都是由一个全然外来的阶级力量领导的，例如在英国和美国出现的反对轰炸伊拉克的行动。

就在奈恩的出生地法夫，曾出现一个虽然很小、但很能说明这两个方面——工人阶级的团结和民族团结——的例子。1974年，智利军事政变后的一年，智利潜艇奥布莱恩号停靠在格里诺克，目的是修复、维护尾轴，然后生产备件送回南美。当尾轴到达位于罗塞斯的皇家海军造船厂的时候，商会组织中的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的工人代表拒绝卸载，并且

写信给国防部通知它“罗塞斯造船厂不会再为智利海军工作,直到法西斯主义军政府解散、自由的民选政府重新执政、智利全面恢复人权”。这一抵制持续了四年,直到国防部最终同意那个造船厂不再为军政府做任何工作,并且不再为其提供后勤供给为止。罗塞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富有战斗精神的工厂。虽然它参与了1919年的“不干涉俄国”运动,但是,那次事件的推动力是一个在法夫临时建立的普利茅斯工程师小组。在1974年,行动的催化剂是一群左翼工人代表。他们是当地工党的活跃分子。他们的行动表明,在国际主义观点经常会出现的地方,它们能够影响工人的行动。<sup>①</sup>

就其倾向而言,国际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工人能够对其做出回应或不回应的道德要求,而是一种涉及资本主义秩序的本质的实践必要性。法夫船厂工人并没有受到军事独裁统治的直接威胁,但是他们知道,军政府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活动的难易程度,或许将影响到统治阶级是否继续维持压迫的道路选择。此外,这是一种使系统的相互关联性——用奈恩的话说即它的“国际性”——成为可能的必要性,因为它不单纯是一个有关人们日常生活和电视娱乐的问题,而是与国际关系再生产有关的共同关系。在工会层面上,澳大利亚海事工会对利物浦码头工人所表示的支持,至少部分地承认了他们自己的雇主也正在计划一场类似的进攻。事实上,后者在前者结束后几个星期就发生了。<sup>②</sup> 以下情况是真实的:“国际性”的文化方面,特别是全球媒体的增长,已经使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自己的斗争和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斗争的相似性。

接下来,我要主要关注国际主义的第二个方面,因为不仅对奈恩而言,它都是导致认识混乱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奈恩的问题在于,一贯错

---

① A. Law, 'Neither Historic nor Colonial: Workers' Organisation in a Scottish Dockyard', in A. Day and K. Lum, ed., *A History of Labour in the Royal Dockyards*. 管理员之一是亚历克·福尔克纳,1984年他成为法夫和苏格兰中部选区的欧洲议会议员。

② J. Pilger, 'The Dockers', *Hidden Agendas*, London: Headline, 1998, p. 351.

误理解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包括它曾经对“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以及它在复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之后留下的意识形态垃圾。首先要重要申明的是,没有抽象的“民族自决权”(很遗憾,它也是列宁一本不可或缺的小册子的标题)。与奈恩所强调的正相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从来不是支持“例外的”或者“好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者从来都不支持民族主义,但他们确实支持在一定条件下的特殊的**民族要求**。这些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经常被简化为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受压迫人民反抗帝国主义或是它们的本地行动者时所采取的态度上的问题。这很好理解,毕竟在20世纪的前半叶,这一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民族问题”。社会主义者支持民族主义运动的基础是在共产国际的前四次会议上确立的。它包括:提高过去被认为比殖民地统治者低下的人民(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自己也这么认为)的人类尊严;民族革命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体系的影响正在减弱,这让社会主义者有机会破除西方社会的工人与种族主义的联系,以及他们对帝国主义的支持,从而向殖民地人民证明:支持他们的是西方社会中的工人,而不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或国家。但是,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对民族运动政治本身的支持。斯大林主义一点也没被曲解的影响使大多数国际左派相信,民族运动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主义终结之后,这种观点仍然还活着,不过换了一种形式,即认为在任何条件下都会存在一种受压迫的、值得支持的民族运动。

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对特殊的民族要求(而不是对特殊的民族主义)的支持问题是由它们与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的关系所决定的,而不管这一被关注的民族是否被压迫。此外,它应该公开承诺减少工人阶级对民族主义的支持这一目标。在这种语境中,人们会问如下问题:对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国家,是加强支持还是削弱?对阶级意识和工人阶级组织,是加强支持还是削弱?对不同民族或者“人种”的相互容忍,是加强支持还是削弱?这些些并不总是容易回答的问题,在那些并不存

在民族压迫因素的地方(如苏格兰),更是如此。无论如何,努力回答它们,总是比未进行研究就提前承认每一种民族主义的合法性,并表示我们无法对它们做出价值判断,更加可取。

## 5. 政治和现代拉撒路

前面这一段让我们重新回到我们的起点苏格兰。让我们看看奈恩现在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然后做个总结。首先,我们需要理解他关于当代苏格兰民族主义的评价。在奈恩看来,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政治民族主义“不只是一种脱离联合王国的愿望”。实际上,在他的故乡苏格兰,“它是一种逃离‘市民社会’,重建‘政治社会’的渴望”。我们知道,在苏格兰,“‘市民’社会秩序(这一秩序有‘正派’、私有、个人和少数派的权利、**创始和企业自由**等意义)长期依赖于民族认同的适当的市民形式”<sup>①</sup>。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市民社会”仅仅只是反对苏格兰民族主义的“中间阶层国际主义者的一种替换立场。”<sup>②</sup>然而,不应该这样想:奈恩就是反对中间阶级的;相反,他实际上认为,他们必须居于苏格兰民族主义计划的核心。

事实上,在某个层面上,在苏格兰民族主义的阶级基础问题上,奈恩要比苏格兰国家党诚实得多:“虽然是以一个不确定的‘人民’的名义来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只能被一个在此过程中有着更多确定性的、更多既得利益的确定的人民来领导;它不可以被设想为其他的样子。”那么,在苏格兰,谁是这个阶级呢?在奈恩看来,它是这样的一个阶级:它是“使苏格兰运作的阶级——即制度上的中间阶级”,并且,他把自己界定为其中“一名顽抗者”:“它无疑进行集体假定,因为重要的术语是‘运行’:苏格兰的制度上的中间阶级从来就没有统治过这个国家,它主要是

---

① T. Nairn, 'From Civil Society to Civic Nationalism', *Faces of Nationalism*, pp. 87, 88. 黑体字为作者所加。

② *Ibid.*, p. 84.

管理它。”<sup>①</sup>实际上，从来就没有过中间阶级——不管是不是制度性的——统治过任何国家，总是资产阶级在统治。然而，对于奈恩来说，未能赢得前一集团的支持是苏格兰国家党没有能力在选举上做到突破的根源：“或许，在这个意义上，苏格兰国家党式的民族认同从来就没有够得上半程度的‘资产阶级’——它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解决方案，目标是为了人人但不是为了任何特殊的个人。”不过，在“撒切尔主义的严重冲击”下，苏格兰中间阶级现在开始严肃地考虑其民族认同了。<sup>②</sup>

现在，有一种绝对正确的认识。这就是：在 60—70 年代这个最初阶段，苏格兰国家党的阶级基础是旧的小资产阶级，“小人物、受挫的苏格兰商人（他们从石油中嗅到钱的味道，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去发财）、在通货膨胀中目睹自己失势和失去安全感的低收入中间阶级和专业人员”<sup>③</sup>。毫无疑问，新中间阶级成员现在在苏格兰国家党内占据着主导地位，他们的存在体现在原为苏格兰银行经济学家的亚历克·萨尔蒙德的领导地位上。然而，这里重要的事实是，工人阶级并没有被政治民族主义征服。奈恩无疑也知道这一事实，但这对他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他现在认为工人阶级政治与此无关。然而，对于革命而言，它恰恰是关键，但主要因为误解了以下民意调查。所以，苏格兰内外都没有注意到苏格兰民族主义在这一方面的失败。

第一种调查显示，宣称感到自己更多地属于苏格兰而不是英国的受访者的增长趋势日益明显（1998 年 6 月是 33%，而 1991 年 9 月是 29%）。<sup>④</sup> 不过，这只是表明民族意识增长了，而不是民族主义本身增长了，虽然前者是后者的一个必要前提。自从 18 世纪下半叶起，这种意识就是与一种英国性意识共有的，但是，在这种二元认同中对苏格兰“方面”

① T. Nairn, 'Identities in Scotland', *Faces of Nationalism*, p. 187.

② Ibid., p. 193.

③ R. Burnett, 'Socialists and the SNP', in G. Brown, ed., *The Red Paper on Scotland*, p. 121.

④ *The Scotsman*, 5 June 1998.

的强调并不具有必然的政治内涵。就像乔伊斯·麦克米兰曾经提到过的，“对每一个机构来说，对苏格兰认同需要不断加强，而对英国的认同则是某种理所当然的东西，（苏格兰人）必须要考虑这一机构，并倾向于在半自觉的假定——政治是某种发生在威斯敏斯特的东西——中来强调自身”<sup>①</sup>。

这里的问题不是感到英国有比苏格兰性或者其他民族有更值得向往的东西，而恰恰是因为政治和经济问题倾向于在英国层面上得到解决，这个方面的民族认同因此就在阶级联合经常得以表现的地方发生了。在某种程度上，苏格兰所有阶级都接受了英国性（在上面所引用的同一个调查表明，只有 28% 的苏格兰人对英国性没有任何感知）。如果苏格兰民族意识真正强化为政治意识，那么，恰恰因为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并且必然伴随着一种强调，即反对英国工人联盟的所有苏格兰人的联盟。

第二种民意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苏格兰人将会在有关宪法未来的全民公决中投票赞同独立，并且在苏格兰议会选举中投票支持苏格兰国家党。最近的调查显示，56% 的人选择了前者，40% 的人选择了后者——和他们所说的他们投票支持工党的百分比一样。<sup>②</sup> 这些结果并不表明原始民族主义在社会上流行起来了。它们不过是对布莱尔政府种种行动的应对而已。在 1997 年大选中，苏格兰国家党在工人阶级中进展甚微。尽管它努力表明自己是过去的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继承者，但是，在占优势地位的农村地区，它也仅仅赢得了原本属于保守党的两个席位。然而，在 1997 年 5 月 1 日的希望破灭之后，苏格兰国家党为苏格兰的选民提出了一个选举上可信的并且看起来像左派的替代方案。但这在英格兰是不可行的，也不可能是可行的。苏格兰国家党并不像工党

---

① J. McMillan, 'Foreign Lesson in Pressing for Home Rule', *Scotland on Sunday*, 22 August 1993.

② *The Scotsman*, 1 July 1998.

那样是一个改良主义的政党，但是，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人们对它的感知，而不是它的实际。<sup>①</sup>

这些调查中产生了另外两点值得一提的有趣东西。第一，宣称支持苏格兰独立的人比宣称会为苏格兰国家党投票的人的比例高出了16个百分点，这说明作为实现某种政治目标的手段的独立，与作为一种信仰的苏格兰民族主义并不存在必然联系。第二，存在一种投票支持苏格兰议会而不是威斯敏斯特——在这里，苏格兰国家党一贯达不到工党的支持水准——的意向，这说明：投票支持苏格兰国家党可能看起来是一种可以纵容的奢侈举动，因为这么做并不会产生太大危害。

在工党政府选举之后，建立苏格兰议会是改良主义者在保守党统治的年代里为苏格兰的工人阶级问题所提出的最常见的解决方案。就现在的工党本质而言，这一点毫不奇怪：那些热切希望采取阻力最少的道路的人，关注的更多的还是议会将会带来什么。奈恩分享了这个幻想吗？在这里，我们又绕回到英国国家这一问题上来了。奈恩是如此憎恨那些老顽固，以至于他对工党在1997年5月1日取得胜利的反应相当冷漠。<sup>②</sup> 奈恩正确地看到了布莱尔不会做任何事情去干扰现存状态，除非是被迫去做。但是，他完全误解了在1997年9月13日投票支持议会的“税收变更”权的背后所隐藏的东西：“我无需指出，对于一个被恢复的议会来说，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去提高或者降低几个百分点的税收，而在于是否去改变联合王国的联盟现状。”<sup>③</sup>

奈恩看起来非常自信这将会发生。在1997年11月的选举及社会趋势研究中心年会的发言中，他预言“在英国主权这个正在破碎的蚌壳

① N. Davidson and K. McKechnie, 'Riotous Assembly?', *Socialist Review* 219, May 1998, pp. 4-5.

② T. Nairn, 'Sovereignty After the Election', *Faces of Nationalism*, p. 221.

③ *Ibid.*, p. 223. 这里提到的“被恢复的”议会可能是在影射1707年4月28日宣布解散议会的封建阶级。



中,真正的地方自治……将会发现它无法避免事实上的主权”<sup>①</sup>。这里有两个问题。

第一,主权究竟是为了什么?这种对主权自身目的的困惑(考虑到奈恩很关注保护“企业”这个问题)是泛民族主义阵营中大多数右翼立场都可利用的。

第二,对于大多数苏格兰人来说,“联合王国的联盟现状”是这个问题的核心吗?1997年的苏格兰选举普查显示:54%的受采访者表示希望在苏格兰议会建立之后“经济”能够变好(13%希望好“很多”,41%希望“好一点”),38%的人希望失业状况能够得到改善(6%和32%),62%的人希望教育能够变得更好(17%和45%),还有60%的人希望国民健康保险体系能够得到改善(16%和44%)。<sup>②</sup>这些发现趋于显示出两个结论。一是,人们希望拥有苏格兰议会的主要原因是直接的社会问题,而不是抽象的主权。另外一个,即使这样,除了稍微提高生活水平外,人们无意得到更多的东西。另一方面,奈恩相信,一个属于苏格兰的国家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天生就是有益的。在关于反对人头税运动的文章中,他提到:“那里的每一个人……都十分清楚地知道,任何苏格兰的法律都不能想象会强迫这样的一种税收开始实行。”<sup>③</sup>众所周知,议会所享有的权力是极其有限的,虽然在鼓动和宣传正如教育这种议会还有点控制力的问题,议会还是有些影响力的。1999年5月选举的投票系统被有意设计得尽可能地防止既定政党之外的个人和组织被选上。此外,它倾向于创建一种联盟政治,在其中,工党和苏格兰国家党都能宣称:为了要安抚

---

① ‘British Sovereignty Since the Election’, *Scottish Affairs, Special Issue, Understanding Constitutional Change*, 1998, p. 36. 奈恩的发言对唐纳德·杜瓦——他之前的演讲者——进行了非常不恰当的、有点卑躬屈膝的称赞:“我们迄今为止最了不起的苏格兰国务卿。杜瓦应当对工党的深重罪孽负很大的责任。”参见 *ibid.*, p. 13.

② P. SurrIDGE, L. PATTERSON, A. BROWN and D. McCrone, ‘The Scottish Electorate and the Scottish Parliament’, *Understanding Constitutional Change*, p. 43.

③ T. Nairn, ‘Empire and Union’, *Faces of Nationalism*, p. 208.

自己的合作者，自己不能实行激进的政治。最终，通过选举，工党的候选人如愿当选。而且除了少量忠诚的布莱尔派左派外，其他人都被淘汰了。不过，就整体而言，苏格兰议会通过某些具有进攻性的法案——如人头税——这种前景的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

奈恩对所有这些都是十分清楚的，但是，他可能会认为议会权力的增长是不可避免的，它的存在导致了对更多“主权”的更强烈渴望。不过，反过来说，这是建立在一种错误信仰的前提——认为主权对于大多数苏格兰人来说都是重要的——之上的。大多数工人阶级的苏格兰人所需要的是对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控制，这是威斯敏斯特和荷里路德的资产阶级议会所不能给予的。事实上，资产阶级议会就是专门用来防止工人阶级去实现种控制权的。未来，当以下情况——即苏格兰议会辜负了投诸它的哪怕是最低希望——变得很明显时，很可能出现某些反应。其中之一是奈恩（以及苏格兰国家党通过一种更加直接的选举方式）所渴望得到的结果：议会的失败被视为源于苏格兰主权的缺失，并由此促成民族独立成为一种不可抵抗的要求。第二种可能是：失败的结果宣告了它只是细枝末节；与提高公众的利益水平相反，它成了同样一种困惑的蔑视对象，在这种蔑视中，地方行政当局获得了关注。还有一种可能是，它的失败不是被视为缺乏独立的结果，而是因为它是一个无法挑战苏格兰的或者其他任何地方的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机构。当然，最后一种理解是正确的。它意味着革命者应当确立在工人阶级中的霸权。如果我们失败了，那将会是因为政治原因，而不是因为我们的追随者都是从心眼里倾向信奉民族主义。

最后有一点值得思考，即奈恩总是倾向于把英国国家当做仿佛有自己的生命，并与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相分离的东西。无论如何，他的观点都假定了“英国的分裂”将代表英国统治阶级的失败，并且，它将反对苏格兰的分离。事实上，这也正好能够说明苏格兰独立的想法为什么在左派中有如此强烈的共鸣。但是，下列情况绝不是确定的，即如果其他宪制安排同样能够服务其利益，英国的统治阶级还会必然致力于按现

有模式保存英国国家。早在1990年，一贯充当最极端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教条指路人的《经济学家》杂志就在一篇社论中指出，苏格兰实现独立的过程可能有以下好处：“由于无法依赖财务大臣的施舍，苏格兰的政治阶级将会为他们自己采取不受欢迎的闭锁政策，或让管理者自由地去这样做。”该社论期待着“用一种成长起来的政治文化来替代今日这种气窘参半的依赖状态”，这种政治文化能够关闭像拉文斯克雷格这样的工厂，但不会向“工业浪漫主义”让步。<sup>①</sup>

在当时，这是一个孤独的声音。但有迹象表明：资产阶级本身——而并不仅仅是他们的理论家们——现在可能准备考虑一种完全的独立，不是在自由市场学说的基础上，而是作为寻求稳定性的一个部分。《金融时报》最近报道：“困扰商业的是关于苏格兰地位的无休止的不确定性和争论，而不是最终解决方案的实质。”<sup>②</sup>正在下滑的苏格兰经济不可能创造出像加泰罗尼亚那样的相对胜利。就像在加拿大的魁北克一样，正在成为苏格兰政治的一个永恒特征的民族问题，其前景将会使得独立变得具有吸引力。之所以如此，仅仅是因为这将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这种观点认为，议会一旦确立便有可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在这个问题上，最典型的当属安德鲁·尼尔的谈话：“在一个更加放权的、甚至是联邦制的联合王国中创造一种新的联合主义。”不过，最终在决定英国国家发展道路的问题上被奈恩描述为“典型的苏格兰走狗”的尼尔的重要性无疑要比他钦佩的那些资本家小得多。<sup>③</sup> 如果苏格兰的独立真的成为英国资产阶级能够容忍的某种东西，那么，左派用以支持它的一个核心观

① ‘Scots Awa’, *The Economist*, 26 May-1 June 1990, pp. 18-19.

② A. Gowers, ‘L Ecosse Libre’, *Financial Times*, 14 August 1998.

③ A. Neil, ‘Scotland the Self-Deluded’, *The Spectator*, 15 August 1998, p. 12. 我不记得奈恩这一令人难忘的谩骂是从何而来的了，不过，这次他骂的倒是很对。但是，奈恩的伪善特征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这种伪善是从他在《苏格兰人》上一篇令人厌恶的专栏文章中隐隐表现出的。他是该刊物的主编。在他的治理下，该刊经常性地且一次比一次严重地表现出了右派的歇斯底里。

点——它是与资产阶级的利益相对立的——将会被有效地消解掉。奈恩朝着接受“企业”的路线图的悲剧之一就在于，对他来说，这个核心观点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

## 6. “我们都是德国犹太人”

在《民族主义的面孔》中的一篇文章中，奈恩批评了马立克·科恩的《种族长廊》，从中他摘录了两条格言。第一条是：“人类的生理学多样性需要被研究而不是被否定。”第二条是：“为了人类能够生存下去，需要更多地保护这种生理多样性。”读者不用费什么心思就能猜出那些保护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在此，奈恩特别提到了欧洲中东部的吉卜赛人。斯大林主义垮台以后，他们遭受了新一轮的种族歧视。无需说，就奈恩而言，能够抵制这种歧视的可能性并不存在。因此，吉卜赛人必须建立他们自己的民族主义，以反对那些“民族语言的或者‘人种的’”“不可避免的”民族主义。<sup>①</sup>

奈恩逐渐远离马克思主义的悲剧在于：曾几何时，他也曾以一种张扬恣肆的方式承认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不是作为神话，而是作为种族和民族压迫的现实解决方案：

当戴高乐在五月风暴后的“发言”中屈尊地讲到“法国的新血液”的时候，他暴露出来的是对这一代的无知。这一代人诅咒“法国”与神父、教授和警察，并以“我们都是德国犹太人”为座右铭。他们在一天中为国际主义事业和欧洲团结所做的贡献，比政府和西欧工党官僚在 20 年所做的还要多。<sup>②</sup>

<sup>①</sup> T. Nairn, 'Race and Nationalism', *Faces of Nationalism*, p. 121.

<sup>②</sup> 'Why it Happened', A. Quattrochi and T. Nairn,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London: Panther, 1968, p. 173. 尼尔为该书的再版撰写的评论认为，读者应当跳过汤姆·奈恩所写的第二部分，直接去读该书的其他部分 (Jonathan Neale, '1968: The Year the Monolith Cracked', *Socialist Review* 219, May 1998, p. 17)。与夸特罗其这个才华横溢的情景主义者相比，奈恩在该书中的表现的确相形见绌。即便如此，这在奈恩前后期著作中也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了。

“我们都是德国犹太人”，这是法国学生和工人们在1968年5月因丹尼尔·科恩-邦迪遇刺事件——他是作为资产阶级压迫下的一名“德国犹太人”而遭到蓄意暗杀的——举行的游行示威中打出的一条标语。奈恩曾经用同样的标语来反对民族主义提供给苏格兰的那毫无价值的构想：“在这样一个年份中，即法国的青年人在波旁宫前哭喊着‘我们都是德国犹太人’，而搁浅在萨尔布吕肯桥边上的过去的民族主义已经蒙尘日久的年份中，勉强同意苏格兰国家党对我们的未来的构想，纯粹是一种无聊的自杀形式。”<sup>①</sup>这句话听起来很有点以下意味，即当别国青年人起来宣称他们是德国犹太人（或是旁遮普的苏格兰人）、从而力图反抗这种不公正时，奈恩却在向我们分发自杀用的毒药。托洛茨基在1933年写道：“错误的政治理论本身就背负着自己的惩罚。”<sup>②</sup>苏格兰或是任何其他地方的工人阶级都没有必要去领受那种惩罚。免除它的前提就在于：我们必须首先把自己当做真正的工人，并且拒绝所有那些力图让我们相信关于苏格兰民族的偶然事实或者其他什么东西会决定我们命运的理论。

（汤建龙 译 张亮 校）

---

① T. Nairn, 'The Three Dreams of Scottish Nationalism', *Memoirs of a Modern Scotland*, p. 54.

② L. D. Trotsky, 'The Tragedy of the German Proletariat: the German Workers Will Rise Again—Stalinism, Never!', in G. Breitman and M. Maisel, ed., *The Struggle against Fascism in Germany*, New York: Penguin, 1971, p. 377.

## 11. 佩里·安德森的早期新左派政治学

保罗·布莱克里奇

1956年以后,新左派对斯大林主义的拒绝迅速演化为对列宁主义的拒绝,这反过来又滑向了对建立任何独立于工党的社会主义组织这一战略的拒绝。事实上,对于那些新左派出身的重要知识分子而言,爱德华·汤普森那种对建立新左派组织所持的无所谓态度,在1956年之后颇有代表性。汤普森有一个知名的观点:“新左派并没有提供一个可以替代现有派系、政党或领导层的东西……官僚控制着领导层,但是,新左派掌握了与新一代进行沟通的桥梁。”汤普森坚持认为,只有不加入任何组织,社会主义的理论作品才能够得到最好的完成。<sup>①</sup>可就在提出这些早期观点两年后,在为他主编的《新理性者》的最后一期——《新理性者》随后与《大学与左派评论》合并重组成《新左派评论》——所合作撰写的一篇不太为人所知的短篇社论中,他写道:“对于我们的读者,同样对于《大学与左派评论》的读者,到了该结束争论、建立政治组织的时候了……我们必须把这一思想付诸实践,对外使它作用于年轻的一代,对内使它作用于传统的工人运动。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在新左派和工

---

<sup>①</sup> E. P. Thompson, 'The New Left', *New Reasoner* 9, Summer 1959, pp. 15 - 17; E. P. Thompson, 'Socialism and the intellectuals', *University and Left Review* 1, Spring 1957, p. 34.

人阶级之间建立更多的联系。”<sup>①</sup>汤普森坚持认为，新的活动家“必须从对组织的持久关注、真正的道德现实主义中学习，这一道德现实主义能够使人年复一年地去面对那些不断出现的局面”<sup>②</sup>。

这种新愿景反映了直到1959年新左派才发觉身处其中的困境的某些侧面：汤普森对建立一个独立的新左派组织的拒绝态度逐渐与以下情况发生冲突，即知识分子越来越把自身作为共产党和工党之外的一个实际存在的组织。这种情况没有比在西法夫更真实的了。在那里，劳伦斯·戴利曾试图找到替代工党和共产党的选举方案。<sup>③</sup>新左派通常会支持这种发展，但是这种支持却是模棱两可的。例如，约翰·萨维勒就指出，只是西法夫地区独一无二的政治文化特征才使戴利的立场看起来是顺理成章的，因此，他总结说，戴利的战略并不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sup>④</sup>许多杰出的新左派知识分子都追随萨维勒，认为虽然他们也会支持戴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与工党全面决裂。更有甚者，汤普森——除了革命的雄辩，他还设想了一种非常不革命的“和平的”英国革命<sup>⑤</sup>——所支持的改良主义理论战略也从这种策略性的观点得到某些借鉴。

事实上，直到1960年，汤普森都认为，把工党转变为向社会主义发展的主体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就像他所写的那样，这一潜在可能性正在实现之中：“工人不再为一种替代性的统治现存社会的方案而费神，他开始寻找一种替代性的社会。”<sup>⑥</sup>因此，他认为，新左派的作用就是应该鼓励这种进步，但同时也必须保持清醒的意识：一旦改造工党的乐观方案遭

---

① E. P. Thompson, 'A Pessay in Ephology', *New Reasoner* 10, Autumn 1959, pp. 5-6.

② E. P. Thompson, 'Commitment in Politics', *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 6, Spring 1959, p. 55.

③ Michael Kenny, *The First New Left: British Intellectuals after Stalin*,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5, p. 40.

④ John Saville, 'A Note on West Fife', *New Reasoner* 10, Autumn 1959.

⑤ E. P. Thompson, 'Revolution', in E. P. Thompson, ed., *Out of Apathy*, London: Steven & Sons, p. 302.

⑥ E. P. Thompson, 'Revolution Again', *New Left Review* 6, November-December 1960, p. 19.

受失败，“那么就必须创建新组织”<sup>①</sup>。因此，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汤普森和新左派的主流都认为，努力去把工党改造为一个能够实现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组织，不仅是可能的，更是可取的。在 1959 年老工党大选失败后，这一关于改造工党的积极乐观希望促使新左派活动家们开始投身于与工党右派的斗争。因此，“1959 年以后，很多原来怀疑工党的人都开始致力于将工党改造为一个左派政党的斗争；1960 年以后，新左派开始向工党的陈词滥调发动新的猛烈进攻，从而增强了这种趋势”<sup>②</sup>。

不幸的是，这一愿景内在地极大低估了右翼工党领袖们的力量。事实上，它到 1961 年就全盘崩溃了：是年，在工党的斯卡伯勒年会上，工会官僚们以票决挫败了左派关于单方面核裁军的议案。<sup>③</sup> 这一失败并没有预示新左派的终结，只不过新左派再也不像 1961 年以前那样，旗帜鲜明地高举工党改革这面大旗了。不过，令人扼腕的是，这一事件以及因此导致的工党左派在年会上的败北，确实导致了新左派随后的解体。<sup>④</sup> 相对于左派在工党内连续两年的大发展而言，斯卡伯勒年会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新左派的精神阉割：正如威廉斯所说：“1961 年在核裁军问题上的票决失利是一场令人震惊的风暴。在那里，我们对工党领袖们的力量一无所知，对右派资以利用从而获得胜利的政治技巧也是一无所知。”<sup>⑤</sup> 对此，彼得·赛奇维克的观点是，这一失败标志着作为政治运动的第一代新左派的终结。<sup>⑥</sup>

① E. P. Thompson, 'Revolution Again', *New Left Review* 6, November-December 1960, p. 29.

② Michael Kenny, *The First New Left*, pp. 131, 143.

③ T. Cliff and D. Gluckstein, *The Labour Party: a Marxist History*, London: Bookmarks, 1996, p. 274 - 276; Perry Anderson, 'The Left in the Fifties', *New Left Review* 29, January-February 1965, p. 9.

④ 安德森认为第一代新左派的解体有一个过程，其起点是检验核裁军运动在工党内的的发展，随后则经历了《新左派评论》的销量下滑以及新左派俱乐部成员的减少（Perry Anderson,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London: Verso, 1981, p. 136）。

⑤ Raymond Williams, *Politics and Letters*, London: NLB, 1977 p. 365.

⑥ Peter Sedgwick, 'The Two New Left', in Widgey, ed., *The Left in Britain*, London: Penguin, 1976, pp. 134, 144.



## 朝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前进

对于第一代新左派的危机,安德森的反应在性质上要比大多数具有类似背景出身的其他主流人物高明一些。有一小部分人加入了这种或者那种托派组织,大多数人则从政治领域抽身而出,或者更确切地说,进入了正不断扩大的学术界。与此同时,安德森此时却试图把英国社会主义战略思想建立在一个更加坚固的理论基础上。安德森曾经呼吁过要出版一系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比较研究,以发现适用于那些国家的政治战略。这一过程的高潮是1964年发表的《当前危机的根源》(以下简称《根源》)一文。<sup>①</sup>在《根源》以及一系列相关文章中,安德森试图在历史发展轨迹的背景上来定位英国资本主义的当代危机根源。然后,他试图勾勒英国的社会学结构,其目的是检验这种结构由以影响危机的那些机制。进而,他确立了一种植根于历史学和社会学分析的政治规划。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这样一种愿景: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洞见,并进行综合创新。

《根源》的理论结构是暗含在文本之中的:葛兰西在正文中被提到了一次,而在脚注中,萨特出现了两次,卢卡奇、玛格利和梅洛-庞蒂各一次。不过,在《社会主义和伪经验主义》(1966年)一文中,安德森专门就《根源》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来检验英国历史和社会这种奇特做法进行了辩护,因此使其得益于那些思想家这一事实变得更加明确。此外,他还为他从英国之外寻找思想启示这一决定进行了辩护,因为,“在英国……根本不存在有凝聚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虽然安德森认为西方

---

<sup>①</sup> 这一时期,安德森的文章大多是和他在《新左派评论》中的伙伴汤姆·奈恩的文章联袂发表的。这些文章是他们一贯的政治介入努力的一部分。鉴于篇幅问题,奈恩对那些议题的贡献本文不做讨论。对此可以参见 Neil Davidson, 'In Perspective: Tom Nairn',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Journal* 82, 1999(即本文集收录的《汤姆·奈恩的民族主义理论:历史发展与当代批判》——编者注)。

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同质的传统——“卢卡奇、葛兰西和萨特的理论前提和关注重点存在很大差别”<sup>①</sup>——但是，他确实试图利用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理论洞见编织出一种连贯的理论来。

伊萨克·多伊彻批评《根源》是一部“民族虚无主义的”作品。<sup>②</sup> 他这样说的意思是：虽然安德森渴望克服与新左派相关的战略缺陷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却没有充分理由就将许多英国社会主义的理论遗产抛弃了。这一批评确实抓住了安德森作品中实际存在的局限性，但是，让当时的读者感到耳目一新的却是《根源》没有言明的民族性参照系。正如鲍勃·卢科尔所说，就是这种共同的感受把安德森和他在英国国内的主要批评者汤普森联系起来。除了作品表面上的区别，“安德森和汤普森都把‘民族的’视为是自然的——因此也是未受检验的——层面，他们的争论就是在此层面上展开的”<sup>③</sup>。安德森的这种民族性参照系源自萨特、卢卡奇，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源自葛兰西。<sup>④</sup> 因为《共产主义者与和平》、《理性的毁灭》和《狱中札记》都试图去分析本国社会形态的特质，并希望以此来支持更加可行的国内社会主义政治，所以，一旦成为《新左派评论》的掌门人，安德森的直接目标就是去效仿这种榜样。

《共产主义者与和平》连载于 1952—1954 年的《现代》杂志，萨特力图以此历史性地证明 50 年代中期他与法国共产党的同路人关系。不过，因为 1956 年以后萨特本人已经转向更明确的反斯大林主义的独立立场，从而否弃了这种路径<sup>⑤</sup>，所以，安德森对这一主题的关注本身表明：相对于新左派 1956 年以后力图在英国建立一个独立左派这种早期意

① Perry Anderson, 'Socialism and Pseudo-Empiricism', *New Left Review* 35, January-February 1966, pp. 31-32.

② Perry Anderson, *English Questions*, London: Verso, 1992, p. 5.

③ R. Looker, 'Shifting Trajectories', in C. Barker and D. Nicholls, ed., *Northern Marxists Historians Group*,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8.

④ Perry Anderson, *English Questions*, pp. 3-4.

⑤ Jean-Paul Sartre, *The Specter of Stalin*, Hamilton: Hamish, 1969.

图,他的退却已经有多远了。从某种意义上讲,安德森诉诸萨特 1956 年之前的政治思想以为 60 年代英国的社会主义战略寻求支撑,这多少有些反讽。

在与“圣日耳曼”欧内斯特·曼德尔的交锋中,萨特论证了自己的立场。与很多英国社会主义者对工党的批评一样,曼德尔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共产党在很多场合中都“歪曲了成千上万战士的本能和革命动力”<sup>①</sup>。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作为一个有道德立场的社会主义者,萨特将被迫与独立左派重新结盟。那时,为了避免这种即将发生的尴尬结论,萨特开始尝试表明:法国共产党根本没有背叛法国的工人阶级,而是忠实地代表着那个阶级。因此,与他所讲的那种曼德尔的托派“理想主义”相反,萨特争辩说:“我既不关心什么是应该被渴望的,也不关心党自身与永恒的无产者所要维持的理想关系;我不过试图去理解:在今日之法国,在我们每个人眼前,究竟正在发生着什么。”<sup>②</sup>

萨特断言,要成为资产阶级是容易的,你只要选对了父母并活着就可以了。相反,成为无产阶级,工人就必须与自己的存在做斗争,那就需要实践。而且,这种实践必须要有组织化的形式,这必须是政党。工会不可能扮演这种角色,因为工会只代表工人的部分利益,仅仅为结果而不是为了原因去斗争。<sup>③</sup> 萨特甚至更为激进地争辩说:“没有共产党,法国工人阶级就不能拥有实际的历史。”<sup>④</sup>因此,批判共产党的官僚化是一种时代错误。法国共产党仅仅反映了工人的斗争状态,如果工人投向了官僚结构,那就让它这样好了:现实必将证明那是必要的。<sup>⑤</sup> 与曼德尔关于工人阶级本质的主张相反,萨特坚持认为,如果左派要理解法国阶级

---

① Jean-Paul Sartre, *The Communists and Peace*, Hamilton: Hamish, 1969, p. 105.

② Ibid., p. 120.

③ Ibid., pp. 128, 181.

④ Ibid., p. 134.

⑤ Ibid., p. 213.

斗争的特殊性,那么,对法国历史的特殊性进行具体的分析就是必需的。<sup>①</sup>我们无需在萨特历史分析的细节上停留太久,因为可以这样说,他所描绘的历史是一个为法国独特的自我提供了基础的总体化过程。这是安德森眼中的英格兰历史的一种预示。<sup>②</sup>

与萨特的法国历史类似,卢卡奇把总体化的德国民族历史具体化为一种坚定地支持当时政策的手段。在《理性的毁灭》(1954年)中,他分析了德国的民族特性,以解释纳粹的兴起。卢卡奇接受了斯大林关于纳粹代表了垄断资本的利益的论调,但又试图通过对19世纪以来德国非理性主义的发展的具体分析来克服这一论断的粗糙。无论如何,在希特勒的兴起这个问题上,他的解释模式毫无疑问要比传统的斯大林主义模式精细得多。不过,在希特勒为什么会不断取得胜利这个问题上,《理性的毁灭》和传统的斯大林主义解释相差无几,即都把它解释为德国历史之最终目的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对此,左派毫无还手之力。<sup>③</sup>在这个方面,卢卡奇深刻影响了安德森后来对英国政治那种听天由命的分析。

如果说萨特和卢卡奇为安德森提示了论题,那么,在这一阶段上,对安德森思想影响最大的应该是葛兰西。事实上,安德森明确表示,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新左派评论》“发现葛兰西的两个核心主题触及我们的处境。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第一个从资产阶级革命的独特形式,来追溯已经被开创出来的本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民族性特征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他也是第一个承认必须为实现普选权之后的西方工业化国家寻找具体的社会主义战略的革命家”<sup>④</sup>。

① Jean-Paul Sartre, *The Communists and Peace*, pp. 134 - 135.

② 萨特在《方法问题》和《辩证理性批判》中为这种方法进行了辩护。在那些著作的前面部分,他攻击了那些被他称为柏拉图主义的各种马克思主义修正版,其中既包括斯大林主义也包括托洛茨基主义,因为它们用一场彻底的“硫酸澡”把真实的历史消解了(Jean-Paul Sartre, *Search for a Metho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3, p. 44)。

③ György Lukács, *The Destruction of Reason*, London: Merlin, 1980, pp.76 - 77.

④ Perry Anderson, *English Questions*, p. 3.

对青年安德森吸引力最大的其实还是葛兰西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批判。关于共产国际就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开展的“辩论”，葛兰西认为，每一个西方国家都有一个特殊的霸权结构，这一特殊结构反过来就必然需要一个特殊的民族性的社会主义战略。因此，在分析国际形势和“国内因素”的关系时，斯大林是问对了问题的，而托洛茨基的分析则过于一般和“国际化”。<sup>①</sup> 因此，与对托洛茨基的理解——他的理解无疑比斯大林的理解要精细得多——相比，葛兰西试图用一种对民族霸权结构的精密分析来支持民族性的社会主义战略，并且把它理解为民族历史的产物。

《狱中札记》认为，在意大利，并且在更广的意义上，在整个西方，市民社会中的霸权体系是通过知识分子而得以运作的；他们是“统治集团的代理人，所行使的是社会霸权和政治统治的下级职能”<sup>②</sup>。葛兰西认为，革命者如果要获得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胜利，就必须同时投身到两个方面的斗争中：既反对政府，又反对存在于市民社会中的资产阶级观念的影响。<sup>③</sup> 葛兰西分析的革命是意大利的复兴运动：一种“被动的革命”，通过这一革命，意大利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成了一种反霸权的集团来赢取其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sup>④</sup> 葛兰西从这一事例生发出了它的普遍意义，并建议要在社团化阶级和霸权阶级之间作明确的区分：前者以美国工会为代表，是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独特阶级而存在的，它对政治权力没有什么主张；相反，霸权阶级在意识形态上和经济上都向政治权力发出了挑战。进而，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虽然不是很系统地——把“被动的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概念做了比较，认为俄国革命是“艺术史和政治学上的一个决定性转折”的标志，从此，立场斗争取代暴力革命成为社会转型的中介。因此，葛兰西（至少在某些提法

①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pp. 240, 237.

② *Ibid.*, p. 12.

③ *Ibid.*, pp. 19-20.

④ *Ibid.*, pp. 105 ff.

上)认为,从其意大利历史研究中形成的“被动的革命”概念能有助于解释西方(被动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构。<sup>①</sup> 这种看法特别重要地影响了安德森《社会主义战略问题》中原始的欧洲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

在综合各种资源以形成自己对英国的衰落的解释的过程中,《根源》既大胆展示了安德森的才智,也大胆展示了他对当代政治思想的把握。而且,它是一篇在迄今为止的政治争论中都能感觉到其影响力的论著。<sup>②</sup> 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管安德森在为左派阐述新战略的努力中运用的欧陆理论资源有多广,也不管爱德华·汤普森归因于《根源》的争论积怨有多深,安德森实际得出的政治结论和汤普森主张的意图和目标却是同样的。尤其是到1963年,两人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哈罗德·威尔逊将成为英国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最初几步的责任人。<sup>③</sup> 因此,与这一阶段吸引安德森的那些头痛医头的短期政治结论相比,《根源》可能更感兴趣的是塑造其成功的理论影响力,以及对英国社会的分析。然而,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更令人感兴趣却还是他的长期政治规划。

## 英格兰的历史

关于英国被人们所普遍经验到的危机,当时已有不少论著。在《根

①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p. 235.

② 安德森论题对威尔·赫顿1995年的畅销唱片《我们身处的国家》和88宪章纲领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A. Barnett, *This Time: Our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London: Vintage, 1997, p. 345)。

③ 事实上,在2002年6月在边山学院召开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新社会运动”讨论会的发言中,多萝茜·汤普森再次提到了那一晚的故事:她、爱德华·汤普森、罗宾·布莱克伯恩还有安德森充满激情地庆祝了威尔逊在1963年工党领袖选举中的胜利。弗雷泽曾更一般地强调,随着核裁军运动的解体、单边主义的失败和威尔逊的获胜,“现在所有的希望都集中到了工党身上了”(R. Fraser, *1968: A Student Generation in Revolt*,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88, p. 61)。相反,有些第一代新左派确实起来抵制那种把大多数人推向威尔逊主义的潮流。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在1963年底的《国际社会主义》中写道:“不管在做什么其他的专业社会主义,至少在现在这个时刻,接受了威尔逊,就意味着向右转”(P. Foot, *The Politics of Harold Wils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8, p. 317)。

源》的开头,安德森对所有既有研究都进行了批判。安德森列举了其中几篇,并把它们描述为“在毫不夸张的意义上是短命的,因为它们没有历史的维度”。他强调,这不仅适用于那些右派作者的作品,同时也适用于安东尼·克罗斯兰和威廉斯等左派学者那些更有意义但终究是有缺陷的作品。归根结底就在于它们仅仅是社会学的成果。虽然它们或多或少在某些方面成功地揭示了英国社会结构中的某些因素,但都没有对当时的英国进行总体的结构分析。安德森决定着手纠正这些错误。他的目标是用一种图解式的、尽量接近的形式来勾勒“(作为)当前英国任何一种社会主义理论的依据(的)……阶级结构的全球发展”<sup>①</sup>。

安德森眼中的英格兰史,是一部英国资产阶级未能完全实现英国国家的现代化的失败史,由此推而广之,也就是一部英国贵族为维持它对国家权力的控制而斗争的成功史。<sup>②</sup> 安德森写道,“在主要欧洲国家中”,英格兰“有着最早的、最温和的也是最不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一革命与其说是代表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的胜利,倒不如说是一部分拥有土地的贵族对另一部分拥有土地的贵族的胜利。事实上,内战“主要是在一个阶级内部而不是在两个阶级之间”进行的。虽然议会中的地主是资产者,但他们并不构成一个资产阶级。因此,当革命打破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障碍时,它并没有改变英国的“社会结构”,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一种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仍然保持着它的霸权地位:“革命的意识形态遗产几乎是零,清教是一种无用的激情。”<sup>③</sup>

对 17 世纪的英国革命,安德森点到为止,接着就从 17 世纪转到 19

---

① Perry Anderson, '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 in Perry Anderson, *English Questions*, pp. 15 - 16.

② R. Johnson, 'Barrington Moore, Perry Anderson and English Social Development', in S. Hall, D. Hobson, A. Lowe & P. Willis (eds.), *Culture, Media, Language*, London: Hutchinson and The Centre For Cultural Studies, 1980, pp. 59, 61.

③ Perry Anderson, '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 in Perry Anderson, *English Questions*, pp. 17 - 19.

世纪,即他的研究中用以解释当前的萎靡不振的下一个关键机遇期。正是在这个机遇期,安德森在资产者和资本家之间所做的区别占据了中心位置。英格兰在一个国际政治反动势力不断增长的时期里经历了工业化,也因此经历了工业资产阶级的的发展。拿破仑的威胁,以及与之相伴的工人阶级的兴起,推动资产阶级领导集团重建与资本主义化的贵族的合作,从而在英国的统治阶级中创造了一种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特殊的融合”。<sup>①</sup> 这一融合虽然是以那些全球进程为前提的,但也是以教育体系为中介的。<sup>②</sup> 1846年《谷物法》废除后,资产阶级不再是一种反对力量。此后,阿诺德主义者在19世纪下半叶的公学中创造了一种新“绅士”,允许贵族成为他们的“先锋”。《谷物法》的废除是安德森“机遇星丛”中另一个重要的节点。因为正是在这一个节点上,资产阶级停止了他们反对贵族特权的圣战,售卖了自己对政治权利和土地与生俱来的权利。它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贵族不是资产阶级,而是一个资本主义化的阶级。因此,“在旧贵族和新出现的资产阶级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矛盾”<sup>③</sup>。安德森指出,这其中存在着“理解现代英国历史的一把最重要的钥匙”<sup>④</sup>。

---

① Perry Anderson, 'Problems of Socialist Strategy', in NLR ed., *Towards Socialism*, London: Fontana, 1965, p. 19. “唯一”一词参见 Perry Anderson, '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 in Perry Anderson, *English Questions*, p. 22.

② Perry Anderson, '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 in Perry Anderson, *English Questions*, p. 22.

③ Ibid., p. 20.

④ 安德森认为,英国的精英所代表的是萨特所谓的“去总体化的总体”:英国统治集团可以被视为一个狭窄的高度结构化的霸权阶级,在其下方是一个由形态各异的职业经理人阶层和许多工薪中间阶级组成的混乱的“蓄水池”。双方中任何一方的严格结构都会严重地解构对方,因为从中间阶层通往上层阶级的通道只向少数特定人员开放。因此,英格兰的中间阶级从来都没有为上层或者所谓的工人阶级创造出任何谈得上与众不同和有分量的体制和文化(Perry Anderson, '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 in Perry Anderson, *English Questions*, p. 20)。萨特曾以市场为例解释了这个概念。在市场中,每一个个体都像其他人一样,与其他人发生着联系,但是,谁都不能把市场视为只有通过他们才能存在的;他们都把它视为“外在性”。因此,事实上,总体只能被序列化的个人总体体验到。在这个意义上,总体是去总体化的(Jean-Paul Sartre,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vol. 1, London: NLB, 1976, pp. 285-286)。



英格兰早期工业化的必然结果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诞生。但不幸的是,这一无产阶级是“早产的”,因为在本土社会主义能够发展成熟之前它就诞生了。对于马克思来说,英国工人出现得太早了,以致他们如此缺乏理论武装,因而未能在宪章运动的伟大斗争中掌握英国政权。因此,宪章运动悲剧性地以失败而告终。1848年以后,英国工人阶级的生命出现了一个“休止”。正是因为这个“休止”,导致了在该世纪末无产阶级的战斗性再次兴起的时候,主要受益者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工联主义。工联主义就其本身来说是由帝国主义支持的,因为在宪章运动和新工联主义兴起之间这个历史时期,英国已经滑向了帝国主义。进而,当帝国主义还是一种资本主义现象时,它通过赞美军国主义的“美德”,把“统治阶级的个人类型”强化并界定为“贵族的、非专业的、‘正常的’土地所有者”。<sup>①</sup>因此,帝国主义是安德森星丛中的第三个机遇,它巩固了英国贵族阶级的霸权地位。帝国主义将乘坐其驾驶的列车的一切阶级和政党都荡涤一尽,并且从意识形态上把它们整合进了贵族世界观。这一过程在188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横扫整个英国的君主制新信仰中得到了反映。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下的帝国主义膨胀期,1846年遭到恐吓的资产阶级最终也被整合进来了。相似地,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工人阶级中也完全被这种帝国主义热情控制住了。安德森注意到了左翼反帝国主义倾向的存在,但忽视了它们,而是把那些实行这一反帝国主义信仰的组织描述成了各种小宗派。因此,那些失败了的传统在他对英国危机的分析中只发挥了微不足道的作用。相反,他提到了马克思主义对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典的现代工人运动的形成所发挥的巨大影响。<sup>②</sup>

最后,安德森认为,与欧洲国家不一样,英格兰在1914年到1945年

<sup>①</sup> Perry Anderson, '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 in Perry Anderson, *English Questions*, pp. 22 - 23. 卢卡奇同样把德国的意识形态特征——“包含一种奴性和琐碎的方式以及可怜的精神”——图绘为在封建和资产阶级因素之间的某种“模糊”(György Lukács, *The Destruction of Reason*, p. 42)。

<sup>②</sup> Perry Anderson, '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 in Perry Anderson, *English Questions*, p. 27.

之间没有遭受失败或者革命。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欧洲其他政权所遭受的失败以及它们由此经历的革命性剧变,促成了它们的现代化。因此,在其他周边国家都已经实现现代化的时候,英格兰从来都没有动力与过去进行决裂。安德森说,贵族霸权由此获得的延续性在以下事实中得到了反映:在20世纪,成为英国天然执政党的是保守党,而不是自由党。事实上,在英格兰的经济基础已经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转型之后,它的上层建筑仍然未被触动。经济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堡垒,但贵族统治循序渐进地抓住四个有利的机遇,设法延续了自己之于整个社会的霸权。同时,尽管工人在罢工斗争方面已经变得更加具有战斗性,可他们从来都没有挑战国家的领导权:他们始终是“分散的和次要的”<sup>①</sup>。

## 英格兰的社会结构

安德森眼中的英格兰史是以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被整合进贵族世界观而结束的。正是站立于这种史学基础之上,安德森试图着手对英国进行有效的社会学分析。他发起这个计划明显有一种偿还之于葛兰西的理论债务的意思,进而也有一种自诩为葛兰西第二的意味在里面。他提出,对于英国社会结构,葛兰西提供了最合理的解释模式:“当代英国社会的权力结构可以被确切地描述为一个具有无限弹性并且无所不包的霸权秩序。”他把霸权界定为“一个社会集团对另一个社会集团的统治,这一统治不仅仅是通过暴力和财富,而且是通过其最终支持和表现形式是一种意义深远的文化霸权的社会权威得到实现的”<sup>②</sup>。如果说在《根源》的这一部分安德森明显受益于葛兰西的话,那么,第二部分的标题“历史和阶级意识:霸权”则强烈暗示了卢卡奇的理论参考系的影响。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论证说,既然作为意

---

<sup>①</sup> Perry Anderson, '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 in Perry Anderson, *English Questions*, p. 29.

<sup>②</sup> *Ibid.*, p. 30.

识形态力量和经济力量的资产阶级都已经开始掌权,那么,无产阶级在这两个层面上都对其发动挑战就是必要的。<sup>①</sup> 在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那段时间里,卢卡奇期望无产阶级能发挥革命作用,但同时又假定了无产阶级不能发挥这种作用的可能性。他指出,在转变阶段,一方面是“物化形式越来越空虚”,“物化形式的量同时又在增加”。事实上,“随着这种矛盾的不断尖锐,无产阶级不但越来越有可能用它的积极的内容取代这些空洞破裂的外壳,而且——至少是暂时地——也面临着在意识形态上屈服于资产阶级文化的这种极其空洞和腐朽的形式的危险”<sup>②</sup>。在这种类型的结合点上,卢卡奇设定“意识形态在决定无产阶级革命的命运中所起的作用就更带有决定性”<sup>③</sup>。由此,卢卡奇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无产阶级范畴与对——即便是在危机时期的——无产阶级的不革命行为的分析连接到了一起。这种洞见与葛兰西对霸权意识和社团化意识的界划一起,为安德森批判威廉斯的工人阶级文化观念提供了部分基础。<sup>④</sup> 因为,在接受无产阶级文化是愚钝的这一观点时,与威廉斯相反,安德森坚持认为英国工人阶级是一个已经被牢牢封闭在霸权系统中的社团。

安德森认为,这样的霸权秩序至少有四个中介:社会关系、意识形态、领导权和抵制。安德森间接提到,社会关系是英国的社会结构曾经并且现在继续被“一种看似秩序和等级的封建特权阶层”控制的特殊方式。那些关系发挥着使“真实的社会关系神秘化”的作用。因此,虽然工人说着“他们和我们”,但他们的领导人“倾向于接受错误的封建意识”。<sup>⑤</sup> 因此,当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攻击英国社会中存在的“势利的绅士”等东西时,他们所发泄的不满却已经从压迫他们的真实的关系转移到那些虚构

① György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London: Merlin, 1971, pp. 65, 69.

② *Ibid.*, p. 208.

③ *Ibid.*, pp. 261 - 262.

④ Perry Anderson, '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 in Perry Anderson, *English Questions*, p. 36.

⑤ *Ibid.*, pp. 31 - 32.

的敌人身上去了。

对于其中的第二个因素,安德森指出,英国的意识形态是以其对传统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固守为特征的:前者源于贵族,而后者则纯粹是资产阶级的子嗣。过去,它们联手限制住了英国:传统主义把当下与虚构的历史联为一体,而经验主义则把未来绑定在当下上。<sup>①</sup> 进而,这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是帝国的产物。因为行为举止造就了一个人,所以,这就造就了一种“贵族式的政治风格”。安德森指出,英国上层阶级的非专业性既是这一风格的结果,也妨碍了英国的统治阶级摆脱其历史性的衰落。

英国的统治阶级也曾努力完善一种旨在取代这种体系的总体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功利主义。然而,这一意识形态遭到了拒斥,从来都没有占据霸权地位。它的失败既反映了19世纪资产阶级的缺陷,也反映了它自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内在缺陷。作为一种过于讲求物质实利的学说,功利主义遭到来自事实的阻碍,从而未能创造出一种作为霸权意识形态的标志的文化价值体系。<sup>②</sup>

那么,这一霸权体系是如何在工人阶级中运作的呢?安德森发展了葛兰西的一些论题,形成了一种与威廉斯对工人阶级文化的解释针锋相对的观点。他指出,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的基本特征是“坚定的社团化阶级意识和几乎不存在霸权意识形态”<sup>③</sup>。在这一方面滋生出了两种制约力:第一是“他们和我们”的意识形态紧张关系,这阻碍了英国无产阶级形成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第二,没有重要的知识分子集团加入工人运动,以帮助它形成这样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这两种制约力都是由这一霸权体系的整体结构所决定的。因为既然英国无产阶级是被迫在前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中开辟自己的道路,那么,它能够依赖的就只是自己十分贫瘠的资源,而对于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一任务而言,这种资

---

① Perry Anderson, '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 in Perry Anderson, *English Questions*, p. 31.

② Ibid., p. 32.

③ Ibid., p. 33.

源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另外,在英格兰,也没有一个超越贵族统治集团的知识界。因此,知识界也是“同质的和内聚性的”。由于受法国大革命经验的惊吓,英国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没有给无产阶级提供一种可以依靠它来为争取霸权而斗争的意识形态。工人从费边主义者那里真正得到的不过是一种二流的功利主义观念——“一种最华而不实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就此,安德森写下了一段著名的评论:在英格兰,“一个无精打采的资产阶级产出了一个从属性的无产阶级”<sup>①</sup>。

无产阶级的从属性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上。因此,安德森解释道,英国无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已经被整合进了国家之中,因而对资产阶级霸权并不构成威胁:密集的工人阶级组织是存在的,但是把那些组织统一起来的意愿“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sup>②</sup>。由此,安德森形成了一种与上述萨特的观点类似的结论,即工人运动史上那些有名的斗争失败,如1926年、1931年和1951年的失败,不应该被完全归结为背叛。他沿着托尼对1931年失败的分析往下,指出:更准确地说,失败“是合乎历史逻辑的”<sup>③</sup>。这再次强化了安德森的以下主张:那些为另一种目标而斗争的左派团体,最主要的是20世纪20年代的共产党,实际上不过是并不能代表工人运动的真实社会力量的小宗派而已。工联主义是英国工人阶级的有机表现,它在意识形态上不能克服英国社会的结构性限制。安德森指出,这个结论可能让人遗憾,但是,这是左派政治学能够立足其上的唯一现实主义的评价。

因此,安德森总结道,“霸权系统作为一个总体而起作用……民主只是霸权的赎金”<sup>④</sup>。然而,民主把权力的真实位置神秘化了:它并不在议会中,而是随着保守党一起出入办公室。如果他们在唐宁街10号,那

---

<sup>①</sup> Perry Anderson, '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 in Perry Anderson, *English Questions*, p. 35.

<sup>②</sup> Ibid., p. 36.

<sup>③</sup> Ibid., p. 38.

<sup>④</sup> Ibid., p. 42.

么,权力就在那里。如果他们成了反对党,那么,他们就会通过其他途径来行使权力。不仅如此,议会民主存在于独特的英国权力结构中,存在于一种“三角关系的形势图”中。在所有西方国家,权力都是多中心的,然而,在每一个国家,这种结构又都是唯一的。在英国,这一三角关系是由以下因素组成的。首先是不那么重要的文官集团和军官集团。这是英国独特的岛国历史的结果。其次是极其强大的经济集团,它通过“资本战争”这样的机制而控制了议会。然而,在英国,及其在更加普遍意义上的西方,权力主要是通过第三个集团——控制“传播方式”的集团——得到运用的。<sup>①</sup>

特别是在英格兰,供不应求的公学和大学系统“对‘上层阶级’霸权的永恒化来说是决定性的”<sup>②</sup>。因此,名义上不受成文体制制约的立法机构实际上比其他结构受到了更大的制约。议会的最高权力因此不过是一种幻象。它掩盖了英国权力的真实结构。所以,资本主义化的贵族允许公民权的扩展,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已经发展出了一种非常有效的意识形态。如此一来,他们面前的工人和资产阶级就不可能看到什么存在多大不同的世界。但这种霸权秩序并不是一点弹性也没有的。相反,它允许左右变化。例如,1945年的工党政府就把秩序向左转了一点。不过,那些转变总是在总体“平衡”中出现的。这种总体“平衡”“绝对是资本主义的”,绝对没有轻松逃脱其控制的可能性。

## 安德森的政治学

《根源》所勾画的政治结论在最抽象的层面上得到了发展。其细节在安德森次年撰写的《威尔逊主义批判》和《社会主义战略问题》两文中

---

① Perry Anderson, '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 in Perry Anderson, *English Questions*, pp. 41, 39.

② Ibid., p. 41.

得到体现。这两篇文章是因不同目的而撰写的。第一篇意在通报当时社会主义者对工党政府的态度。第二篇则列举了未来可能的社会主义实践——当时社会主义在实现现代化的英国似乎变得可行了——的因素。有意思的是，这两篇政论都没有和《根源》以及安德森其他论英国政治和历史的文章一起，收录到1992年的《英国问题》文集中去。正如格雷戈里·艾略特所说，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因为不能仅仅因它们被排除在《英国问题》之外，就模糊了安德森的政治规划在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之间的实质性转变。<sup>①</sup>60年代，安德森的历史学和社会学文章是为阐明一种可能的社会主义战略前景而写的。然而在《英国问题》出版时，安德森看起来已经倾向于认为那些计划不再是可行的。有意思的是，这其实是他在《根源》中的分析的一个暗含结论。在这一部分，我将讨论他是如何从对英国的悲观主义的历史和社会学分析中得出乐观的政治结论的。

在《根源》中，安德森认为，作为英国经济相对衰退的一个结果，战后英国社会正在经历日益明显的“熵增”。<sup>②</sup>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英国与国际流行的国家干预经济潮流逆势而行，同时，因为伦敦金融城的国际化定位吸干了国民经济的资源，结果它成了勒在工业脖子上的一条绳索。不仅如此，金融城和财政部都由陈腐而非专业的贵族阶级掌握，而对于理性地管理国民经济这一工作来说，它们是极不胜任的。同时，英国的管理者为了“绅士风度”而出卖了他们的资产阶级本能。另外，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的国内企业都没有遭到毁灭性破坏，因此，英国的工业从来都没有被迫在一种与它的大陆竞争者相对应的规模上进行现代化。最后，1957年，当英国的精英放弃了新形成的欧洲共同市场给它提供的一个领导者角色时，它就失去了将英国从混乱中解脱出来

---

① Gregory Elliott, *Perry Anderson: the Merciless Laboratory of Hist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p. 31.

② Perry Anderson, '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 in Perry Anderson, *English Questions*, p. 43.

的一个绝好机会。同时,因为英国的眼睛始终盯着大英帝国不放,所以,她就失去了“在没有大的国内政治和社会危机的情况下……实现复兴”的大好机会。<sup>①</sup>

这并不意味安德森相信英国注定要解体。相反,在英国精英必须要面对由危机而导致的难题时,这就为对当代政治进行现实的社会主义干预提供了空间。正如我们在他关于欧洲的论文中所看到的那样,安德森相信,为国家政治问题提供现实的解决方案是左派的职责。并且,在1964年,他相信,对于增长中的“熵增”,现实的左派替代方案将会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它将为英国的现代化开列必要条件;第二,这种现代化不仅能解决当前的经济危机,而且还会为其支配地位尚处萌芽阶段的左派的发展创造必要的政治条件。因此,60年代的危机第一次为左派创造了影响政策的机会——虽然不是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政策的机会。在当时的环境下,左派本可以通过一个跨度较长的社会主义过渡计划——这可以等最初阶段完成后再进行——努力完成“1640年和1832年的未竟事业”。

因此,英国需要现代化。无论如何,这一选项是否被选择,并不是由星象决定的,而是取决于亿万个体的行动。安德森的观点是,左派不应该因为忽视这一辩论而把它视为与己无关。事实上,他认为,对于左派来说,沉溺于极左立场是致命的,相反,它应该支持所有现代化力量。在1964年,对安德森来说,这意味着左派应该支持威尔逊。当然,不应当非批判地支持威尔逊。不管何时,只要威尔逊从现代化的计划中退却,社会主义者的职责就是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把他重新拉回来。

安德森的《威尔逊主义批判》是作为“工党纲领的直接分析批判”而出场的。当威尔逊步入这一由冷战的瓦解而为欧洲社会主义所创造的“地理政治空间”时,威尔逊主义就成了可能。而且,威尔逊主义已经做

---

<sup>①</sup> Perry Anderson, '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 in Perry Anderson, *English Questions*, p. 45.



了一些工作去实现这一形势下的潜在可能性：它不仅仅是一个纲领，它“首先并且主要是一种战略”，这一战略是以威尔逊对当前危机本质的“精确的洞察”为中心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安德森相信，威尔逊的目的是把知识分子从支持现存霸权结构的保守集团中争取过来。事实上，他既看到了威尔逊对不专业的贵族制度及寄生其上的投机者的抨击，也看到了威尔逊对英国需要现代化的强调，因为这是与他自己关于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诊断契合的。<sup>①</sup>

但危险依旧存在。因为虽然现状被发现是不够格的，但旧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关系依然强大，足以转移工联主义对它的进攻。实际上，安德森已经指出，对于英国社会中那些使无产阶级的愤怒偏离它的真实源头的、前资本主义的时代错误，威尔逊倾向于文过饰非。不过，“当他谈论那些遥不可及的未来时，听起来绝对是最社会主义的”<sup>②</sup>。安德森接下来罗列了威尔逊与公共所有权、土地和房屋、教育、计划和外交政策有关的政治宣言的局限性。

在每一项分析中，安德森都提到了威尔逊纲领的含混性。因此，在安德森视之为“整个阶级歧视和不平等的体系之关键”的教育政策上，威尔逊仅仅是就结束公学体系的可能性做了一个泛泛而论的声明。<sup>③</sup>甚至连原来的许诺也被弱化了，因为它们都被整合进了他的建立一个教育信托机构的计划中，而该机构的作用仅仅是提供政策建议。同样，在外交政策中，威尔逊没有丝毫要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迹象。不过，当在殖民问题上出现了一种使人焦虑不安的沉默时，安德森多少从威尔逊承诺帮助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关于应当克服南北平等的言论中得到了一些安慰。<sup>④</sup>

鉴于这些缺点，安德森毅然批评威尔逊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事实

---

① Perry Anderson, 'Critique of Wilsonism', *New Left Review* 27, September-October 1964, pp. 4-5.

② Ibid., p. 11.

③ Ibid., p. 15.

④ Ibid., p. 17.

上,他宣称,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责任都应该是“远离工党的计划并且从一个完全独立的立场上来批判它”<sup>①</sup>。不过,他自己的分析逻辑却损害了其批判的决心。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的史学观点是认为工党是英国工人阶级的有机政党。因此,与萨特一样,他宣称,“因为那些根深蒂固的逃避行为而责怪威尔逊或工党是没用的”。工党的失败不是威尔逊的失败,而是左派在50年代不能使工党转型的结果。可是,如果历史没有给我们提供其他替代的可能性,那么,安德森的批判又有什么作用呢?他对这一批评的回答十分机敏:“正是威尔逊主义的缺陷提供了超越它的可能性。”<sup>②</sup>

与盖茨克的意识形态绝对主义相反,威尔逊提供了一种“可扩展的”计划。所以,安德森把威尔逊那种用花言巧语来吸引民众的能力描述为一种积极的进步——当然是相对于以前那种阻塞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工党意识形态而言的。威尔逊计划中的这些雄心壮志为左派发展开辟了一个空间。作为工党的新领袖,威尔逊体现了“平庸统治”的终结。因为他是工党在半个世纪里涌现出的第一个真正有才干的领袖。<sup>③</sup>作为首相,他的步调可以帮助他“实现自身复兴的冲劲,这对于一个身处资本主义环境中的工人阶级政府来说是重要的”:“作为领袖”,威尔逊“最终可能体现了英格兰工人阶级运动自我解放过程中的一个特定要素”。<sup>④</sup>

但这种结果绝不是确定无疑的。它取决于随着(并且当)这些时刻的来临,左派对领导层提出具体要求的能力。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可能会受到拒斥,占上风的可能是工党内意图推动威尔逊在左派道路上前进的左派改良主义者:“对左派而言,推行纯粹自发的要求没有什么意义。它们对于干预1964年的英国政治结构起不到什么作用。在当前形

① Perry Anderson, 'Critique of Wilsonism', *New Left Review* 27, September-October 1964, p. 20.

②③ Ibid., p. 21.

④ Ibid., p. 22.

势下,这种抽象的马克思主义结不出任何果实。相反,此时此刻,左派应当强调那些深深地植根于工人运动的当前问题和前景但又创造性地推迟或超越了它们的要求。”<sup>①</sup>这些要求应该以对抗资本的力量为目标,因此,在工党官方计划的每一个领域里,左派都应该努力对那些政策做出最具平等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解释,并且努力推动这些解释得到实行。另外,工会应该要求的是更多的“工人控制”而非更高的工资。在工厂层面,这将是收入政策的前提,而在政府层面,则是将工会整合进政府中去的前提。安德森在收入政策中看到了“消灭工人阶级意识和自主性”这种非常真实的危险。不过,他相信,这将因车间民主化的成果而得到克服。<sup>②</sup>最终,文化工业的民主化和合理化将会考虑对英格兰的霸权意识形态得以产生的传播方式发起攻击。这意味着安德森是支持皮金顿委员会在电视问题上所提的建议的。<sup>③</sup>

在威尔逊入主唐宁街 10 号后,《新左派评论》对威尔逊的热情在 1964—1965 年冬季那几期上的另外两篇文章以及一篇编者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表达。最先发表的是大选胜利后立马写就的编者按。令人惊奇的是,就热烈程度而言,作为整体的大众的反应比知识分子要淡漠得多。事实上,就选票而言,威尔逊并没有领先败选的保守党领袖亚列克·道格拉斯-荷姆多少,投工党票的选民反倒比 1959 年时少了些,因为有 200 万张选票流向了自由党。在题为“分裂和征服”的社论中,安德森试图把握这一问题。该文章有两个观点:第一,工人的低投票率被视为证实了安德森有关英格兰工人阶级已经被整合的分析;第二,安德森相信,低投票率将灾难性地导致威尔逊只能采取防御姿态。安德森提到,幸运的是,威尔逊知道防御是革命的死亡,打破旧秩序的唯一途径是

---

① Perry Anderson, 'Critique of Wilsonism', *New Left Review* 27, September-October 1964, p. 23.

② *Ibid.*, p. 25.

③ *Ibid.*, p. 27.

要有多元的观点。安德森强调,工党必须“分裂和征服”。也就是说,必须让老的工党下台,并使后面的无产阶级激进化。<sup>①</sup>

在1965年1月出版的新一期《新左派评论》中,安德森对威尔逊的定位更加精细了。在《50年代的左派》一文中,他发展了早先的观点:威尔逊接受了新左派的衣钵。不过,他分析这一现象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一个独立的、斗志旺盛的左派”的重建,而不是让左派依旧停留在对威尔逊领袖气质的欣喜若狂中。在文章的开头,安德森勾勒了50年代英国的那些客观条件。那时候,资本主义卫道士想方设法诋毁性地把社会主义等同于斯大林主义,同时肯定性地把资本主义等同于丰裕社会。<sup>②</sup>然而,丰裕无法医治异化。核裁军运动的风行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这一运动的基层与其领导层有不同的特征。核裁军运动也是大量工人阶级和中下阶级青年反抗氢弹成为其法令的那个社会政体的标志。”虽然核裁军运动的基层是由这些人组成的,但它的领导层却来自“真正的、正在为其最近的也是最关键的一场战斗而战的英国自由主义”传统。<sup>③</sup>不幸的是,这场战斗在1961年的工党年会上失败了。

安德森认为,核裁军运动之所以未能改变工党,是因为“它不能提供一种连贯而全面的政策替代工党的既有官方政策”。这反映了自由主义的历史性失败:它未能把社会理解为“具体的总体”。实际上,核裁军运动没能认识到冷战有四个要素:“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之间的斗争;议会政治体系和专制政治体系之间的冲突;帝国主义和本土民族主义之间的竞争;技术装备型军事体系和杀身成仁型军事体系之间的对抗。”核裁军运动仅仅关注了四个要素中的最后一个,从而把对整个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挑战变成了一场道德竞赛。这一道德主义总是容易受

---

① Perry Anderson, 'Divide and Conquer', *New Left Review* 28, November-October 1964, pp. 1-3.

② Perry Anderson, 'The Left in the Fifties', *New Left Review* 29, January-February 1965, pp. 3-4.

③ *Ibid.*, p. 10.

到民族主义的批判,核裁军运动拒绝对此做出回应。因为安德森自己也没有对此进行回应,所以这一点被削弱了。他认为,这四个要素不是等量齐观的,但同时坚持认为,“在那一痛苦的时代,没有哪一个运动、没有哪一个人得到了具体的总体:冷战的真相”<sup>①</sup>。1961年工党年会上单边主义的失败也反映了英国无产阶级组织的社团化本质,因为工会集团的反对票正是1961年核裁军运动遭到失败的罪魁祸首。<sup>②</sup>工党左派的弱点就在于它体现了这种反对票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社团主义。<sup>③</sup>

同时,新左派也勾勒出了一种对战后资本主义的强有力的文化批判。不仅如此,它还是作为英国浪漫主义的继承者而这样做的。不幸的是,这一传统一直“保持着社会学意义上的散乱状态”。来自于精英的第一代新左派因此分有了它的某些局限性。尤其重要的是,推动它的是些“业余人士”。因此,相应地,新左派是一种环境而非一种运动。最终,它被它自身的混乱弄垮了。虽然它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极为雄辩,有很多理论闪光点”,但缺乏任何“纲领性的锋芒”。结果,当新左派就像1961年那样打破自己的隔绝状态时,当它介入了工党内关于单边主义的争论时,作为一个运动的新左派就被工党领导层轻松击破了。<sup>④</sup>

因此,1950年的三类左派——新左派、核裁军运动和工党左派——都没有能够为当前状况提供出可行的替代方案。悖谬的是,新左派却是在保守党滑向更深危机之际解体的。历史的讽刺意味就在于:“该危机的继承者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威尔逊。”<sup>⑤</sup>威尔逊是在政治环境客观上有利于左派——左派以前从未有过如此环境——的时候步入混乱的。安德森相信,在转向社会主义变得可行之前,威尔逊将能够在国家现代化

---

① Perry Anderson, 'The Left in the Fifties', *New Left Review* 29, January-February 1965, pp. 11-13.

② *Ibid.*, p. 9.

③ *Ibid.*, p. 18.

④ *Ibid.*, pp. 15-17.

⑤ *Ibid.*, p. 18.

问题上发挥一种预备性的作用。一旦这种预备性的任务完成了,真正的社会主义重建工作将会开始。当然,安德森并没有完全忽视社会主义发展的“乌托邦目标”。相反,他为必然要肩负这一任务的政党拟定了一个大纲,其前提是威尔逊已经发挥了安德森规定的作用。这个大纲就是1965年发表的《社会主义战略问题》(以下简称《问题》)一文。

## 社会主义战略

在《问题》的开头,安德森将自己和老新左派拉开了距离。老新左派发展了一种缺乏战略中心的资本主义道德批判。相反,他相信,可行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首要任务是必须能够确立战略定位。为了替西方社会主义者发展这种战略,安德森从葛兰西对东西欧国家的界划——这种差异是东西方社会主义组织具有歧异的政治形式的基础——中汲取了灵感。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二分法是错误的,因为它们是在针对不同的问题时分别发展起来的。列宁主义“几乎完美地适应了它那个时代和地区的特殊条件”。事实上,“对于俄国来说”,它“代表了巨大的、普罗米修斯式的进步,就像它如今对中国所具有的意义一样”。<sup>①</sup>

安德森用葛兰西式的口吻说,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存在意味着那些社会构成了“一个全然不同的整体”。<sup>②</sup> 社会民主主义是对这一问题的西方式回应,不过可惜的是,与列宁主义不同,它远远未能完美适应它那个时代和地区。因为在列宁主义诞生的地方,社会主义社会终究出现了<sup>③</sup>,而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记录却“相当差”。<sup>④</sup> 记录这么差的原因主要在于

① Perry Anderson, 'Problems of Socialist Strategy', in NLR ed. *Towards Socialism*, London: Fontana, 1965, pp. 227 - 230.

② Perry Anderson, 'Problems of Socialist Strategy', in NLR ed., *Towards Socialism*, p. 230.

③ “拒绝承认以下历史真相,即那些国家在最不理想化的意义上也是社会主义的,既是生气的也是偏下的。”(Ibid., 225.)

④ Perry Anderson, 'Problems of Socialist Strategy', in NLR ed., *Towards Socialism*, p. 233.

“战略错误”。因为社会民主主义把议会物神化为了西方社会中权力的真正所在,可事实上,权力的分配是“多中心的”。<sup>①</sup> 社会民主主义因此将自己陷于其奖品不过是一种幻象的选举游戏之中:“国家的他治是社会民主主义失败的最根本原因。”<sup>②</sup>

安德森认为,列宁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受到了它们把国家理解为权力的唯一所在这一物化观念的制约,虽然这在东方确有部分合法性。同时,在西方,这两个思想流派都没有察觉市民社会在维护资本主义霸权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安德森完全回避了改良和革命之争:在西方,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长期目标只能通过拒绝这两种战略得以实现,因为其替代选择只能是葛兰西所构想的那种创造“霸权政党”计划。<sup>③</sup> 但这样的政党又从哪里来呢?安德森的回答是,工党潜在地发挥了这种作用。<sup>④</sup>

安德森认为,通过霸权政党,这一组织将会在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全部机构中都为社会主义文化而战:“它的行动范围不仅要包括纯粹的国家机构,还要包括市民社会的全部复杂地形。”<sup>⑤</sup> 这样的政党不能与任何一个阶级捆绑在一起,其战略也不能主要建立在工会的基础上:“从其本质来说,纯粹的工人阶级政党要么倾向于社团主义,要么倾向于完全的从属。”<sup>⑥</sup> 相反,在能够支撑“新的历史集团”——它将超越工人阶级,从广泛的社会阶层中汲取力量——的意识形态的建立过程中,知识分子应该发挥重要作用。<sup>⑦</sup>

政党还必须是“它要着手建立的那个社会的模型”<sup>⑧</sup>。而工党永远都“寄生在英国的社会结构中”,虽然它的肌体是与工人阶级连在一起的。

---

① Perry Anderson, '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 in Perry Anderson, *English Questions*, p. 39.

② Perry Anderson, 'Problems of Socialist Strategy', in NLR ed. *Towards Socialism*, p. 237.

③ *Ibid.*, p. 239.

④ *Ibid.*, p. 259.

⑤ *Ibid.*, p. 244.

⑥ *Ibid.*, p. 241.

⑦ *Ibid.*, pp. 240-242.

⑧ *Ibid.*, p. 244.

由于这一阶级是社团主义的,因此工党也是社团主义的。而且,那些把选票投给工党的工人,在其阶级中所占比例既不高,也不像支持保守党的上层资产阶级那样有激情。不仅如此,工党党员人数一直在下降。与此同时,工党领导层却总是因为怀疑青年党员的激进影响而不断压制他们。工党至今没有一份日报。结果,它总是被动应对观点变化,而不是去积极塑造它们。因为安德森特别强调作为霸权系统的再生产者的传播方式的中心地位,所以,这一点对他来说尤其重要。另外,就普通党员的增加而言,工党狭隘的选举主义本身就是一个障碍。因为一般民众似乎不像工党的领导层那样关心单纯的议席数。进而,那些普通劳工大众应对青年组织的衰微负很大的责任。因为,威廉斯如此看重的“无产阶级积极性”的影响之一就是扼杀了青年人。<sup>①</sup> 要从这种弊病中出来必须要有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就需要拥有一份全国性的日报,其风格在某种意义上应当介于《卫报》和《每日镜报》之间。在讨论这一意识形态的本质之前,安德森对能够挑战旧秩序的社会力量进行了研究。

安德森是从一种既独立于右派的选举主义又独立于左派的民粹主义立场出发,开始分析英国的社会结构的。右派把社会理解为由四种不同的选举力量组成,因此其政治任务就是去赢取中间力量。相反,左派含糊地诉诸其普遍的人性可以被用做一种联合的力量的“人民”。在这两种立场中,“具体的、决定性的现实性都消失了”<sup>②</sup>。安德森试图在那些抽象的地方揭开英国真实的社会结构。具体来说,他分析了工人阶级、下层中间阶层、知识界和妇女。

在安德森看来,英国工人阶级是一个社团化性的阶级。事实上,投票给工党的工人和投票给保守党的工人都具有顺从性。不过,投票给工党的工人至少已经意识到他们只有通过集体行动才能强大有力,从而在

---

① Perry Anderson, 'Problems of Socialist Strategy', in NLR ed. *Towards Socialism*, p. 257.

② *Ibid.*, p. 259.



某种意义上突破了最极端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投票给工党的工人和投票给保守党的工人的关键区别在于联合的比率：联合的比率越高，就越可能投票给工党。安德森因此在联合中看到了工人阶级集体主义意识的基础。“联合改变了工人阶级意识，虽然这么做并不是最好的，却使他们从神秘化的基本形式中解放了出来。”<sup>①</sup>既然投票给保守党的工人和投票给工党的工人在经济利益上区别不大，那么，能够解释他们不同的投票模式的关键因素就是意识形态。他认为，工人可以通过思想斗争转向联合，进而转向工党：“争取亲保守党的工人阶级的斗争……只能最终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取得胜利。”<sup>②</sup>

既然工党和工会都是社团化的机构，那么，仅仅是工会成员及其投票给工党，其本身并不是社会主义意识的反映。有的时候，它们确实看起来像一种包含未来社会主义意识的潜在发展可能性的进步意识。洛克伍德和歌德索普看到了工人阶级中他们称为“工具主义集体主义”意识的发展。<sup>③</sup>“工具主义集体主义”是一个表示集体主义思想的“理性”基础的假设性增长的含混术语。以前曾存在过“坚定的集体主义”——本质上是一种非批判的工联主义的本能反应。相反，在安德森看来，“工具主义集体主义”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可能推动工人认识到其合理利益就存在于与其阶级意识发展相反的方向。另一方面，它也意味着“理性、合理化第一次渗透到了这个封闭的、易受影响的工人阶级世界”<sup>④</sup>。因此，在英格兰资本主义霸权的核心地带，“工具主义集体主义”可以发挥破坏经验主义和传统主义的作用。鉴于安德森把为工人的心灵和精神而进行的斗争当做意识形态斗争的基础性工作，因此，这种理性的增长就只能帮助社会主义者赢得工人阶级内部的霸权。

---

① Perry Anderson, 'Problems of Socialist Strategy', in NLR ed., *Towards Socialism*, p. 263.

② Ibid., p. 283.

③ J. Goldthorpe and D. Lockwood, 'Afflu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Sociological Review*, July 1963.

④ Perry Anderson, 'Problems of Socialist Strategy', in NLR ed., *Towards Socialism*, p. 265.

在安德森选择分析的第二个集团白领工人中，“工具主义集体主义”也得到了发展。他对这一集团的分析始于对约翰·斯塔奇观点的拒绝，因为后者仅仅把这一集团定位为无产阶级的另一个派别。安德森认为，他们有不同的生活经验，因此，不应该置于无产阶级的名下。事实上，他们不是从“坚定的集体主义”，而是从相反的极端转向“工具主义集体主义”的，他们正在放弃激进的个人主义传统。<sup>①</sup> 无论如何，他们的意识形态与蓝领工人的意识形态趋于一致，并且随着官僚化的升级，他们的状况也与蓝领工人趋同。因此，安德森总结道，就像蓝领工人一样，“这一阶层的意识的关键同样存在于联合”。当白领工人没有成为经典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时，其工作性质的改变和“工具主义集体主义”在本阶层内部的增长，意味着通过争论决定联合，社会主义意识从而也向他们打开了大门。

安德森分析的第三个社会团体是知识界。以上讨论过的那些集团代表了工党为了获得永久性多数——安德森分析中的量的因素——而必须争取的人群。相反，安德森再次沿着葛兰西的思路往下说，知识分子是意识形态的生产者，是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的“决定性的质的维度”。他写道：“由于他们作为社会中的意识来源这种角色，意识形态问题直接联系着英国的知识分子问题。”<sup>②</sup> 这并不是说英国知识分子有什么特别不同的命运。事实上，他认为，英国根本不存在真正的知识界。调查他们的观点就会发表他们的“渺小、虚无和庸俗”<sup>③</sup>。然而，工党要成为一个霸权政党，就必须争取它支持社会主义。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从它们的专业组织——从英国医学会到全国学联——入手，“使之从内部政治化”，在每一个组织内部形成亲工党的组织，以夺取其中的领导权。要赢得这一战斗，政治就不能是“对工党的抽象效忠，而应该成为改

---

①② Perry Anderson, 'Problems of Socialist Strategy', in NLR, ed., *Towards Socialism*, p. 269.

③ Ibid., p. 271.

变和解放其现状的具体计划”。因此,社会主义者的主要活动应该是“使社会主义在每一个知识分子集团中都具有积极的鲜活的形象”。<sup>①</sup>

在关于英国社会结构的分析中,安德森讨论的最后一个集团是妇女。他认为,“女性保守主义是工党的最大绊脚石之一”。工党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能克服这一问题,首先,它要承认对女性的压迫是存在的,因此第二,它要在其纲领中在承认“妇女的基本权利”。安德森再一次把联合视为打开妇女的社会主义意识的发展大门的最重要杠杆。他认为,妇女受压迫不是物质力量的附带现象,其根源主要在于社会的意识形态结构:“必须承认问题的根源并不直接存在于妇女的经济利益中,而是存在于那个压迫其生活的整个意识形态之中。”安德森提出,“用一种能对妇女的社会作用和目的给出新的理解的相反的意识形态”去颠覆这种意识形态,“妇女才能得到解放”,而“这种相反的意识形态本身也是全新的社会文化图景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sup>②</sup>

在关于英格兰社会结构的讨论的最后,安德森得出结论,认为工党必须把成为一个霸权政党作为其目标。与现存工党对议会政治的迷恋不同,这样的工党必须建立一种真正的意识形态,因为它是与市民社会中真实存在着的民众的真实的生活经验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结果将会是政党自身的形成,而不是掌握议会或者粉碎国家。它将是一个拥有充满活力的年轻化组织机构以及让人民充满憧憬的全民党。

最后,安德森提出了一个对他而言最重要的问题,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问题。有点悖谬的是,他实际上承认“上述讨论的全部战略都依赖于一个巨大的前提,即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sup>③</sup>。所以,这是全文中最不令人满意的一个部分。因为安德森文章的顶点是一个非常概要

---

① Perry Anderson, 'Problems of Socialist Strategy', in NLR, ed., *Towards Socialism*, pp. 274, 276.

② Ibid., pp. 277-278.

③ Ibid., p. 282.

的描述。大意是：只有综合了所有民族文化传统，这一意识形态本身才会是有活力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罗列出来的那些民族文化传统包括坚定的且不断增强的社团化阶级意识，经典的英国的自由主义，浪漫派及其从利维斯到威廉斯的后继者所秉持的道德批判和美学批判。

非常遗憾的是，工党只反映了前两种民族文化传统，而且更糟糕的是以消极辩证法的方式进行了反映，即一种传统的缺陷因为另一种传统的缺陷而得到了强化。不过，在所有那些传统中都存在一种共同的线索，即民主观念。可以用这一观念来联合它们，并把它们转化为对现实社会的社会主义批判。<sup>①</sup> 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民主就其本身而言是不充分的，但它却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前提。安德森认为，为了超越这个基础，民主的概念必须通过实践进行深化。在他看来，工作场所的民主化是这一实践的关键。工人控制将是创造车间民主以及扩大英国文化中的民主意义的手段。

此外，如果要创造一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那么，“人的总体理论”则是必需的。它不仅对“工作问题”很重要，而且对性问题以及其他生活领域的问题也很重要。在英国，在超越实证主义建立这样一种社会理论的问题上，威廉斯做出了第一次实验性的探索。左派的任务就是继续和扩大他的劳动成果，“因此，最终的目标必然是一种新型文明”。<sup>②</sup>

安德森认为，“接下来的建议必然是简略的、乌托邦式的”，并且，“在今日之英国，任何关于社会主义战略的考虑都必然是学术性的”。<sup>③</sup> 罗曼·罗兰经常引用的一句话“乐观的意愿，悲观的智慧”，可以很好地描述安德森在 1964 年威尔逊政府大选前后的政治立场。安德森的史学分析的重要性就在于提出：英国的危机走投无路了。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拥

① Perry Anderson, 'Problems of Socialist Strategy', in NLR ed., *Towards Socialism*, pp. 283-284.

② Ibid., pp. 287, 289.

③ Ibid., pp. 223, 282.

有希望。相反,他试图从最坏的形势中争取最好的结果。他相信,如果社会主义者想要把握进入政治主流的任何机会,那么,批判地支持威尔逊就是必需的。因此,他支持威尔逊,但同时又拒绝完全接受威尔逊。他认为,左派尤其不能把自己禁锢在议会斗争中,而是应该效仿意大利共产党的模式,寻求发展一种具有全国性意义的反霸权战略。

不过,在他对威尔逊主义的“现实主义”批判和他关于未来社会主义战略的“乌托邦”规划之间确实是存在着连接点,这就是工党。安德森的论证逻辑是:在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英国,工党能够创造开始其自身现代化进程的必要条件。这种前景既是工党内左派的批判工作的一个合理结论,也包含了安德森未来思想发展的许多种子。因为,如果工党没有能够成功地参与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那么,对它的支持将很快下降。从安德森现有的社会理论基础上看,如果他不再支持威尔逊,那么,我可以预断其未来政治发展的两种可能方向。第一个方向是他可能追随多伊彻,进入观望之中。安德森对英国状况的分析意味着不可能摆脱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贵族霸权,因此,社会主义者唯一可能的角色就是将自己和这个肮脏的现实世界进行原则区分。事实上,这正是2000年他再次入主《新左派评论》时所持的立场。第二个方向是安德森在1964年之后采取的立场,这就是在威尔逊失败的地方,寻找新的行动主体以肩负起如下责任:回应英国的国家危机提出的挑战。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这个阶段,他主要是通过与普兰查斯和阿尔都塞的对话,促进自己的思想发展的。

(汤建龙 译 张亮 校)

## 12. 伊格尔顿学术思想概览

大卫·爱德森

### 意识形态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sup>①</sup>换句话说，我们的思想和意识是由我们生存于其中的社会以及我们在这个社会中的地位所建构的，甚至就连我们的情感和直觉也是由其建构的。因为，情感和直觉尽管拥有“自发性”，但这并不能使其免受外界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而言，正是这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从根本上赋予了社会组织以独特性。这些从马克思著作中引述出来的句子源自他争议不断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的经典表述。这一命题坚持认为，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了由哲学、宗教甚至法律和政治等构成的上层建筑，并且正是上层建筑决定着我们对社会关系所形成的意识。显然，文学和文化也属于这一领域。马克思在这一重要命题中没有明确说明决定性的性质和特点；他在此所使用的术语“意识形态”似乎也不具有后来的马克

---

<sup>①</sup>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2 页。

思主义理论所一再坚持的否定性。这也由此而使得人们对这一术语的理解变得非常复杂,并且这种复杂性也在此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将这一问题理论化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强化。当然,这一切既源于马克思著作的模糊性、矛盾性和局限性,也与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理论思潮相调和有着很大关系。既然我不可能在此对这段历史做出全面概述,那么我将仅限于叙述伊格尔顿对这一术语的运用。这显然是一项难当之重任,因为并不存在像阿尔都塞式的意识形态理论一样的伊格尔顿式的意识形态理论。尽管意识形态理论化的取向不断遭到拒绝,因为对其的拓展应用既不合时宜也极为不便,但是就像我们下面所看到的,坚持对意识形态进行分析仍然有各种不可小觑的原因。

首先,我们需要澄清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重要意义。尽管它能够明确地指涉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或社会主义等政治信念,但这不是其最为重要的(至少,这不是我们所要寻求的)意义。到目前为止,它很少被用来表示其作为一种特殊的信仰体系既教条狭隘又可能惨无人道,只是自由主义者为了贬低马克思主义才倾向于采纳这一内涵。简单说来,伊格尔顿将意识形态界定为“那些感觉、评价、认识和信仰模式,它们与社会权力的维持和再生产有某种关系”<sup>①</sup>。这也就意味着意识形态源自当前的社会现实,这些现实——以感觉、评价、认识等形式——持续存在下去。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类社会现实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本身。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意识形态不是由我们生存于其中的物质状况之外的力量所强加给予的,而是由这些物质状况所决定的。让我们举一个例子,即源自19世纪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将“适者生存”——达尔文并没有刻意使用这句话——的进化原则应用于人类社会,这也就成为体现资本主义竞争性和个人化特点的社会关系。例

---

① 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如,乔治·吉辛的《新寒士街》就是由这种意识形态性认识模式所支配的,因为它通过描写那些作者在心理上和精神上对于成功的渴望表现了19世纪90年代作者在文学市场中的竞争关系。无可否认的是,它包含着恳求改变那些根本不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各种人的生存条件,但是这些具体的呼吁只能使不合适的制度的不适应性变得更为自然,并且全部批评——一种改良主义的态度——对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不产生任何作用。因此,社会达尔文主义使资本主义的各种具体特点表现出一种历史必然性,因为其基于自然的进化过程,并且个体获取成功或失败本质上也都是“合理的”。而且,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不是某种废弃的思想模式:它在我们这个充满冒险精神的时代有很大的潜力,例如就像我们所听说的,企业为了“精简”而辞退工人。

由于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不完全是一套虚假的信仰体系,所以伊格尔顿评论指出,“认识论并不能在严谨的科学和纯粹的幻象之间巧妙地一折两半”<sup>①</sup>。暂且举一个更为常见的例子,我们可以设想,一个被打算精简人员的公司解雇的工人顺从地评论说:“也许,命该如此。”人们一般都认为这不可能是一个虚假的陈述。确实从某种意义上,寻找一个比它更为真实的陈述也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这句话仍然具有意识形态性,哪怕它即使只是宿命地指出事情不可能存在其他解决途径,甚至可以说宿命论本身就反映了特定时刻的言说所具有的阶级政治功能。而且基于此,并不是所有的错误观念都是意识形态的陈述。事实上,尽管坚持认为德比郡队是英格兰最好的球队的观点根本不具有意识形态性质,它却存在着明显的错误。然而,在某种情况下,例如,这种观念能为德比郡队带来一种数量极大的补偿性精神投入,从而使个别支持者对这支球队感到满意,就像一个超市手推车收集工对自己这份收入低下、前景无望的工作感到满意一样,那么,这种信念因此可以被看做是意识形态的。

---

<sup>①</sup> Terry Eagleton, *Marx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 London: Methuen, 1976, p. 71.



但是,我们已经注意到,在马克思的后期著作中,意识形态至少在商品拜物教的形式中与现象世界本身的关系极为密切,因此从另外一种意义来看,意识形态并不仅仅表示一套错误的观念。伊格尔顿在此进一步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上对资本主义这种特点的阐述的意义,并且这种特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也得到了详细的阐述。首先,

社会的真正作用……被掩饰和遮蔽了:劳动的社会特点被隐藏于商品流通背后,不再像社会产品那样容易辨识。其次……社会被这种商品逻辑所瓦解:因为商品流通以原子化方式进行,这一过程也将社会劳动的集体活动转变为相互分离的僵化事物之间的关系,所以社会不可能得到整体的把握。资本主义拒绝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由此而使其秩序免遭政治批判。最后,社会生活因被无生命的实体所控制,从而造成一种自然而又必然的虚假氛围:社会不再被看做一种人类的建构之物,因此也不可能得到人为的修改。<sup>①</sup>

我们将更为详细地讨论商品化问题,其在后现代主义的讨论中能够将我们关于任何社会总体性的认识原子化。尽管如此,应该注意的是,我们在此远远还不能得出我们可能获得的意识形态阴谋论的观点:意识形态是由商品的交换过程,而不是其流通过程自发地产生的;它并不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为服务于其利益而有意或无意地广为传播的,当然,意识形态偶尔也采取这样的形式。

我们一开始就注意到意识形态最初的内涵所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不过,迄今为止,我们已经用阶级术语相对集中地探讨了其中的权力关系,这也使马克思主义因无视例如性别或种族等压迫形式而备受苛责。伊格尔顿努力纠正马克思主义对这类压迫形式的“忽视”,因此而试图扩展意识形态的意义,以便将观念和认识等涵盖在内,从而使其有助于解

---

<sup>①</sup> Terry Eagleton, *Walter Benjamin, or Towards a Revolutionary Criticism*, London: Verso, 1981, p. 85.

释那些不是基于阶级或者不仅仅基于阶级的压迫形式。这种内涵扩张在某种意义上是积极的,因为它认识到,比如说,性别歧视者或种族歧视者的信仰必然与某种权力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尽管如此,但这一术语的内涵扩张还是使我们遭遇到一些理论难题,例如,它不可能探查到性别意识形态背后的物质性社会关系。这类跨越文化并超越时间的积极与消极、理性与非理性的性别对抗显然已经持续了很久了。尽管如此,由这类对抗所决定的独特的社会关系还是存在着很大差异。然而,性别意识形态也必然随着物质性历史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工作和家庭生活的严格分离必然导致对中产阶级家庭生活中的女性主导领域的评价的变化,例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19世纪城市空间组织变化而带来的后果,也即郊区生活远离在工厂或办公室的工作。<sup>①</sup> 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更好地认识性别意识形态。这些理论是由马克思的挚友恩格斯提出来的,并且与现在阿尔都塞的相对自主性理论非常相似。为了从物质性社会关系的角度思考意识形态的相对自主性,人们认识到意识形态理论向这类社会关系施加了强大的压力,但至关重要,意识形态理论也受到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变化的影响。因此,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不应该被看做一种直接的单向过程。这有助于阐明某些理论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现实政治活动中往往在某种程度上把女性主义政治学——或性别、种族等问题——看做“次生的”,因为最为重要的问题还是“意识形态”问题。然而,这也需要思考女性主义和另外一些政治问题,而不是将之简化为与更广泛的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形式相关的阶级问题,因为性别意识形态根本就不是不受其他力量影响的某种“真空”领域,相反也涉及一些具体问题。任何女性主义——或其他社会运动——一旦忽视权力在社会结构中所发挥

---

<sup>①</sup> Catherine Hall & Leonore Davidoff, *Family Fortunes: Men and Women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1780 - 1850*, London: Hutchinson, 1987.

的其他决定作用,就有可能不再对权力再生产发挥任何作用,而马克思主义此前却未能严肃思考这些根本不能简化为阶级的问题。

伊格尔顿对意识形态所做的宽泛界定最初显然遭到了“正处于理论化”的指责,这类指责所凭的依据可以在他论述意识形态的导论性著作中找到。这部著作也简单梳理了意识形态概念的历史,但是他评述不同意意识形态界定所面临的问题是,他一般通过援引具体的意识形态事例来阐明其所存在的不足,而这些意识形态事例并未充分论述其内涵,却更为渴求对这一术语作出更为直觉或超验的理解。伊格尔顿在结论中含糊地承认了这一点并指出:“有些令人怀疑的,人们认为意识形态肯定存在着某些恒定的特点。我们不是太希望找到意识形态的某些本质,而是更为渴望找到存在于不同表意系统之间的‘家族相似’的意义重叠网络。”<sup>①</sup>然而,准确说来,这种正处于理论化过程的反本质主义的论述的优点是其拒绝事先说明意识形态的表述形式。我们在本文开头已经注意到,伊格尔顿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显然是功能主义的——他的界定显然是通过意识形态所发挥的作用而不是其表述形式而实现的,其核心是意识形态的效果而不是其发挥作用的具体模式。这使我们不但像商品拜物教或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坚持的那样,将意识形态作为处于具体社会组织中的不断变化的现象来理解,而且通过其在具体历史语境中所可能采用的表述形式来理解:例如后现代反讽就是一种能够发挥决定作用的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感觉**,但不能将之简化为一套明确的信仰体系,然而这种信仰观念在宿命的等级制度中却是一种完全过时的意识形态**教义**。

因此,伊格尔顿在很大程度上将意识形态看做一种社会力量,这种力量所发挥的保守性作用能够对其进行界定和说明,同时其反过来也能够促其不断发展的独特权力关系所决定。当然,这种社会力量的形式也不可避免地因此而不断变化。同时,伊格尔顿这一界定也包含着一种

---

<sup>①</sup> Terry Eagleton, *Ideolog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1, p. 222.

批判维度,这是表面与之相关的“话语”概念所缺乏的重要内容。这一界定还指明了与社会关系密切相关的独特认知模式所存在的缺陷,并且因此也表明:为了改变权力的不平衡关系以及对其的直接运用,对这类社会关系的更为全面的理解不但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需的。“话语”也经常被如此运用,好像它也拥有同样的内涵——例如我们经常以怀疑的态度谈论性别话语的有效性,但是话语在认识论上不具有确定性,并且就所有话语是否具有真实内容而言,它也不具有潜在的批判性。对于左派而言,意识形态概念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概念,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必须像对世界所做的分析一样,应该自信地面对它所反对的强权。

## 物质的身体

对伊格尔顿而言,人类关系需要更多关注,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程度也越来越深,因为也正是这一切证实了个体的罪恶、创造性成就以及对其的剥削利用,也证实了这些行为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如果基督教所理解的个人行为的罪恶与马克思主义主张的由社会所决定而不是个人罪恶所导致的剥削之间存在着张力,那么与马克思主义相比,人们需要对基督教传统做出相似甚至更多的重新思考。伊格尔顿以他的著作深入研究了存在于我们的语言能力之中的这种双重悲剧。最近,这一问题也成为他的许多重要著作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甜蜜的暴力》。在这部著作中,他以多种方式重新概述并提出了迄今为止他一直关注的身体与悲剧的关系问题。在这部著作的最后一章,伊格尔顿进一步发展了最先在《作为语言的身体》中提出的观点并指出,替罪羊——在成为弃儿之前能够显现社会的所有不幸的古代人物,也即基督的原型——可以被看做辩证发展的隐喻。这一人物——在将之抛弃或者驱逐之前还是一剂能够反映社会秩序之缺陷的道德良方——仍是一个稳定社会关系的形象。如果这一人物只是遭到谩骂,或者如果这一人物对

引起变化的力量充满怜悯的认同,那么其悲惨境遇应该得到改变,因为他只表现了那种社会秩序的败落。尽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平凡并且处境悲惨,但是伊格尔顿发现这种悲剧英雄使替罪羊发挥了潜力,

开创了一种革命的伦理学,他们采取的是给予死亡、英勇顽强地参与全然另一种真理秩序的方式,这是一种揭示主体之否定性而非使得积极的政体合法化的真理,对于拉康而言,它充当着事态或实在界之令人可怕的深渊。这种人物代表着制度为了起作用必须压制的一种真理;可是鉴于他们因此是任何社会团体中对这种真理投资最少的,他们还拥有转变它的奇怪而神圣的力量。他们体现了社会秩序的内在矛盾,因此象征着他们自身的失败。<sup>①</sup>

以这种方式所解读的悲剧英雄成为所谓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运动的典型,并且如果这类英雄的困窘意义可以被普遍化,那么他的地位就相当于马克思的集体主体——工人阶级,准确说来,他们拥有不寻求任何回报而促使阶级社会终结的潜在力量。拉康的祷文再一次将主体与社会联系起来,因为符号秩序一定是社会现象,我们以此将决定性关系与他者联系起来,然而事态是一种能够产生欲望的力量,但它不能由任何具体的符号组织所提供。然而,在主体与社会之间这样一种不断简化的关系之中仍然存在着一个问题,因为伊格尔顿对于社会否定意义的理解中蕴含着一种疗救的希望,然而麦尔肯·鲍伊却指出,拉康希望“他的三种界域(符号界、想象界和实在界)的组合能够对人类阶级、社会和文化等全部问题发挥启迪作用”<sup>②</sup>,并且对于拉康而言,共产主义社会仍然要求欲望得到升华,而他也敦促我们千万不要放弃这一努力。<sup>③</sup>能够经得起仔细推敲的关于主体与社会关系的另外一种叙述是,任何社会的重构必

① 特里·伊格尔顿:《甜蜜的暴力》,方杰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4页。

② Malcolm Bowie, *Lacan*, London: Fontana, 1991, p. 91.

③ Jacques Lacan, *The Ethics of Psychoanalysis. 1959 - 1960: the Seminars of Jacques Lacan*, Jacques Alain Miller & Trans Dennis Porter, ed., London: Routledge, 1992, p. 318.

然要重申一种新的秩序,这个过程必然能够形成新的排斥机制以及由此而生成的一种新的辩证法。这至少是伊格尔顿在《作为语言的身体》中想象事态的方式:在此“死亡和再生、革命和联合、被压迫者的消极的神圣品德与坚持积极重组的人的神圣品德之间的辩证过程都是拯救历史的表现形式,并且只能指向末世论的革命;也只有在天国中,存在于神圣意志内心的这种创造性辩证法能够实现其综合,并且由此而创造的社会结构在转变为现实的过程中也不能暴露其自身的不足”<sup>①</sup>。如果这是《甜蜜的暴力》(未曾陈述)的观点,那么它也有助于解决一些伊格尔顿的问题,但是它也意味着人性甚至能够基于新的排斥形式重新建构社会,并且这种不可挽救的堕落——无论这种堕落如何幸运——更多应该归因于基督教教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如果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结盟在试图根据历史发展测定主体位置的过程中遭到瓦解,那么精神分析仍然可以被用来思考主体性、意识形态和权威之间的复杂关系。悲剧英雄再一次成为我们存在的真正意义,也提醒我们的“身体性”所面对的悲惨境遇。尽管悲剧英雄可能并不能被直接感受到,但这个感受过程就像我们可以跳出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并在一定程度上知道它将如何“自然”地发展。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并不自信,而是比较拘谨,因为它只是在重申需要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时才摒弃了欲望存在的意义,并且他也对他的认识中的两个问题实施了解构,也即“文化的补偿不仅是对人类本性的添加,而且是填充其核心部位的一个结构性短缺所必需的”<sup>②</sup>。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从来不知道一切将变得更为自然,那么我们只能使我们自己受到伤害,这种伤害是因忘却我们的具体存在并热衷于对这种自然主义——后现代的文化主义神话,也即我们完全是被“建构”的存在物——进行非辩证的选择

① Terry Eagleton, *The Body as Language*, London: Sheed & Ward, 1970, p. 69.

② 特里·伊格尔顿:《甜蜜的暴力》,第300页。

而导致的。的确,对身体最为基本的需要的不断肯定是实现伦理和政治的团结以及自我和他者相互联系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同时,与自我和他者的联系相伴而存的是一种为公正社会秩序提供基础的潜能:“人类的依赖性先在于自由,并且肯定为其提供依据。”<sup>①</sup>这就时时处处与梅洛-庞蒂产生了共鸣,而梅洛-庞蒂则对伊格尔顿关于身体的思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旦他人已被确定,一旦他人注视我的目光把我置于他的视觉场,夺去了我的一部分存在,人们就能明白,只有我和他人建立联系,只有我使他人不受拘束地认识我,我才能收回被夺去的一部分存在,我的自由需要他人有同样的自由。”<sup>②</sup>不过,这种对依赖状态的解释能够将政治和精神分析关注的焦点联系起来,因为依赖是人类最早的也是唯一一种不断延迟的存在状态,其仅能够满足人的需要,而且能够借助这些满足人的需要的关系建构我们的主体发展,并实现我们对他的理解。<sup>③</sup>

伊格尔顿最近的思考重申了身体的物质性,但《审美意识形态》和其他一些著作同样也是这类思考的延续。同时,这些思考也强调身体的物质性及其在文化中的鲜活经验必然是与阶级和其他政治冲突相联系的。准确地说,审美作为一个哲学范畴,的确是身体及其感觉以及感觉与合理行为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启蒙的哲学话语是由时代的政治冲突所导致的,并且必然随着这种冲突的发展而发展。审美作为这样一个范畴,一方面可以被保守地用来强调政治权力嵌刻于我们的主体性之中,另一方面也被用来强调主体的自主性是抵制权威的基础:

如果既有的社会秩序按照伯克的方法,通过文化——通过祈求于暗含在民族传统中的价值和情感——就能自我维护的话,那么该秩序必然会倾向于从政治左派中诱发出具有腐蚀性的理性主义。

---

① 特里·伊格尔顿:《甜蜜的暴力》,第300页。

② 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50页。

③ 特里·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王杰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左派严厉地攻击审美,视之为神秘化和非理性的偏见之所在;左派还谴责邪恶的自然化的力量,但伯克认为风俗比法律更起作用,“因为风俗成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共同天性”,此时伯克想到的就是自然化的力量。如果存在的秩序可以通过诉诸绝对法律的方式来自我认可的话,那么,绝对法律所无法包容的“主体的”本能和激情就可能成为激进的批评的基础。<sup>①</sup>

而且,审美话语内部的“矛盾性”主要表现为,尽管审美所维护的情感和冲动是“真实的”,而不是由社会决定的,并且这些情感和冲动稳定地存在于个体之中,而不是存在于已经确立的社会关系之中,但是审美却不能使自己免受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毕竟,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在这一时期需要社会秩序,并且还需要在哲学上拥护资产阶级的自由,例如黑格尔在美学中指出——为实现各个群体之间的联系——必须反对资产阶级自私与贪婪的“糟糕的排他主义”。但是,如果伊格尔顿从一开始就无法判定审美话语是否受到这两种冲动的撕扯,那么就像解构主义那样,这种矛盾的根源根本无法在哲学文本内部得到清楚的说明;相反,这种矛盾的根源是与只能通过历史发展得以解决的历史冲突和需要密切相关的(因此,这种矛盾一直持续到现在)。而且如果辩证地分析,这种矛盾性可能并不是福柯关于启蒙话语的一元论的观点,因为在福柯看来,启蒙话语能够从主体存在这一最为基础之处对其形成建构,也即身体必然受到理性的影响。然而,审美话语的潜在的解放功能是“危险的”,因为“肉体中存在反抗权力的事物,而权力又规定着审美;只有消除证实权力的正确性的能力,我们才能消除那种冲动”<sup>②</sup>。因此,尽管伊索贝尔·阿姆斯特朗宣称审美这一范畴只能让他感到“深恶痛绝”<sup>③</sup>,但是伊格尔顿却对审美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因为在他看来,审美既不稳定,也不

① 特里·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第15页。

② 特里·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第17页,根据上下文略有改动。

③ Isobel Armstrong, *Radical Aesthetic*, Oxford: Blackwell, 2000, p. 29.



可能徒劳无功。伊格尔顿通过对《审美意识形态》这部著作所涉及的每一位思想家的详细探讨指出,这种矛盾的不断变换就构成了美学思想的发展。

主体的这种双重性可以凭借欲望——一方面渴望获取成功,另一方面又希望顺从——从不同的角度得以描述。顺从能够使主体产生满足感,但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倡导的观点,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倾向于认为压迫超越个体并对其持敌视态度,因此压迫也只有采取各种神秘化的形式才能阻止人们清醒地认识自己。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所长期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尽管存在剥削但为什么却经久不衰。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政治团体作出了一个富有影响的重要划分,也即使其统治争得霸权的政治团体——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通过争得人们赞同而实施的统治——和只能遭到压迫的政治团体。但是,即使这样一种表述也未能指出顺从与欲望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并且对于伊格尔顿而言,这也是精神分析中的超我这一理论范畴的重要价值之一,因为社会良知本质上对作为理想主义和自我否定的关键所在的自我保持一种敌视态度。事实上,仅仅对法则的内在化做出解释是不完全的:对于精神分析而言,这种内在化过程在精神生活中以非常复杂的方式得以实现,主要包括对被压抑的(快乐)以及内在受虐本能的认同和转换。的确,精神分析疗法的目标之一是抑制超我对自我的敌视。从主体的角度来看,超我解构了压迫与霸权之间的对立,也就是说,一方面飞扬跋扈的统治者不需要将自己的要求合理化,另一方面法则借助内心的顺从原则获得霸权。

鳞次栉比的法则和内心欲望对较早的压抑模式提出了挑战,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伊格尔顿却旗帜鲜明地拒绝仅仅服从法则和欲望的否定性的政治内涵,相反不但强调法则在建构主体过程中所发挥的根本作用,而且还要我们不能深信法则的要求真如其显示的那样:

如果法则真是先验的、无功利的,政治左派肯定会陷于困境。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法则不是个如何表现自己的问题,这既是政治障碍又是政治机会,如果说法则的欲望基础加深了法则的邪恶的话,它同样使法则变得不稳定且充满问题,而先验的权威却不会这样。法则以阉割为标志,在其语言中心主义的面目下隐瞒了其缺失,具有无意识的不稳定性和紧迫感。法则过分热情无异于法则的外壳中的裂缝,这不只是因为这种过分热情表征着粗鲁的专制主义的不稳定性,而且因为它包含着无休止的自我解构的法则,唤起它所抑制的渴求,以创造秩序的名义扩散浩劫。法则是难以控制的,假设法则的指令难以容忍的话,那么法则的牺牲品就别无选择,只能得神经病或反叛。该行动的两个过程都有各自隐瞒的痛苦和快乐。<sup>①</sup>

因此,这里也就存在着由不同见解、偶像破坏和革命所带来的(自我陶醉的)快乐,并且这种快乐超过了通过反对敌人而获得的任何理智的满足(当然,伊格尔顿并没有认识到左派对这种情感也存在着自相矛盾的态度,因为这种情感一旦过剩,导致的却是一种寻求报复的潜能——这一点大概从伯克开始对左派而言就有待于充分学习)。而且,弗洛伊德的理论认为健康的升华过程在许多文明中仅仅适用于一小部分人,相反对很多人而言,工作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不满的压抑是不稳定的,也是多数人所必需的一种生存状态<sup>②</sup>,由此也使得那些文明本身就是不稳定的。

因此,伊格尔顿对于弗洛伊德的理论的运用必然是具有批判性的,并且也机警地意识到这种理论范式存在的局限,因为对所有人来说,弗洛伊德的理论洞见充斥着资产阶级的假想。这类假想——并且伊格尔顿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明显受到其特有的基督教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反映出,弗洛伊德更多地关注性爱,而不是不涉及任何个人因

<sup>①</sup> 特里·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第274—275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277页。

素的明显更具社会性的情感,后者则是基于对我们总是相互依赖的主张。如果我们在伊格尔顿对精神分析的批判性运用中发现他的基督教直觉与精神分析的犹太建立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伊格尔顿所倡导的观念是毫无问题的,因为,他更为看重基督教对具体的爱的渴求,而不是法则自身所具有的深刻的意识形态内涵。

## 爱尔兰研究

如果人们对伊格尔顿职业存在着巨大的争议,那么显而易见的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由派主导的学术争论的不断介入所导致的,这类争论甚至促进了当代理论语言的改头换面。尽管伊格尔顿近年来的爱尔兰研究著作已经引发了一系列争论,但是这些复杂的争论并不能简单地化约成左派与自由派之间的对抗。同时与他在其他领域的研究相比,他对这一领域的贡献自始至终不断遭到人们的曲解,以至于各种充满敌意的评论者已经试图将他的形象看做迂腐不堪的“可塑的爱尔兰人”,或是一个多愁善感浪漫有加的爱尔兰移民文化的新生代人物。这也就是埃德娜·朗利所谓的“托马斯·吉尔罗伊的《背叛》”的内容。“这部戏剧在很大程度上描写了剩余的自卑情结(尽管吉尔罗伊的剧本描写了布兰登·布瑞肯和威廉·乔伊斯努力成为‘英国人’,但是这一切却在另外一部戏剧中得到了补充。在这部剧作中,迈克尔·麦克利亚莫瓦和特里·伊格尔顿等人重新将自己塑造为‘爱尔兰人’)。”<sup>①</sup>另外,从政治角度来看,他的爱尔兰民族主义研究也可以被看做对在政治和理论研究中出现衰退的马克思主义的补偿。因此,R. E. 福斯特评论说,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直接的,因为“尽管不断退潮的知识传统(结构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使很多人感到绝望,但是传

---

<sup>①</sup> Enda Longley, *The Living Stream: Literature and Revisionism in Ireland*, Newcastle upon Tyne: Bloodaxe, 1994, p. 223.

统的[民族主义]叙事形式仍然能够给这片幅员辽阔的土地上的失魂落魄的人们带来希望”<sup>①</sup>。马丁·麦克奎兰同样以雕文织采的理论语言阐明了这样的观点：

假如历史是如此的“非辩证”以至于选择了托尼·布莱尔和新工党，那么伊格尔顿对于新的耶路撒冷的追求使他进入了爱尔兰历史这一充满魔力的磨坊之中。后殖民斗争很容易说服好人远离恶人，同时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二元关系与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也极为相似。在这样一个剧本中，被殖民的爱尔兰人（伊格尔顿从来都毫不含糊地声明他站在哪一“边”）成为绝望的工人阶级的替代者，而后者却被撒切尔夫人的新自由主义所消弭。<sup>②</sup>

与福斯特的观点相比，这一观点更为详细，也更为明显的成为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的症候。一开始，将新工党的出现看做非辩证的观点至少明确地表明，他更为倾向于相信第三条道路，而不是承认眼前所看到的一切；这也是历史辩证法不断在全球重新申明其糟糕一面的诸多例子中的一个。这一观点未能认识到在撒切尔“消弭”了工人阶级的断言中存在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本身就非常重要。撒切尔促使传统工业和劳动组织走向消亡，同时努力促进劳动组织不断发生弱化的非传统雇佣方式的增长，就此而言，麦克奎兰的观点确实是对的；但是，就由社会结构决定的被称为工人阶级的行动者的瓦解或“消失”而言，麦克奎兰的观点又是错误的（因为，从资本的角度来看，呼叫中心的工人与机械操作者并没有什么不同）。其次，后殖民——与反殖民相对——斗争并没有明确显现出来，但是后殖民与反殖民这类术语之间的滑动表明，后殖民主义在没有赞同反殖民主义辩证逻辑的前提下，就擅自使用了假定反殖民主义

<sup>①</sup> R. E. Foster, *The Irish Story: Telling Tales and Making It Up in Ireland*, Harmondsworth: Allen Lane, 2001, p. 20.

<sup>②</sup> Martin McQuillan, 'Irish Eagleton: Of Ontological Imperialism and Colonial Mimicry', *Irish Studies Review*, 10:1, 2002, p. 34.

运动应该拥有的激进主义,当然也应该指出的是,反殖民主义运动的确正是通过这种辩证逻辑才达到了目的。(麦克奎兰在“边”这一词汇上面使用了引号就表明了这一点。)伊格尔顿通过引用阿贾兹·阿赫迈德的著作指出:“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思潮]伴随着各种革命民族主义的垮台或者衰竭而抛弃了自己存在的基础,但大约在20年前,革命民族主义却对世界帝国主义断然提出了一系列令人吃惊的反对。”<sup>①</sup>(至少对我来说)比较明显的是,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相比,(北爱尔兰)的冲突各方并不容易区分,也难以中肯评价:这种认识显然也是由历史决定的。最后,伊格尔顿并没像对他进行滑稽模仿的理论家所指出的那样(麦克奎兰连续以言辞激烈的语言在他的著作中探讨了伊格尔顿,并承认他写了很多模仿性著作),对民族主义提出了很多确定无疑的观点。对伊格尔顿而言,反殖民主义斗争并不能代替工人阶级的斗争,而只能为社会主义政治的出现提供一个有效前提。这才是我想稍后再谈的话题。

我将提出一个很多人都提出过的观点,即就像他们对伊格尔顿本人所做的评价一样,这类评论远非针对一个作者,而是指向了很多人。并且,这些评论往往是贬义的、歪曲的,甚至是混淆视听的,而不是客观公正的真实理性评价。伊格尔顿与“爱尔兰性”的特殊关系并不是一种“独立创造”的结果,而是起源于他在索尔福德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移民家庭,因为,当时反对爱尔兰的种族主义确实有助于确立这类家庭与他们所移出的社会之间的关系。他也并不是没有意识到移民文化中的伤感情绪与虚妄意识。他在为他的父亲所写的回忆性文章中评论说:“他对爱尔兰一往情深,曾经有一次屏住呼吸向我说那是一片‘神圣的土地’;当然他对那片土地的记忆似乎是模糊的,也许还有一些令人不快的东

---

<sup>①</sup> Terry Eagleton, 'Postcolonialism: The Case of Ireland', David Bennett, ed., *Multicultural States: Rethinking Difference and Identit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 125.

西,因为他从未有些许想要回去的意愿。”<sup>①</sup>他评论他的祖母说:“她显然是长期饱受痛苦以至于使我不忍心再给她一点烦扰的爱尔兰母亲的原型,尽管这隐瞒了一种连喀利古拉都难以望其项背的个人中心立场。”<sup>②</sup>这也就是说,他认识到了本雅明在现代性背景中强调伤感的重要价值。他针对罗伊·福斯特的《爱尔兰故事》,指出“福斯特充满生机的现代主义神话……表明了对过去的怀旧总是令人感到忧伤,并且这一切充斥着我们这个整天高呼克里斯·埃文斯、核导弹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时代”<sup>③</sup>。此外还应该指出,伊格尔顿对于爱尔兰文化的关注也是最近才开始的。的确,从时间上来看,它远远比爱尔兰研究这一公认的或已经制度化的学术研究领域要早得多。例如,任何人只要重读一下《批评与意识形态》就会发现,伊格尔顿在这部著作中有大量从文化角度对古代爱尔兰诗人著作、特别是爱尔兰早期各部落之间的游吟诗人的文学形象的研究,还有对17世纪爱尔兰遭到殖民统治期间的文学著作的富有影响的研究,还包括让这些书籍的较早的读者感到困惑甚至有些吃惊的一些内容,这也显示出他明显喜欢研究“边缘”事件。他的唯一一部小说《圣徒和学者》就描写了爱尔兰,并且将争论设置在爱尔兰拥护共和政体的马克思主义者詹姆斯·康奈利·维特根斯坦、利奥波德·布鲁姆和尼克莱·巴赫金之间,同时爱尔兰问题也占据了他最近所编辑的戏剧集的大部分篇幅。如果人们认为伊格尔顿总是以各种陈词滥调来炫耀民族主义观点,那么这也是不公正的。因为他对爱尔兰民族主义既持有一种同情态度,也持有一种批判态度,而这些态度也是由他在政治上一直坚持献身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所建构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者所怀有的重要目标就是要成为国际主义者。当然,他的著

① Terry Eagleton, *The Gatekeeper: a Memoir*, London: Allen Lane, 2001, p. 120.

② *Ibid.*, p. 117.

③ Terry Eagleton, *Figures of Descent: Critical Essays on Fish, Spivak, Zizek and Others*,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3, p. 232.

作的确是要控诉福斯特等历史学家在意识形态方面所存在的不足,但这些著作不仅有毁损这些“修正主义”历史学家的目的,还要对历史事件及其叙述方式之间的关系做出思考,更要探讨英格兰或英国与爱尔兰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而且,与福斯特的理论相比,这些思考显得更为复杂。同时,伊格尔顿对艾米莉·勃朗特的小说的探讨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伊格尔顿也会让一部分人感到非常沮丧,因为他们尽管在政治上支持伊格尔顿,但在理论上却汲取了后殖民主义的观点,由此也对他将爱尔兰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相结合的理论探索提出了批评。

## 奥斯卡·王尔德的画像

与其说王尔德对当时文学市场的认可和接受是关于王尔德的各种论著的最具唯物主义特点的内容,不如说复杂的社会关系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才更具这一特点。伊格尔顿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中所强调的正是后者。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王尔德自身所存在的矛盾,也即他作为一个作家从事的是小资产阶级的工作,但他在价值观方面却对资产阶级表示出强烈鄙视的态度。准确地说,王尔德本人不实际地将艺术家概念化也是导致这种矛盾出现的重要原因。王尔德对“审美的”生活方式的追求远远超越了他为此而付出的代价,这两方面也因此而龃龉不断,但又相互依赖。这是因为,他对生活方式的追求越来越要求他从写作中获得金钱。与之相比,伊格尔顿既不凸显也不漠视王尔德在政治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相反,他试图清楚地认识他的不同见解的价值和不足。王尔德在《圣奥斯卡》中的演讲与王尔德的著作中处处充满妙语警句的风格极为相似,但是这也传达出伊格尔顿对王尔德的模棱两可的态度:

你可能想知道我为什么如此讨厌肥胖。这主要是为了对爱尔兰

兰民族的饥荒做出补偿。也可以说对待吃饭,我同他们一样感同身受。这绝不是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从中很难获得愉悦。你所没有看到的是,在这个过度肥胖的身体面前,一个更为肥胖的人试图回避这一问题。这就像在一个苗条人的周围,一个肥胖的人要求得到接受。我还是否想写出讽刺性短句?多么奇怪啊,我总是分不清这些词句的意思……不,这不是实情。只有那些胸无点墨之人才这样。从表面来看,他们远远比在现实中更为可靠。英国人认为这就是伪善。当你发现他们所做的一切影响了半个世界,你是否知道他们也对此充满了狐疑?他们已经逃到真理的世界中。这个世界隐藏着非常深——就像一个排水沟。然而我却有些肤浅,诚恳地说就是如此。任何表象都表现不出我是如此的肤浅。<sup>①</sup>

王尔德在开头就“机智”地宣称为他人而活着,同时又否定了这种道德逻辑。可是,这一反讽也引人注意“爱尔兰种族”与他本人之间所存在的差距,这也是由王尔德及其在英国的特权地位与爱尔兰大多数人的阶级立场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所决定的。在做出这番评论时,王尔德也注意到身体在此作为一种表示唯美主义的隐喻,也成为唯美主义者所饱享的文化盈余。王尔德和爱尔兰大多数人的差别也表现为,在随后的谈话中他从正反两方面与他妈妈真诚的民族主义观念形成对照。在这场谈话中,他因拒绝“爱尔兰性”以及一般的真实性而遭到他妈妈的责骂。这种拒绝在很大程度上是采取了对“英格兰性”的拙劣模仿的形式,并且王尔德为了成为英国人而在表意实践中乐意表现为持有不同意见者,由此也使他对爱尔兰大多数人产生了威胁。同样重要的是,他也在他的许多著作中注意到这些爱尔兰人的浅薄,并认为他们的信念和表现是不切实际的。王尔德因混淆悼文和铭文两个词而显现出其悲剧的特殊性,就像他喜欢

---

<sup>①</sup> Terry Eagleton, *Saint Oscar and Other Plays*, Oxford and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97, p. 17.



通过倒置格言警句的次序将他自己在衰落过程中的受虐性倾向表现出来,伊格尔顿在这场讲演中对此的深刻领会也有明显的暗示意义。但是,伊格尔顿使用的双关语也注意到了王尔德在文化自创中存在着身体缺陷:我们知道后来狱中的王尔德在面具滑落之前坚守另外一种谦和“姿态”,并且他也被迫显示出身体的各种需要:“监狱是一个令人感到害怕的可恨之地!我之所以在这儿是因为我是社会的弊害、毒瘤和溃疡:我现在已经成为一枚社会的毒瘤。”<sup>①</sup>

埃德娜·朗利认为,伊格尔顿在《圣奥斯卡》中“通过运用王尔德提出了帝国主义压迫这一永恒主题”<sup>②</sup>。因为她并没有明确说明这个主题是什么,所以也很难驳斥她,但是由于戏剧中根本没有一个广为认可的关于爱尔兰民族主义问题的坦率诚恳的发言者,因此也很难探明她的具体观点是什么。王尔德是一个著名的共和党人的儿子,并且遭到了律师爱德华·卡森的迫害。后来,也正是卡森发现了北爱自愿军反对威斯特敏斯特致力于自治的行为,同时伊格尔顿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试图考察王尔德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一般人看来,伊格尔顿大概对联邦主义的偶像卡森持否定的态度,事实上这是值得商榷的。但是,王尔德与卡森的最终争论几乎不可能简单化约为联邦主义者与共和党人之间的分歧:相反,它强调新教与保王派倡导的粗野的平民主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受过三位一体教育的卡森却致力于推动新教与保王派的发展。这场对话也表明这是一种教义,他几乎不相信其中存在任何形而上的辩护理由,当然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他的立场几乎不可能得到公众的认可,因为如果要使秩序得以维系,就必须使大众相信它。卡森宣称“如果没有秩序则丝毫没有意义”,对他而言,后现代的王尔德就是不得被终止的“混乱状态”的代表。<sup>③</sup>从这部戏剧中至少可以详细阅读出的内容是各色

<sup>①</sup> Terry Eagleton, *Saint Oscar and Other Plays*, p. 50.

<sup>②</sup> Enda Longley, *The Living Stream: Literature and Revisionism in Ireland*, p. 183.

<sup>③</sup> Terry Eagleton, *Saint Oscar and Other Plays*, pp. 60-61.

人物思想观念的哲学基础,而这些思想观念则表现为他们对具体政治学所持的拥护态度。王尔德对他们的这些思想观念所持的怀疑态度也表明了他们的思想中所存在的矛盾,但是他对政治的拒绝也显示出他在面对引发他毁灭的社会权力时,内心总是怀有几分天真。面对王尔德夫人所宣称的“普通人不得不依赖神话过活”,奥斯卡说:“神话是虚构故事,但早已不为人看做虚构的;然而我从来不曾忘记,令人可笑的是我太虚假了。”<sup>①</sup>如果卡森在法庭上支持判决王尔德两年的苦役,并且他的依据是“现在到了王尔德先生以更为严肃认真的态度面对他无聊的存在的时候了”<sup>②</sup>,那么,比较明显的是,戏剧既在一定程度上赞同了这种怜悯的柔弱之情,同时也对判决及其所保障的社会秩序表达了一种厌恶之情。这种秩序可以依赖虚构,尽管如此它也是一种现实,就像身体,其疼痛有助于对其产生保护作用。

即使本论题所支持的《圣奥斯卡》一般都会遭到人们的误解,然而这部戏剧最容易受到的批评是其立场与政治靠得太近。倒不是说好的戏剧就不能拥有这样的立场,这纯粹是一种自由主义的设想,而是说这种立场不便于充分地**戏剧化**(尽管无可否认的是,王尔德对语言的尊崇和行动的贬抑在这方面都是一些挑战)。因此,戏剧所要表现的正是伊格尔顿对于王尔德这一人物的矛盾心态,因为王尔德本人被描述为一种性别模糊的人物,并且不由自主地说出“他是雌雄同体”<sup>③</sup>,并且因此一些人也反对这种符号秩序的固定意义。但是伊格尔顿对王尔德的这种不确定的性别的认识也是与他的同性恋倾向相联系的,其中的原因是不言自明的。“《圣奥斯卡》偶尔将他自己描述为一种双重性别,当然并不是因为同性恋事实上‘一半是男人,一半是女人’,而是因为这提供了一种将

① Terry Eagleton, *Saint Oscar and Other Plays*, p. 24.

② *Ibid.*, p. 45.

③ *Ibid.*, p. 16.

他与他的另外一些矛盾联系起来的方式。”<sup>①</sup>事实上,就像近来的著作所显示的,王尔德的柔弱气质及其与他的同性恋的关系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至少既是基于阶级差异的,也是基于具体的性别差异的。

(李永新 译)

---

<sup>①</sup> Terry Eagleton, *Saint Oscar and Other Plays*, p. 5.